季羡林文集

第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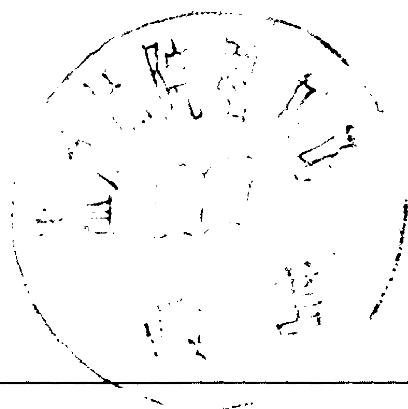
序跋杂文及其他（一）

第十三卷

序跋杂文及其他（一）

季羡林文集

江西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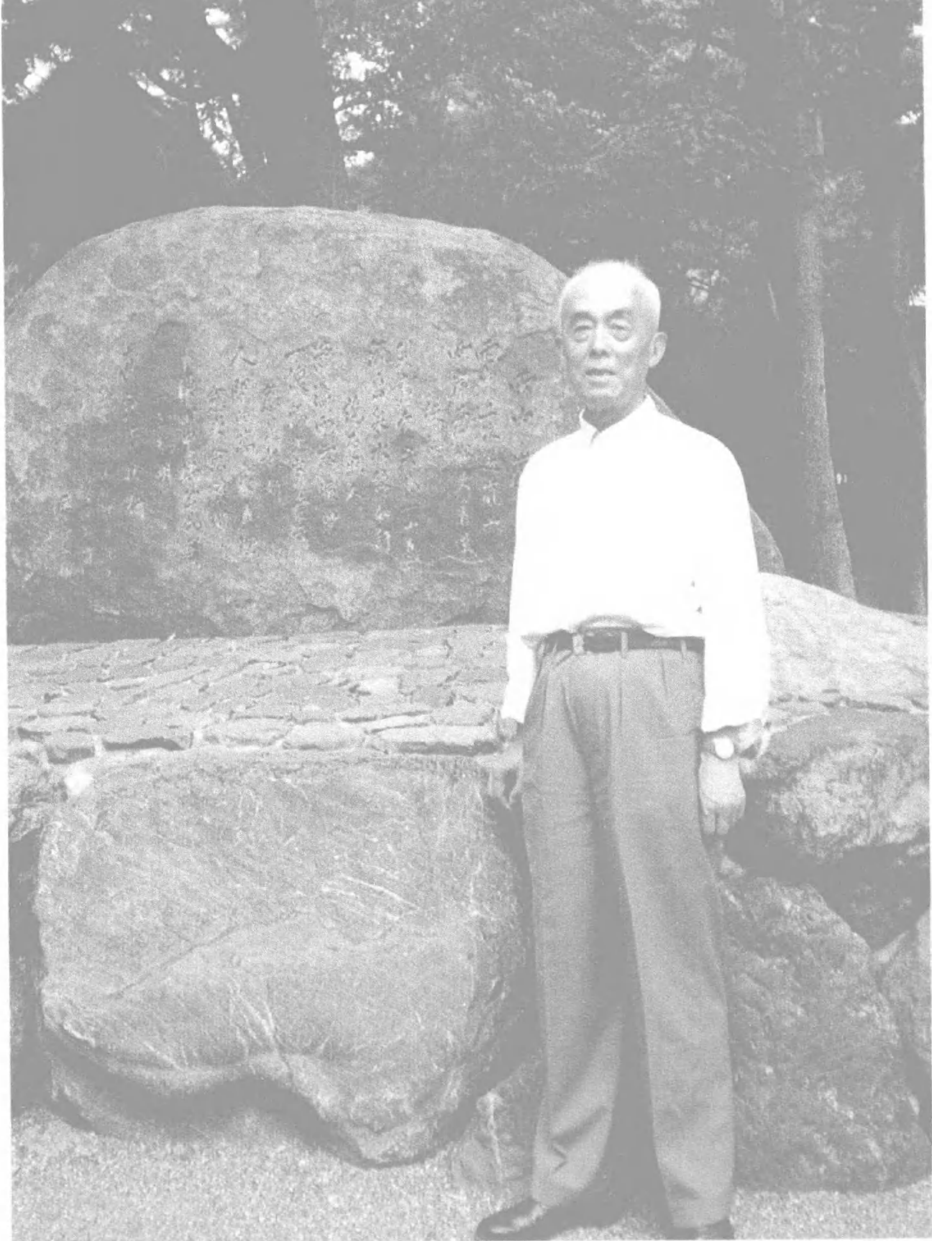
书名题字:启　功

江西教育出版社

本卷责任编委:李　铮
本卷责任编辑:吴明华
本卷责任校对:吴明华
本卷责任印制:马正毅

季羡林文集
JI XIANLIN WENJI
第十三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一)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9.5　插页:8　字数:480,000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5392-1921-1/Z·13
定价:55.00元



1986年访日，在日本岚山周总理墓碑前留影。



作者与日本梵文学者三友量顺博士合影。



1986年留影。

作者与婶母(右三)、夫人(右二)、儿、女和孙女合影。

出版说明

《季羡林文集》是1992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它包括作者迄今为止的创作、评论、论文、专著和译著。依据内容或文章体裁,《季羡林文集》暂分为如下二十四卷:

第一卷:散文(一);

第二卷:散文(二);

第三卷:印度古代语言;

第四卷:中印文化关系;

第五卷:印度历史与文化;

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第七卷:佛教;

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第九卷:糖史(一);

第十卷:糖史(二);

第十一卷: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

第十三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一);

第十四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二);

第十五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

第十六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二);

第十七卷:罗摩衍那(一);

第十八卷:罗摩衍那(二);

第十九卷:罗摩衍那(三);

第二十卷:罗摩衍那(四);

第二十一卷:罗摩衍那(五);

第二十二卷:罗摩衍那(六上);

第二十三卷:罗摩衍那(六下);

第二十四卷:罗摩衍那(七)。

除散文和翻译卷外,《文集》其他卷的文章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文章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国名和术语,在各个时期的译法不尽相同;部分标点符号、数字用法与现行标准亦有差别,为保持原貌,均不作统一处理。《文集》的全部作品这次都经过了比较仔细的校勘,主要包括更改繁体字、异体字,订正印错的字和标点符号,规范词语的用法以及核对引文等。个别引文在国内难以找到原著,才不得不网开一面,留待今后有机会再补校。凡内容重复的文章,则保留其中最完整、周详的一篇,余者删去。

虽然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进行文章的搜集工作,但仍难免有所遗漏。如果今后发现有遗漏的文章,将随作者的新作一并收录。迫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和帮助。

《季羡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4年12月

第十三卷说明

本卷收作者1932年至1989年所写的序、跋、杂文及其他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已在书刊中发表过,部分序跋还曾编入《季羡林序跋选》中出版。关于序跋部分还需说明的是:一、凡与比较文学、民间文学有关的序跋,收入《文集》第八卷,即《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卷;二、凡作者出版过的译著或论文集,整本收入《文集》某卷时,其序跋同时收入某卷;三、其余的序跋收入本卷。

《季羡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5年5月

目　　录

序　　跋

杂文及其他

序　　跋

缺 页

《胭脂井小品》序、跋

序

不知怎么一来，自己的生活竟然安静下来。四五个月以来轮车的劳顿，现在一想，竟像回忆许久许久以前的事情，同现在隔了一段很久的距离；这一段是这样渺远，连自己想起来，都有点吃惊了。

然而，这也只是最近的事；说清楚一点，就是自从移到朋友这里来住以后，才有这样的感觉。从那以后，自己居然有了一张桌子，上面堆了书同乱纸。我每天坐在这桌旁边写些什么；有些时候，什么也不写，只把幻想放出去，上天下地到各处去飞。偶尔一回头，就可以看到朋友戴了大眼镜伏在桌子上在努力写着，有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支纸烟，烟纹袅袅地向上飘动。我的眼也不由地随了往上看，透过窗子就可以看到在不远的地方有一段颓残的古墙，上面爬满了薜荔之类的东西。再往上看，是一堆树林，在树林的浓绿里隐约露出一片红墙。

但这些东西在眼前都仿佛影子似的，我心里想到朋友。朋友是老朋友，在倒数上去二十多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那时候我们都在国民小学，岁数都在十岁以下。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我当时还没有离开浑沌时期，除了吃喝玩乐以外，什么都不懂。现在一转眼就过了二十多年。在大学里我们又同学，从那时到现在也已

经十几年了。我从那个辽远的国度里回来。我们又聚在一起。难道这就是所谓“缘”么？现在回想起那小学校来,颇有隔世之感,仿佛是另外一个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了,一闭眼也真的就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小学校的长长的走廊里晃动。只有在朋友的嘴里,我还是我,还是一个活人。当他说到我同别的小孩打架时闭紧了眼睛乱挥拳头的情景的时候,连我自己也笑起来了。

在这时候我往往停止了幻想,站起来同朋友谈几句闲话,朋友也开了话匣子,一谈就是半天。在谈话的间隙里,两人都静默的时候,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抬头又看到远处长满了薜荔的古墙,古墙上面的树林,树林里隐约露出来的红墙。但这次却看得清楚了:在我住的地方同那古墙中间,有几条小路蜿蜒在竹篱茅舍边,看上去就像一条条的白痕。园子里的青菜,菜畦里徘徊着的鸡鸭都历历在目。

我现在才想到问朋友这红墙是什么地方。朋友告诉我,这长满了薜荔的古墙是历史上有名的台城,再远的古庙就是更有名的鸡鸣寺。

但又隔了好久,我才有机会到鸡鸣寺去玩,同我去的仍然是我的朋友。我们在大殿里徘徊了会,看了看佛像,又到大殿里去喝茶。从窗子里看出去,看到玄武湖。这时是六月,正是莲叶接天、荷花映日的时候,远处的水洲,湖里的荷花,荷花丛里的小船,都清清楚楚映入我们的眼中。我们的心也不由的飞到湖中去了。

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只有我自己,我看了看佛像,看了看湖。觉得无聊了,又到各处去逛。我忽然发现半山里有一个亭子。旁边一口古井。探头看下去,黑洞洞看不到底,上半透光的地方长满了青草。再转到亭子那一面,就看到一个躺在那里的古碑,上面四个大字:胭脂古井。我才知道,这口井就是有名的胭脂井。回到亭子里,靠中间的大石头桌子坐下,清风从四面袭过来,令我忘记是夏天。

不远处看到城墙，城墙上面是一片片的白云。透过城墙我想象到玄武湖，湖上的荷花。我拿出带去的书，读一段，又出一会神。想到现在，不知怎么一来，自己的生活竟然安静下来了。四五个月来轮车的劳顿，现在一想，不但像回忆许久许久以前的事情，简直不多不少正像回忆一个夏天的梦，自己现在也仿佛正在梦中了。

在这样梦境里，十年来压下去的写点什么的欲望蓦地又燃了起来，我于是用幻想在眼前的空地处写了五个字：胭脂井小品。

我又走到井旁，探头向里面看。虽然依然是黑洞洞看不见什么，但井却仿佛忽然活了起来，它仿佛能了解我，告诉我许多东西。这使我有点不安，我究竟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呢？连我自己也不敢说。我只希望我真的能写出点东西来，不要玷污了这井的名字，又可以纪念我这次同朋友的重逢。如此而已。是为序。

1946年7月14日

跋

今年夏天在南京的时候，忽然心血来潮写了上面这一篇小序。当时心头确是堆满了感触，要想写点什么。但还没等到能动笔，我又不得不离开南京重登旅途了。九月底到了故都，这半年来走过地球一半的长途旅行才算告一段落。现在转眼又是一个多月，以前从窗子里望出去，那一片浓绿的树顶已经渐露黄意了。当时堆满心头的感触也都消逝得如云如烟，不但难再追写，即便写出来，恐怕也与当时真正想写的有不少的出入了。所以现在就不再动笔，只把这小序拿出来发表了，纪念南京的小住。至于这对别人有什么意义呢，我有点说不上来。反正我自己看了，还能依稀追索出那些消逝得如云如烟的感触的影子，因而引起点渺远的回忆，仿佛

看一片夹在书里的红叶。

1946年11月1日　故都

《新时代亚洲小丛书》序

我们是亚洲人,但是我们以前却很少把眼光放在亚洲,我们的眼光越过中亚看到欧洲,越过太平洋看到美国,作了许多充满了幻想的美丽的梦。我们对欧洲和美国的了解反而比对亚洲多,这不能不算是怪事。

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而且是帝国主义就要趋于崩溃的时代,整个亚洲,除了少数的例外以外,都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的对象。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次殖民地的人民总是看不起的。在以前,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人,尤其是所谓高等华人,受了帝国主义的熏染,看不起自己,看不起自己的邻居,觉得自己和自己的邻居样样不好,什么也赶不上帝国主义。于是反以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的邻居为荣。他们的梦当然更充满了幻想,更美丽。

然而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主席却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当然帝国主义也在内,宣布:我们四万七千五百万人站起来了。这位巨人的呼声响彻全球。以前趾高气扬的帝国主义者们抱头鼠窜了,我们的受了帝国主义几百年侵略的邻居们抬起头来!亚洲的事亚洲人要自己来管了。朝鲜、越南、缅甸、马来亚各地的人民本来早已经拿起了武器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毛主席的呼声更给他们增加了勇气和信心,连印度共产党也宣言要向中国学习,中国的道路就是他们的道路。

我们自己的人当然也从美丽的梦里醒转来。但醒转来又怎样

呢？我们眼前摆了艰巨的工作。我们当然先要把中国的革命经验介绍出去，使中国革命的影响扩大开来。这样我们亚洲人才能紧密团结起来，把帝国主义这只垂死的野兽赶快打发去见阎王。但倘若对我们的邻居一点都不了解，我们无从介绍，也无从团结。

但是想了解又从什么地方了解起呢？我们的眼光一向往远处看惯了，我们看到欧洲，看到美国，却很少看到同我们靠近住在一起的有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文化外交商业种种关系的邻居。一旦要想了解他们，当然就处处感到困难。我们许多朋友都是专搞东方语文的，我们对这困难知道得最清楚，感觉得最迫切，我们明知道自己的能力不够，因为我们都正在学习中，但我们又觉得，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尽上我们的绵薄。所以我们就冒昧编写了这样一套新时代亚洲小丛书，个人就个人的研究范围写一点简明通俗的介绍。我们决不敢说，看了这一套小丛书，对我们邻居的情形就可以了如指掌，做起工作来就可以左右逢源；我们只希望，这些薄薄的小册子能帮助大家初步了解我们自己的邻居，能帮助我们团结起来——如此而已。是为序。

1950 年

朝鲜文影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谚解》序文

从极古的时代以来,中朝两国就是兄弟之邦。在悠久的历史上,我们两国勤劳勇敢的人民在文学方面、艺术方面、以及科学方面都对人类文化做了极有价值的贡献。我们互相启发,互相学习,从而提高了自己的文化,充实了自己的文化。这种事例是不胜枚举的。现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影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谚解》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对朝鲜语文完全是门外汉,在这方面,不敢班门弄斧,发表什么意见。但是据我所了解的,这样一本书至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十五世纪中叶汉语和朝鲜语的关系,以及当时朝鲜语音、语法和词汇的情况,同时从谚文的注音里还可以推断出当时汉语的发音以及汉语发音和朝鲜语发音的关系。对朝鲜语言发展史的研究和汉语语言史的研究来说,这都是极有价值而不可缺少的工作。只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影印这部书的重要意义就充分可以看出来了。

但是这影印工作的意义却不止这些。这部书具体地表现出中朝两国人民文化关系之密切,它是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一个象征。友谊虽然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在伟大的抵抗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又用鲜血给我们古老的友谊涂上崭新的色彩,增加了崭新的内容。我们今后更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为人类的崇高目的而奋斗。希望这部书的影印工作能在这伟大的文化合

作事业中加上一块哪怕是很小的砖石。

1955年2月12日

《东方研究》(文学专号)前言

《东方研究》出版了。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我们知道,我们的水平是比较低的,我们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但是,在解放后的30年中,我们东语系研究文学的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尽管在外面报刊上发表过不少的论文和译文,出过一些书籍,受到研究者和读者的欢迎,自己办的文学刊物却从来没有出过。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憾事。俗话说:一燕知春,我们这一本薄薄的刊物就算是报春的一燕吧。

从整个形势来看,中国现在确实算是春天。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是全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在努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北大的教职员工,东语系的教职员工,其中包括研究文学的教员,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工作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精神面貌是好的。他们都在勤勤恳恳地工作,希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从北大三个外语系和两个研究所来看,搞文学的同志,队伍是比较大的,力量是比较强的。他们是有潜力的。社会上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期望也是很大的,特别是一些院校中文系和研究文学的青年更是如此。如果加以组织,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相信,他们的积极性是能够调动起来的,他们的潜力是能够发挥出来的。我们现在的工作只能算是一个开端,将来北大的三个外语系和两个研究所还要共同协作,出版刊物。现在就让我们大家共同祝愿

这一只报春的燕子展翅飞翔吧。

1979年10月20日

中日友谊　万古长青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序

中国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现在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在中日两国人民长达几千年的友好的历史上,这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石窟中的壁画和雕塑,内容都是佛教的。佛教原产生于印度和尼泊尔,先传入中国,又从中国传入日本。佛教作为一个宗教,我们对它是有我们自己的评价的。但是,佛教对传播文化有很大的功绩,这一点也是无法否认的。

我常常想,横贯亚洲大陆的那一条著名的"丝绸之路",从长安(今西安)开始,一直到达地中海和黑海沿岸,长路漫漫,蜿蜒万里。中间经过无数名城:"廛闬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但是,更多的是通过沙漠:"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魅举火,灿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如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其艰难辛苦的情况,跃然纸上。

然而中国的和外国的外交使者、僧侣、商人等等,就沿着这样一条漫长而又艰险的道路,跋涉万里,九死一生,把中国的文化科学成果如丝绸、纸张、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等传了出去;又把外国的文学、宗教、科学,当然也有商品运了回来。

这一条"丝绸之路"实际上成了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大

动脉。如果没有这样一条大动脉,我们简直很难想象,今天文化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

从唐朝或更早一点的时候开始,这一条大动脉又从长安向东方延伸,一直越过烟波浩淼的大海,达到了日本。中国的文化、印度的文化,其他欧亚古代国家的文化,就沿着这一条延伸的"丝绸之路"传入日本。日本的文化也沿着这一条大动脉传入中国、传入印度,而且向更远的地方传去。

在唐代,日本来华的学者、僧侣、外交官员非常多。最著名的恐怕是阿倍仲麻吕,汉文名字叫晁衡。他长期住在中国,同当时著名的诗人来往唱和,伟大的诗人李白就是其中之一。晁衡本来准备回日本去的,但因事未果,结果就死在中国。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

到日本去的中国学者、僧侣和外交官员也是非常多的,毫无疑问,其中最著名的是鉴真。当时日本僧侣荣叡、普照于日本天平五年即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历733年,到中国留学。他们在中国留学十年,想早归故国;并有意请一些中国高僧去日本传法。他们将此意向鉴真报告,鉴真遍询弟子,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原因是"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最后鉴真自己决定去日本。中间经过许多波折,几次渡海失败,"去岸渐远,风急汝峻,水黑如墨,沸浪一透,如上高山,怒涛再至,似入深谷。人皆荒醉,但唱观音。""舟上无水,嚼米喉干。咽不入,饮咸水,腹即胀。一生辛苦,何剧于此!"虽然最后鉴真终于在天宝十二年(公历753年)达到了目的,到了日本。但是渡海时所遇到的艰辛,真可以同走"丝绸之路"渡流沙相伯仲。可见向东延伸的这一条海中的"丝绸之路"比起旱地上的"丝绸之路"来,并不见得更容易、更轻松。走这两条"丝绸之路"都是九死一生的。

可是中国的和尚和日本的和尚,并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为

了把佛教,其中也包括印度、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文化,送到日本,取回日本,他们是什么艰险也不怕的。

日本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接受者呢?决不是的。日本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接受者,他们善于学习,又善于创造。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日本的文明,也通过这一条海上的“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传到了朝鲜,传到世界其他的国家。今天日本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源远流长,有雄厚的历史基础的。

一部人类的历史、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历史都证明了一个真理:人类总是不断进步的,到了今天,创造出这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是世界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哪一个民族单独创造出来的。

专就中日两国人民的关系来说,从历史上一直到今天,我们总是互相了解,互相学习的。就以佛教艺术而论,形式上是从中国传到日本去的。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佛教艺术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人民已经在很多方面有了新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成分。我们两个民族互相了解、互相学习的情况,我们两国人民心里面都是一清二楚的。最近几年,我招待过很多日本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宗教界的著名人物,几乎每一位都流露出这种感情。唐朝的鉴真和尚,离开祖国一千二百多年,现在就要回国探亲了。我们中国人民现正准备热情地欢迎他。我相信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又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现在《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的出版,也会给我们之间的友谊大厦,增砖添瓦。就让这一本中日友谊结晶的书带着两国人民的长达几千年的友谊去接受两国人民的欢迎吧!

1980年4月7日

《东方研究》(历史专号)前言

《东方研究》曾出过一期东方文学,现在再出版一期历史。

同文学一样,我们对东方国家的历史的研究工作,虽然已经进行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只如蜻蜓点水,认真严肃开展工作,现在才只能说是开始。文学的那一只报春的燕子已经飞出去了,现在我们再放出一只历史的春燕。

总起来看,我们国家研究东方各国历史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我们北京大学东语系也不能例外。我们学习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这一点我们自己非常清楚。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研究东方史又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我国几千年来保留下来了大量的史籍,其中有很多有关东方国家的记载,这些记载一般都是翔实可靠的。对许多国家来说,这些记载都是非常宝贵的。世界各国研究东方史的学者都可以利用这些资料。但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国家研究东方史的学者利用起来会更容易,更方便,因而也就更有责任,把这些史料整理好、利用好,写出价值比较高的著作。这是全世界东方史学家对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东语系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们愿与大家共勉之。

常言道:"一燕知春"。我们东语系力量很薄弱,只能算是"一燕"。但是我们却不满足于一燕。我们希望的是,在东方史研究的园地里飞燕满天。

1980年4月21日

锦上添花

——《国外文学》代发刊词

当前我国关于外国文学的刊物有如雨后春笋,争奇斗妍。这充分说明,我国广大的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同志们,砸碎了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使我国的外国文学园地开出了朵朵鲜花,姹紫嫣红,花团锦簇。无论如何,看来广大读者的需要已经能够得到满足,没有必要再出版什么新的刊物了。借用一位同志的话说,就是,没有必要再锦上添花了。

那么,北京大学为什么偏要来锦上添花呢?

这原因应该从几个方面谈起。第一是北大的主观力量。北大与外国文学有关的目前有三个系、两个研究所。语种新的与古的加起来有二十多个。当代的重要语言应有尽有,还有一些国内少见的稀有语种。古代语言除了亚洲的以外,还有欧洲的。从事外语教学和研究的教员有三百名之多。其中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的有60多人。即使我们的水平还有待于提高,我们的学习任务还很繁重,但这毕竟是一股比较强的力量,而且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同志们都有很大的干劲,有很高的积极性。这种干劲和积极性应该充分加以调动。

其次,社会上对外国文学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一般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对外国文学有强烈的爱好。我自己就经常接到青年朋友的来信,有的甚至把钱寄了来,托我给他(她)买外国文学的书,并且声明,什么书都行。每次看到信和钱,我心里就久久

不安。在一个下乡知识青年手中，十几块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是他们节衣缩食省下来的，我们怎样去满足这些嗷嗷待哺的青年，不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吗？此外，许多大学和师院的中文系都有外国文学这门课程。怎么把这门课程教好，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大学和师院的老师和学生都同样迫切需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中译本和研究论文。我仿佛看到千千万万的青年站在我们眼前，渴望着我们帮助他们。对于这样一些青年，我们能够无动于衷漠然置之吗？

最后，还要看一看我国研究外国文学的情况：成绩很大，这为主；但也还有不少不足之处，这是其次者。即使我们现在暂且不谈2000年前对印度文学的介绍，我们近代介绍外国文学的历史已将近100年了。在这期间，我国的先进的学者把大量的外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来。最初当然是筚路蓝缕，惨淡经营。一个不懂外文的林琴南竟然同别人合作译出了大量欧美文学作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到了鲁迅时代，他以惊人的毅力毕生锲而不舍地介绍外国文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能是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30年代出现过光辉灿烂的局面。解放后，我们介绍外国文学的成绩更是远迈前修。质量与数量都决非解放前能够比肩的。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仅仅看到这一点，也无助于进步。倘若把过去的将近100年的历史做一个回顾与总结，就会发现，我们的介绍，无论从国别方面，还是从一个国家的作家作品方面，都有不平衡之处，片面之处。我们从来很少制订什么介绍计划，即使有了计划也由于某一些原因未能完全实现，有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

把上面说到的几点归纳起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再在锦上添一点花，好像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怎样来在锦上添花呢？我们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补苴罅隙

过去的翻译和介绍，既然还有点不够全面，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不全面或者缺陷弥补起来。这种例子多得很，简直是不胜枚举。我只举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家——印度。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年轻的印度文学爱好者。在谈话中，他认为一部印度文学史就是这样的：古代有两部大史诗（连这两史诗也只是听到名字），中间有一个迦梨陀娑，他的名著是《沙恭达罗》，近代有一个泰戈尔和一个普列姆昌德，如此而已。我听了简直大吃一惊，啼笑皆非：难道印度文学就是这个样子吗？继而一想，造成这种情况的不就是我们自己吗？我们从事印度文学研究的人，没有全面地介绍印度文学。就连那两部蜚声世界的两部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过去也没有认真介绍过。造成这种恶果的就是我们自己。其他国家情况也差不多。连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也都有类似的情况。这种情况，过去没有注意到。今天既然知道了，当然要加以改正。

一般说起来，我们对欧洲中世纪一直到古典主义这一段的文学介绍得比较少，其他国家的中世纪或与中世纪相当的文学也介绍得很不够。一提到中世纪就想到黑暗时代。现在已经有人发现，那个时代也并非完全黑暗。当然我们也决不能说，那个时期的文学特别繁荣，特别优异，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个时期的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有其特点，我们也应当适当地加以介绍。至于一些小国家，一些大国家的小的语种，往往为我们所忽略。一些国家的古代文学，比如伊朗和埃及，介绍得几乎等于零。过去我们介绍外国文学，往往有一阵风的情况，说是泰戈尔，那就大家都瞅着泰戈尔。说是巴尔扎克、高尔基，那就大家都瞅着巴尔扎克、高尔基，一涌而起。不是说这些伟大作家不应该介绍，而是说要有计划地全面地使用力量。我们过去没能做到这一步，现在都要加以弥补。

此外,有一些世界名著,过去译本质量不高,有的还是间接译过来的,比如果戈里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易卜生的戏剧。看来这一些都有重新翻译的必要。

要想做好上面这些工作,决非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办到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决非一个单位能够胜任的,全国研究外国文学的单位或个人,应该通力协作,先订出一个十年计划,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地把这些补苴罅隙的工作做好。我们北京大学的同志们愿意追随全国同行之后尽上自己的绵薄。

第二,继续介绍

上面讲的是弥补过去的不足之处。这里再谈一谈当前和今后的工作。现在全世界各国形势都在不断地变化,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当然也决不会一成不变,而是日新月异,人材辈出。我们应当紧紧跟上形势。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国外情况不甚了了。现在情况改变了,我们应该努力把外国当前的文学加以介绍。

介绍当前的文学,要冒一定的风险。情况在变化,人也在变化。一个作家今天是这样子,明天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今天觉得好,介绍了。明天可能就会受到谴责。而古典文学作品都是经受过时间考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早有定评。那些经受不住时间考验的作品早已被淘汰了。当前的作品却完全不同。西方有一句谚语"闪光发亮的不都是金子"。眼前有一些作品可能闪着光发着亮,但过了不久有的就会光消亮逝,很少有人再去理睬。比如过去颇为流行的辛克莱的小说和《西线无战事》之类的作品,现在很少有人提起。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的意思是,只要真闪光发亮,我们就要独具慧眼,加以介绍。至于能否长期发光,永久发光,那是另一回事。这是由中外广大读者去决定的,我们只能尽其在我。

第三，了解情况

我在这里指的是下列的情况：

1. 国外各学派或流派；

2. 文学史上一些争论的问题；

3. 一个国家研究另外一个国家文学的情况，比如苏联研究其他国家的文学，其他国家研究苏联的文学的情况；

4. 外国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等等。

所有这一些情况，我们都需要了解。这些东西虽然不是文学作品本身，但对我们了解外国文艺界的情况，促进我们自己文艺创作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帮助。

第四，开展比较文学的研究

比较文学在过去我们搞的很少，甚至连这个名词本身都有点陌生。然而在国际上，比较文学早已蔚成大观，成为一个有系统理论的学科。在不少国家的不少大学中都专门设有比较文学系。它对促进文艺科学的研究，加强民族和人民间的互相了解与友谊，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追溯民族与人民间互相学习的历史都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准备大力提倡一下这种研究。既准备发表理论性的文章，也准备发表一些说明具体事例的文章。希望造成一个研究比较文学的风气。

以上是我们准备做的几件工作。下面谈几个与我们这个刊物有关的原则：

一、普及与提高

两方面都要顾到，这是不言而喻的，对其他刊物也同样是适用的。在这里我只想谈一点有关普及的意见。我们认为，普及是非常必要的。问题是怎样来普及。我们必须给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提供知识，提供美感享受，帮助他们一步步提高欣赏外国文学的水平，对他们的创作或研究提供借鉴，同时培养他们高尚的

情操。但是我们决不能迁就某一些读者的口味,为了达到经济目的,弄一些不够文学作品的侦探小说或惊险小说之类,硬塞给读者。我并不是笼统地反对侦探小说或惊险小说,真正够上文学作品水平的,我们仍要介绍。同时,我们也决不故弄玄虚,弄一些表面上似乎很高深、实际上是以高深文浅陋的东西强加给读者。但是对外国古代一些只能为少数人欣赏的文学作品,我们也要介绍。让能欣赏的人欣赏,不能欣赏的人也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文学作品,借以开扩眼界,增长知识。我们要有下里巴人,也要有阳春白雪。我们决不孤芳自赏,也决不随波逐流。

二、严肃与活泼

对研究外国文学的人来说,这也是常常遇到而又难以处理的矛盾。我们的印象是,一般的外国文学刊物偏于严肃,内容多半是正规的("古典"的)小说,诗歌,戏剧。这些东西确有必要介绍。但是如果仅仅限于这些,未免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外国还有不少的作家,除了写堂堂正正的文学作品外,还写一些抒情的短文、书札、游记、日记、札记之类,还有些作家写作家回忆录。他们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信笔挥洒,不加粉饰,然而却是本色天成,逸趣横生,有如吹皱一池春水,自成文章。一般读者是喜欢这类文章的。读起来往往是手不释卷,一气到底。我们想设法多介绍一些这样的作品。至于中国作家写的国外文学家访问记,我们也准备发表一些。总之,我们想尽量使严肃与活泼相结合,在严肃上显出活泼,避免趋于一端。

三、译文与论文

我们是两者并重。但是根据我们的了解,读者需要更多的是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因此,我们就决定译文多于论文,占大约五分之三或者更多一点的份量。

对于论文,我们希望水平能高一点,能有一些经得住考验的独

到的新见解。我们是在大学里工作,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做到这一步。我们希望能有一些经过长期积累资料细致分析探讨然后写成的论文。我们希望这些论文真正能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水平起到提高的作用,不管这个提高是多么微小。

上面是我们的一些主观想法。至于双百方针,那是繁荣文学艺术科学研究的根本方针,我们当然要努力贯彻。对于论文的观点,我们提倡展开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讨论。对本刊译文的质量,我们也提倡不同的译文,不同的译风,不强求定于一尊。我们还准备刊登一些书评,对国内外一些影响较大的文学论著或译本提出自己的意见,共同切磋琢磨,求得进步。

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个刊物应有一个独立的"形象"。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那么我们这个刊物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我们认为,把上面说到的那一些经过大家讨论而提出来的想法变成现实,刊物的"形象"即在其中了。刊物,同人一样,面貌都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决没有长三只眼睛、两个鼻子的人。刊物亦然。我们这个刊物同其他刊物大体上也是差不多的。这是大同。但一个人同另一个人,一个刊物同另一个刊物,又确有不同之处。这是小异。一个刊物"形象"的关键,就在这个小异上。我们也将在这一方面努力工作。但是"形象"的形成决不是短期可以做到的。只能慢慢地、逐渐地、由模糊到具体、由片段到全面,这样形成起来。我们的想法不见得全都正确,实现这些想法更有困难。希望得到各方面的帮助与批评。

现在再回头来看看锦上添花的问题。我觉得,在这里,问题不在"添",而在"花",究竟是要添什么样的花?究竟是花不是花?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说,我们想添的是真正的花,是在外国文学的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花。但究竟能否做到这一步,主观愿望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看客观效果了。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与渴望,把

我们这一本《国外文学》送给国内外广大的读者。

1980 年 7 月

《胡隽吟译〈学术论文集〉》序

胡隽吟女士把她以前翻译的、已经出版过的许多德国学者的学术论文汇为一编，重新出版。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些篇论文虽然都是几十年前写的，但是一直到今天仍然很有用处，仍然从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东西。

德国学术，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成绩斐然，名家学者灿如列星，在国际上一向享有盛名，受到各国学者的热烈赞扬。原因何在呢？原因当然会是很多的。各人也可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据我自己的管见，最重要的原因是就举世异口同声说的“德国的彻底性”(Deutsche Gründlichkeit)。德国学者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就是努力掌握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包括德国的和外国的。德国学者都广通声气，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几乎都有联系，因此，全世界研究动态，他们基本上都能掌握。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学说，都有成竹在心。在这个基础上，或者与此同时就大量搜集资料，不厌其详，不惧其远，只要能搜集到的，全都搜集。这两件工作做完以后，才努力分析资料，然后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即使不可能就是最后的结论，但就当前而言，已经是比较可靠的了。

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本书中所收论文作者之一傅吾康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我是一向钦佩的。过去的不必说了，就拿眼前傅吾康教授所进行的工作来说，也可以充分表现出这些特点。傅

先生正在进行东南亚华侨问题的研究。据他自己说，他为了调查华侨的历史情况和当前情况，曾跑遍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城市与乡村，市场与学校，古庙与墓地，只要有有关华侨的资料，不管是匾额，还是碑铭，不管是活的资料，还是死的资料，傅先生无不广为搜罗，而且把这些东西都拍成照片，分门别类，储存备用。他利用所有的交通工具，从最近代化的飞机、火车，一直到比较原始的骡车、小船。有时候也难免遇到一些惊险。吃苦耐劳那就更不必说。然而傅先生却是锲而不舍，决不后退。甚至一件不太重要的资料，也决不放过。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工作着。我上面谈的"德国的彻底性"，在傅吾康先生身上难道不是表现得很具体、很充分吗？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像傅吾康先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也就不再举了。胡隽吟女士现在的这一部书，其中所收的论文无不充分表现出"德国的彻底性"。因此我才说，出版这一部书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我祝贺这一部书的出版。

1980年10月29日于北京

《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序

中国立国亚洲，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时间内，我们同我们的邻国和比邻国更远的许多国家，一直在进行着经济、文化交流。这种交流，虽然时高时低，时断时续，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是总起来看，可以说是一直没有完全断绝。这对我们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起了促进的作用，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彼此文化的内容，为我们的人民造了福利。

我们始终认为，在世界上，国家有大小，历史有长短，经济、文化发展有差别，但每一个民族都对全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宝库有所贡献。那种认为某一个民族或某几个民族是唯一的文化创造者的议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愚昧无知。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

现在人类历史已经到了 20 世纪末叶，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已经大为便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来往更频繁了，我们互相学习的机会更多了。我们相信，这种学习，同过去几千年一样，一定会丰富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促进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这样的时候，如果回顾一下我们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互相学习以及相互支持的历史，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它可以加强我们的团结，增进我们的友谊，提高我们的信心。

在这样的考虑下，我们北京大学从事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

同志们，把我们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写了下来，集成这一本书。尽管它可能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们为了加强人民间的友谊与了解的心是真挚的。就让这一本书带着它的优点与缺点，希望与信心，走到中外读者中间去吧。我们相信，它在建造人民与人民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友谊与了解的金桥方面，一定会起到自己的作用。

1981年8月21日

《谚语手册》序

在世界上，不管是哪一个时代，也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在长期与自然的斗争中，在阶级斗争中，在处世、待人、接物中，都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与教训。表达这些经验与教训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用谚语来表达可以说是其中最常见、最方便、最易行的。

谚语，有的人称之为“炼话”，就是精炼的话。既然是精炼，就不会太长。不太长，也就容易记住。有不少炼话，又合辙押韵，就更容易记住。因此，在全世界各地老百姓口中，文人学士的著作中，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谚语。谚语实际上就成了一个民族继承传统智慧的工具。

在我们中国，在过去，已经有不少的有心人搜集过谚语，并且印成了书。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有心人，他们也做过搜集谚语的工作，而且出了书。一般都只限于一个国家。跨国的谚语词典也是有的。1972 年在意大利出版的意、拉丁、法、西、德、英、古希腊七种语言对照的《谚语词典》(Dizionario Comparato di proverbi e modi proverbiali)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这一部书受到了国际上普遍的欢迎。

现在王常在同志的《谚语手册》又摆在我们眼前了。据我所知道的，中国过去搜集谚语的书虽然相当多，但是范围大到“古今中外”却还是第一部。过去有一些谚语集只注意中，而不注意外；只注意古，而不注意今；现在这一部却避免了这个缺点，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谚语都搜集起来，真可谓洋洋大观了。只要看一看目

录就可以知道,内容是多么丰富,分类是多么细致。它几乎包括了人生的各个方面。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如何说话,如何做人,如何修养,如何学习,如何工作,如何待人,如何立志,如何勤奋,如何处理家庭问题,如何讲究卫生,总之,处世待人,应对进退,人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几乎都包罗无遗。不但中华民族的过去的智慧,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人民过去的智慧,一开卷,就都跃然纸上。从前有一句也算是谚语的话"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其中有合理的成分,也难免有一点儿夸大。今天我们稍稍加以改动:"秀才不出门,便得天下利。"把这句话用到王常在同志这一本书上,也许没有人反对吧。

我上面讲到搜集谚语都是古今中外的一些有心人。我现在觉得,在这些有心人中,王常在同志是最有心的人。难道我这是阿谀奉承吗?不是的。我同老王同志认识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几年的时间。他从外单位调到北大来主管总务方面的工作,去年又离开了北大。我是最怕同人交际的人。对老王也不例外。平常只是开会时见见面,说上几句寒暄话,如此而已。但是我却逐渐发现,常在同志为人非常淳朴、正派,心直口快,不像我有时候见到的极少数有"官"架子的人。虽然我们的交情仍然是"淡如水",但心中却有了好感。

但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王常在同志竟然用了30年的时间搜集古今中外的谚语。说句坦白的话,我下意识地认为,只有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干这个活,而王常在同志却是被我在下意识中排出于知识分子之外的人。我认为他也不过是搞一点后勤工作,关心人的吃喝拉撒睡。言外之意,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搜集谚语这样的工作简直同他风马牛不相及,用最大的幻想力也不会联在一起的。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实的思想,尽管是下意识的,就是这样。

我这个人有很多毛病,但是在解放后,我逐渐有了一点自知之明,经常在剖析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对别人还是知道尊重的。可是,王常在同志这个例子却明确无误地告诉我,我在下意识中还放不下知识分子的架子。我们自己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有时候知识并不很多,傲气却并不少。王常在同志尽管不在大学里教书,他却是最好的知识分子。他能够常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搜集古今中外的谚语,做出这样有意义的工作。我说他是有心人中的有心人,难道不公允吗?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除了从王常在同志搜集的谚语中可以学习到许多有益的东西之外,王常在同志又成为我的一面镜子,从中照见自己的不足,促进自己的思想改造。因此,虽然我对搜集谚语的工作了解不多,我写的序也决不会为本书增辉,但当王常在同志提出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序言的时候,我却满口答应了下来,写了上面这一些话。

1982年1月28日凌晨

《〈大唐西域记〉今译》前言

唐代著名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久已蜚声士林,在国内和国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文、英文和法文都已有了译本,而且不止一种。这是译为外文的情况。最近几十年来,国内古典今译之风颇为盛行。《诗经》、《书经》、《左传》、《楚辞》等等古籍都有了今译本,大大便利了对古文不太熟悉的读者。《大唐西域记》怎样呢?

几年前我同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的几个同志接受了中华书局的委托,从事于《大唐西域记》的注释工作,最近即将脱稿。我们都觉得,对《大唐西域记》作注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中外一些读者对这本书的一些词句了解起来就会感到困难。但是对于将《大唐西域记》今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是因为《大唐西域记》由于用唐代散文写成而容易读吗?不是的。绝大部分的词句,一般读者是可以读得懂的。但是少量的词句却决非如此。中国古今读者怎样感觉,我说不上。现在看日文、英文和法文译文中的那一些错误就可以知道,这部书也并不都那么容易读懂。因此,我们不考虑今译,应该说是一个疏忽。

但是这个不利的疏忽却为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们弥补或者纠正了。他们向我们提出今译的问题。我们感谢他们的提醒,立即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又组成一个今译的班子。参加者一部分是参加注释工作的同志。这样一来,可能收到驾轻就熟之效。每个人都在其他工作的间隙里,满怀热情地开始了今译的工作,到现在也有一年多了。今译稿已经完成。

现在先将参加者的姓名按原书卷数的顺序开列如下：

第一卷，第十二卷	张广达
第二卷，第三卷	季羡林
第四卷，第五卷	李　铮
第六卷，第七卷	谢　方
第八卷，第九卷	蒋忠新
第十卷	王邦维
第十一卷，序和赞	杨廷福

在开始今译之前，我们先商定了一些翻译原则。我们认为，严又陵对外文汉译提出的信、达、雅，在古籍今译中也是适用的。信，就是忠实于原文，决不能随意增删。达，就是使用标准的普通话，把原意表达出来。雅，就是尽量表达出原文的风格。翻译完了以后，我们又把翻译时遇到的一些问题，统一作了讨论，加以解决，同时还统一了译名。全部译文最后由季羡林看了一遍。

翻译完毕以后，我们都感觉到，这个今译的工作决非可有可无，而是非有不可。我们每个人都遇到不少难懂的词句。有时候我们也参考日、英、法等译文。我们发现了译文中的一些错误，但同时也学习了不少的东西，足资我们借鉴。特别是日本学者水谷真成的译文我们参考得最多。参考时，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日语专业的于荣胜同志帮助了我们，谨向他致谢。对水谷真成先生我们也表示谢意。

我们感觉到，中国唐代以来读《大唐西域记》者众矣，但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完全读懂的恐怕是绝无仅有。好多人大概就学习了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了。

同时，我们又想到，《大唐西域记》虽然已有英译本，但都是程度不同地有错误的。研究印度史、中亚史，《大唐西域记》是不可缺少无法代替的瑰宝。而英文又是在印度以及世界各地最流行的语

言。从已有的英译本的水平来看,实有再译之必要。此意我曾向印度著名的唯物主义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巴教授表示,得到她热烈的赞成。我也曾对一些西方的学者谈过,他们也一致表示赞同。我们已准备请人将此书再次译为英文,而根据的本子,就只能是我们的今译本。我们的想法是,让精校本、注释本、今译本和英译本这四种本子构成一个整体,互相补充、互相关照。读者使用时也请注意到这一点。

现在今译本已经完成,它将带着自己的优点与缺点,与读者见面了。我们已经尽到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草率从事;但决不敢说,一点误译的地方或理解不同之处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恳请读者指出错误与不足,以便将来改进。我们今译是靠集体,将来改进时仍将要靠集体,而且是更大的集体。

1982年9月29日

《中外文学书目答问》序

列宁有两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共青团的任务》)。什么叫"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呢？顾名思义，内容一定是非常广泛的，生产斗争的知识、阶级斗争的知识等等一定都包括在里面。但我想文学作品在其中应该占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学作品能增长人的知识，开阔人的眼界，给人以美的享受，能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人的性灵，提高人的文化修养和鉴赏水平。而没有这种修养是很难完成自己的工作的。

但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一个人即使用上毕生的精力也决不会都读完的。因此就需要介绍。我们编的这一套《中外文学书目答问》就是为了给爱好文学的青年提供一些常识性的介绍，并做些阅读辅导。俗话说："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青年们一定能够根据这些简单的介绍选出自己所喜爱的文学作品，再进一步阅读全书。如果只停留在阅读这些简单的介绍上，那不是我们的想法，也不是我们的希望。

阅读文学作品是不是只限于文学青年呢？不，不是这样。我在这里不谈理论，只举两个现实的例子，因为现实的例证最有说服力。一个例证是北京一所搞工业的学院。院领导给学生开了一门有关唐诗宋词的课。原意只不过想给他们增加点中国文学的常识，结果却收到了完全为始料所不及的效果：青年学生学了这些诗词大为激动，大为兴奋，他们原来不十分知道我们伟大祖国竟有这

样一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现在他们觉得祖国更加可爱了,无形中却成了一门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程。此外,在陶冶性灵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相信,这对他们以后搞纯技术的工作也会有很大帮助的。

另一个例证是一个钢琴家。他旅居国外,名震遐迩。外国的音乐批评家都说他的弹奏中有一种说不出的优美深刻、从容大度的风格,是欧美钢琴家所没有的,使听者耳目为之一新。这种风格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位钢琴家自己说,这得力于他的父亲,他年幼时,父亲每天让他背一首唐诗宋词之类的旧诗词。积之既久,心中烂熟的那几百首旧诗词对他心灵的陶冶,不觉形之于钢琴弹奏中,从而产生让人赞叹的效果。

这两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阅读文学作品不应只限于文学青年,其他各科的青年,不管学的是工程、技术,是自然科学,是房屋建筑,无一不需要读点文学作品。一般人的看法,认为学习理工的青年可以不必分心去读什么文学作品,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走进一个家庭,走进一家旅馆,只要看一看他们房中的陈设,就可以知道,这家的主人和旅馆的主持人或建筑师有没有文化修养,文化修养是高还是低。至于园林的布置,建筑物的设计,更与这种修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大家都承认的,用不着多说。有没有文化修养,文化修养之高与低,不但表现在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上,也表现在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应对进退上,有与没有,是高是低,给人的印象迥乎不同。

总而言之,我的用意只是想说,青年是我们未来希望之所寄托,他们的任务一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由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进而走向共产主义,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学习业务。除了自己专门的业务之外,一定要读一点中外文学作品,这同他们的终生事业有关,决不可以等闲视之。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今天我们

广大青年的抱负，但是想达到这个目的，光靠政治觉悟还是不够的，必须掌握“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

1983 年 4 月 14 日晨

《弭菊田画集》序

对于国画，我似乎还有一点欣赏能力，是好是坏，是美是丑，是精是粗，我似乎能够辨识；但实际上，我却是一个门外汉，我连一笔画都画不了，谈论国画，不是班门弄斧，就是野狐谈禅。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因此我对菊田的画，除了说“画得很好”之外，不再赞一词。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却有许多话要说。菊田是自学成家的一个典型，一个很好的典型。在“四人帮”时代，甚至在“四人帮”之外的某些时候，“个人奋斗”被批得“臭”不可闻。仅仅为了个人名利而奋斗，我们当然不能提倡。如果为的不是个人，或者不仅仅为个人而努力奋斗，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们常常说，人是应该有一点精神的，这一点精神表现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努力奋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就是：拼搏精神。

在菊田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种奋斗拼搏的精神。按照他的家庭环境，在旧社会，他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商店的老板，或者政府机关一个小公务员，如果再向下滑一步，他可能成为一个靠吃祖宗遗产过活的浪荡公子。这样的人物，我们亲眼看到的难道还不够多吗？

然而菊田却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学了书法，学了国画，学了治印，学了刻竹，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成了有成就的艺术家。在旧社会不必说它了，到了新社会，他就靠这艺术上的成就为人民服务，为祖国争光。

今天，我们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全国形势确确实实是一片大好。但也还是有困难，而且有极大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要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主要的，我认为，就是在全民中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特别是靠自己的力量努力成才，努力成家的精神。从这方面来看，我们要向菊田学习的不仅仅是他那高超的国画艺术，而更重要的是他那锲而不舍努力奋斗的精神。

给一个画册写序，本来是应该谈画的，因为我不太懂画，只好说些别的话。但我并不认为我这是离题万里。我把艺术同努力奋斗结合起来，顺理成章。我还可以说，一切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无一不应该同努力奋斗联系起来。这一点精神，是绝对不可以缺少的。再把话缩回来，缩到菊田的画集上，我只能说两句话：我们要学习菊田的画，但我们更要学习他的自学成才、努力奋斗的精神。

1983年6月14日

《启明星》序

吴继路同志写信给我，要我给《启明星》写一篇序。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推掉。但是看到附来的《启明星》的目录，按年龄顺序排列，我的名字赫然站在首位。在这“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我只好屈服了。不屈服又怎么能行呢？我拿起笔来。

我拿起笔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有人给我机会让我对少年同学们说几句话，我简直觉得是莫大的幸福。我也是有过少年时代的；但是，到了今天，再回忆起那个时代来，云烟渺茫，真是恍如隔世了。

当我还是少年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少年特别幸福，特别可爱。有时候，反而有些愤愤不平之意，很想赶快长大成人，好同大人分庭抗礼。以后进入青年、中年。辛稼轩词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他这里说的“少年”，据我理解，实际上是指青年，甚至是中年的一部分。我在青年时期，愁滋味识得颇为充分。但我不赋新词，因而也不爱上层楼，只是觉得人生艰难而已。我对别的青年或中年，除了至亲好友之外，几乎是漠不关心的。然而时间只是流逝，一转瞬间，自己已经进入老境，再引辛稼轩的词：“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我的心情完全不同。“文化大革命”中间，也确实识尽了愁滋味。但那只是暂时的现象。到了今天，尘霾已息，朗日重明，我没有什么愁可说，也用不着说“天凉好个秋”。只是对于少年儿童，感情却越来越深，深的程度可以说是同年龄成正比。这一点，

在我青少年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大概是，自己一进入老年，想的问题就多了起来。我从不叹老，也不嗟贫，认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是自然规律，用不着嗟叹。不过自己毕竟有了一把子年纪，迟早会向地球告别的。但是地球决不停止转动，人类也不会停止进步，光明就在前面，希望在于将来。二三十年以后，担负起伟大建设任务的不就是今天的少年吗？因此，年龄增加一岁，对青少年的感情就增加一分。这种心情，我不说，青少年是未必知道的。而且我这种心情，我相信，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决不会为我一人所垄断。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能有一个机会对少年同学们说几句话，我认为是一种幸福，不是很自然的吗？

人人都有一个少年时代。本书的作者们当然不会例外。这些作者，很多我都是认识的。尽管年龄还有一定的差距，各个人的少年时代也不会完全相同。但是根据年龄计算一下，我们都在旧社会生活过一段时间。旧社会的那种情况，旧社会的“愁滋味”，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尝过而且“识得”。这种滋味，今天的少年，做梦也不会梦到的。今天的少年有福了。你们是在蜜水中成长起来的。这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是，你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发育正常而健康，没有受过挫折或打击。坏的是，你们社会经历太少，对好多事物，无从比较，难以鉴别。本书中所收的文章，有的记述了作者童年时代的一些经历。我相信，你们从中可以了解一些过去时代的情景，也许能间接识得一些旧时代的“愁滋味”。你们可以拿这些文章当作镜子，从中照见你们和我们的不同，过去和现在的不同。这会有利于扩大你们现在的远远超过我们当时水平的知识面，对社会认识更深刻，对生活体会更全面。当然，这些优美的散文也会给你们一些艺术享受。

你们听说过“代沟”这个名词吗?看样子,这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一个名词。意思是两代人之间的鸿沟。我同你们从年龄上比起来,已经不是两代人,而可能是三代或者更多的代。我们之间有一条“沟”,这是很自然的,用不着大惊小怪。我们只有承认这个事实。

但是我们之间难道就没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情了吗?我认为,还是有的。我一生在教育界工作,天天同学生接触。我一向自认为是了解同学的。可是最近几年以来,我却越来越感觉到我们彼此互不了解,特别是我不了解学生。我常常以此为苦。但是我在这里想着重说一句:也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互不了解。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是心心相通的,比如爱国主义,就是其中之一。

我同别的人一样,也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我常常剖析自己,剖析自己的优缺点何在。我认为有一点是值得提出来的,就是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我头脑里有时候也有一些畅想曲。我曾幻想,有朝一日,如果在祖国与个人生命之间非有所抉择不行的话,我究竟选择什么?我的回答简单而又坚决:祖国。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我的每一个灰分子也是热爱祖国,决不变节的。这当然都是瞎想,不过也略能表达我的心情。在这方面,我同许多大学生是有共同感情的。一提到振兴中华,他们就立刻来了劲。这不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吗?

你们少年同学怎样呢?我没有同你们谈这个问题的机会,我不敢说。但是我坚决相信,你们也会同你们大学生哥哥姐姐是一样的。你们也热爱我们的祖国。这一点是环境决定的。中国过去是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国家,我们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之所以有强烈的爱国心,其根源就在这里。你们当然没有识得旧社会那种愁,但是你们从家长、老师那里,从父辈、祖父辈那里,也会了解到,感觉到这一点的,所谓潜移默化、耳濡目染者就是。你们从这一集子

中的某一些文章中也能领会到一点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会感到无限的欣慰。我在本文开始时,写出的那一句话,“有人给我机会让我对少年同学们说几句话,我简直觉得是莫大的幸福”,就不至于落空。

今天我们的祖国,在克服了灾难之后,正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幸福,前途越来越光明。这一点,我们老年人感到了,你们少年同学们也不会感不到。现在我想改一改辛稼轩的词:“而今尝尽喜滋味,欲罢不能,欲罢不能,频说喜事千万重。”

1983年7月31日

《北大研究生论文集》(文科版)序

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同志们出一本论文集,要我写几句话作为前言。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个任务。

集子里的文章我一篇也没有看,我这个前言只能说一些空话;但我确实希望,我的空话还能有一点实质性的内容,不至于流为废话。这一点有实质性内容的空话是我对青年们说过多少次的。这一次又能有机会对北大的研究生说一说,所以我感到愉快。

中国有两句老话: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又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些话都是总结了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也包括学术研究的历史在内而得出来的结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发展,才能进步,才有光辉灿烂的前途。如果像九斤老太说的那样,一代不如一代,那么我们人类再过一些年就会退回到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再退恐怕就要退到猿猴阶段。这是完全不能够想象的。

但是,是不是年轻的一代,新的一代,只要有年轻这一个条件作为靠山,把枕头垫得高高的,大睡其觉,一点努力也不需要,只要守株待兔就能出于蓝而胜于蓝呢?当然不是。需要的正是它的反面。青年人一定要加倍努力,刻苦学习,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攀登高峰,才能达到出蓝的境界。这里面,没有什么捷径,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一切懒惰的念头,一切取巧的办法,都要彻底丢掉。

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有了不知多少

代师生衣钵相传的关系,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都有自己的贡献,每一代人都是踏在前一代人的肩头上向上攀登的,今天我们学术研究的光辉成就就是这一代代人接力赛似地创造出来的。其中也包括向外国的借鉴。

今后怎样呢?今后也决不会另外换一个样子。今天的青年人,今天的研究生,要从老师手里接过学术研究的火把,把它点得更亮,让它放出前所未有的光芒。要知道,将来还会有比你们更年轻的人出来接你们手中的火把,如此绵延不断,直至永恒。

我同你们年龄悬殊,任务也不尽相同,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总的方向是一致的。我们要共同努力,奋发图强。前进吧,年轻人!

1983年9月21日

《中外关系史译丛》前言

对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同行们来说,《中外关系史译丛》的创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在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那自然难免。"这话完全符合事实。但同时,我们还要说,中国也影响了别的国家。中国自有历史以来,自从立足于世界国家之林以来,就处在这种相互影响之中。所谓中外关系史就是要研究这种交光互影的情况。

在世界所有的民族中,中华民族是最喜爱历史的民族。我们一部《二十四史》,还有其他的许多史书,就足以证明这个事实。中国史籍中不但有关于中国本国的记载,而且有大量关于其他一些国家的记述。到了今天,这些记述就成了研究其他一些国家的历史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史的瑰宝。

因此,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外关系史方面具有明显的有利条件。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国外一些国家的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同中国关系的论述。在这一方面,外国学者又明显地有其有利条件。

当然外国学者也可以掌握中国资料,中国学者也可以掌握外国资料。这是一种好现象,值得大加提倡的,谁也别想、也不可能垄断资料。我上面说到有利条件只不过是说,在使用资料方面,外国和中国各有方便之处而已。对各国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协作。我们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面,一

不画地为牢,二不各自为政,而是沟通有无,互相补充,即使是一个第三国家的学者研究中国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史,也多半有他自己的看法,因而也能做出令人羡慕的成绩。

我们的《中外关系史译丛》目的就是使对外国语言不太熟悉的中国学者能及时了解外国同行的研究成果,这会大大地促进中外学者的交流与协作,大大地提高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水平。在过去,中国一些知名的学者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比如冯承钧、张星烺、向达、姚楠、朱杰勤诸先生,他们的成绩彰彰在人耳目。但是在过去,他们多半是"单干户",也不可能不是"单干户"。到了今天,盛世升平,乾坤朗朗,组织起来,共同协作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中外关系史译丛》的创刊就是共同协作的一个步骤。随着它的出版,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工作将会大大加强,更光辉灿烂的成绩将会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信念。

1983年10月9日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小引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到现在已有半年多了。在这期间，学会秘书处的同志们始终在紧张地工作着：联系中央领导同志批准的经费领用办法、制定经费分配方案、与有关单位磋商资料中心设置地点、关于一些分会成立问题、学术讨论会的召开问题等等。工作量极大，工作头绪颇繁。

可是对广大会员来说，好像学会没有怎么动。这当然不能怪会员同志们，主要原因是互通情况不够。因此，再加上一些别的原因，我们决定尽早出版这个研究通讯，以便让全体会员同志们了解秘书处的工作情况，并且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我们特别着重通报研究情况，以便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达到互相启发，共同前进的目的。

同时，我们也还要尽可能地报导国外的一些研究情况，使会员能够知己知彼。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敦煌吐鲁番学早已成为一门国际上共同注意的学科。因此，国外的研究动态我们也决不能漠然置之。中国古代有两句话：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两句话对国内适用，对国际上也同样适用。这样作不但可以共同促进这门学科的研究，同时也可以达到以文会友，加强团结，促进友谊的目的。

我诚恳地希望我们的会员同志以及非会员同志，还有国外的同行们，根据编印《研究通讯》的几点意见，踊跃写文章，共同努力，团结协作，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刊物办好，而且是越来越好，共同促

进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

1984年3月6日

《东方世界》发刊词

前不久，我听到一位从一个欧洲国家访问归来的同志谈到，那个国家有一些朋友不知鲁迅为何许人。我始而吃惊，继而深思：难道我们只责怪这些外国朋友吗？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没有跟得上，责任在我们身上。

我们对外国，特别是东方国家的了解又怎样呢？仔细追究起来，我们也难免要闹欧洲那个国家的一些朋友的笑话。

为了避免这样的笑话，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加强对外国的了解。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东方国家，因为在所有的外国中，东方国家是最受忽视的领域。一直到现在，东方国家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一些同志在有意无意之间还流露出对东方研究的轻视。我不认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这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算是研究东方国家的人，因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不是这样的。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教育和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有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任务。如果不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情况，所有上面这些任务都是难以完成的。

我们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同志们对于这个问题特别感到关切。尽管我们自己知道力量微薄，但是我们也同样感到责任重大。现在我们国家研究东方国家问题的机构日益多起来了。这对于我们来说有如空谷足音，感到由衷的高兴。在高兴的同时，我们都热切期望能够做一点工作，帮助国人了解东方国家的情况。

因此,我们创办了这样一个《东方世界》。竭尽我们的绵薄,介绍东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人民提供一些这方面的材料。我们的目的很简单:让中国人民知道这些国家的"鲁迅"是什么人,知道这些国家的一般情况,借此以加强中国同东方国家的相互了解,增进我们彼此的友谊。我们相信,这对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有帮助的,这对于我国的四化建设是会有帮助的。

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多么热切,我们的水平毕竟有限,我们希望全国的同行们和读者们监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

1984年7月18日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译丛》序

《诗经》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充分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善于学习他人之长。再加上另外一个优秀品质:善于发明创造,这两种品质合起来,就创造出来了长达五六千年的,在世界民族之林独放异彩的光辉灿烂的文化。

学习他人之长,包括一切方面。专就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而论,同样有向别的国家学习的任务。当然,在这里,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发明创造仍然居第一位。学习他人之长与发明创造,这二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

五六十年以前,冯承钧翻译了大量的法国学者关于敦煌吐鲁番研究以及中外交通史的论著。用力至勤,成就最大。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眼界。至今学者蒙受其益。其间还有许多学者,如向达、贺昌群、方壮猷、姚楠、朱杰勤、王古鲁、张小柳、何健民等等先后翻译介绍了不少日本、法国、英国等国的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国内学人至今还感谢他们。可惜的是,从那时以后,学者大都忙于自己的名山事业,翻译介绍之事,只是偶一为之,像冯承钧先生那种锲而不舍终身从事的劲头,而今真已成《广陵散》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一个人,不管有多么大的学习语言的才能,决不能精通所有的语言。因此就有必要看别人的翻译。我常常看到或听到有人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流露出鄙薄翻译之意,我深以为异。如果没有翻译,古代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化能传到中国来吗?如果没有翻

译,欧洲文化能传到中国来吗?

时至今日,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日益增多,我们要研究的课题之广度与深度日益加强,我们不可能广泛阅读所有原著,我们更有必要参看别人的翻译。这一点,对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来说,更是迫在眉睫。这种学问是最近七八十年以来新兴起来的。在过去,由于有广泛的国际协作,才能取得如此令人兴奋的成绩。今后这种协作只能加强,而万万不能削弱,特别是日本学者和法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更是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必须继承老一辈学者那种勤于翻译的传统,更进而发扬光大之,否则要想开创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新局面是决不可能的。

基于以上这些考虑,我们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决定出一套研究译丛。请一些专门或者主要从事翻译介绍的同志们参加翻译。我们也希望,其他同行们在著作之余,也能选择一些有价值的国外论著加以迻译,以饷国内学人;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做得一天比一天更好,使我们的研究成果一天比一天更多,研究水平一天比一天更提高。

1984年8月1日

《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献考释》序

刘俊文同志经过了四、五年的努力，最近写成了《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献考释》，征序于我。我不懂法律，对于唐代的法律文书更是一窍不通。我本来不敢承担写序的重任。但是我翻看了手稿，我们这位青年学者的治学精神，跃然纸上。我可以想象到，四、五年来他搜集资料，推断年代，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他那谨严的学风和朴实的文风，都流露于字里行间，我受到了很大的感动。不敢再以任何理由为借口推掉不写。

法律的重要性，尽人皆知。在阶级社会中，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具体表现。研究历史而不知法律，有许多问题则将得不到解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唐代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朝代。现在研究唐史在国内外已经蔚成风气。鸿篇佳制，灿若列星。对唐律的研究也取得了极大的成绩，杨廷福等同志都有专门著作。唐长孺、王永兴等同志在许多文章中涉及唐律。刘俊文同志个人不久前出版的《唐律疏义》也以其谨严的学风，细致的探讨，独有建树，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教授对此书给予极高的评价。

对于这些专门问题，恕我藏拙不再讲下去吧。

我想在这里着重谈一下我在上面提到的文风问题。我最近读到王元化同志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他在《跋》中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共鸣。他说：“

> 我曾经说,我们时或可以看到,有人提出一种新观点或新论据,于是群起袭用,既不注明出自何人何书,以没其首创之功,甚至剽用之后反对其一二细节加以挑剔吹求,以抑人扬己。这种学风必须痛加惩创,杜绝流传。我们应该学习马克思写《资本论》那样,对古往今来提出任何一种新见解的理论家,都在正文或注脚中一丝不苟地予以注明。我们必须培养这种学术道德风尚。

王元化同志在这里提到的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无论是在文艺创作范围内还是在科学研究范围内都时而遇到剽窃的情况。剽窃的问题中外都有。我们虽不能说“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是我们今天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而且已经有35年的历史了。按理说,这种现象应该绝迹,至少应该减少到最低限度,事实并不是这样。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王元化同志之所以不惜大声疾呼,其原因恐怕也在这里。我对于他的意见是完全同意的。

唐代刘知几对研究历史提出了才、学、识三个标准,清代章学诚又加了一个史德。他说:

>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内篇·史德》)

意思就是说历史著作必须力求表达客观的真实性,不能夹杂个人偏见。章学诚在这里讲心术,同王元化同志所讲的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其间确有相通之处,这是显而易见的。

章学诚在另外一些地方还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话。《又与朱少白》的信中说:

> 盖好名之习,渐为门户,而争胜之心,流为忮险。

《与邵二云论学》中说:

> 近则遨游南北,目见耳闻,自命专门著述者,率多阴用其言,阳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说,暗剿其意,几乎李义山之敝缊,身无完肤,杜子美之残膏,人多沾丐。

这些情况,同我们今天要反对的恶劣学风几乎完全一样。我觉得,研究历史,必讲求"心术"。我看,研究其他学问,也要讲求心术,决不能弄虚作假,决不能哗众取宠,决不能粗制滥造,决不剽窃他人,这属于学术道德的范畴,与章学诚所讲的"心术"有密切关联。

我为什么在谈到刘俊文同志的著作时竟然谈到什么"史德",什么"心术"呢?我觉得,刘俊文同志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文风和学风是有道德的,心术是正的。引用别人的著作他一一交代清楚,对自己使用的材料处理非常谨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文风和学风是端正的,他们是有道德的,"心术"是正的。但是,正如我上面说到的那样,也确有少数"学者"道德不高,心术不正。我们应该反对这样的文风和学风,而提倡刘俊文同志和其他绝大多数同志所遵循的文风和学风。这就是我的希望。这就是我写这一篇短序的用意之所在。是为序。

1984年8月31日

《中国纪行》中译本序

张至善、张铁伟等同志翻译的阿里·阿克巴尔著《中国纪行》，我认为，是一部非常值得重视、非常重要的书。它完全能够同《马可波罗游记》媲美，先后辉映，照亮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道路。

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穆斯林的作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著名的《伊本·巴图泰游记》、《贝鲁尼游记》等书获得东西各国学者的高度赞扬，是众所周知的。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写成于1516年，正当中国明武宗正德十一年。过去不大为人所知。在欧洲，从19世纪起，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中国，第一次介绍此书者是张至善同志的父亲张亮尘老先生，但这已经是50年前的事情了。

《中国纪行》原文是波斯文，作者是哪一国人，似乎还没有结论。至于作者是否真正来过中国，学者们的意见也不一致。我认为，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问题在于此书本身。不管作者记载的是元代中国情况或明代中国情况，基本上都翔实可靠，栩栩如生。个别章节有一些荒唐的记载，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不足深责。此书记载了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地理、军队、宗教、仓库、皇帝宫廷、监狱、节日、教坊妓女、医疗、立法、学校、外国使臣和侨民、农业、货币、法律、剧场等等，简直是一部中国的百科全书。我们中国史书之多，水平之高，誉满全球。可是如果我们真想了解过去历史上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和烦琐细节，仍然感到缺少资料，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书，特别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

按照心理学的规律,他能看到我们习而不察的一些东西。把这样的观察记载下来,传之后世,这样的书不但能帮助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了解中国,也能帮助中国人民了解自己的过去。从这个观点上来看,这些书,其中当然也包括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之价值,概可想见了。

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谈一谈本书的价值。我们一向被称作伟大的民族。但是到了近代和现代,外国人怎样来认识我们呢?我们自己又是怎样来认识自己呢?外国人认识我们,我们自己认识自己,都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如果划一条界限的话,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就是一条天然的界限。在这之前,在17、18世纪,中国人在欧洲人心目中,是有天才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当时他们向往的是中国,学习的是中国。但是殖民主义者一旦侵入中国,中国许多弱点暴露出来了。首先是中国力量不强。在信奉优胜劣败的欧洲人眼中,中国不行了,中国人不吃香了,中国成了有色人种,成了劣等民族。久而久之,他们忘记了曾经有一段崇拜中国文化的历史。而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忘记了过去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志者要奋发图强,爱国雪耻。庸俗者则产生了贾桂思想,总觉得自己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另一条界限。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感觉到真正是站起来了,腰板挺直了。绝大多数外国朋友对中国也另眼相看了。但是100多年的习惯势力,余威未退。有贾桂思想者也不乏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四人帮一伙。他们义形于色,振振有词,天天批什么洋奴哲学,实际上在他们灵魂深处,他们自己最有洋奴相,见了洋人,屁滚尿流,奉若神明。

到了今天,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必须教会青年人怎样正确认识外国,怎样正确认识自己。我们决不盲目排外,我们承认外国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学习,但是我们也决

不盲目拜倒在外国人脚下,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用什么办法来进行这种教育呢?方法当然很多,读过去历史上外国人的中国纪行,也是方法之一,而且我认为是有效的方法。现在回到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我认为其中就有很多有用的资料。我现在按原书的次序先在下面列举几条,然后再加以分析:

在第三章里,作者谈到中国招待外国人时写道:

> 我们在中国内部旅行一百天,每天都热热闹闹,所有的必需品都能得到。

在第四章里,作者写道:

> 在世界上除上中国以外,谁也不会表现出那样一种井井有条的秩序来。毫无疑问,如果穆斯林们能这样恪守他们的教规——虽然这两件事无共同之处——他们无疑地都能按真主的良愿成为圣人。

在第六章里,作者写道:

> 整个中国人,从平民到贵族都培养得懂礼节。在表示尊敬、荣誉和沿守礼节方面,世界上没有人能和他们相比……中国人非常守纪律,无人可以相比。

在同一章里,我们读到:

> 谁也不敢违反法律,向真主保证,这里没有夸张,都是事实……他们的法律和规章十分完善严明。

第九章记载各地的物产:麝香、金银酒器、瓷器,又记载了北京(汗八里)挖掘的人工湖(可能是指的中南海和北海),书中讲到中国烧黑石头(煤),讲到贵州的药材,福建的麻、丝绸、彩缎,特别细致地描述了南昌的瓷器,和阗的玉石。

第十一章讲中国奇妙的手艺,其中有胸外科手术。作者写道:

> 我相信,如果谁在中国游历一个世纪,他每天都能看到从未见过的奇迹。

第十五章讲到来中国的外国使臣和商人,他们用狮子换东西,每一头狮子可以换回三十箱财物。其中有衣料、缎子、布匹、鞋袜、马蹬子、铁马鞍、剪刀、针。

第十七章讲联绵不断的农田。在山坡、沙漠和砂石地区运土造田。我们有两三个月都在树荫下行走。

第十九章讲中国的纸钞、铜钱、金、银作为货币。在这里又讲到在汗八里已使用煤。

第二十章又强调说:“中国人非常守法。”

第二十一章讲中国的画院。作者写道:

> “在中国有三件东西只有天堂才能找到,与其比美。那就是蜜枣又大又甜。还有两种花,一是罂粟花,二是莲花。”

归纳起来,作者在当时中国看到的人民奉公守法,秩序井井有条,物产极大丰富,手艺十分高超。

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能看到很多我们习而不察的东西。上面这些材料都完全是一个外国人眼中的情况,

是完全可靠的。这些材料告诉我们,在明朝中国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什么样子,达到什么程度。明朝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个发展的高峰。然而我们的人民已经有了这样的水平,今天我们,特别是中国的青年们,不应该感到自豪与光荣吗?难道我们一向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污蔑我们的那个样子吗?阿里·阿克巴尔这一部书的真正价值是在学术方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是它的任务。但是,从我在书中择出的那些例子来看,这一部书的价值不是已经远远超过了学术领域了吗?

因此,对于这一部书的出版,我从上面的两个方面要表示衷心的祝贺,我在开头时说的,这是一部“非常值得重视,非常重要的书”,也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的。我相信,这部书一出版,一定会受到中国学者和老百姓的欢迎。他们都会同我一样,感谢张至善、张铁伟等同志。是为序。

1985年6月1日在儿童节的欢乐声中

《汉文南亚史料学》序

在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中,中国同印度是仅有的两个文化传统迄今没有中断又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国家。

但是这两个国家却又有极大的不同。印度人民想象力异常地丰富,寓言、童话非凡地发达,却对历史兴趣不大。马克思说:印度几乎没有历史。而中国则正相反。西方有人说,在文明古国中只有两个国家有科学,其中之一是希腊。这是众所周知的;另一个则是中国,而中国的科学就是历史。

现在我们喜欢讲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课题,中印两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都努力在这方面探讨、研究。但是谈到历史资料,在印度几乎找不到什么,而在中国则比比皆是。印度朋友们都寄希望于中国,中国的同行们则感到责无旁贷,应该把搜集整理的责任担当起来。

过去已经有不少的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努力过了。像张星烺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冯承钧先生、向达先生的许多文章,都做出了光辉的成绩,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但是系统地搜采、科学地整理,似乎还没有开始。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的耿引曾同志从几年前就开始了从大量的中国载籍中搜集整理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资料,经过了几年的努力,现在已经裒然成集,成绩斐然。耿引曾同志工作认真负责,细致深入,而且虚怀若谷,经常同我讨论一些问题,无间寒暑,锲而不舍,终于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为今后不管哪个国家的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的学者提供了方便,弥补了多

年以来就已经感到的一个缺憾。这是一件很值得祝贺的事情,我乐于写这样一篇短文,权当序言。

1985年10月26日

回顾与瞻望

——1986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论文专辑序

1985年8月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年会和学术讨论会。中外学者参加 的共有100多人。提出论文105篇。现在从中选取了28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借《中国史研究》和《敦煌学辑刊》的篇幅,出这样两个专刊。

中外学者们都承认,七八十年代以来敦煌吐鲁番学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在中国也不例外。在解放前的漫长的岁月里,中国学者已经做了很多很出色的工作。解放以后,特别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之后,重新走上了康庄大道,人人精神振奋,各方面都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气象,敦煌吐鲁番学也不落后。1983年在兰州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上和今年的乌鲁木齐的年会上提出来的论文,数量之多和质量之高,专就中国来说,都是空前的。这一个事实充分显示了中国学者的积极性和敦煌吐鲁番学作为一门显学的巨大力量。

目前,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正在方兴未艾。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陆续建立了专门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的所、室或组,开设了有关这一方面的课程,青年学生对此表现出来极大的兴趣。许多出版社出版了研究专著或者国外论著的译文集,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报刊杂志上刊出了一些颇见工力的论文,探讨的深度和广度都比以前有所提高。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同

国外的交流日益紧密。外国学者访问中国,中国学者访问外国已成为常见的现象。中国学者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研究方法日益革新,到处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气氛。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后,已经全面地展开活动。在我们党政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会员们都干劲十足。语言文学分会、音乐分会、舞蹈分会已经成立,西藏分会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其他分会亦在酝酿中。北京和乌鲁木齐的资料中心、兰州的阅览室正在筹建中。学会同其他机构和学会的协作活动越来越多,比如资料中心就是同北京图书馆、新疆社会科学院和兰州大学协作建立的。此外,还同唐史学会和厦门大学等机构共同组织了座谈会。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欢迎。学会还斟酌情况资助了一些研究项目,对研究工作也有所推动。水平比较高的研究丛书已经出了几种。翻译丛书和资料丛书已经出版了三种。我们的活动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

从上面的情况里我们可以看到,同各行各业一样,中国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工作的学者们也正在腾飞,是在七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的第一次真正的腾飞。最令人欣慰的是,中青年的学者,特别是青年的学者,脱颖而出者日益增加。这一批年青人信息灵通,思想开放,观察敏锐,进取心强。他们是我们未来希望寄托之所在。

但是,我们决不能就此满足。同一些国外的专家比起来,我们还在不少的方面有一定的差距。我们今后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而且也很艰巨。首先我们要了解当今世界上资料收藏和研究的情况。最近个别同志从海外考察归来,谈了一些情况,我们才知道,我们(其它国家的学者也一样)对全世界收藏文献资料的情况,并不是了如指掌。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进一步调查研究。其次,我们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把全世界所有的文献资料搜集齐全,给我们将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一个坚牢的基础。

谈到研究工作,我个人认为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都要加以注意。在微观方面,我希望能多出一些专门从事于一个问题或一个方面研究工作的学者,把所有的资料(我强调的是"所有的"资料)都搜集起来,认真细致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急于求成,而要锲而不舍地干它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样必有所成。但还要把眼光放远。在宏观方面,要从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的交流和汇流的高度来考察个人手边的小问题。这样的话,我们的视野扩大了,我们的心胸开扩了,成果必然迥乎不同。我们之所以再三强调把我国西藏的古藏文和梵文贝叶经的研究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其根由就在这里。

大家都承认,现在是"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工作的同志们切不可抱残守阙,固步自封,而应放眼四海,广通信息;还要尽量使用新的研究手段,比如电子计算机之类;尽量参考新的研究理论(当然要批判地参考)。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日新月异,才能真正为振兴中华,为建立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都是异常艰巨的工作,但是我们有领导的支持,有全体同志们的努力,我们的事业一定能成功的,愿与同志们共勉之。

1985年11月14日凌晨

《季羡林序跋选》序

集子的名字是《季羡林序跋选》,但是我仍然要写上一篇序。这岂不是叠床架屋了吗？可能是的,可是序仍然要写。

我为什么这样刚愎自用呢?

原因恐怕要从很远的地方讲起。对于散文，我曾在几个地方都讲过，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长、成就最高的散文国家；散文在中国是最为人民喜爱的文学体裁。对于序跋，我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实际上序跋也属于散文的范畴。翻开中国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伟大作家都写过一些序或跋。从汉代的司马迁开始，他写了《外戚世家序》、《太史公自序》等等文章。晋代的王羲之写了《兰亭集序》。唐代的王勃写了《滕王阁序》。李白写了《春夜宴桃李园序》。韩愈写了《送孟东野序》等等。柳宗元写了《愚溪诗序》。宋代李格非写了《书洛阳名园记后》。欧阳修写了《释秘演诗集序》、《梅圣俞诗集序》。所谓“书后”，实际上就是跋。宋代以后，还有大量的序跋。直到近代，此风不衰。梁《昭明文选》所选的各种文体中也有“序”这一项。这样的例子是举也举不完的。我之所以这样列举例证，无非是想说明，序跋这种体裁在中国是有悠久而又光辉的传统的。直到现在还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爱好，我自己也在其中。

但是,也并非没有例外。我前不久读到一篇文章,作者说,他读书不喜欢看序跋。这使我有点吃惊,我原以为是任何人都是喜欢读序跋的。我记得鲁迅先生曾说过,他读书总是先看一看序跋。

鲁迅的作法是有代表性的。

我为什么喜欢读序跋呢?我觉得,序跋同日记一样,在这里,作者容易说点真话。在其他体裁的文章中,作者往往峨冠博带,在不知不觉中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装腔作势,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这些东西,读起来让人感到腻味,读不下去。当然,有人在日记中也不说真话,比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是众所周知不完全说真话的典型。他是拿日记当著作,准备有人来抄了出版的。他在里面大抄朝报之类的东西,梦想有朝一日得到御览,从而飞黄腾达。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来过。不过,这究竟是极个别的例外,不是日记的正宗。序跋与日记也不完全相同,其能说一点真话则一也。我同许多人之所以喜欢读序跋,其原因就在这里。

就我自己而论,我不但喜欢读序跋一类的文字,而且也喜欢写。其原因同喜欢写作几乎完全一样。这就是,序跋这一种体裁没有什么严格的模子,写起来,你可以直抒胸臆,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如果把其他文章比做峨冠博带,那么序跋(当然也有日记)则如软巾野服。写起来如行云流水,不受遏制,欲行便行,欲止便止,圆融自如,一片天机。写这样的文章,简直是一种享受。

写到这里,我在篇首提出来的那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序上加序?便自然得到解答了。

但是,据我自己观察到的,序跋也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有一些序跋,特别是名人的序,大概是受人请托,情不可却,也许还有一点什么"效益"之类的东西,于是乎,虽然那一本书实在并不怎么样,写序的人也只好不痛不痒地加以空洞的赞誉,虚伪之气溢于楮墨之表,扑人眉宇。谁读这样的序而不感到别扭,不感到腻味呢?

这样的序,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欣赏的。可是,我当时还并没有考虑到,自己决不写这样的序,压根儿没有考虑到;因为写这样

的序是名人的事，自己决非名人，离名人至少还有十万八千里，存在决定意识，没有这个存在，也就决不会有这种意识。

可是世间的事是异常复杂而又多变的。不知怎样一来，居然有人找自己写序，而且自己也居然写了起来。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要走的一条道路，在自己心灵深处十分厌恶走的一条道路，自己居然走上了。最近几年来，我颇写了一些这样的序。自己当时心灵的活动，现在已经不很清楚。最初似乎也想拒绝过。因为种种原因，出于种种考虑，拒绝没有发生效果。于是一步步沿着这一条路滑了下去。等到脑筋清醒，回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自己滑得已经相当远了，想要打住，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我现在觉得，人真是一个奇妙的动物，人的一生也多半是奇妙的一生。你想走的路，有时无论如何也走不上。你不想走的路，不知不觉之中，不管有多少曲折，最终还是要走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样的经验，不是很多人——如果不是每一个人的话，都有过吗？古今之人有的在迫不得已时只好相信命运，难道就一点根据都没有吗？

这话扯得太远了。我无非是想说，我从厌恶给人做序一直发展到做起来，而且还做了不少，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有点糊涂。我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严格说来，是不是就想忏悔而要悔过自新呢？决不是的，我一点那样的想法都没有。如果现在有人求我写序，我立刻就会答应的。

"你这不是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读者或许要这样问。我在这里必须解释几句。回想我写每一篇别人要我写的序时的心情，检查一下我为别人写的所有的序，有一点是可以告慰于自己的：我没有作违心之论。序中可能有一点废话；但是决没有假话、大话、空话。对于每一本要我写序的书，我也尽量避免使用溢美之词。总起来看，我对书的评价总算是实事求是的。因而，尽管

我走上这一条路有点迷惑不解,但是我决无内疚之感。

“你现在把你的序跋拿出来出版给别人看,难道就是仅仅因为里面没有假话、大话、空话吗?”读者或许又要这样问的。我曾再三考虑过出版不出版的问题。有几度,我曾打过退堂鼓,不想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出版。但是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拿出来出版。原因何在呢?仔细想来,原因是颇多的,而且也颇复杂。上面说到的那种情况,仅仅是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最近几年来,我曾听到几个年轻人(其中也有我过去的学生)说,他们颇喜欢读我写的序跋文字。听了以后,我心里不禁漾起一点喜悦之意。我原来以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写东西的甘苦别人未必知道。现在居然有人知道了,我的喜悦不是很自然的吗?即使内心深处有点沾沾自喜的意思,难道还有人像过去在那“史无前例”的时代要我“斗私批修”吗?既然如此,我索性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公诸同好,又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这里讲的序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恐怕不但我自己不那么喜欢,别人也未必有嗜痂之癖专门喜欢那些东西。可是,话又说了回来,即使是在这些文字中,我也总是说了些实话。这些实话,不管多么肤浅,毕竟是我的一得之愚,对人也未必没有好处,没有启发。用现在的说法,考虑到社会效益,也许还有点积极的东西,至少不会放毒。总之,我决心把我自己喜欢的文字,连同不那么喜欢的文字,集成这样一个集子,送到读者面前。个别词句有一些改动。古人形容出刊不应该出刊的书时常用“灾祸梨枣”这样一个词儿。我这个集子是不是灾祸梨枣呢?但愿不是这个样子。

集子的编选整理,都由李铮同志负责。附此致谢。

1985年11月26日写毕

附记：

写了序，书没有出，转瞬已将五年。现在又有了出书的机会，于是把这几年中写的序跋的大部分也收了进来，以期让读者对于我的序跋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

1990年1月16日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建系四十周年纪念专刊》(1946—1986)前言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成立已经四十年了。解放前的三年,基本上没有展开工作。1949年建国以后,东语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但是这发展是不平衡的,中间升升降降,起起伏伏,变化多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东语系可以说是又得到重生,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四十年来,我们系毕业的学生,根据大略的统计,约有3000人。除了有一部分没有结合业务外,大部分是结合的。现在他们几乎遍布全国,很多机关,都有我们的毕业生,许多驻外使馆也是这样。应该说,我们的毕业生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不同的方面作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

这些散布在全国全世界的毕业同学,有的还有联系,有的就断了联系,许多毕业同学给我们提出意见,希望系里工作的同志能够出一种类似同学录之类的东西。系里经过深思熟虑,觉得这种意见是十分正确的,决定出这样一本纪念册。我们的用意决不仅仅是联络感情,决不是要我们的毕业同学回头看,“发思古之幽情”,而完全是为了向前看,便于在我们包括着几代人的毕业同学之间加强联系,加强了解,为了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

1986年1月13日

《谢氏南征记校注》序

从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来看,长篇小说是兴起得很晚的一种文学体裁。在欧洲,古代和中世纪有一些类似长篇小说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并没有受到重视。因为古代的欧洲人认为:高贵庄重的文学体裁是史诗,而长篇小说则是微末琐细的东西,不能登大雅之堂。欧洲真正的长篇小说,一直到 17、18 世纪才出现。在东方,我们的情况比较好一点。日本的《源氏物语》出现在 11 世纪。中国从元明,也就是从 13、14 世纪起,陆续出现了大量的优秀的长篇小说。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必然有其原因。可惜它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充分重视。

我很早就有一个想法:应该对长篇小说这一种文学体裁,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上来加以探讨,说明它为什么兴起得晚?其中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为什么西方的长篇小说又晚于东方?如此等等。

眼前的这一部《谢氏南征记》是朝鲜过去的一部长篇小说。原来是用朝鲜文写成的。后来又译为汉文,时间是 17 到 18 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明代后期至清代之初。仅仅这个成书年代,我觉得就很值得研究。这一部书在整个朝鲜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它同中国的长篇小说有什么样的关系?所有这一些问题探讨起来既有趣味,又有重要意义。

至于本书的内容,背景是放在中国的,而实际上却写的是朝鲜当时宫廷的矛盾和斗争。这一点没有什么值得惊异之处。过去的

中国作家,为了避祸,也采用这种方法:改变时间,改变地点。白居易的《长恨歌》,明明写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却偏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儒林外史》写的明明是清朝的事,却说是明朝。连《红楼梦》一开始也玩弄一套“太虚幻境”,扑朔迷离,故意让人摸不着头脑。就《谢氏南征记》来讲,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它把背景放在中国,至少说明这一部长篇小说同中国有密切关系。这对于研究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很有意义。

中国和朝鲜自古以来就是唇齿相依的邻国。我们之间一直进行着频繁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丰富了我们彼此的文化,提高了我们的物质生活。在文学方面的关系更是特别密切。《谢氏南征记》就是一个证明。我们介绍朝鲜文学作品,不自《谢氏南征记》始。朝鲜古典小说《春香传》早已介绍过来。现代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在内,介绍过来的更是不计其数。现在韦旭升同志又把《谢氏南征记》加以校注,介绍过来。我觉得,他的这一番努力,既是锦上添花,又是雪中送炭,应该得到我们热烈欢迎和感谢。

但是,从我们两国历史上长期的文化交流来看,我们介绍的朝鲜古今文学作品,不是太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我希望,这种介绍工作还要继续下去。我相信,这也是中国读者的共同愿望。

1986年2月5日

《简明东方文学史》序言

中国近代,研究外国文学是从西方开始的。大家都知道,也都承认,这种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成果。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受了西方文学极大的影响。没有西方文学的影响,我们的新文学的产生是无法想象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但是我国立国于地球的东半部,同我们毗邻的许多国家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发展了自己的文学。我国同这些东方国家之间时断时续但始终没有停地进行着文学交流,这同样也丰富了我们各自的文学创作。按道理,我们应该对东方文学有湛深的研究,应该有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应该有众多的研究机构,人民群众,特别是文学研究者,应该对东方文学有了解,能欣赏。

然而事实却与此相违。我们对东方文学没有湛深的研究,我们没有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我们没有众多的研究机构,我们人民群众,连那些文学研究者,对东方文学也了解不多,欣赏不够,甚至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有地位的学者专家,表面上说重视东方文学,实则在内心深处是轻视,是欧洲第一。

这些情况同我们的国际地位,同我们要进行的宏伟的建设是不合拍的。这种情况已经到了非改变不行的时候,已经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了。

特别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在我国,东方文学的研究更是刻不容缓。并不能算是新兴学科的比较文学现在已经风靡全世界,在过去,不管是影响的研究,还是平行

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文学之间进行的。西方文学的源头不外是希伯来文学、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发展到了今天,西方各国的文学都蓬蓬勃勃,花团锦簇,在这些文学之间进行比较,收获当然会很令人满意。但是,久而久之,西方一些清醒的学者也逐渐感觉到,在近亲文学之间进行比较有极大的局限性。从比较中得出来的规律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不会有很大指导意义。眼前当务之急是把眼光放远,放到西方文学狭隘的圈子之外,在这狭隘的圈子之外,是广袤的东方文学的国土。最近有许多国家的学者大声疾呼,说进行文学比较研究,必须把东方文学纳入,否则,比较的道路是很难走下去的。这种见解是非常高明的。

在东方文学范围内,中国文学自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在中国讲东方文学不包括中国文学在内,指的只是中国以外的东方国家的文学。中国文学同东方国家的文学关系密切,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来加以探讨,是十分重要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工作我们进行得还很差。至于东方文学同西方文学的比较,其意义就更为重要。从这种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探讨出世界文学,也就是人类整个文学的发展规律。这大大有助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了解,有助于世界文学的发展。但是这件工作,从全世界来看,也只能说是刚刚开始。西方学者研究东方文学,总给我们一个隔膜的印象。这一件重要的工作非得东西文学研究者通力协作不行。然而这一件工作恐怕只能说是还没有起步。

解决上面谈到的这一些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中国开展东方文学的研究。我想,这一点是国内学者都会承认的。我在上面已经谈到,我国研究东方文学队伍小,能力差。我们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当然也决不能例外。不过相对而言,我们这样的队伍还算是比较集中的,语言品种还算是比较全的。我们系研究文学的同

志们又都痛感改变这种落后状态的迫切性。因此,多少年以来,我们就分别搜集了一些资料,进行了一些研究,现在先把我们的研究成果以这样一部《简明东方文学史》的形式提供给广大读者,包括海内外的读者。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责任,我们也是清楚的。考虑到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敢妄自菲薄,我们不敢藏拙,我们勇敢地献出了我们的成果,海内外的读者是我们最好的评论者,我们热切地等待着他们的评论。

1986年2月18日凌晨

《东南亚历史词典》序

从地理上来看,中国同东南亚许多国家壤地相接。从历史上看,中国同东南亚所有的国家都有长短不同但总起来看是非常漫长的文化交流关系。这种文化交流大大地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因此,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的人民之间一向存在着深厚的友谊,彼此都希望了解对方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历史。

世界各国人民都有自己的历史,东南亚国家当然不能例外。但是各国人民对历史爱好的程度,颇有所不同。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最爱好历史的,这是一个尽人皆知、尽人都承认的事实。我们的史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不但对中国本国的朝代更替都有详尽的记载,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有所记述。有关东南亚国家的记载更是比较多的。因此,要想了解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中国史籍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尽管我们不能够说,中国史籍中有关东南亚国家的记载都是准确的、翔实的,但是总起来看,是比较准确的,翔实的。这一点,东南亚国家的没有偏见的史学工作者也是承认的。有的甚至说,倘若没有中国史籍,自己国家的历史写起来会感到困难。

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应该是很熟悉了吧?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百多年中,反动统治,以暴易暴,外国帝国主义者,虎视眈眈,中国人民完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顾不暇,对外国的,其中也包括东南亚国

家的情况,没有余力去关心了。中国古代关心域外历史的优良传统难以继承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解放以后,情况有了改变。但是真正的改变只是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算开始。我国人民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振作精神,努力建设国家,保卫世界和平。文化发达,学术昌明,一扫过去万马齐喑的那种沉闷局面,人民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只有在这时候,对世界各国,其中当然包括东南亚国家的兴趣,才真正又大大地加强起来。广大读者对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等等情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迫切希望了解这些国家。从事东南亚学术研究的学者们也都精神焕发,心情舒畅,锲而不舍,钻研业务,成立了一些有关的学会,全国一盘棋,互相切磋,进行讨论。学术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领导同志,为了适应读者的迫切需要,找到了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要求我们主持编写一部《东南亚历史词典》。在我们研究所内虽然只有三位从事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同志:周南京同志、梁英明同志、杨保筠同志,但是他们三位都是既能掌握外文资料,又能了解中国史籍的多面手。他们认为,编这样一部词典是我们应尽的义务,立刻就答应了下来,同时并邀请兄弟单位的一些同行共同努力,从事编写工作。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国内一些老专家,如姚梓良(楠)、朱杰勤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从 1982 年 10 月起至今年 2 月止,编写工作全部完成。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王芝芬、陈光裕、任余白等同志自始至终关怀、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现在我们这一部词典全部完成了。只要了解了我上面谈到的那一些情况,就不难认识此书的伟大意义。它必将会既能满足中国读者的需要,又能为外国有关国家的专家们和一般老百姓提供必要的资料和信息。其结果必然会大大地促进我们国家同这些国

家人民之间的友谊与理解,大大地有助于各自国家的文化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这是我的希望,同时也是我的信念。

1987年2月20日

《文化意识的觉醒》序

最近一两年以来，我们国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已经涌起了一股“文化热”。讨论文化的文章频繁出现在许多刊物上，探讨文化发展的座谈会接二连三地在许多大城市召开，许多学术机构举办有关文化的学习班，比如中国文化书院就举行过比较文化的研讨班，全国有近千人参加学习。青年学生们对文化问题也表现出空前的热情，纷纷举办讲座、讨论会。我认为，这是完全合乎发展规律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指导下，日益繁荣发展。文化建设问题已经迫切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在思想领域内，真正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扫过去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老中青年学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如万斛泉水，奔腾喷涌，遂形成了这样热气腾腾的局面。

我个人的看法，大家探讨最多的是中外文化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承认至少有两种文化。所谓文化交流，所谓比较文化，无不可以归入这一个范畴。如果只承认有一种文化（自己国家的或别的国家的），那就根本谈不到交流，也谈不到比较。我一向主张，从人类整个数千年的文化史来看，文化交流是促进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时至今日，在地球上恐怕还没有一种纯之又纯的、不同任何别的文化进行交流的文化。一谈到文化交流，就必然要讲内因与外因。只有内因，不成其为交流；只有外因，也不成其为交流。总是以内因为根据或基础，外因为条件来进行交流。换句话说，文化交流是内因与外因的结合，缺一不可。

写到这里,我想对一个老而又新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这就是所谓"全盘西化"的问题。且不说真正的"全盘西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垄断,就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从哲学上来讲,这是一种只要外因,不要内因的想法。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植物学上的嫁接,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全盘什么化的先例。日本在西化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从一个封建王国变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决定的因素就是西化。但是它"全盘"了没有呢?只要稍稍了解日本情况,或者到日本去看过的人,都只能承认,它并没有"全盘"。日本固有文化的痕迹到处可见,有的地方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日本在西化方面是内因与外因结合得比较成功的一个典型。有好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还想谈另外一种"学说",这就是完全、彻底否定中国的固有的传统文化。这同全盘西化论应该归入同一个范畴。张扬这种"学说"的学者的文章,我没有全看,因为我"修养"得还很不够。我没有那个耐性看下去。我只觉得作者既不懂中国文化,也不懂西方文化。登龙有心,哗众无术,鼓其如簧之舌,造作一大串奇怪的名词术语,发为惊世骇俗之论,其实是除了自我陶醉之外,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如果也把这种"学说"作为百家之一家而与之争论,实际上是上了英雄欺人之当,未免太天真了。

在这个文化讨论的洪流中,我们北京大学怎样呢?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大学在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方面是非常敏感的。往往起些带头作用。将近70年的历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到了今天,当全国热烈讨论文化问题的时候,北大的一些青年学生和教员,在一部分中老年教师的支持下,也参加到这个文化讨论的洪流中来,成立了文化学会,经常邀请校内外一些对文化问题有兴趣的人来讲演、座谈,这大大地提高了青年学生对文化的

兴趣,也促进了许多中老年教师的深思。大家不约而同地对文化问题进行探讨,这一本论文集可以算是研究探讨的成果之一。

对于文化学,我没有做过什么系统的研究,所知不多。这并不是什么谦虚之词,而完全是事实。但是我对于文化学却有极大的兴趣,甚至有所偏爱,这也并非虚语,而完全是事实。

在学术研究方面,甚至在文学创作方面,我把自己划归"功利主义者"这一类人物范畴。我一贯认为,进行任何学术研究,必然有其用途。这个用途决非狭隘的,也决非只顾眼前的,而是从宏观着眼,从长远着眼,不管怎样,它决非一个个人问题。如果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只为了一个人的利益,只有作者一个人懂,别人懂不懂他根本不关心,还以此自傲,以为高出流俗,这样的什么者,即使不是有意骗人,我看也差不多,对于文化学我也这样要求。

文化学的用途在什么地方呢?探讨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文化交流的规律,用以指导我们自己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这是毫无问题的。对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在这里暂且不去细谈。

我想专门谈一个小问题或者比较小的问题。这个问题特别适合我们中国和一些同中国有同样情况的国家,这就是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勇敢的伟大民族,对人类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也无法否认。谁忘记了这一点,他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封建主义的统治,在我们的国民性中积淀了不少不健康的东西。当年鲁迅先生曾含着眼泪,大声疾呼,批判揭露了这样一些消极的国民性格。到了今天,我认为鲁迅的批判还并没有完全失效。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只要放眼一看,就能看到我们社会还存在着十分矛盾的现象。正确与错误,伟大与渺小,智慧与愚蠢,真诚与虚伪,率真与圆滑,

勇敢与怯懦,勤奋与懒惰,大公与自私,杂然并陈。虽然前者总是为主,但后者也决不能忽视。世界所有民族中都有类似的现象。别人的事,我们先不去管,我们先清理自己的"内务"。谁要是不承认这一点,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们切不能躺在勤劳、勇敢、智慧和伟大的枕头上,怡然自得,陶然酣睡,这无助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这些消极的东西,憬然懔然,认真分析自己性格中的这一些东西,不要怕痛,不要害羞,努力学习,认真思考,加以批判,加以改正,与此同时又要认真发扬优秀的一面。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是不能否认的,也是否认不掉的。

我不知道,改造国民性,是否属于文化学研究的范围,这要请文化学的专家们来研究讨论。如果文化学专家都认为,这是他们研究的范围,当然很好。如果多数专家认为,这不是他们的职责,我就斗胆建议,在他们的研究项目中加上这样一项。这决非无理要求,而且文化学既定的研究范围(如果有的话),也决非一成不变,天经地义。随着需要适当调整,我想也是可以的。

"改造国民性,'改造'二字不妥",我们似乎听到有人这样抗议了。我们可以换别的词儿,"补正","提高","纠正"等等许多词儿,都是可以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的国民性出了点毛病,应该加以改正,使它在保留原来优点的同时,洗刷不足之处,如此而已。

"国民性怎么能改造呢?"我又似乎听到有人这样惊呼了。改造的想法,实际上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当年鲁迅先生就曾主张过,而且毕生锲而不舍。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解放以后,我们很多人都经常进行思想改造,我自己是从中尝到了甜头的,可惜前几年,对于思想改造,人们提得很少了,窃以为这不是好现象。一直到今天,我还坚决相信,我们的思想是必须改造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那里不停地改变,我们的思想能"以不变应万变"吗?既然思想都能够改造,一国的国民性为什么就不能改变呢?改造的明

确目标,就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切不符合这个远大理想的国民性都必须加以改造,有一些国民性看似细微,实则所关至大,切不可等闲视之。

我对国民性改造的看法,就是这个样子。我到文化学这里来寻求援助,是不是找错了门呢?但愿不是这样。

1987年3月5日

《国外中国学研究》前言

说老实话,当我最初听到四川外国语学院成立了一个国外中国学研究所的时候,我颇为感到吃惊:怎么还会有这样的组织呢?但是,继而仔细一想,我"顿悟"了:这样的组织不正是过去完全没有人想到过而我们今天却是非常需要的吗?

这要从远处讲起。中国学在国际上不是一门新兴学科。大概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者,用各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派人到中国来的时候起,中国学就算是开始存在了,根据我的理解,中国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这些西方人到了中国以后所写的一切东西,不管是哪一行哪一业,都属于中国学的范围。西方这一批人主观动机不同,其中也确实有一些抱着侵略目的而来的,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必然是戴着有色眼镜的。特别是那一批天主教和耶稣教的传教士,他们多年认为中国是文化不高的民族,甚至是野蛮民族,必须把他们的"上帝"请了来,传布"福音",中国才能得救。可是其中也确实有一些人,抱着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态度,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问题。我们千万不要良莠不分,放在一个锅里煮。

即使是对那些动机不纯的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我们也要有一点辩证的观点。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外国的传教士们喜欢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去,比如云南、四川、西藏等地区,都是他们热衷于钻进去的地方。他们的用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他们传教以外的一些工作,比如制订新文字、研究当地的民俗等等,难道一点积极的作用都没有吗?马克思当年论到英国在印度的统

治的时候曾经指出,英国在印度的一切措施,比如修铁路等等,其目的无非是想尽快尽多地剥削印度人民。然而其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这些措施带给印度人民科技知识,提高了他们的科技水平和觉悟。这当然决不是英国殖民统治者所乐意看到的事情。即使外国人怀着偏见谈论我们的缺点,我们也要有点辩证观点。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集·马上支日记》中写道:"我自己想,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类似的话,他在别的地方也曾说过。我想,鲁迅的用意无非是想借外国人指摘这一面镜子,照一照我们自己,指摘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就拒绝,用不着一听指摘就火冒三丈。

我在上面讲的主要是过去的中国学。那时候,中国要么是封建帝国,要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亚病夫,外国人到中国来,对我们总有点蔑视,是不愉快的,但是可以理解的。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外国人再也不敢小看我们了。所谓中国学和中国学家,据我个人的观察,已经走上了一条同过去有点不同的道路,呈现出过去不可能有的崭新的面貌。他们多半是怀着善良的愿望,从事中国学的研究的。不管是研究宗教哲学,还是研究文学艺术,或是研究语言文字,有的人成绩斐然可观,受到我国学者的赞扬,同中国同行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决不敢说,外国的中国学家对中国文化都理解得完全正确,他们的研究工作没有主观隔膜的情况,没有在无意中歪曲的地方。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理解对了的,可以供我们参考。由于民族文化传统不同,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有时同我们不同。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能看到我们忽略了的东西。即使他们看错了,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无论如何,中国两句俗语完全可以用在这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但是,外国的中国学家的作用,还不只限于此。中华民族在世

界民族之林的地位越来越高，外国人民对中国友好、渴望了解中国的也越来越多，没有一个媒介，没有一座桥梁，外国人民是难以了解中国的。外国的中国学家就正是这样的媒介，这样的桥梁。他们的工作能促进外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他们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金桥。

然而，在过去，我们对外国中国学家的工作太不注意了。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中国学，有一些学者也漠然置之。这既不利于中外人民友谊的增强，也不利于中国人民对外国的了解。这种情况不能让它再继续下去了。

现在四川外国语学院建立了国外中国学研究所，创办了《国外中国学研究》，真不能不说是目光远大，应该受到我们的最高的赞美。我个人愿意充当一个马前小卒，为各位先知先觉摇旗呐喊，共同推进这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是为前言。

1987 年 4 月 1 日

《中外文学系年要览》序

现在全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股热潮。除了全国性的学会以外，许多省市也纷纷成立了分会，出版了一些专著。至于短篇论文，数目更是无法统计的。青年学生对于这一门新学科兴趣日增，这对于中国是一件好事，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认为，这对于全世界的比较文学研究更是一件好事，则需要一点解释。

在西方国家，比较文学形成一个学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应该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西方的比较文学基本着眼于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学比较，目光很少出欧美一步。这当然大大地限制了比较文学者的视野。西方文学都属于近亲，比来比去，比不出多少名堂。学者们的一些理论也受到限制而缺少普遍意义。一出欧美，有时候竟令人感到滑稽可笑。这一点连一些西方学者也已逐渐认识到了。

救亡之方并不复杂，这就是要扩大范围，扩大视野，不再坐井观天。而一谈到扩大，则必然要把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包括进来。这样一来，全人类在过去几千年的漫长时间内在文学领域内所有的创造都包罗无遗了。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所探索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就不再偏颇，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岂不猗欤盛哉！

但是要想扩大范围，决非轻而易举，必然需要一系列的工具书。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文学系年要览》正是一本相当有用的工具书。全书洋洋70万言，按年代，分国家，依次排比。只要

抓住年代这个纲,则纲举目张,一查便得,何等方便!我觉得,这是对当前比较热潮的一个贡献。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甚至外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一定会感到高兴的。因此我乐意写出以上的一些感想,算是序。

1987年6月2日凌晨

《中国楹联墨迹荟萃》序

书法是中国传统的艺术之一，从唐代传入日本，至今兴盛不衰。楹联则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因为只有像汉语这样有独特结构的语言才能有。世界任何其他语言都根本无法讲什么平仄、对仗等等。没有平仄、对仗等等，也就没有楹联。道理是非常清楚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书法和楹联一向是紧密结合的。一直到今天，在全国各地的名山胜刹，古寺梵宫都还悬有名人书写的楹联。人民过新年时也往往用红纸书写楹联，张诸门楣，或表示祝贺，或表示期望，或言志，或抒情。为佳节凭空增添了无量欢悦。

将楹联汇集成册者，过去有过一些。但是将楹联与书法联合出书，尚未多见。现在聊城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了这一册《中国楹联墨迹荟萃》，集全国老中青三代学人、政治家、书法家的墨宝于一册，真可谓洋洋大观。窃以为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对全国书法爱好者来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欣赏这样多名家的书法；对全国文学研究者来说，能欣赏这样多精彩的楹联；对青少年来说，读一点楹联，可以体会中国文字之特点。五十多年以前，在1933年，先师陈寅恪先生给清华大学出国文入学试题，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记”，另出对对子一题，以测试学生对汉文理解之程度。当时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我以为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的。对仗确实能试出学生的水平，而楹联是最讲求对仗的。青年学生通过楹联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因此，他们还能通过欣赏书法与楹联艺术，开阔眼界，活跃情思，培养情操，提高精神境界，由热爱祖国独有的艺术，进而

热爱祖国。其为用不可谓不大矣。然而更有进者,其意义决不限于本国。从对外文化交流上来讲,像日本等国对中国书法艺术和文学修养素有基础,此外还有海外华人或华裔,对此同样有浓厚的兴趣。有此一编,不出国门家门,就能欣赏中国当代有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学者、教授的书法艺术,此书将受到他们的欢迎,是肯定无疑的了。

因此,我热烈祝贺此书的出版。愿中国传统文化和煦的春风吹绿祖国大地,吹遍友邻诸国。

1987年6月8日

《什么是比较文学》序

最近几年来，比较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已经逐渐开展起来了。在这方面，北京大学起了鼓吹推动的作用。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机构，一个比较完整的老中青三结合研究梯队也已形成。我们出版的这方面的书籍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全国的研究情况也表现出欣欣向荣的势头。

是不是一切都很好，都很顺利，一点缺憾也没有了呢？还不能这样说。在了解外国研究情况方面我们还有不少空白点。一不够普遍，二不够深入，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努力。

从国际上来看，法国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有突出的贡献。现在常讲的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分庭抗礼。对法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曾做过令人满意的翻译与介绍。但是仍然是一不够普遍，二不够深入。现在葛雷同志和张连奎同志翻译法国几个著名的比较文学家的几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这是值得欢迎的。我相信，全国广大的比较文学者也会欢迎的。我虽然乐意写这样几句话，但估计我的话会成为蛇足，我也希望它成为蛇足。本书价值具在，读者自己会评断的。

1987年6月23日

《罗摩衍那选》序

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汉译文七篇八巨册，完全出齐已经三年多了。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们要我从中选出三十多万字，印成一册，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接受任务为什么还要“欣然”呢？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一部书确有选一选的必要。这一部大史诗，虽然在印度家喻户晓，在世界上名声远扬，故事情节也动人心魄，但是故事性并不很强。有时候会费上很长的篇幅，描绘一座树林，或一场战斗，把许多希奇古怪的树名或兵器名，硬是拼凑成诗，合辙押韵。作者显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听者却是味同嚼蜡。据说，在古代印度，人们能夜以继日地听人歌唱这一部长诗。说实在话，其中原因我真有点难以理解。或许是听者对全书故事早已了然于胸中，听的只是朗诵者或者歌唱者抑扬顿挫的声音，是从声音中得到美感享受，而不是从故事情节中，正像中国的京剧和其他剧种那样。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想，证据是没有的。

我自己翻译这一部大书，用了六七年的时间。虽然用力极勤，兴致极高，但是在翻译过程中曾多次想到读者。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今天的生活节奏，比起过去来，大大地加速了。中国也不例外。今天中国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连中国的京剧和电影都嫌节奏过慢而失掉兴趣。再拿像《罗摩衍那》这样长的东西，硬塞给他们，故事情节的节奏比中国京剧还要慢得多，而且不可能从声音中

得到美感享受,要他们静静地坐在那里,仔细品味,确实是强人所难。我决不相信,除了少数人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不得不硬着头皮读下去之外,还有什么人能认真读下去。即使是摆香花,煮香茗,吸香烟,饮香酒,把读书环境弄得充满了诗情画意,也决不会像"雪夜闭门读禁书"那样吸引住人的。因此,如果不选上一选,把篇幅大大地压缩一下,让故事节奏快一些,故事情节联贯一些,那么那八巨册皇皇巨著决不会突然具有神奇的吸引力。命运只有一条,那就是,束之高阁,或者排在书架子上,在寂寞中存在下去。

说到选,不外有两种做法:一是平均主义的,从全书七篇每一篇中选出一点来;一是有重点的,只选有用的。我采用的是第二种做法。重点就摆在眼前,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抓到。这就是罗摩与悉多的爱情故事。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罗摩衍那》的故事性不是很强,但是故事线索却并不很少。除了罗摩和悉多这个主干故事以外,还有几个分枝故事,猴国的故事、魔国的故事,都属于分枝故事之列。我现在只选这个主干故事,其他分枝一概不管。这样主干更能突出。节奏可能显得快了一点,可读性也可能增加。总之,我希望通过这一次拣选,能够多招徕一些读者,能够给本来能沉得住气坐下细读的老读者节省一些气力。这就是我所以"欣然"的理由。

我自己"欣然",是不是读者也"欣然"呢?这有点难说。可是,我相信,读者也会同我一齐"欣然"的。总起来看,罗摩和悉多的爱情故事,如果去掉其中的封建糟粕,是非常感人的。两个人都忠诚于自己的爱情,海枯石烂,此志不渝。这种精神,即使在今天,也还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马克思说过,希腊神话具有永恒的魅力。古希腊如此,为什么古印度就不如此呢?《罗摩衍那》中包含着印度古代著名的神话,这些神话也同样具有永恒的魅力。离开了古代印度那种环境,那

样的神话无论如何是不会再产生了。但是，正因为它不能再产生，它是无法代替的，也是永远不会衰老的。时至今日，生活节奏日益加速，建设任务日益频繁，新兴学科日益纷杂，外来事物日益增多。现在已经不是古代那种可以夜以继日地悠哉游哉地聆听别人歌唱罗摩与悉多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的时候了。现代人的心情，同那时候完全不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多读一些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带神话色彩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使我们的内心能在纷杂混乱中保持宁静，保持平衡，否则长此以往，我们的精神将会无法支持。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些想法是正确的。

愿《罗摩衍那选》带着我的良好的祝愿走向五湖四海吧！

1987年10月1日

《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序

要论资排辈，了一先生应该是我的老师。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他是1932年从法国回国到清华大学来任教的。我当时是西洋文学系三年级的学生。因为行当不同，我们没有什么接触。只有一次，我们的老师吴雨僧（宓）教授请我们几个常给大公报文学副刊写文章的学生吃饭，地点是在工字厅西餐部，同桌有了一先生。当时师生之界极严，学生望教授高入云天，我们没能说上几句话。

以后是漫长的将近20年。1950年，我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因为是解放后第一个大型的出国代表团，所以筹备的时间极长。周总理亲自过问筹备工作，巨细不遗。在北京筹备了半年多，又到广州呆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们访问了岭南大学。了一先生是那里的文学院长，他出来招待我们。由于人多，我们也没能说上多少话。我同时还拜谒了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他也在那里教书。那是我第一次到广州。时令虽已届深秋，但是南国花木依然蓊郁，绿树红花，相映成趣。我是解放后第一次出国，心里面欣慰、惊异、渴望、自满，又有点忐忑不安，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甜甜的，又有点酸涩。在岭南大学校园里，看到了含羞草一类的东西，手指一戳，叶子立即并拢起来，引起了我童心般的好奇。再加上见到了了一先生和寅恪先生，心里感到很温暖。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以后又是数年的隔绝。1952年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调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了一先生也迁

来北京。从此见面的时间就多起来了。

从宏观上来看,了一先生和我都是从事语言研究的。解放以后,提倡集体主义精神,成立机构,组织学会,我同了一先生共事的机会大大地多了起来。首先是国务院(最初叫政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了一先生和我从一开始就都参加了。了一先生重点放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方面。我参加的是汉字简化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常常听到他以平稳缓慢的声调,发表一些卓见。其次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编纂工作。了一先生是中国语言学界的元老之一。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要听他的意见。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在一起开了不少的会。了一先生还承担了重要词条的编写工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写的词条别人提出了意见,他一点权威架子也没有,总是心平气和地同年轻的同志商谈修改的意见。这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将毕生难忘。最后是中国语言学会的工作。为这一个重要的学会,他也费了不少的心血,几次大会,即使不在北京,他也总是不辞辛劳,亲自出席。大家都很尊敬他,他在会上的讲话或者发言,大家都乐意听。

通过了这样一些我们共同参加的工作,我对了一先生的为人认识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清楚了。我觉得,他禀性中正平和,待人亲切和蔼。我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甚至大声说话,疾言厉色,也都没有见过。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他能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待人,无论是弟子,还是服务人员,他都一视同仁。北大一位年轻的司机告诉我说:有一次,他驱车去接了一先生,适逢他在写字,他请了一先生也给他写一幅,了一先生欣然应之,写完之后,还写上某某同志正腕,某某是司机的名字。这一幅珍贵的字条,这位年轻的司机至今还珍重保存。一提起来,他欣慰感激之情还溢于言表。

谈到了一先生的学术成就,说老实话,我实在没有资格来说三道四。虽然我们同属语言学界,但是研究的具体对象却悬殊很大。了一先生治语音学、汉语音韵学、汉语史、中国古文法、中国语言学史、汉语诗律学、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同源字等等。我自己搞的则是印度佛教梵文以及新疆古代语言文字、吐火罗文之类。二者搭界的地方微乎其微。了一先生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我确实读过不少他的著作,但是并没有读完他所有的著作。以这样一个水平来发表意见,只能算是管窥蠡测而已。可是我又觉得非发表一点意见不行。所以我现在只能从低水平上说一点个人的意见,至于是否肤浅甚至谬误,就无法过多地考虑了。

我想用八个字来概括了一先生的学风或者学术成就:中西融会,龙虫并雕。

什么叫中西融会呢?我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了一先生治中国音韵学用力甚勤,建树甚多。原因何在呢?在中国音韵学史上,从明末清初起,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师辈出,成就远迈前古。顾炎武、戴东原等启其端。到了乾嘉时代,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诸大师出,辉煌如日中天。清末以后,章太炎、黄季刚、王静庵等,追踪前贤,多所创获。这些大师审音之功极勤,又师承传授,汉语古音体系基本上弄清楚了。但是,他们也有不足之处,他们对于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缺乏近代科学的审析方法,因而间或有模糊之处。而这一点正是西方汉学家的拿手好戏。瑞典高本汉研究中国汉语古音,自成体系,成绩斐然,受到中国学者如胡适、林语堂等的尊崇,叹为得未曾有。实际上欧洲学者的成就正是中国学者的不足之处。了一先生一方面继承了中国的优秀传统,特别是乾嘉大师的衣钵,另一方面又精通西方学者的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在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中走出了一条新路。所以我说他是中西融会。至于他在汉语史等方面的研究上也表现出融会中西

两方的优点的本领，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什么叫龙虫并雕呢？了一先生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龙虫并雕斋。意思十分清楚：既雕龙，又雕虫，二者同样重要，无法轩轾，或者用不着轩轾。他的著作中有《龙虫并雕斋诗集》、《龙虫并雕斋文集》、《龙虫并雕斋琐语》等。可见了一先生志向之所在。这一件事情，看似微末，实则不然。从中国学术史上来看，学者们大别分为两类。一类专门从事钻研探讨，青箱传世，白首穷经，筚路蓝缕，独辟蹊径，因而名标青史，举世景仰。一类专门编写通俗文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普及工作。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前者往往瞧不起后者，古人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可以充分透露其中消息。实际上，前者不乐意、不屑于做后者的工作，往往是不善于做。能兼此二者之长的学者异常地少，了一先生是其中之一。在前者中，他是巨人；对于后者，不但乐意做，而且善于做。他那许多通俗的文章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著作《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对于普及普通话工作所起的推动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了一先生的远大的眼光和广阔的胸怀。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是值得我们大家都去学习的。"阳春白雪"，我们竭诚拥护，这是不可缺少的。难道说"国中和者数千人"的"下里巴人"就不重要，就是可以缺少的吗？

我在上面谈了我对了一先生为人和为学的一些看法。在世界和中国学术史上，常常碰到一种现象，那就是：一个学者的为人和为学两者之间有矛盾。有的人为学能实事求是，朴实无华，而为人则诡谲多端，像神龙一般，令人见首不见尾。另外一些人则正相反，为学奇诡难测，而为人则淳朴坦荡。我觉得，在了一先生身上，为人与为学则是完全统一的。他真正是文如其人，或者人如其文。在这两个方面他给人的印象都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只有实事求是之心，毫无哗众取宠之意。大家都会承认，这一点是非常难得

的。

多少年来，我曾默默地观察、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了一先生也包括在里面。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实在是一群很特殊的人物。他们的待遇并不优厚，他们的生活并不丰足。比起其他国家来，往往是相形见绌。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政治运动中，被戴上了许多离奇荒诞匪夷所思的帽子，磕磕碰碰，道路并不平坦。在十年浩劫中，更是登峰造极，受到了不公正的冲撞。了一先生也没有能幸免。但是，时过境迁，到了今天，我从知识分子口中没有听到过多少抱怨的言谈。从了一先生口中也没有听到过。他们依然是任劳任怨，勤奋工作，"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他们中的很多人真正做到了"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为培养青年学生，振兴祖国学术而拼搏不辍。在这样一些人中，了一先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如果把这样一群非常特殊的人物称为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难道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人们不禁要问：原因何在呢？难道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群圣人、神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吗？当然不是。我个人认为，只有在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出现。在这些人身上，爱国主义是根深蒂固、血肉相连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某一些（不是全体）知识分子，不管在国家兴旺时多么高谈爱国，义形于色；只要稍有风吹草动，立即远走高飞，把自己的国家丢到脖子后面，什么爱国主义，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在中国则不然。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吃过苦头，受到过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今天得到了解放，当然会由衷地欢畅和感激。要说他们对今天当前的情况完全满意，那也不是事实。但是，只要向前看，就可以看到，不管我们目前还有多少困难和问题，不管还有多少大风大浪，总起来说，我们的社会还是向上的，前途是光明的。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决不会改变。这一点，在了一先生身上，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

显得非常突出。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可宝贵的品质,年轻一代人应该永远保持下去。

了一先生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人品,他的学术却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他留给我们的一千多万字的学术著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要认真学习、研究,再从而发扬光大之,使中国的语言研究更上一层楼。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从这一册琳琅满目的纪念论文集中,我仿佛听到了我们大家的共同的心声。

愿了一先生为人和治学的精神永存。

1987 年 11 月 4 日

《歌德与中国》序

最近几年,杨武能同志专门从事于中德文化关系的研究,卓有成绩。现在又写成了一部《歌德与中国》,真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了。

我个人觉得,这样一本书,无论是对中国读者,还是对德国读者,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它都能起到发聋振聩的作用。一个民族,一个人也一样,了解自己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也不例外。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世界大势,昏昏然,懵懵然,盲目狂妄自大,以天朝大国自居,夜郎之君、井底之蛙,不过如此。现在读一读当时中国皇帝写给欧洲一些国家的君主的所谓诏书,那种口吻、那种气派,真令人啼笑皆非,不禁脸上发烧。

鸦片战争中国的统治者碰得头破血流,在殖民主义者面前节节败退,中国人最重视的所谓"面子",丢得一干二净。他们于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一变而向"洋鬼子"低首下心,奴颜婢膝,甚至摇尾乞怜。上行下效,老百姓也受了影响,流风所及,至今尚余音袅袅,不绝如缕。鲁迅先生发出了"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的慨叹,良有以也。

怎样来改变这种情况呢? 端在启蒙。应该让中国人民从上到下都能真正了解自己,了解历史,了解世界大势,真正了解我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看待一切问题,都要有历史眼光。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并不总是像解放前一百年来那个样子的。

我个人认为，鸦片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西方人看待中国同那以后是根本不同的。在那以前，西方人认为中国是智慧之国、文化之邦，中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令人神往的。从 17～18 世纪欧洲一些伟大的哲人的著作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从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的著作中，也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一点。杨武能同志在本书中详尽地介绍了这种情况。

这充分告诉我们，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看待自己要有全面观点、历史观点、辩证观点。盲目自大，为我们所不取；盲目地妄自菲薄，也决不是正当的。我们今天讲开放，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对西方的东西应该有鉴别的能力，应该能够分清玉石与土块、鲜花与莠草，不能一时冲动，大喊什么"全盘西化"，认为西方什么东西都是好的。西方有好东西，我们必须学习。但是，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难道西方所有的东西，包括可口可乐、牛仔裤之类，都是好得不能再好、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吗？过去流行一时的喇叭裤现在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感、所作、所为应该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千万不要重蹈复辙，在若干年以后，回头再看今天觉得滑稽可笑。我在这里大胆地说出一个预言：到了 2050 年我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回顾今天，一定会觉得今天有一些措施不够慎重，是在一时冲动之下采取的。我自己当然活不到 2050 年，但愿我的预言不会实现。

这一本书对德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的读者怎样呢？我认为也同样能起发聋振聩的作用。有一些德国人——不是全体——看待旧中国，难免有意无意地戴上殖民主义的眼镜。总觉得中国落后，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好像是中国一向如此，而且将来也永远如此。现在看一看他们最伟大的诗人是怎样对待中国的，怎样对待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的，会促使他们反思，从而学会用历史眼光看待中国，看待一切。这样就能大大地增强中德的互相了解和友谊。这

一点是可以断言的。

基于上面的看法,我说,杨武能同志这一本书是非常有意义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为序。

1987 年 11 月 30 日

《东方风俗文化词典》序

在一般人心目中,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只不过是一些细微末节,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稍微对这个问题有点研究的人,都能知道,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

从大处来看,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可能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风习有的是在极长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的。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而不深入研究风习,则所得结果必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稍微对这个问题有点研究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

从小处来看,一件件一桩桩的民族风习,往往能代表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特点。要同别的民族交往,必须懂得这些特点,不然的话,难免产生一些误会。小之引起一些不快,大之则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历史上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不少次了,并不是我在危言耸听。

东方国家的文化在世界上占重要的地位。在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中,东方就占了三个。与这几个文化体系密切相联的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世界各国人民都必须了解这些风俗习惯。我们身为东方人,更应该了解这些风俗习惯。无论是研究工作者,还是外交官,涉外商人,凡是同东方各国民族接触的人都必须了解这些风俗习惯,否则不但工作做不好,而且还会做不下去。这对我们这样一个东方大国是非常不利的。因而是绝对不允许的。

但是怎样去了解这些五花八门的东方风俗习惯呢？每个人都亲临其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靠书籍。过去没有这方面的书。即使有的书讲到一点，也只是一鳞半爪，而且往往只限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法得到一个全面的了解。这应该说是东方文化研究界的一个 Desideratum。

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同志们，还有校外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们，密切协作，撰成了这一部有 70 多万字的《东方风俗词典》，正弥补了这一个缺门。杜甫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想把这一部词典比作知时节的好雨。我相信，它会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1987 年 12 月 15 日

《北京大学》序

北京大学正在庆祝90周年华诞,这颇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吕林同志为此写了《北京大学》一书。他用流利活泼的文笔叙述了北京大学90年的历史,娓娓说来,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读者可以学到一些知识,又能得到美感享受。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为什么北京大学90年的历史竟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呢?首先当然是由于北大所处的地位。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值得考虑:北大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从东汉起一直到清朝的太学或国子监的继承者,又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开拓者。自从90年前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以后,历经清代、北洋军阀政府、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各个时代,一直到了解放,北大都无愧于她的这样一个历史地位。

北京大学既然是中国的一所大学,必然具有中国大学的共性。但是她在某些地方又不同于其他大学,这就是她的个性。共性的东西我们不谈了。个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到北大工作已经40多年了。经过40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北大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继承而且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大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从汉朝的大学生起,一直到了解放后,中国的大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很强,北大尤甚。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一直到解放后抗美援朝运动,北大无不走在运动的前面。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北大的光荣传统。

但是,一切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北大在十年浩劫期间,也曾走在前面。臭名昭著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在北大出笼,我们北大人从来不隐瞒这一件事实,而且从中吸取了教训。教训就是,在今后我们仍然要关心国家大事,以天下为己任,但必须有远见,有理智,不能盲目乱干。十年浩劫的教训,再也不能重现了。

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有密切联系的是爱国主义思想。这一点在中国知识分子,从历史上一直到今天表现得特别突出。这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国历来有爱国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则由于中国曾长期处在半殖民地地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因为本身受到压迫,最容易产生爱国主义思想。

90年来,北大的学生,当然也有教职员,在以上提到的两个特点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现在我国虽然已经进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压迫别人,也不受别人压迫,但是以天下为己任和爱国主义思想仍然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我希望,我们全体北大人,以及全国的大小知识分子能同意我的看法,带着这两个观点去读吕林同志的《北京大学》必然会有新的发现,新的领悟。这样一来,吕林同志这一本书的意义就不仅限于北大范围,而有普遍性了。是为序。

1988年2月24日凌晨

《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

我舞笔弄墨，五六十年于兹矣。我从来没有想到搞什么自选集，更谈不到什么“精华”。而今已近耄耋之年，垂垂老矣。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提出来，要我自选“精华”，编入丛书中。我最初觉得非常新鲜，但窃以为恐怕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想加以拒绝，托辞是，自己写的东西里面有不少的古怪文字，排印困难。想以此吓退出版社。我万没有想到，出版社的胡乃羽同志竟认真对待，说是回去研究一下。我想，这下子一定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颇以自己托辞巧妙而沾沾自喜。

然而事实却出我意料。过了一些时候，胡乃羽同志打电话告诉我，出版社经过研究，仍然决定出。这无疑击了我一猛掌。出版社这样认真对待，而我自己则轻率托辞，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必须端正态度，也认真对待了。

我于是根据令恪同志和李铮同志编纂的我的《著作系年》，认真考察了自己一生所写的东西。古人说：“文章是自己的好。”不能说，我认为自己写的东西全都是垃圾，有一些文章自己也是颇为满意的。但是，总起来看，自己写的东西中真正有很高水平的并不多。虽间有新的发现或见解，也并不见得都十分深刻。看了中外大师们写的文章，读到那些石破天惊的新见解，如饮醍醐，百读不厌，对这些大师们只有高山仰止了。谈到“精华”的问题，我曾对胡乃羽同志说过，自己挑选而称之为“精华”，不是有点狂妄了吗？她说，这也无大妨碍，你只把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文章挑选出来就行

了。

我就遵照这个意见,考虑了一下:哪些文章自己比较满意。这并不困难。满意或者不满意,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决定起来,比较容易。我从过去几十年写成的大约将近 200 万字的学术论文中,选出了若干篇,算是完成了任务。选的文章决不是照原样重印一次,而是由于胡乃羽和李铮二位同志的努力,校出了一些错误或者不确切的地方,在新版中都一一加以改正。因此,收入本集的文章其可靠性增加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但是,选完了以后,再加以仔细思考,却发现了一些自己从没有意识到的现象。我挑选的时候,丝毫也没有先入之见,一定要选哪一类的文章。我只是根据自己喜爱近乎本能地挑选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就说是"精华"吧。但是,挑选的结果,入选的全是属于考证一类的文章。这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自己的兴趣或者自己的能力究竟在什么地方。

清代桐城派主将姚鼐《复秦小岘书》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我觉得,这种三分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它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是十分自然的,它也为我所服膺。

在三者之中,我最不善义理,也最不喜欢义理。我总觉得,义理(理论)这玩意儿比较玄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矛盾,矛盾了几千年,到现在还没有哪一个理论家真正说透。以我的愚见,绝对纯之又纯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没有的。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显然也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符合。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以来,有一些理论家,或者满篇教条,或者以行政命令代替说理,或者视理论如儿戏,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最终让读者如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反正社会科学的理论不像自然科学的实验那样,乱说

不能立即受到惩罚。搞自然科学,你如果瞎鼓捣,眼前就会自食其果,受到惩罚。社会科学理论说错了,第二天一改,脸也用不着红一红。因此,我对于理论有点敬鬼神而远之。这类的文章,我写不出,别人写的我也不大敢看。我对理论的偏见越来越深。我安于自己于此道不擅长,也不求上进。

这并不等于说,我抹煞所有的理论。也有理论让我五体投地地佩服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经过了几十年的学习与考验,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完全反映了客观现实,包括了历史、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即使马克思主义仍然要不断发展,但是迄今它发展达到的水平让我心服口服。

这种轻视理论的做法是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呢?可能是的。一个人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即使是偏见吧,我目前还不打算去改变。我也决不同别人辩论这个问题,因为一辩论,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弄得大家一起坠入五里雾中。我只希望理论家们再认真一点,再细致一点,再深入一点,再严密一点。等到你们的理论能达到或者接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水平时,无需辩论,无需说明,我自然会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你们脚下。

谈到文章,我觉得,里面包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专门搞文章之学的,一个是搞义理或考证之学而注意文章的。专门搞文章之学的是诗人、词人、散文家等等。小说家过去不包括在里面。这些人的任务就是把文章写好,文章写不好,就不能成为诗人、词人、散文家、小说家。道理一清二楚,用不着多说。搞义理或考证之学的人,主要任务是探索真理,不管是大事情上的真理,还是小事情上的真理,都要探索。至于是否能把文章写好,不是主要问题。但是,古人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孔子要求弟子们在讲话方面要有点文采,是很有道理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义理学或考证学的专家们,有的文章写得好,有的就写得不怎么好。写得好的,人家愿

意看,你探索的真理容易为别人所接受。写得不好的,就会影响别人的接受,这个道理也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我认为,对不专门从事文章之学的学者来说,认真把文章写好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谈到考证,亦称考据,如上文所述,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也是清代朴学大师所最擅长的东西,同时又是解放后受到一些人责难的东西。最近我写了一篇短文《为考据辩诬》,这里不再重复。我在这里只谈我的想法和做法。

首先,我觉得考证之学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没有一些人加给它的那种作用,也没有令人惊奇的地方,不要夸大它的功绩,也不要随便加给它任何罪状,它只是做学问的必要的步骤,必由之路。特别是社会科学,你使用一种资料,一本书,你首先必须弄清楚,这种资料,这本书,是否可靠,这就用得着考证。你要利用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证明一件事情,你就要研究这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研究它们原来是什么样子,后来又变成了什么样子,有没有后人窜入的或者更改的东西?如果这些情况都弄不清楚,而望文生义或数典忘祖,贸然引用,企图证明什么,不管你发了多么伟大的议论,引证多么详博,你的根据是建筑在沙漠上的,一吹就破。这里就用得着考证。必须通过细致的考证才能弄清楚的东西,你不能怕费工夫。现在间或有人攻击烦琐的考证,我颇有异议。如果非烦琐不行的话,为什么要怕烦琐?用不着的烦琐,为了卖弄而出现的烦琐,当然为我们所不取。

其次,在进行论证时,我服膺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两句话已经被批了很长的时间了,也许有人认为,已经被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了。现在人们都谈虎色变,不敢再提。可是我对此又有异议。过去批判这两句话,批判一些人,是在极“左”思想支配下——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冒充辩证法,鱼目混珠,实际上是伪辩证法——来进行的。头脑一时发热,在所难免,我自己也并非

例外。但是,清醒之后,还是以改一改为好。我现在就清醒地来重新评估这两句话。

我个人认为,古今中外,不管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哪一个人在进行工作时也离不开这两句话。不这样,才是天大的怪事。在开始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时,你对于这个课题总会有些想法吧,这些想法就是假设。哪里能一点想法都没有而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呢?为什么要"大胆"?意思就是说,不要受旧有的看法或者甚至结论的束缚,敢于突破,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或者甚至胡想力,提出以前从没有人提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不然,如果一开始就谨小慎微,一大堆清规戒律,满脑袋紧箍,一点幻想力都没有,这绝对不会产生出什么好结果的。哥白尼经过细致观测,觉得有许多现象是太阳绕地球旋转说解释不了的,于是假设了日中心说。这真是石破天惊的假设,大胆的假设。没有这个胆量,太阳恐怕还要绕地球运转若干年。没有大胆的假设,世界学术史陈陈相因,能有什么进步呢?

那么,大胆的假设,其罪状究竟何在呢?

有了假设,不等于就有了结论。假设只能指导你去探讨,去钻研。所有的假设,提出来以后,都要根据资料提供的情况,根据科学实验提供的情况来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客观材料证实了多少,你就要在假设中肯定多少。哪些地方同客观材料相违,或者不太符合,你就要在假设中加以修正。这样可能反复多次,十次,百次,几百次;假设也要修正十次,百次,几百次,最后把假设变成结论。有的假设经不住客观材料的考验,甚至必须完全扬弃,重新再立假设,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凡是搞点科学研究的人,都能了解其中的味道,或甘或苦,没有定准儿。这就叫做小心的求证。

那么,小心的求证,其罪状究竟何在呢?

也有人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假设,自己认为是神来之笔,是灵感的火花,极端欣赏,极端自我陶醉。但是后来,客观材料,包括实验结果证明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在这个关键时刻,真正有良心的科学工作者应该当机立断,毅然放弃自己的假设,另觅途径,另立新说。这是正途。可是也有个别的人,觉得自己的假设真是美妙绝伦,丢掉了万分可惜。于是不惜歪曲材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选取对自己的假设有利的材料,堆累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迁就自己的假设的结论。这是地道的学术骗子。这样的"学者"难道说是绝无仅有吗?

这就是我理解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这是丝毫也无可非议的。

但是确实有一些学者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再搜集材料,来证实结论。"以论带史"派的学者,我认为就有这种倾向。比如要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他们从什么人的著作里找到了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结论。在搜集材料时,凡有利于这个结论的,则统统收进来;凡与这个结论相违反的,则统统视而不见。有时甚至不惜加以歪曲,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最后磨出一个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结论,而让步政策则是"修正主义"。研究清官与赃官问题时,竟然会说赃官要比清官好得多,因为清官能维护封建统治,而赃官则能促成革命,从而缩短封建统治的寿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研究方法根本用不着假设,不大胆的假设也用不着。至于小心的求证,则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衡量一切,谈不到小心不小心。

对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来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必须彻底批判的。

对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的结论是先验的真理,不许怀疑,只准阐释。他们是代圣人立言,为经典作注。

用这样的方法,抱这样的态度,来研究学问,学问会堕落到什么程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我服膺被批判了多年的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理由就是这一些。另外可能还有别的解释,则非愚钝如不佞者所能知矣。

统观自己选出来的这一些文章,不管它们是多么肤浅,我总想在里面提出哪怕是小小的一点新看法。要提出新看法,就必须先有新假设。假设一提出,还不就是结论。不管假设多么新,在证实之前,都不能算数。我经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设,个别时候甚至被迫完全放弃。有的假设,自己最初认为是神来之笔,美妙绝伦;一旦证实它站不住脚,必须丢弃。这时往往引起内心的激烈波动,最终也只能忍痛丢弃。我的做法大体上就是如此。鹦鹉学舌,非我所能;陈陈相因,非我所愿。我也决不敢说,我的这些所谓新看法都是真理。一部人类的学术史证明了,学术一定要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将来有新材料发现,或者找到了观察问题的新的角度,自己的看法或者结论也势必要加以修改,这是必然的。

现在归纳起来可以说,我过去五六十年的学术活动,走的基本上是一条考证的道路。可是原来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到了今天,通过这个自选活动,我才真正全面而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考证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无非是寻求真理而已。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凡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足信的”。这句话可以有多种解释。什么叫真理? 大家的理解也未必一致。有的人心目中的真理有伦理意义。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事情是什么样子,你就说它是什么样子。这是唯物主义,同时也是真理。我体会爱因斯坦在这里所说的真理就是这样的真理。他这一句颇耐人寻味。同样是真理,事情却有大小。哥白尼倡日中心说,这是大事情上的真理。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弄清楚一个字或一句话的古音古义,这是小事情上的真理。事情有大有

小,而其为真理则一也。有人夸大考证的作用,说什么发现一个字的古音,等于发现了一颗新星。这有点过分夸张。这样的发现与哥白尼的日中心说是不能比的。不管怎样,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历史,这一点恐怕是无法否认的。从事各种工作的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内追求真理、探索真理。

我自己也在我所从事的领域内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一直探索了五六十年。我经常说,我少无大志。不但在中小学里没有立志成为学者,就是到了大学以后,除了写点散文之外,真正的学术论文没有写几篇。写成了的那几篇水平都不高。我是阴差阳错才走上现在这样一条道路的。但是一旦走了上来,我却能坚持不放。过去在极"左"思想黑云压城的时期,一个人如果想写点什么,想努力钻研点什么,现成的帽子就悬在你的头上:名利思想,修正主义。我搞了几十年的行政工作,在过去40年中,至少有1/4的时间是泡在无穷无尽的会议中,消磨在花样繁多的社会活动中。但是,我仍然坚持看书写作不辍,我是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来从事这项工作的。就时间来说,我每天不比任何人多一分一秒,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我一向被认为是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连带我工作的北京大学东语系也成了业务挂帅的典型。我却乐此不疲,坚持不改。每一次政治运动,我首先检查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大家都认为是抓到了点子上,顺利地过了关。但是,我是一个"死不改悔"的顽固派,检查完了,运动一过,我照样搞我的"修正主义":智育第一,业务至上。我担心不担心下一次运动呢?担心的。但是,我对自己那一套检讨的本领很有信心,抓自己的问题,一抓就灵。因此也不过分担心。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有点后怕,有点不寒而栗。如果我不是一个顽固派,一度检查,真心悔改,同"修正主义"一刀两断,同智育第一、业务至上划清界限,今天我在科学研究方面还能留下什么东西,就很值得怀疑了。"死不改悔"的顽固派有

时候也会有点好处的,这就是我的结论。

那么,我搞这一套东西是不是为名为利呢?说一点都没有,那不是事实。但是我再三检查自己的动机,觉得并不完全是那个样子。研究一个问题,提出一个假设,经过反复的验证,得到了自己认为满意的结论,虽然不过是小事情上的真理,自己却往往大喜过望,以为人生之乐无过于此矣。我之所以拼命钻研,老而不已,置危险于不顾,视饥饿如儿戏,不是为名为利,而是为了探索真理。我想,很多科学工作者恐怕也有同我一样的动力。

我还想讲另外一个情况。我在上面曾提到令恪同志和李铮同志编的我的《著作系年》。我除了根据这个《系年》来挑选文章以外,还粗粗地检查了我在过去几十年中写作的情况。从 1932 年我 21 岁时起,几乎每年都写点东西。从 1937 年到 1942 年,表面上没有写什么东西,实际上是我一生学习最努力的时期。从 1967 年至 1977 年,在长达 11 年的时间内,竟然一篇东西都没有,不能不令人吃惊。这情况我过去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过,但是很不具体。现在一看《系年》,赫然白纸黑字,我真是震惊不已。至于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大家心里都明白,用不着多说。我一个人如此,全国又不知道有多少成千上万的人也是如此。想到这里,所谓"文化大革命"究竟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不是清清楚楚了吗?我又有点后怕,又有点不寒而栗。如果真正让"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搞一次,一次搞上七八年,搞的结果恐怕要把全国知识分子的知识都搞成光板。卫星上不了天,是可以肯定的;所谓"红旗落地",是否还有红旗都是值得怀疑的,还谈得上什么落地不落地呢?

在人生的征途上,我已经走了 70 多年。如果照古人的说法:行百里者半九十,那么我走了还不到一半。但这是比喻,不是事实。应该承认,自己前面的道路有限了。可我也并不想现在就给自己做结论,我认为还不到时候。我在这一生选择了这样一条道

路,走起来并不容易。高山、大川、深涧、栈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并不容易。说不想休息,那是假话。但是自谓还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宛如鲁迅散文诗《过客》中的那一位过客一样,非走上前去不行,想休息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有人问:"倘若让你再活一生,你还选择这样一条并不轻松的路吗?"我用不着迟疑,立刻就回答:还要选这一条路的。我还想探索真理,这探索真理的任务是永远也完不了的。

在这里我要感谢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在目前出版条件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还毅然决定出版这一套丛书,又让我滥竽其中。我还感谢李铮同志,他用他那特有的细致认真的态度来帮我整理稿件。最后但不是最少,我还必须提一提本书的责任编辑胡乃羽同志。她那种对待编辑工作的细致、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决非轻轻的一句"感谢"所能报答的。她对我是一次活生生的教育,我不由得由衷地对自己说:"干工作就得像胡乃羽这个样子!"

1988年4月18日写完

行将见春色满寰中

——《东方美术史》序

记得当年在德国读书时，有一件事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几乎每一所德国大学都设有一个美术史系。德国，不像中国现在这样“教授满街走”，那里的教授是非常少的，一般的系只有一个教授，大系才有两个；而美术史系，不管这个系多么小，学生多么少，也总有一个正教授。对于德国这样做的意义，我当时大惑不解，一直到回国以后很久，我才逐渐理解。

后来，我到了苏联，又听说莫斯科大学的文科研究生，不管是否学习美术，必须要常到普希金画廊去参观，这也算是上课。俄国教育受德国影响颇深，在重视美术史方面是否也有一点渊源关系呢？

德国、苏联，还有欧美其它国家，为什么这样重视艺术教育呢？道理是很明显的：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修养，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优美情操。中国旧日许多著名演员都能欣赏书画，甚至自己染翰挥毫，写字作画。他们演出的戏雅而不俗，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事实。还有许多名医都注意书法，据说这样开出的药方有助于安定病人的情绪。这些现象都说明文化修养的重要性，也说明美术在文化修养中的重要性，决非信口雌黄。

在中国，过去也有人提倡过美术教育。蔡元培先生就曾主张“以美育代宗教”；鲁迅先生也主张在大学里开设美术课，他曾为北京的教育部起草过有关的文件。他晚年大力提倡木刻和版画，这

都是大家熟知的事实。

可惜，蔡元培和鲁迅的合理主张没有能够得到贯彻。旧北大曾有过研究音乐的机构，后来没有继承下来。解放以后，教育虽屡经改革，但是主张大学增设美术课者，却不见一人，不能不令人浩叹。

教育部门如此，一般人更无论矣。今天，中国人民的一般文化修养，似乎很难说是很高的，中外有识之士颇有些忧心忡忡。中华文化之邦，不文明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岂不大可哀哉！世界上文明国家都有大量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我国又怎样呢？为今之计，如果真想建设两个文明，必须大力建立美术馆和博物馆，大力出版美术史一类的书。这样庶几有助于社会风气之改善，道德情操之培养。这是一件大事，决不可等闲视之。

现在，范梦同志的《东方美术史》已经出版了。如果承认我上面说的那些话，就应该由衷地欢迎。这本书的重点是东方，这决不意味着西方美术不重要。东西双方都是重要的，但是，既然中国是一个东方国家，东方美术，我们欣赏起来，理解起来，也许更容易些。如果将来再出版一些东方美术的图像册和东方绘画的画册，那将会相得益彰，更容易发挥美术的作用。范梦的这一本书希望能成为报春之鸟，行将见春色满寰中，美术之光普照大地，我也将为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是为序。

1988年7月31日写于北大

《卢坤峰题画诗》序

诗、书、画三绝，世所艳称。此盖由中国文化特点及艺术特点所决定，他国艺术不得同日而语也。然古今真能臻此境界者，亦为稀见。卢君坤峰，英年歧嶷，于斯三者，皆有可观之造诣。谓之三绝，不亦可乎？羡林于诗、书、画三者，皆非里手，妄发议论，贻笑方家。然所见如此，不敢自秘，姑妄言之耳。

1988年10月22日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序

近几年来,寅恪先生的弟子们和弟子的弟子们,以及其他一些朋友,经常谈论一件事,想在先生诞辰百周年时,出一本论文集,以资纪念。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邓广铭教授对此事异常关注。中心成员王永兴教授和荣新江副教授实主其事。惨淡经营,几经周折,终于把稿子集成。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当前出版界碰到极大的困难时,不顾经济损失,毅然承担出版责任。我们中国史学界的同仁们对上述诸位学者和出版社,决不会吝惜自己由衷的赞美和敬佩。

用论文集的形式纪念某一位有造诣有影响的学者,是在东西方一些国家中一种流行的办法,在日本尤为普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还历纪念"、"古稀纪念"一类字样的纪念论文集。纪念对象大都仍然健在。这种办法在中国比较稀见。但是解放前中央研究院纪念蔡元培先生的论文集,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用这种形式来纪念寅恪先生呢?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决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怎样才能算是一代大师呢?据我个人的看法,一代大师必须能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一世之新风,踵事增华,独辟蹊径。如果只是拾人牙慧,墨守成规,决不能成为大师的。综观寅恪先生一生治学道路,正符合上述条件。他一生涉猎范围极广,但又有中心,有重点。从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天竺影响,进而专心治六朝隋唐历史,晚年又从事明清之

际思想界之研究。从表面上看起来,变化莫测,但是中心精神则始终如一。他号召学者们要“预流”,也就是王静安先生和他自己所说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学问”,学者能跟上时代,就算是“预流”。寅恪先生在上述各个方面都能“预流”,这一点必须着重指出。他喜欢用的一句话是发前人未发之覆。在他的文章中,不管多长多短,他都能发前人未发之覆。没有新义的文章,他是从来不写的。他有时立一新义,骤视之有如石破天惊,但细按之则又入情入理,令人不禁叫绝。寅恪先生从来不以僻书来吓人。他引的书都是最习见的,他却能在最习见中,在一般人习而不察中,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寅恪先生继承了清代朴学考证的传统,但并没有为考证所囿。考证学者往往不谈义理,换一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不大喜欢探索规律。但是,寅恪先生却最注意探索规律,并不就事论事。他关于隋唐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证。他间或也发一些推崇宋学的议论,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今世论者往往鄙薄考证之学。实际上,研究历史首先要弄清史实,考证不过是弄清史实的手段,既不必夸大其辞,加以推崇;也不必大张挞伐,意在贬低。我们历史学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高唱“以论带史”,却往往是“以论代史”,其甚者甚至置史实于不顾,而空谈教条,这样的教训还少吗?提倡一点考证,可以济我们历史研究之穷,不是一件坏事。寅恪先生利用考证达到弄清史实的目的,一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自己学殖瘠薄,实不足以窥寅恪先生之堂奥,妄发议论,贻笑方家。但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的这些浅薄的看法也许还有点参考价值吧。

现在纪念论文集即将出版。作为寅恪先生的弟子,我衷心感激海内外学者们惠赐大作为本集增添光辉。我只希望,我们大家能在寅恪先生指出的“预流”的基础上,昂扬前进,把我们的史学研

究的水平再提高一步,愿与海内外诸志同道合者共勉之。

1988年12月5日

《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后记

跟我比较熟的几个同志建议我将有关印度佛教史和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论文集成一个集子。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我照办了,结果就是现在这个集子。

为什么觉得这个意见很好呢?因为多少年来,我一方面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另一方面又在探讨佛教史的问题,这两个其实是一码事,中印文化交流是主干,佛教传入中国是这种交流的一个具体表现。把这两方面的论文集在一起,可以起相辅相成的作用。

关于这两方面的论文,我写的不止是本书中所收的这一些篇。大部分都已经收在已经出版的或即将出版的《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等书中。收在这些集子中的论文,除一点点例外外,本集全部不收。原因不言自明。

间或听到有人对论文集的形式有些看法:为什么不写成专著而只写论文呢?专著诚然很好,但也有它的局限。一写专著,必求全面,结构框架,一一推敲。为了装点门面,中间必然掺上一些搔不着痒处的东西。论文则不然。可以就一个小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直抒胸臆,不用搀水。从世界学术史上和中国学术史上来看,论文的作用都不能低估。

我并不贬低专著。我也曾有写专著的考虑,想写一本《印度佛教史》。我有志于研究佛教史有年矣。积累的资料比盈尺还要多。但是牵于他事,又年近耄耋,自谓难以完成撰写印度佛教史的任务

了。因此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论文集在一起,便于自己和他人翻检。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我对印度佛教史的一些看法,供同行学者评估。

说这些文章有多么高的水平,我愧不敢当。但是文章有一些特点,却不能否认。在每一篇文章中我都努力提出一些新问题,而且是关键性的问题,加以解决。我解决的方法以前还很少有人用过,我是通过对佛典梵语特点的研究来确定要探讨的问题出现的时间和地点。这个方法曾经受到许多学者的赞美,这对我是一种鞭策,其中德国梵文学者 Bechert 教授却是又批判,又赞美。我原来以为是赞美在前,批判在后。但是后来我才发现,这两个举动发生在同一年内。因此我就不能断定究竟哪一个在前了。我但愿赞美在后。

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我这个方法也受到毁誉,这总是难免的。无论是毁还是誉,我都重视,我总是平心静气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两方面的意见。但是,我决不为他们所左右。只要我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是对的,我决不动摇。利用佛典语言特点,这一条道路我认为是正确的、可靠的,我要坚决走下去。尽管现在各国关于印度佛教史的著述已经很多,但遗留的重大问题仍然不少,比如小乘向大乘的过渡问题,佛教部派产生的问题等等。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也考虑过很久了。将来时机成熟,我仍然要写一些东西的,而用的方法仍然是利用语言特点。

我讲的这些情况,我相信,细心的读者自己都能看出来的。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这些东西不能说都是好文章,但我总怕自己的"寸心"不为人知,所以才又啰里啰嗦写了上面这一些话。

至于中印文化交流史,本集中也收了几篇。最近几年来在全国掀起的"文化热"的高潮中,我也考虑了一些问题。我对文化问

题本非内行里手,但一得之愚,恐怕也自有其价值,所以就大胆发表意见。中印两国各有自己的文化圈,但二者之间又频繁交流,其效果是异常显著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世界历史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间不太远了。人类文化发展到了今天,全世界各国,不管是大小强弱,都面临着一些与人类生存有关的新问题。在这样情况下,探讨一下中印两大文化圈的交流恐怕是不无意义吧。

同我的其他一些书一样,收集、整理稿子的任务又落到李铮同志肩上。他以他那特有的细致负责的作风,整理出了这一部集子。我对他表示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在当前出版事业面临种种困难的情况下,竟然肯出这样一本书,我也必须表达我的谢忱。

1989年1月25日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序言

本论文集共收论文41篇,是从1988年在北京召开 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中选出来的。那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国内学者外,还有来自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瑞典、挪威等国的学者,以及台湾来的学者;真可以说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极一时之盛。而且国内外学者中有不少人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为本次会议增添了光彩。

本集中论文的作者,既有中国学者,也有外国学者;既有老年学者,也有中青年学者。这两个特点,看似寻常,实则具有深刻意义。我在开幕词中提出了两句话:敦煌、吐鲁番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世界,得到了中国领导同志和外国学者的赞许。可见这两句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时至今日,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国际性的。关起门来搞学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这一次会议和本集所收的论文,充分体现了这个精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 。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表现出来了非凡的才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本论文集中所收的青年学者的论文可以为证。在这里,有一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中国青年学者得到了日本老一辈学者的赞扬,日本青年学者得到了中国老一辈学者的称许;而且两国的青年学者通过个人接触,通过会上的讨论,切磋琢磨,建立了个人的友谊。这充分说明了,在我们这里,狭隘的民族感情已经让位予大公无私的学术活动的国际合作精神。这对于敦煌吐鲁番学在世

界范围内的发展,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时代不断前进,希望在于未来。我们这一批老一代的学人,看到我们这一门学科光辉灿烂的发展前途,能不得到极大的安慰吗?看到国与国之间的青年学者这一种亲密无间的合作精神,能不得到极大的安慰吗?

本论文集的编选工作,王永兴教授实主其事。他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完成了这一个颇为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感谢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在目前出版业处在“谷底”的情况下,毅然出版这一部论文集,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同任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样,不可能把所有的论文都收进去。因此就必然要有所选择。不周之处,希望得到谅解。

1989年2月17日

日译《季羡林散文集》前言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我的《散文集》送给了峰岛旭雄教授。我万没有想到,他竟委托依田熹家教授从中选择了几十篇,译成了日文。用中国现成的话来说,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了。

我写散文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应该说,这不是我的本行,但是,在这漫长的时间内,经常有一些人、事、物真正触动了我的灵魂,逼得我非拿起笔来不行。可以说,我这些散文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就这样锲而不舍,一直流了六十年,看样子还会流下去的。

我写散文受的影响,归纳起来,可以说有三个方面:中国古典散文、英国散文和日本近现代散文。中国的经、史、子、集中很大一部分都属于散文的范畴。中国实际上是世界上的散文大国。我自幼耽读古文,受到影响,是很自然的。我在大学里读西洋文学系,特别喜爱英国的那一些散文作家。至于日本,则我从中学起就爱读日本文学作品,包括散文作品在内。我觉得,日本近现代散文作品东西方的影响都接受了,而以东方为主。日本散文,和日本俳句一样,有一种特异的神韵,东方的神韵。西方作家,不管有多么高明,但这种神韵他们是没有的,他们恐怕也很难欣赏这种神韵。我是一个地道的东方人,中国散文和日本散文中的这种神韵,我自谓是能充分欣赏的。

在散文创作中,我也努力保持这种东方特有的神韵。在努力的过程中,日本散文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现在我的散文译

成了日文,我想在日本的读者中,我会有知音的。

我感谢峰岛旭雄教授和依田熹家教授。我当然也感谢我的日本同行中村元教授。我希望,而且也相信,他们的努力不会是徒劳的。

1989年2月22日

《中日比较文化论集》序

在人类的文化史上,像中国和日本这样文化关系异常密切的国家,实不多见。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至少已经有了将近两千年的历史。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过去的论者多强调在历史上日本向中国学习的一面,而不甚注意中国向日本学习的一面。我认为,这至少是一个偏颇。

去年在中国召开的中日民间人士的会议上,我发言时引用了黑格尔关于事物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理论,谈了中日的文化关系。这三个阶段是大家所熟知的:正 These、反 Antithese、合 Synthese。我觉得,这个理论完全可以应用到中日文化关系史上来。从中日文化交流开始直至 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这算是正的阶段。从 1868 年起直到 1949 年或者前后,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这算是反的阶段。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长远的未来,是中日共同学习、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时期。这算是合的阶段。当时我曾强调说,中日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源,我们都清楚了,是一个非常长的源。流,我们还不太清楚,可能是一个比源还要长的流,现在还难以估算。我们现在常常讲,中日两国人民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个口号非常响亮,中日两国人民都同声响应。但是,具体内容则颇有点模糊。现在我提出了三个阶段的说法,又把重点放在第三个阶段上。我想,我的看法是能够为两国学者所接受的。在那次会议上,我发言后,就有日本学者表示同意,并同我握手长谈。我的看法至少可以弥补那个模糊的缺憾。

我在上面两次用了"主要"二字,意思是说,即使在两国之一向对方学习时,也不会是纯粹的一边倒,也还有互相学习的成分在。

我在那次会议上着重解释了中国向日本学习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似乎还从来没有人这样明确地提出来过。我碰到不少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日本学者,他们也都只是强调在历史上日本向中国学习的一面。那么,我为什么现在提出中国向日本学习的问题呢?试想一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情况,便可一清二楚。当时的人们昭告天下:向西方学习。但是许多向西方学习的代表人物却同日本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是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当然同时也就学习了日本。我举出几个代表人物的名字:孙中山、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苏曼殊、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等等,都是非常显赫的名字。汉语中很多科学名词和政治术语,都是从日本移栽过来的。连马克思主义最初也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最早的汉译本,恐怕主要是根据日译本转译的。20 年代,许多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书籍,也是从日译本译过来的。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可惜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所以我必须在这里着重提一下。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虽然中日两方面的学者都努力研究对方文化的特点,但是比较研究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程度。我对于中日文化交流问题是一个门外汉,了解得不多。可是就我浏览所及,中日文化对比的研究确实还有待于发展和提高。我早就希望,有朝一日,中日双方的学者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

现在他们果然注意到了。1987 年 10 月,中日两方的一些著名的学者,在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主持下,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赞助下,在北京大学联合召开了中日比较文化研讨会。中日两国的学者在会上宣读了内容精湛的论文。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

论文,推动中日比较文化的研究,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同仁们,汇集了这一本《中日比较文化论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一定会受到中日两方学者们的热烈赞扬。

中日两国人民间已经有了长达两千年的友谊。在目前新的形势下,两国人民又都渴望加强、发展这个传统友谊。加强、发展友谊的方式多种多样,而通过加深彼此的理解则是最有效的。想加深彼此的理解,方式也是多种多样,而通过彼此文化的比较研究,则是最有效的,最根本的。现在,中日文化的对比研究方在开始,来日方长,前途辉煌。我在上面曾引用过黑格尔事物发展三阶段的理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合的阶段。在互相学习,共同前进的基础上,我们两国人民将真正地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

是为序。

1989年3月21日

《中国文化年鉴》序

年鉴的重要性,尽人皆知。最近几年来,我国确实出版了不少的年鉴。许多学科都有了自己的年鉴。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欢欣鼓舞的现象。

如果说还有什么缺憾的话,那就是,中国文化还没有自己的年鉴。年来研究中国文化的高潮,在全国激荡。异论蜂起,众说纷纭,论文如雨,专著如云。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起着促进推动的作用。可是,想找一本提纲挈领的年鉴一类的书,能够让读者一览无余,立刻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得到一个全貌,却还没有。

中国文化书院建院数年以来,以弘扬中国文化,引进外国文化为职志,举办了许多全国范围内的培训班,召开了一些国际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大量的论著和学报,团结了大批的中外港台的知名学者,成绩具在,用不着老王卖瓜。去年,院内的一些同仁又着手编纂一部中国文化年鉴。经过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现在终于编成了。这填补了我国年鉴出版工作的一个空白,一定会受到国内外欢迎的。

年鉴,顾名思义,记载的应该是过去一年的事。但是,因为这是第一册,只讲过去一年,不足以概全貌。因此,我们就把时间上限延伸了不少。以后再出的话,就能够严格地遵守年鉴的规格了。

现在,我们怀着良好的愿望,伴之以真诚的祝福,把这一册年鉴送出去,送给海内外爱好中国文化的志同道合者。既在雪中送

了炭，又在锦上添了花，愿它走向天涯，走向海角，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得到赞赏，我们高兴；得到批评，我们感谢。无论如何，对己对人，都会有好处的。

是为序。

1989年4月5日

《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序

我一向认为，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文化交流，人类就没有进步，就没有今天世界上这样繁荣兴旺的社会。

环顾我们四周，我们今天的衣、食、住、行，哪一件没有文化交流的痕迹？如果没有几千年，特别是近几百年来的文化交流，我们今天的社会能有现在这个样子吗？

文化交流表现的形式很多。外来词在其中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谓外来词，无非是两大类：一类代表精神方面的，抽象的东西；一类代表物质方面的，具体的东西。佛、菩萨、耶稣教等等属于前者；沙发、咖啡、巧克力等等属于后者。无论是抽象的东西，还是具体的东西，这些词儿所代表的东西原来都是外国货，传入中国，必须有一个华名，于是千奇百怪的外来词就应运而生。有的最初是译音，后来中国人民觉得不习惯，于是改为意译，比如电话，最初叫德律风，等等。有的始终保持原来的音译，比如沙发、咖啡等等。决定取舍的是广大人民群众。

有很多东西，我们早已忘记了它们是外来的了。比如葡萄、菠菜等等。我们不是天天在吃吗？有谁还会想到：这些东西原来都是"舶来品"——可能是"骆驼来品"——呢？想不到它们是外来品，葡萄、菠菜等的美味决不会受丝毫的影响，我们照样可以大快朵颐。但是，如果我们在津津有味地享用这些东西之余，能够知道一点它们的来源，不是会更增添一些美感，增加一些历史的美丽的

回忆吗？我甚至相信，有了这一些美感，有了一点美丽的历史回忆，在潜移默化中，会加强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意识到世界林林总总的人民总是互相帮助的，共同进入大同之域的理想也决非一个乌托邦。

我在这里并不要求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成为研究外来词的专家。他们在读书和生活中遇到一些外来词和用外来词所表示的生活用品，尽管他们不知道这是外来词或舶来品，只要能理解，能享用，这也就够了。但是，对一些从事文教工作的人，一些大、中、小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历史研究、语言研究，或其他有关研究工作的人，似乎应该在这方面要求高一些，应该要求他们对外来词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决非过高的要求。

可惜的是，我国对外来词的研究，一向受不到重视。世界上一些先进的文明国家，往往都有一批研究外来词的专家，有不少的外来语词典。一般老百姓，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查阅，既能扩大知识面，又能提高文化修养。反观我国，不无遗憾。研究外来词的专家很少，编纂成的专著和词典更不多见，广大人民群众对这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这与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显得异常不协调。

史有为同志是个有心人。他多年以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怕坐冷板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从事外来词的研究，现在终于写成了这一部《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专著，既能当学术著作来读，又能当外来词词典来查，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为我国学术界弥补了一个缺憾。我相信，这样一部著作，一方面会受到专家学者的赞美，另一方面又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是为序。

1989年9月19日

《敦煌文书学》序

林聪明教授撰写《敦煌文书学》既竟，索序于予。自问于敦煌学涉猎至浅，本无作序之勇气。继思提倡敦煌学之热忱则至深且切，又似有作序之资格。于是乃不揣谫陋，毅然应命，佛头著粪，所不敢辞。然实欲结文学因缘也。

去岁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年会开幕辞中羡林曾有言曰："敦煌吐鲁番在中国，而敦煌吐鲁番学则在世界。"极得与会中外学者之赞赏。敦煌学自建立以来，瞬将百年。东西各国从事此项研究之学者，灿如列星。名篇佳作，层见叠出。敦煌学已浸浸成为世界显学矣。吾国海峡两岸之学者不甘后人。老、中、青三代学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半世纪来，成绩斐然，使中华文化弘扬于天下，亦可以扬眉吐气矣。

敦煌学虽有悠久之历史，但深入研究尚有待于未来。人类学术永不能停留于一点之上。年长者既完成其历史任务，年轻者必接踵而至。此学术进化之规律，亦世界之通例也，决非人力所能左右者。但年轻者必有一成长过程。语云："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无师傅，进门必难，甚至不得其门而入。林聪明教授凭其积年研究之心得，撰成此书，深入浅出，娓娓动人。诚进门之良师、学海之津筏也。以浅见所及，海峡两岸尚少此种著作。此书一出，必将不胫而走。行将见敦煌学研究之佳卉开遍神州大地，敦煌学研究之新世纪亦必将肇端于此。岂不猗欤盛哉！愚钝老朽如羡林者亦将浮一大白

矣。是为序。

1989年10月15日

《南国声华——周颖南创作四十周年》序

我年近耄耋，生平阅人多矣，已经成为一个地道的“世故老人”。根据我的“世故经”，我一向认为，企业家和文学家是两类水火不相容的概念。古人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企业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颇有点类似学与道之间的关系。我生平还没有遇到过一个既是企业家同时又是文学家的人。

有之自周颖南先生始。

在会面之前，我已经听说过颖南先生的大名。他同我们国家一些文化名人有密切的友谊，出过一些通信集一类的书籍。后来又听说，周先生在新加坡是著名的企业家，又是华文文学的著名作家。更难能可贵的是，周先生对我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同叶圣陶、俞平伯、刘海粟、巴金、萧乾等受国人尊敬的文学艺术家，有多年的交往。他同香港的饶宗颐先生也有亲密的友谊。这都可以说是文坛佳话，也可以说是商坛佳话吧。

最近几年，我经常考虑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我觉得，一部人类进化史证明了一个历史事实：经济离不开文化，文化也离不开经济。没有经济的发展，文化不可能繁荣。没有文化的繁荣，经济也不可能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怎样解释，也解释不掉这个历史事实。认识这一点是异常重要的，对于平民老百姓和当权者，都是重要的。要想国家富强，必须两方面都抓，偏于一方，后果严重。

这话扯得远了一点。个人与国家毕竟不完全相同。对一个人

来说，不两者来抓，是没有多大影响的。但是，话又说了回来，如果一个人能够两者都抓，不也会更好吗？再来上一个“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步，这是异常困难的。

而周颖南先生尚矣。

说话绕了这样多弯子，直白地说吧，在我眼中，周先生是一个畸人，可以人“畸人传”的。

我就是怀着这一点敬意，写了这篇短序。

1989年12月11日于北京大学

缺 页

杂文及其他

缺　页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之获得者高尔斯华绥

(一)生平和著作
(二)戏剧家的高尔斯华绥
(三)长篇小说家的高尔斯华绥
(四)短篇小说家、小品文家、诗人的高尔斯华绥
(五)附尾

(一)生平和著作

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于1867年8月14日生于英国苏雷(Surrey)之孔布(Coombe)。母亲名巴提利(Bartleet),系出沃台斯德省(Wortesteire)旧家。父亲在伦敦是有名的律师。幼年在哈楼(Harrow)读了五年书,颇致力运动,当过足球队长。1886年入牛津大学新学院,三年后毕业,获得法学学位。青年的高氏,并没有怎样过人的地方,最多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好人,巴蕾(Barrie)在罗撒林(Rosalind)里面描写牛津大学学生的情形,就有高氏的缩影。1890年执业做律师,但是他对自己的职业,却感到极端的厌恶,因为家境还宽裕,不急需要挣钱来糊口;所以他便跑了出去,做了二年的长期旅行。关于这旅行他没写什么东西,在这里面,他也没有得到以后著作的材料,不过,因为是在国外,他能更清晰地观察了自己的国家,正如易卜生在意大利观察了挪威一样。在这期间,他自己发奋读着迭更司,屠格涅甫,莫泊三,法朗士的作品,这些人对

他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第一次海行,遇着了康拉得(J·Conrad)。那时康还在多伦斯(Torens)船上服务,他俩同船自澳洲一直航行到南非,两人间产生了很深的友情。康以一篇小说的原稿给他看,他劝他继续写下去,康氏终以文学终身,而成了近代小说名家。

在28岁才开始文学的他,成为作家是很偶然的事。重要的原因,实在是出于他的未婚妻的督促,他自己说:"一个在英国公立学校和大学出身的人,习于游乐旅行,经济不受压迫,而且又是一个没人问津的律师,他不会把文学看得很严重的,但是他可以写点东西给他的爱人看,于是我开始写。两年以内写了九篇小说,一切的缺点都有"。他最初的几篇小说全是用 John Sinjohn 的笔名发表的。1898年发表长篇小说处女作《久斯论》(Jocelyn),1900年发表《威拉·鲁滨》(Villa Rubein),1904年发表《岛国的法利赛人》(The Island Pharisees),1906年发表《有财产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这是三部曲《否赛提家的家史》(Forsyte saga)的第一部,以上全是长篇小说。自1906年到1908年,否赛提家沉寂了下来:高氏正忙着写戏剧和其他的小说。戏剧方面1906年发表处女作《银匣》(The Silver Box),1907年发表《快活》(Joy),接着有1909年的《争斗》(Strife),1910年的《正义》(Justice),1911年的《轻梦》(The Little Dream),1912年的《鸽子》(The Pigeon)和《长子》(The Eldest Son),1914年的《逃亡者》(The Fugitive)和《暴徒》(The Mob),1915年的《一点爱》(A Bit of Love)和1917年的《基本金》(The Foundations)。小说方面1907年发表《乡村的家室》(The Country House),1909年发表《友情》(Fraternity),接着1911年有《贵族》(The Patrician),1913年有《暗花》(The Dark Flower),1915年有《弗利兰家的人们》(The Freelands),1917年有《在外》(Beyond),总共十一个剧本和六篇长篇小说,此后又是否赛提家的复活。他自己说:"我并没有继续写否赛提家的意思,但是自1918年后,他们又自己活跃起来了",于是,

1920年发表《在法庭上》(The Chancery),1921年发表《出租》(To Let),加上1906年的《有财产的人》,再加上两篇间插的短篇小说——1917年的《印度夏天的否赛提家》(Indian Summer of A Forsyte)和1920年的《醒》(A Wakening),——一部系统的三部曲——《否提赛家的家史》,便于1922年出版了。我在这里还得补一句,1919年他还发表了《圣徒的历程》(Saint's Progress),因为与这三部曲没关系,所以只好在这里添述,同时他又转到戏剧方面去。1920年发表《相鼠有皮》(The Skin Game),1921年发表了《有家室的人》(A Family Man)和六篇短剧,1922年发表了《忠义》(Loyalties)和《窗户》(Windows),1924年发表了《森林》(The Forest)和《老英国人》(Old English)。但是他对否赛提家总还有沾恋,于是又开始写他们的家史,1924年发表《白猴》(The White Monkey),1926年发表《银匙》(The Silver Spoon),1928年发表《天鹅之歌》(Swan Song),再加两篇间插——《沉默的求婚》(Silent Wooing)和《过客》(Passerby)——,一部新三部曲,在《现代喜剧》(A Modern Comedy)总名之下于1929年出版了。在这期间,仍然有戏剧发表:如1926年的《逃脱》(Escape),1929年的《放逐》(Exiled)和《屋顶》(The Roof),都是值得注意的。在戏剧和长篇小说出产的洪流里,他也不时写小品文,短篇小说和诗,不过为他的长篇小说和戏剧所掩,人们不大注意罢了。

1930年高氏赴美,一度退隐生活于亚利桑那(Arizona),目的在创作一篇长篇小说,写的已经不是否赛提家的事情了。他说:"人不能无限制地粘滞在那种事情上,尤其是主人公已经被杀了以后","这小说写的是另一家的事情,是否也能成为一部家史,现在还不能够知道"。

他现在定居在苏赛斯(Sussex)地方的一个山下,与夫人及甥同居。他喜欢音乐,好骑马,也时常到伦敦去。他是世界笔会会长,今年又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

(二)戏剧家的高尔斯华绥

说来也像个奇迹,英国现存的三大戏剧家正巧代表了英伦三岛:箫伯讷代表爱尔兰,巴蕾代表苏格兰,高氏代表英格兰,的确,无论在血统上,在教育上,高氏都是纯粹地英国的,他能客观地观察自己,了解自己,他看到了人们的愚妄,社会上种种的不平;他听到了弱者被压迫的呻吟,他愤慨了,于是他同情弱者,同情低阶级,但是,根本上说,他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者,他是个贵族。他看到别人受苦,于是自己不能享乐,这完全出于良心的驱使。在这种情形之下,内心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托尔斯泰就曾给这种冲突驱到疯狂的路上去,因为高氏究竟是英国人,多少有点绅士风度,不至走向极端,不过,理论与现实交战于脑中,铁壁重重,一线的出路也找不到,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然而又不能停止,勃廉谛尔(F·Bruneteire)说:"没有冲突,没有戏剧",高氏内心冲突的结果,就是戏剧的产生。

他从不知名爬到荣誉的最高峰,不是偶然的事。他在戏剧上没有取巧,正如他在小说上一样。他的荣誉,是那一篇篇戏剧做成的,是那一串杰作做成的。自 1906 年起至 1912 年,七篇戏剧之中,竟有四篇是被认作杰作的,这四篇是:"《银匣》、《争斗》、《正义》、《鸽子》,这又不能不算是个奇迹了。

《银匣》是他的处女作,表现的是阶级的冲突,巴斯威克(John Barthwick)的儿子和流氓永思(Jones)同时喝醉了,小巴斯威克偷了一个女人的钱包,永思偷了她的盛烟的《银匣》,但是结果小巴斯威克获释,永思被罚,在两人对比之下,表现了阶级间的不平。这剧一开幕,观众的注意力就被吸引住了,此后每一句每一字都渐渐引向胜利的结尾,即使善写开幕的非赤(Clyde Fitche)也不得不甘拜

下风了。全剧没有叫嚣,没有夸大,是处女作同时也就是杰作,远非箫伯讷、王尔德和一般感伤主义作家所可及的。不过,他这种对感情的约束,在德国颇不得一般批评家的赞许,他们以为他没胆量去尝试更深的悲剧。但是,我们都知道,悲哀到了沉默的程度,比大嚷大叫不更能动人吗?

《争斗》写的是铅板公司的工人罢工的情形,高氏没说给我们罢工的进行情形,他直接把我们领到出事的地方去了。在会议席上,我们看到公司经理安东尼(Antony)坚持要制止罢工,因为他已经平息过四次罢工了,这次也丝毫不能妥协,胜利一定是他的。在工人方面,罢工领袖罗伯次(Roberts)也坚持着要奋斗到底,为人道主义,为光荣妻子,饿死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结果劳资两方面都排挤了个人的领袖。他们妥协了,两个失败的英雄,安东尼和罗伯次,互相惊奇地望着,这是怎样动人的一幕呵!这剧不仅是表现了劳资的斗争,实在表现了真真正正的人性,他没宣传主义,他没说教,他把活的人放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愚妄,看他们在迷路里转,我们笑他们——但是我们自己仍在愚妄里活下去。西班牙戏剧家培那文德(Benavente)说:“观众在观剧时所发的道德、善、正义的意念,只要有四分之一实行出来,世界就可以变成乐园了”,正可以应用到这剧上。

《正义》是高氏看了穷人不能享受离婚自由的特权,监狱制度的腐败而发出的抗议,高氏的热衷和多思很多有与法国戏剧家卜乐(Brieuy)相似的地方,在这剧里我们更发见了许多卜氏的《红外套》(La Robe Rouze)相似之点。在这剧里,没有英雄,因为真正的英雄对自己的罪恶也会感到快意的,法尔德(William Falder)只是个弱青年,在第二次被捕时就自杀了。

实在说来,以上三剧虽然各有特殊的成功,但是伟大的杰作还是《鸽子》,有宏大的布局,有连续的进展,充满了诗的神秘的幻想

的色彩,主人公外尔文(Christopher Wellwyn)看到别人的痛苦,自己也不痛快,所谓外文尔者实在也就是《岛国的法利赛人》里面的谢尔顿(Shelton),都是作者自身的影射。在这剧里作者内心的苦闷的冲突又活跃地表现了出来,斐尔浦教授(Phelps)说:"现在世界上只有三个人,箫伯讷、巴蕾和高氏,能写出《鸽子》,但在这三人中却给高氏写出来了。"可见这剧的重要。

大战前后,高氏是正在走坏运的时期,所发表的戏剧都不受大众的欢迎,《逃亡者》写恋爱和婚姻问题,在《暴徒》里我们看到个人反抗群众,在《一点爱》里我们又有了殉真理者,《基本金》写的社会革命,都不是重要作品,不能详细叙述了。

《相鼠有皮》和《忠义》的发表,使高氏重得了以前的荣誉。这两剧所代表的思想,同以前各剧是一致的。高氏曾在一篇论文里发表他对戏剧的理论,他说:"戏剧的形式应该使剧的含义尖锐化,每一组生命和人物都有他生来的'道',戏剧家的职责就在把这些组放在适宜的地方,可以使他们的'道'深刻地表现给大众。"这两篇剧就是他这理论的实证,其实高氏一切戏剧的技巧的奥秘,也可以从这里得到启示。

自 1922 年以后,他所发表的诸剧如《森林》、《窗户》等,都不占重要的地位,一直至 1926 年《逃脱》的发表,高氏在技巧上有了个新的转变,就是,他受了电影的影响。他指给我们,戏剧是可以超过电影的,无论在趣味上,在给人们的刺激上。1929 年的《屋顶》和《放逐》算是最近的作品了。

最后,倘若需要的话,我们还可以谈谈他的所谓中心思想,尤其是在戏剧上表现的。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他的戏剧的成因是内心的冲突,所谓中心思想也者,也不外是从那里生出来的,总括一句,在戏剧上,他的出发点是同情,表现的是阶级冲突,目的是在求人类平等。再总括一下,他的一切戏剧都不外是保罗致考伦斯人

(Corinthinans)的第一封信第十三章的注解——这章的主意就是人类应当慈悲为怀。

(三)长篇小说家的高尔斯华绥

19世纪之末,英国小说界有一个新趋势,就是想从维多利亚时代的空虚无物里逃脱出来。在这种趋势下产生了斯蒂文生的冒险小说;吉百龄的帝国主义小说;威尔斯的新乌托邦小说。但这不过代表逃脱的倾向,不能就这样停止下来的。于是一般女作家热烈地写着恋爱问题、婚姻问题、法律宗教问题,这些对她们都是极切身的。又有一般青年小说家从而助势,于是乃洋洋大观了。他们都是革命家,他们继续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垄断的态度和实利主义,20世纪初的英国小说界实在是为一种大的破坏所震栗着,同时打破偶像的观念也流遍了思想界,潜伏着的是一次道德革命。就在这时候,高氏以长篇小说家而挺立出来了。

最初发表的两部长篇小说,《久斯伦》和《威拉·鲁滨》都是写爱情的喜剧的,人物缺乏真实,不能算是成功之作。《岛国的法利赛人》得到了相当成功,主人公谢尔敦是作者自己的缩影。他天性就倾向利他主义,他用心灵去到社会探险,这社会不想知道什么人生的真义,它所知道的只是占有和享乐。高氏在改订版的序上说:"十分之九的中上阶级的人都是法利赛人,不思索地去接受固有的东西。"这部书只是一篇序论,他发见了法利赛人以后,他又继续揭穿现代法利赛主义的各种相,接着我们有了两种人物的典型,《有财产的人》的主人公和《乡村的家室》的主人公,《有财产的人》下面还要讲到;《乡村的家室》描写乡间地主的生活。他们固执地认为,一切旧的全是好的,是一篇讽刺友情转而讽刺伦敦贵族的生活,在技巧上有惊人的成熟。《暗花》是对热情的分析,分三部,每部各有

女主人公,是一个缩小的三部曲,《弗利兰家的人们》描写地主的暴虐,《在外》则是对热情的分析,这许多部长篇小说,表现的手法尽管不同,采取的材料尽管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指示给了我们:我们都是法利赛人,虽然我们不自觉,不承认。

高氏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自然还是他的前后两个三部曲。比较起来,《否赛提家的家史》似乎还更重要,这部家史实在就是自1741年以来的英国中上阶级社会的历史,叙述自 Jolyon Forsyte (1741—1812)开始。他生了五个孩子,他的大孩子又生了十个孩子,一直下去五辈,描写他们的欺诈,他们营营苟苟,他们的偏见和固执,以叟木(Soames Forsyte)为活跃的中心,极尽了变化,极尽了错综。在前两部里,第二辈的人们,因为意见和理想的不同,反抗第一辈的人们。至《出租》出现了第三辈,第二辈又被反抗了。《出租》是从《否赛提家的家史》到《现代喜剧》的桥梁。《现代喜剧》写的仍是否赛提家的事情,不过背景都现代化了。叟木虽然还活着,但因为已经过了时,地位给弗乐尔(Fleur)占了去,他只好学着抽烟打高尔夫球了,他曾一度游美,归来后就死去了,这一家的家史就终止在这里。

在长篇小说里,使我们惊奇的,是他的文学的优美,个性的活现。因为受了戏剧和随笔两层技巧上的调练,人物虽然多到可惊,但绝显不出拥挤来,同时也使他在长篇小说的形式上有了新的贡献:就是他能使各章在调子上,在插话上,在背景上成功一个密合的一致的整体,——布局的戏剧化。詹姆士(H·James)整天嚷着:“戏剧化,戏剧化”。不错,他的确化了,但可惜化得不高明,勉强的痕迹随处可以发见。高氏这种天衣无缝的密合,他是梦想不到的。班乃特(Bennett)和威尔士都是近代大小说家,但是在他们的小说里,除了他们写出的以外,我们得不到什么更深刻的意义和暗示,正相反,高氏割下了人生的一部分,去写,去渲染,我们却从这里得

到更多的了解,即便全部的人生哲学,也可以从这一小点去窥见。在英国小说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能这样做过。

同戏剧里一样,他在长篇小说写的仍然是中上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冲突,他看到中上阶级用旧公式来解决新问题,紧紧地抱住传统的观念,革命者所要求的是真理,他们希望中上阶级也要求真理。他们坚持着,中上阶级应当放弃他们所有的旧的东西的某一部分,来寻求真理,而他们自己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很自由地去寻求。高氏看出了这种惰性的坚持,是使这两个阶级永远不能互相了解的最大原因,就在这一点上,他筑起了他的社会哲学。他一方面描写贵族阶级的传统的固执,愚昧,一方面他也认为革命者的要求是有点太大了。这哲学,不管高氏应用得怎样,的确是永久真理之一。他多半在家庭的琐事上,表现社会问题,表现他这种哲学。他并不像箫伯讷,把家庭来当作一个组织去破坏,他不过拿家庭当工具去表现他的思想罢了。他的性情有一种高尚的本质,所以他既成不了刻薄的嘲讽家,也成不了感伤主义者。他有时也不免去嘲讽别人,但总有节制。他同威尔斯一样,是不惜以任何代价去换真理的,但是与威尔斯究有不同处。他对真理的要求,并不显出只是为个人的需要。威尔斯的人物为观念而活动,高氏的人物为个人的兴趣而活动,倘若我们需要观念的话,我们可以到书里去发见,在这一点上,高氏是超出同时代诸小说家的。

舍瓦勒(Chevalley)说:“倘若我们来评列高低而给出批评的话,他(高氏)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了,他可以说是最完全最充实的小说家。”可见他的价值。

(四)短篇小说家、小品文家、诗人的高尔斯华绥

我们普通所认识的高氏只是戏剧家和长篇小说家的高氏,的确,他的天才在戏剧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我们也不可忽略过,在短篇小说、小品文、诗的领域里,他的建树也是不可泯灭的,再夸大一点地说,即便他不曾写了那些戏剧和长篇小说,只靠这些不使人注意的建树,在文坛上,他也会有很高的地位的。

短篇小说,我们拿1918年的五篇故事(Five Tales)和1927年的《沙漠旅行队》(Caravan)作代表,表现的思想同戏剧和长篇小说差不多,但是文笔的优美,在比较短的篇幅里所表现的技巧,却不是在长篇小说里可以找到的了。

小品文集有《静的旅店》(The Inn of Tranquility),诗有心情诗歌和劣句(Moods Songs and Doggerels),都有浓厚的兴趣,熟练的技巧,但是这不是我们所着重的,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高氏的另一面,长江大河的长篇小说,错综变化的戏剧,当然能使我们惊叹也来不及的,但是随时起意写出的小品文,随时感兴吐出的珠圆玉润的诗句,不也能带我们到另一种飘渺的灵界吗?

(五)附尾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确也是近代一般人兴趣所集中的盛典。我们不能否认,有许多作家因得到这奖金才为世人所注意,而享了大名。但是今年奖金之给与高氏,我们除了认为这次的确给了配接受的人以外,对高氏的荣誉不会有怎样大的影响。至于高氏的真价值更与这得奖没有关系,不过在别人抬神像似的大吵大嚷的当儿使我们国人来认识一下这位大作家,也不是无意义的

罢。

高氏今年已是65岁的老翁了,但是除了不时写小品之外,在The Scribners杂志最近几期上又发表完了他的长篇近作《绚烂的沙漠》(Flowering Wildrness)。这种惊人的魄力和工作的精神,真使我们惊叹。我每次读他的作品,总有一个秃顶高额的老人,脸上充满了毅力和严肃,浮现在眼前,我祝福他。

1932年

夜会(书评)

这也许是幻觉罢。——一想丁玲,总有两个不同的影子浮现在我面前:一个是前期的,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少女的影子;一个是后期的,这个影子却很难描述,大概多少总带点儿普罗味,身上穿的应该是蓝布裤褂之流的东西罢,虽然这两个影子往往是同时浮起来,我却很难把它们拉在一起,说是一个人。我并不否认一个人会转变的,但这转变放在丁玲身上,我总觉得有点不大适合。仿佛近于奇迹似的,这种"觉得"实在太不近情理:但是我自己除了这样"觉得"外,再进一步的解释想找也找不到了。

以后因为某一种机缘的凑巧,我读到了几乎自《在黑暗中》以后的她的全部作品;最近又读到她失踪前不久出版的《夜会》。在这几部书里,有她的全人格的进展的缩影,最初是从"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的莎菲,进展到能"忍受非常无礼的侮辱"的梦珂,这以后,她的颓废的心情又反映在阿毛姑娘身上,——"不为什么,就是懒得活,觉得早死了也好,"跟着来的是转变,《韦护》的女主人公丽嘉一出台便与以前不同了,她看破爱情,她想做点事业,这种空漠的想,又实现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里,这书的女主人公美琳终于投身革命,最后是,革命被象征化了,在《给孩子们》里作为爱若出现了。

这种由资产阶级而闻到革命的气息,而真去革命,而把革命象征了,不是一个很合理的进展么?合理是真的;但也许太合理了,我在《在黑暗中》看到的丁玲是这样;在《韦护》里看到的仍然是这

样,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看到的仍然是这样,——倘若就这样下去,我想不会有一天不这样的,也许因为时间的关系,在《在黑暗中》里不得不穿旗袍或马夹;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只好穿蓝布裤褂之流的东西,我不愿意替别人检定意识,说不愿意是瞎话,实在是不会,但是丁玲的意识却很明显:她彻头彻尾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典型女性。

在这里,很奇怪的,我想到扑火的蛾子,无论原来是在树丛里,墙角里,只要见到一丝光明,也要去扑,被纱窗隔住了,还要停留在那里,徘徊着往里窥探,希望可以发见一个空隙,钻了进去。但这个联想实在不恰当,我承认我们的革命家闻到了革命气息,有的也真的去革命了,但是大部分闻到这气息的时候却往往在跳舞厅里,喝过了香槟酒"醉眼朦胧"的那一霎那间。我的良心不使我把丁玲归在这一类,但是除了这一类外,我却也再找不到更适合的一类了。

但是,实在说起来,还不这样简单,在她这一些作品里,我看出了她的一个特点——黏质的惰性。这种惰性我自己也感到过,尤其是在读书的时候,只要一想到发奋读点书,总想明天开始罢,然而明天成了今天,还明天开始罢。就这样明天下去,终于也不开始了,在某一种时候,丁玲也实在被革命气息陶醉过,但是她仍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向前动一动。自己作些美丽的富有诗意的梦,她微笑着满足了,也许她也有"来了"之感罢。

就这样,无论穿的是旗袍或马夹,穿的是蓝布裤褂;但是,她还是她,转变也终于只转变了衣服。她与第四阶级的距离不比《在黑暗中》时期距离近,她所描写的第四阶级只是她自己幻想的结果,你想,像她这样一个人凭空去幻想第四阶级,结果应当怎样离奇呢? 你可以用一个印度人去想象北冰洋来比拟,这个印度人会把棕榈栽在冰山上(自然是在想象里),他会骑了象赤着身子过雪的山,——你看她怎样,在《消息》里,她同几个老太婆开玩笑,她替她

们做着白日的梦:

"一天只做七个钟头工,加了工资,礼拜天还有戏看呢,坐包厢,不花钱……"

在《夜会》里,她描写了,也许同她初意的相反,他们的简单、愚蠢,以及一切能令一个绅士发笑的举动,倘若我们有一点同情心的话。这一点也是为他们单纯的愚蠢的而生的,本来,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眼里,他们的举动的确有点愚蠢而近于可笑的。丁玲虽然改了装,穿上了蓝布裤褂,但是她仍然是以前的她,这些简单到同牛马一般的人们,在她眼里,能不显得可笑么?我常奇怪,出现于外国电影里的中国人,总是佝偻着腰,摇着尾巴(可惜没有个尾巴)。低首站在天之骄子面前,外国人为什么把中国人弄成这样?在丁玲身上,我找到了解答。

我不是说,在她的几部书里有她的全人格进展的缩影么?但是这里所谓的进展,却似乎有点不大适合,倘若进展含有好一方面的意义的话,她的缩影是往前走的,但这只是给时间拖着。更适当地说,她的影却是愈拖愈暗淡下来了。到了《夜会》,只模模糊糊地留了点残痕,明显地说,就是,她的身躯在经过某一个阶段以前,只适于穿旗袍或马夹;或者,再往后,穿筒子似的大衣和高跟鞋,但是她却偏想去穿蓝布裤褂,结果只有暗淡了。

虽然暗淡了下来,仍然一样浮现在我的面前。不同的就是,现在我却能把它们拉在一起,以前我看看她的影子在书里掠过的,绿的,渐渐地蓝了蓝了,迅速似流星,终于我也莫明其妙,但是现在我仿佛有了慧(?)眼似的,我能在这些幻变的影子后面发见一个更根本的东西,我知道,自始至终,她仍然是她,没有转也没有变,我笑自己的浅薄——我怎么会给她的外套眩惑了呢?

1934年1月

近代德国大诗人薛德林早期诗的研究

在整个德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个诗人够得上称为伟大的:一个是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的歌德;一个是几乎没有人知道的薛德林(Hölderlin),但是无论哪一方面,他们俩中间都有显著的距离,所以在他们生时,虽然并不是不认识,歌德从没提到过薛德林;而薛德林在长期疯狂中也极顽固否认他知道谁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终于是近人的,在他死后的一世纪里,他的精神像中天的阳光,流注到德国,以至于世界的各方面,被人们神圣般地崇拜着,薛德林却被遗忘在一个暗黑的角落里,两者相比之下,是怎样一个惊人的对照呢?但是,正如高尔哥(Stefan George)所说,任何严密的箱子也锁不住薛德林的光芒,他终于被人们从角落里认出来,整理他的作品,发布关于他的文章,在极短的期间,他的精神就注入一大部分的人的心里,渐渐有取歌德而代之的趋势,——时间终于调停了他们俩间的不合;歌德影响了过去的德国文化,薛德林却命定了要影响将来的。

在精神上,薛德林也正补了歌德的缺陷。歌德只代表了德国文化的一半,倘若没有薛德林,这一半将终归成了一半,但却出了薛德林,他们俩合起来把德国文化完成了。这话并不过分,也并不神奇。我们都知道,歌德是个多方面的人才。他最会生活,他能很锐敏地去观察近代生活,他是一个,正如亚诺德(Matchew Arnold)指出来说,自然主义者。但是,只是这些偏于现实方面的东西却不能使人们满足,在人们内心的极深处,还有一种到更高的,更深的,

神秘的领域里去的倾向。只有这神秘的领域才能满足人类的最根本的要求。这种倾向一直到最近人们才渐渐觉察出来,于是人们找到了薛德林,薛德林就正是神秘诗人的代表。歌德的灵感的来源是现实生活,薛德林却把眼光放在渺茫的未来上,全人类无时无刻地不在盲目地向前走着,但眼前是烟雾,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在烟雾里薛德林却看出了那个人类正向着移动的神秘的目标,这目标就启发了他的灵感,他住在人的世界上,他自己是个人,但他却看到神秘的神的世界里去,这神的世界将成为人类的归宿,他一生的努力就在把现实世界同神秘世界,人同神,弄得更接近了,他是成功了,因为我们很可以看出来,人与神接近的程度是随了他在生命的路上的行程而随时增加的。

他的早期诗就表现了他这种努力的开始,在最初他觉得人与神之间有着不可思议的距离,神是高高在上的,人却受命运的支配,在痛苦里展转着,在命运歌(Schicksalslied)里,他高唱道:

你们在高处的光辉里徘徊
踏着柔软的地,幸福的神们!
灿烂的灵风
轻轻的吹着你,
像女乐师的手指
触着琴弦。

不受命运的支配,像熟睡的
婴孩,你们活下去,
纯洁地保存在
清净的花蕊里的,
是你们的精神,

无尽的辉明；
你们的眼睛
静静地闪着
永恒的光辉。

但是我们却正相反，
我们得不到宁静；
说不定什么时候要消失，要颠踬，
这痛苦的群生
盲目地从一点钟
爬到另一点钟，
正像海水从一个浪头
被掷到另一个浪头，
前面永远摆着不可测的深渊，

人类不能走近神，走近天，命运对他们有着无上的威力，在薛德林的早年，命运的观念深深地苦恼着他，在他的诗里随时都可以找到命运(Schicksal)这个字：

呵！让我哭吧！——不，我要快活了！
有这样一个地方么，我们永不希望到的，
在哪里，人们赞美自己的命运？——
那边就是，在那里我可以再见到你，

——给史维拉

不！自己再不要为生与死所苦恼吧——
生与死一任命运的支配，

——英雄

在命运观念紧紧掴握之下,他甚至于觉到人类的渺小,因而又看不起,又恨起人类来了,他说:“我再想不起一个比德国人更卑污的民族来了,你看到工人了,但不见人,你看到思想家了,但不见人,你看到教士,看到主人和奴隶,看到年青的和年老的了,但不见人。”

对自己他也是同样地觉得渺小,他不宽恕自己:
我恨我自己,它是一个讨厌的东西,
人类的心是这样地柔弱,这样的骄矜,
这样像“拖白亚”的小狗一样的驯顺,
又这样地恶毒! 去吧,我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
因了这对人类,对自己的憎恨,他愈觉得神是高不可仰的,在绝望里,他只有高唱着:
呵,你是美丽的,你这崇高的创造者!
——英雄

在他自己的内心里虽然有天堂的影子,他自己制造的天堂的影子,然而这悠远渺冥的天对薛德林也终于是悠远渺冥的东西,怎能满足一个有着火样的热情的活人的要求呢? 终于在地球上,他找到了古希腊,他就把那些悠远渺冥的天的影子都寄托在这里。

希腊,温克尔曼(Winckelmann)指出来说是有着高贵的单纯同温静的宏伟(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össe)的希腊,的确是一个奇迹,它在世界文化里放出万丈的光芒,使一切别的民族在这光茫里失色,只有这样一个地方才值得薛德林的响往,我们且看他对希腊天才是怎样地称赞呢:

为你欢呼;你这高高在上的人们,
你这伟大的自然的
初生子!
你从克鲁奴斯的厅堂里
走出来
走上了新的神圣的创造
勇猛又坚毅,

——希腊天才颂歌

在希腊,他找到了美(Schönheit),找到了谐和(Harmonie),美是他的宗教,谐和是他的最高理想,但古希腊终究是古希腊,终究是过去的了,希腊离神的世界有多远,那只有上帝知道;但离薛德林却同神的世界一样远,也真地难怪,除非在梦里,有谁能走回古代去呢?他只有望希腊而兴叹了:"我像一个平足的鸭子站在现代的水里,想飞上希腊的天空,却不可能,"好容易自己找到一个寄托幻影的地方,但这地方眼看着也同幻影本身一样地渺茫了,连这样一个地方也渺茫起来,神的世界还能想象吗?他一向就感觉到神与人间是有着极大的距离的,对他,现在这距离就似乎更大了,他悲哀了,在幻影的破灭下,在对人类的反感下,又混合上他天生的内倾的阴郁性,悲哀深深地啃着他的心:

"人类,人类;你们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呢,
你们的世界,充满了泪的世界,
这个舞台,没有忧愁的舞台,
能不能给你们愉快呢?
呵!只有萦绕在你们周围的影子

才是你们的愉快的源泉,

——人类的生命

这忧郁的调子笼罩着大部分的早期诗,但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在他整个的生命上有了一个大的转机,因了一种机缘的凑巧他认识了一个银行家的太太苏赛提(Sussette),在她身上,他发现了一切他认为最高的美德,发现了美的本身,谐合的本身,他不认为她是个人,她就是神,他一向连做梦也不敢希望能接触的神,现在竟然找到了,他是怎样地狂喜呢?他热烈地爱着她,不,崇拜着她,他写给一个朋友的信说:“我现在是在一个新的世界里了,在世界上真地有这样一个生物,爱与崇高,贞静与生命,精神、灵魂与一切完美的外形都在这生物身上化成一个整个的浑一”,就这样,他在人世里发见了神,在活人身上发见了他一切最高的理想,从前他觉到的人与神间的不可思议的距离消泯了,人与神混合起来,这混合给了他伟大的灵感,他一眼便看到人类正向着移动的神秘的目标,从这时起一直到死,他高唱着伟大的充满了神秘的预言的诗歌,完成了人类最根本的要求。

(后记:)薛德林是最近才给人们发现了的一个奇迹,但自从宫泰(Gunther)、荻尔泰(Dilthey)、高尔哥等人相继发表关于他的文字以后,他的慧星似的光茫立刻照澈人们的心,同歌德争德国最高文学的宝座,我们敢断言:将来的世界一定是薛德林的,在中国似乎还没曾有人论到他,我因了一个德国教授的介绍,读到他的诗,真地为他这种奇迹似的诗所震惊了,我曾在《清华周刊》上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对他的生平,他的天才被发现的经过,他的诗都粗略地谈了谈,倘若有人读上面这篇东西,而感到一点点兴趣的时候,那篇文章也能给他一点更有益的帮助。

大概以后我还要写几篇关于他的文章,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去

注册专利，或挂上薛德林专家的招牌，注册专利我没那样的兴趣，挂专家招牌我又哪里有那种勇气呢！我最大的希望也不过是，使中国不知道德国有薛德林这样一个人的人知道德国有过这样一个人罢了，倘若读者能比这得到更多的东西，那是读者自己的福分，我连梦想也不敢梦想的了。

1934年8月4日

现代才被发见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

目　次

Ⅰ 一个湮没的天才,又渐渐被人发见了。——当你作梦的时候,你是上帝;当你想的时候,你是乞丐。——

梦,多么飘忽的玩意儿呢? 然而,唯其在梦里,诗人才能表现了真的"自我",同时也表现了他感应到的普遍的生命,在这两种表

现里,他触着了一个时代的人心的趣归,暗示着未来,拉丁语 Vates 这字,最初是预言者的意思,后来也应用到诗人上。于是,正像预言者被人迫害,被人误解一样,诗人也被人误解着——一直到一个时代代替了另一个时代,普遍地流在人们心里的生命力,爆发出来,成了具体的活动。

正像一个轻梦,不知从哪儿飞了来,蓦地闪光似地现了一现,又飞去了。我们的诗人也是同样的一个奇迹。他们飘飘地走了来,高唱出预言的歌声,又飘飘地去了。他们梦着,梦着,譬如薛德林说:"当你作梦的时候,你是上帝;当你想的时候,你是乞丐"。然而诗人的梦,正如上帝,离开了连想都不去想的俗人够多么远呢?于是薛德林也正得了他应得的命运,在渡过四十年漫漫的疯狂的长夜以后,没得到别人的了解,悄悄地去了。

我不是说,没得到别人的了解吗?真地,了解一个人,尤其是诗人,简直是缘分,而且有点近于神奇的缘分。(这里面并没有迷信的成分)。一个人的个性,我说,颇像"青霭入看无"的青霭。远处看,濛濛的一片青。这青,流散着,流散着,这里,那里。然而,近看,却没了青,也没了霭,只有一片空濛。这青霭是否还能再被你发见,就全在你个人了,因为它仍然是存在着的。薛德林的个性,真地比火焰还辉耀,同时比青霭还"无"。在他一生的朋友中,有大思想家黑格尔(Hegel),有哲学家施林(Schelling)。然而,真够上了解他的,只有释勒(Schiller)一个人。即如我们都承认是大诗人的歌德,对薛德林也就不怎样了解。而且还当面侮辱过他一次:事情是这样——在耶那的一天,薛德林去访释勒,一个人已先在。这人知道来的是薛德林,但薛德林却不知道他是谁。当薛德林同释勒谈话的当儿,那人拿起了桌上放着的薛德林的诗集,念了两句,摇了摇头,又恶意地瞪了薛德林一眼,忿忿地把书掷在桌子上了。始终沉默着。这人,薛德林后来知道,就是大诗人歌德。这,不能因

为大诗人看不好他的诗就以为他的诗不好。这只证明了了解一个人的困难，甚至像歌德那样天才也免不了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俩正做着不同的梦。

薛德林做的梦，是一个充满了奇迹的梦。他梦的不是中世纪，像其他诗人一样，他梦的是悠远的古代的希腊。在他生前，同他作同样的梦的，前面已经说过，是释勒，在他死后，我们在他死后第一年生的尼采(Nietzsche)身上找到。尼采，这充满了热情的尼采，像一个火山，像一个炸弹，你看他的劲够多足？同薛德林一样，他看到人们的渺小，愚昧，他忿怒了。于是他憧憬着古代的伟大的希腊，他提倡超人，他掷给世人那充满了神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终于，(这也是在意料之内的)，他被那些他称为 Heiterlinge 的迫害着，误解着，做着同薛德林一样的梦，去了。这样一个人把薛德林认为生平最爱的诗人，也是非常自然的事罢。

随了尼采的死去，薛德林也仿佛不再存在在世界上。在另一个意义上，人们正做着各种各样的梦。对他们，薛德林曾经存在过这事实，简直比蜃楼的轻梦还渺茫。正如高尔葛(Stefan George)所说："因为不能了解，这部神秘的预言的怪书，许久以来就被人们锁在箱子里"(Das Sibyllinische Buch lag in den Truhen verschlossen weil niemand es lesen konnte)。但是，这箱子虽然锁了这怪书，却锁不住它的光芒。这光芒终于又射着了一个人——是荻尔泰(Wilhelm Dilthey)。在他身上，薛德林又得到了新的生命和意义，更重要的，得到了解。荻尔泰从心理学方面，用综合方法，研究文化的根本精神。从文化哲学里创造了精神科学。他也根据了他的学说去论到诗人，在批评史上还占了不小的地位。在他的一本书叫经验与创造(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里，他谈到了四个诗人——雷兴(Lessing)歌德(Goethe)诺瓦理斯(Novalis)和薛德林，他主要的主张

是:大诗人之所以伟大,全在他能表现一种动作;生活的意义与内在的联络,要自己从动作里显示出来,每件创造的作品,都是具有独特个性的有机物。就在这种观点下,他重新估定了薛德林的价值。他说:“在同伴里面,薛德林挺立着,像人类本性的更纯洁更谐和的高贵教养的化身”(Unter den Genossen stand Hoelderlin wie die Verkoerperung einer reineren, harmonischeren Bildung der menschlichen Persoenlichkeit)然而,不幸得很,他见到的薛德林的作品并不全,在他死后,又有许多薛德林的手稿和书信继续着被发见。他的论列自然不能很周全;但是无论怎样,他能认清了从那严锁着的箱子里发出的光芒,把这部怪书取出来,又写了预言的创造(Prophetische Schoepfung)这样一个签条贴在上面,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了,这些手稿和书信的发见,是何林葛拉斯(Hellingrath)和纪拔斯(Seebass)的努力,因为喜爱了他的诗,便着手去搜集,这自然是很偶然的事,但是,就因了这“偶然”,我们却能够多读了许多他的诗,我们是幸福的,他们俩对薛德林自然不能不了解,但了解也不深,他们的价值就在作品的发现的本身,因为每个天才的发见,第一步总是搜罗遗著和手稿,以后才能谈到其他,“每个开始,都是难的:”他们就担任了这艰难的开始,而且很令人满意地担任下来,我们怎能不感谢他们呢?

开始虽然是艰难的,但是终归是开始了,我们的希望却不能就此止住,我们希望能够有人利用这第一步工作去整个地了解他,这希望我们在高尔葛身上得到了实现,高尔葛——呵,高尔葛,你读过他的诗罢!美的心灵与绵密的音乐织成了一片朦胧的幻变的诗境,是有着怎样与薛德林相同的地方呢?在他的一本论文集日与事(Tage und Taten)里面特别有一栏叫做赞辞(Lobreden),在这里面,他有一篇短文——短,真的,短得有点儿可怜了,然而比洋洋数千言的大文章,并没少说了什么,开头他便惊醒似地说:“经过了几

乎一世纪,没有人曾注意过,或者注意过而也只被认为是过去的梦想者,忽然人们发见了,他是这民族伟大的先知——这事我们不能不承认是个奇迹了”。(Uns heisst es ein greifbares Wunder wenn durch Menschenalter nicht beachtet oder nur als zarter Ertraeumer von Vergangenheiten ploetzlich der grosse Seher fuer sein Volk ins Licht tritt)梦想者,薛德林的确是梦想者,因为他自己就曾说过:“当你做梦的时候,你是上帝。”(说到这里,连高尔葛自己也一样,)但是,别人所谓的梦,与他们自己的梦,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在别人的梦里,我们找到了醒时不能满足而现在满足了的奇迹,他们的梦只是金色的船,给了他们灵感,给了他们幻像,给了他们一切,摇摆着,摇摆着,更上,更上,到上帝的座前。

止到高尔葛,对薛德林的了解可以说是到了具体的阶段,人,即便无论怎样沉在贸易的棕色的空气里,谁个没点子诗意?看了春花,看了秋月,也会“有动于中”的,(虽然未必“必发於外。”)对诗人的了解,他们怎能自甘落后呢?然而,我说,他们却是信不得的,没有尼采,高尔葛,薛德林也便会永远地湮没起来,我们欣慰的是——无论误解的深渊怎样深,我们这天才怎样湮没在里面,他,一个 Ertraeumer,终于被其他的 Ertraeumer 从这深渊里曳了出来。

Ⅱ 他的生平

他的一生,正如白云流过了空谷,充满了阒静与单调,但与白云又不一样,这生命是不缺少热情的,只能当它是一首诗,一首美的诗——

(1)幼年和大学时代 1770 年(与黑格尔同年)3 月 20 日生在劳奋(Laufen am Neckar),父亲在本地做事。他长起来,正如 Hyperion 所说:“像一条没有硬茎的葛蔓”(Wie eine Rebe ohne Stab),

在极小的时候,就是他母亲一个人担任他的教育,从她那里,他只受到严格的束缚,并没受到一般人所受到的母爱,所以终其一生,他只感到需要别人的爱抚,他永远渴望回到老家里,回到姐妹的怀抱里去,(Der Mutter Haus und liebender Geschwister Umarmungen),这种渴望对他的个性,他的诗的创作,有极大的影响,他的幼年,大半都消磨在 Nuertingen,这里,四周有青青的山围着他,他在小河里戏着浪花,看远帆的消逝——这些影子,在他以后的诗里,像寂静的地方(Stille Ort)少年的林(Waeldern seiner Jugend),都留下了痕迹,在私塾里,受过了古典的教育,又到 Maulbronn 去习神学。在这里,他对希腊的向往已经很明显了,诗也是这时候开始作的,美、爱和热情润染了他的整个的心灵,1788 年入 Tuebingen 大学,他找到了不少同志的诗人并且还同瑙於弗(Neuffer)玛哥瑙(Magenau)(玛哥瑙以后在本地还有相当的诗名)结了一个诗社,这时候,他完全在克劳卜斯陶克(Klopstock)的影响下,尤其受他的感伤主义的影响。

(2)在奥西安,维特,和瑎卡劳斯的影响下　　克劳卜斯陶克的感伤主义的扩大,使他中了所谓奥西安病(Ossiankrankheit)。他用游行歌者所歌唱的英雄们的事迹喂饱了他的灵魂(Weider seine Seele an den Helden des Barden),他对死去的美人(Sterbende Maedchen),同书上的英雄们一般地悲哀着,正在这时候,他又接触到释勒的动人的抒情诗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于是他又把自己放在释勒和维特的影响下,尤其是释勒的悲剧瑎卡劳斯(Don Carlos)更感动了他,1799 年在他给释勒的一封信里,他写道:“Don Carlos,自许久以来,就变成一片幻云,在这片云里,我被我幼年的神灵裹住了,我不至于太早地看到围绕着我的世界的渺小和野蛮。”(Don Carlos war lange Zeit die Zauberwolke, in die der gute Gott meiner Jugend mich huellte dass ich nicht zu früher das Kleinliche und Barbarische

der Welt sah, die mich umgab.)我们细细地分起来,这三种对薛德林的影响——奥西安,维特和瑎卡劳斯,在幽郁的情调上,在幽渺的思想上,实在有共同的地方,就在三者加攻之下,造成了薛德林阴郁的内向的性格。

(3)希腊和哲学的研究　在薛德林的思想里,实在潜伏着一种轻微的哲学的神秘性和泛神论的倾向,他这种伦理的美学的热情,同希腊的根本精神也有许多相同的点,所以,在大学里的他,对希腊的研究仍然感到极大的兴趣,同时对哲学也热烈地爱好着,他沉潜在哲学,尤其是希腊的研究里,他的整个的心灵贯注在这研究上。在 Tuebingen 大学学业将修完的时候,他已经计划着写一篇关于希腊的长篇小说(Griechischen Roman)——这就是后来出版的 Hyperion。

(4)释勒的影响加重,加新　正当希腊主义在他身上发酵的时候(1793 年左右)他因别人介绍认识了释勒。在没认识以前,他已经读过了他的抒情诗,他的瑎卡劳斯。在心灵上,可以说是早就认识了。也或者正因了这心灵上的认识,才促成了他们的个人的认识。但是,无论怎样,在憧憬上,在性格上,他们都有很相似的地方。这时候的释勒,也正在热烈地研究着希腊。以前他寄托在白姆森林(boehmisch Waeldern)和泛在的乌托邦(Kosmopolitischen Utopien)里的理想世界破灭了。但是他现在却在希腊的奥灵比山上找到了它。同时,他也接受了康德的学说。薛德林,由于释勒的介绍,当了 Frau Von Kalb 的家庭教师。他又从释勒转受了康德的影响,连教授方法也照了康德的原理。——就这样,他所受的释勒的影响加重了,同时也加入了新的成分。

(5)耶那和费希德的哲学　1795 年他辞去了 Kalb 的家庭教师,到耶那(Jena)去。因为这时释勒在耶那,想同释勒住在一处,可以说是此行的动机。但是最重的大概还是想去听大哲费希德

(Fichte)的演讲——他称为 Der Titan 的费希德。这时释勒正主编 Die neue Thalia 和 Die Horen。他常有文章在上面发表,释勒关于美学问题的解决,大半都借助于费希德的学说。对薛德林以后的思想,费希德也有不少形成的力量。

(6)早期感伤病的征象　　因了童年的教育,因了以后所接受的外来的影响——阴郁,感伤和内向便成了薛德林的主要性格,一向支配着他的是时时刻刻幻变的意念。轻轻地,一个意念浮起来了。于是,他追求,然而轻轻地,这意念又幻灭了,于是他失望。——就在这种自己制造的烦闷的网中,他深地陷着。在耶那的时候——真地也难怪他,他接触到都是像费希德释勒这样的巨人。虽然现在我们看起来,薛德林同他们是一样地"巨"。但是,可怜我们的诗人!在当时还没有伟大的自觉的时候,站在这山岳般的伟大人格前面,怎能不觉得自己的渺小呢?他一直自己苦恼着,为什么不能同释勒一样地伟大?再加上他天性的阴郁,这苦恼便一天一天加重起来,渗透了他的灵魂,差一些不曾压瘪了他。他渴望着再回到朋友和家庭的怀抱里去,去得一点暖意。(Wieder einmal zu erwarmen bei seinen Freunden und seiner Familie)他写给释勒信说:"我冻住了,我僵木了,在这紧围着我的冬天里;天空是这样地铁冷,我又是这样地死硬!"(Ich friere und starre in dem Winter, der mich umgibt, so eisern mein Himmel, so starr bin ich!)可见他的精神是怎样颓丧了。

(7)在佛兰克府哲学的沉思　　使他的精神稍稍恢复了,是佛兰克府(Frankfurt)的居停。由于他的大学同学辛克莱(Sinklair)的介绍,1796 年他到了佛兰克府,就银行家龚达尔(J·F·Gontyard)的家庭教师。在这里,他努力钻研着费希德的哲学,同时也开始了自己关于哲学问题的沉思。

(8)薛德林和黑格尔　　1797 年正月,黑格尔也到佛兰克府

去当家庭教师,在哲学上,我们虽然不确切知道薛德林怎样影响了黑格尔;但黑格尔影响了薛德林却是显然的。——就在释勒和黑格尔之间,他把自己的哲学建立起来了。

(9)薛德林和 Diotima　环境的舒适给了这时候的薛德林不少的新的力量和生气。然而(一个引导薛德林到毁灭的路上去的"然而")他却陷到爱河里去,——这爱,是他生平第一次也可以说是最末一次的真正的爱。谈到爱,他可以说完全是门外汉。在这以前,勉强算起来,只有两次,而这两次也很难算是什么爱,一次是,他对他一个朋友的亲戚的女儿发生过片面的恋慕,一次是,在 Tuebingen,他曾爱过某教授的女儿,也只是他一方面的,并没有回响,但这都不过是青年人常见的现象,如一现的昙花,掠过他的心灵。虽然也曾给了他成串桃色的梦;然而这梦,经不起风吹雨打,一闪,只一闪,便消逝了,他仍然还是他,没有影响,也没有变化。在耶那的时候,他曾写给他的朋友瑙於弗说:"除了在梦里,我大概没曾恋爱过"(Jch soll wahrscheinlich nie lieben als im Traume)。他又加添说:"因为我有眼,我便永远不再恋爱了"。(Seit ich Augen habe, lieb'ich gar nicht mehr)。这种梦里的恋爱的憧憬,就在 Hyperion 里作为 Melite 出现了——这 Melite,他描写,像一个爱神化身的女尼,一般地柔美圣洁(hold wud heilig wie eine Priesterin)但是,说来也像个奇迹,这圣洁的只有梦里才能见到的 Melite——不,按照他的柏拉图主义,他叫她做 Diotima——他却在佛兰克府发见了,不是在梦里,是真的有血有肉的凡人,这就是他的学生的母亲,龚达尔的美妻,Sussette,站在主妇的地位上,她对薛德林自然保持着相当的敬意,但在薛德林方面,他竟在一个凡人身上,找到了他的理想的美,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自己的眼;然而,这终于又是事实。他是怎样地惊喜呢?但是,这凡人却又已经是不能为他占有的凡人,舍之不甘,明正言顺地去爱又不可能,他只好在心里偷偷地去恋着

她。在这种偷恋里,他又是怎样地失望以至于痛苦呢?当歌德爱了他朋友 Kestner 的新妇的时候,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里藉了维特的信发泄了他的恋慕,同样,当薛德林对 Sussette 发生了单方面的热恋的时候,他也在他的长篇小说 Hyperion 里藉了 Hyperion 写给 Diotima 的一封信,表现了他的深情。同样是不应当爱的人,同样他们俩都去爱,又同样找出了这种自欺自慰的方法。但是薛德林却更进了一步,沉醉在自己酿造的爱情的酒浆里,1796 年的夏,在他写给他的朋友瑙於弗的一封信上,他说:"我现在是在一个新的世界里,在另一方面,我可以相信,我知道美与善是什么。但是,我既然看到它们了,我只好对一切我的知觉发笑。亲爱的朋友!在世界上,真地有一个'生物'(Wesen),我的精神可以寄托在那里,多长时间也行。当面对着自然的时候,我又感觉到我们的思想和理解是真地幼稚呢。爱与崇高,柔静与生力,精神与感觉与外形,混合成了一个整一的人格,在这个'生物'里。——你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怎样被平凡所包围;你也知道,我怎样没有信仰生活过来,我的内心是怎样空虚,因而怎样颓废;我现在也可以像以前那样地活下去,快活如一只鹰,倘若不是这个,这一个(Dies eine——指生物),出现在我面前,把我已经没了意义的生命加了生力,使它充实起来,鼓动了它,使它更崇高了,同她的春一般的辉光。"几个月以后,他又写道:"我周围是一个充满了愉快的世界——我又同以前一样地快活了。"就在这种狂欢,有点矛盾的情绪下,他窃爱着他的主妇,恋爱的心,正像微风里的游丝,袅袅地,若续,若断,消失了,又出现,终于捉点什么,黏在上面。然而,薛德林的游丝只捉住了空虚,空虚,但是,他仍然拼命赞美她,她变成了美的本体;她成了他的宗教。"她简直是一个希腊女人"——薛德林说。

(10)阴郁性的加增　　不用说,这种单方面的恋爱比一现的昙花还渺茫,还虚无,结果是一个最后的失望,一个大的打击,对薛

德林,你想,我们这多愁善感的诗人能受得住吗?没了意义的生命仍旧没意义,仍旧空虚,以前没有信仰,可以活下去,现在却有点儿活不下去了,百思而不得出路,无已,只有工作,在极恶劣的情绪下,他终于完成了 Hyperion 的第一部,印行了,把自己所感到的籍了 Hyperion 写了出来。

(11)向诗的圆熟期奋斗和安卜岛可拉的死　　在佛兰克府住了两年以后,他终于离开了龚达尔家,离开了他的 Diotima,走了,离开他的 Diotima 对他简直是无上的惩罚,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猜想他临走时的心情的苦恼和不得已。跟着来的是缠绵的疾病,再加上他故有的阴郁性,这病越发缠绵了。在辛克莱的看护下,他渐渐地有了起色,Hyperion 的第二部就在这时候完成的,他常说,哲学的研究,只给了他不安。他又说:"哲学是被损害了的诗人的医院。"(Hospital fuer verunglueckte Poeten),现在,我们的诗人是真被损害了。他仿佛漂浮在大河的急流里,只有冲下去,冲下去。只有一条水草,他也想握住,休息一刻。现在这无尽藏的哲学的医院,正是他休息的好地方。虽然给他不安,也管不了那许多了。他的诗渐渐地走上圆熟的路,也是在这时候。在他开始写 Hyperion 的那一年,他就打算写一篇悲剧,叫做苏格拉底之死(Der Tod des Sokrates)。但是,后来不知为什么改成了安卜岛可拉的死(Der Tod des Empedokles)。这剧完全采用希腊悲剧的形式,没有浪漫的色彩。全剧充满了神秘的谐和,——但终于也没写完。

(12)疯前　　对 Susette 恋爱的失败,使他失去了生命的明星。哲学虽然给了他暂时的休息,怎能弥补他这海样般地深的创伤呢?朋友看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地坏起来,而且神经也仿佛有点错乱,便劝他到瑞士去修养,一方面充当 Hauptwill 某家的家庭教师,在这里,他的精神渐渐好起来。名诗如盲歌者(Der blinde Saenger)希望颂(an die Hoffnung),都是这时作成的。1801 年 12 月

回故乡,计划出版诗集。失败了,乃就 Bordeaux 某家的家庭教师,次年的6月,Diotima 死,(呵,天哪!这却怎么好?)这消息立刻传到薛德林那里。当年7月,他突然离开了 Bordeaux,经过法国,到了 Tuebingen)是步行的,我们的诗人疯了。

(13)漫漫的长夜　因为看护得法,精神又稍稍复常,但疯症仍然时作时辍。精神好的时候,他也常写诗,或翻译希腊的作品。1804年刊行 Sophocles 的 Antigone 和 Oedipus Rex 的德译本。同年又当了 Hamburg Landgrave Frederick V of Hesse 的图书馆员,只是挂名领薪水,在朋友看顾之下,他便定居在 Bordeaux。两年后,疯症忽然大发,1807年夏天移住 Tuebingen。先住在养育院里;后来又移到一个木匠家里去住,就这样开始了三十多年的疯狂的漫漫的长长的夜:没有变化,也没有光明,一直到1843年6月7日,变化来了——我们的诗人在73年的小梦后,陷入永恒的不变的大梦里去。

Ⅲ　我对他的认识

正如一座活跃着的火山,充满了熔岩,在回荡,在爆展,只要有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裂隙,也便会奔涌出来;我们这充满了比熔岩还热的热情的诗人,也便把这热情,用了抒情的形式喷泄出来了。勃兰地斯(George Brandes)说:"即便当作一个戏剧家,当作一个小说家看,薛德林也是个有十足天才的抒情诗人,"这,我们不能不承认是一句老实然而同时又真实的话。

过去有过比现在更好的人,更好的时候——不满意现在的人,而又不能把希望放在渺茫的将来的,大概总都有这样的想望罢,但是过去,并不比将来不渺茫的——高兴还要更渺茫的,过去,是怎样地不 definite 呢?就在同样的想望里,生出种种不同的变化,提

克(Tieck)和诺瓦理斯(Novalis),因了这种想望,理想化了中世纪的生活,在幻想里,他们浮飞在中世纪的阴森宏伟的城堡上,从一个雉堞,到另一个雉堞,看见了满裹着铁甲的勇士,看见了在迷楼躲着的美人。从这里得到一切诗的源泉和灵感,有着同样浪漫气分的薛德林,也给这幻想拖了走,走过了中世纪,只瞥了这城堡一眼,没停留,又走,又走,远,远,一直到了希腊——呵,这是怎样一个明朗的地方呢?我们的诗人满腔的热情,终于找到了喷泄的对象,他的想望也终于找到了目的地了。

希腊,温克曼(Winkelmann)称为是有着高贵的简单和温静的伟大(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oesse)的希腊,的确充满了神秘和魔力,一看到这两个字,立刻我们便仿佛看见了长着翅膀的天使们来来往往地在天空里飞着,阳光是金色的,又有金色的平原,连树木,不管冬天和夏天,也是金色的,水也是金色的,金色的:就这样组成了一幅金色的梦,轻轻地笼罩了我们诗人的心,他大声嚷着:"我仿佛像一个平足的鸭子,站在'现代'的水里,努力,但是却无效地想飞到希腊的天空里去。"(Wie die Gaense mit platten Fuessen im modernen Wasser stehe und unmaechtig zum griechischen Himmel emporfluegle)真地,这金色的梦迷惑了他了。

迷惑了并不是偶然的,在这梦里,他发见了美的本体,他一向憧憬着连希望见都不敢希望的美的本体。美,是他的宗教;美,是他的最高的理想。它占有他的理智,倘若把它当作一个概念;它又占有了他的幻想,倘若把它当作一个象征,不像康德那样,他分不清这理智的世界和幻想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对他是一个浑融的整一。使他它们浑融的整一的就是美,美对薛德林正像观念对柏拉图,是一切的来源,又是一切的归宿。在美里,他自己的生命也有着意义和价值。——这样一件再真实不过,再重要不过的东西,竟在这金色的梦里发见了,想叫他不迷惑不沉醉,

能办得到吗?

也许正因了他愈迷惑,愈沉醉,他便愈对现代的一切,尤其是德国,感到憎恶。他说:“我再找不到一个民族像德国人这样令人气短的了。你看见工人了,但不见人;你看见思想家了,但不见人;你看见教士了,但不见人;你看见主人和奴隶了,年轻的和年长的了,但不见人。”(Ich kann kein Volk mir denken ,das zerrissener waere wie die Deutschen. Handwerker siehst du, aber keine Menschen, Denker, aber keine Menschen, Priester, aber keine menschen, Herrn und Knechte, Jungen und gesetzte Leute, aber keine Menschen)这对希腊的响往,对现代的憎恶,表面上看来虽然不一样,其实是一种东西,只是一种力的两方面的发展,然而它们都互为因果,而且互相影响着:响往的加强,固然可以增进憎恶;憎恶的加高也推进响往。就这样,这一个影响了那一个,那一个又影响回来,这一个又影响回去……推上去,推上去,没有止,也没有完。于是,表现在他整个的诗里的情绪,只是——向上,向上。

在这里,我们须要注意,因为倘若我们再更深地看进一层,我们可以发见,薛德林向往的希腊不是普通知识的希腊,只是(也就只“只是”)他理想化了的希腊,那末,他的向往(包括了憎恶)不是没意义了吗? 正相反,却还有更深的意义在——。

对诗人,现实往往是一个讨厌的东西,诗人梦想的是“美”,是“全”,但是在现实里哪能找得出“美”,找得出“全”呢? 于是诗人失望,于是诗人入梦(你还记得薛德林说的:“当你作梦的时候,你是上帝”吧?)在梦里,阵阵金色的幻影,掠过诗人的眼,诗人眼花缭乱了,他随了这幻影飞,坐在金色的船里,飞,飞,飞过了闪熠着的星星的光,飞过了挂在蝙蝠翅膀上的黄昏,到辽远的,幽渺的,更辽远的,更幽渺的地方去。在这里他找到他要求的“美”,他要求的“全”,他要求的一切。薛德林歌道:

一切生物也都爱你,奋争着
不断地向上,向上,到你那里去。
(Darum lieben die Wesen dich auch und ringen und streben
unaufhoerlich hinauf nach dir im freudigen Wachstum)

到哪里去呢?到在梦里找到的地方去。这地方,提克和诺瓦理斯叫做中世纪,其实叫做希腊也行;薛德林叫做希腊,其实叫做中世纪也未尝不可,更"甚实",两者都不叫也好,只叫做一个地方,一个说不出只能意会的地方,也就很够了。正如鸱枭向月亮诉苦(见 Gray 诗),他们对这地方倾吐了一切,寄托了一切理想,希望和向往,同时也找到一切诗的灵感。这一切,这一切,完全是诗人在自己的心里作怪,因为中世纪不外是中世纪,希腊不外是希腊。两者都不外是人间,有"美"么?有"全"么?压根儿看不到,这中世纪,这希腊,这"美",这"全",就都在诗人的幻梦里,在诗人的向往里。

是的,在诗人的向往里,然而没有这向往却不是真正的诗人,前面已经说过,诗人自己制造的梦,制造"美",制造"全",再捉住了,写出来,成了诗,是否成为真正的诗,也便看你这幻梦制造得怎样,看你向往到什么地方,歌德的诗:

哦,我假如有凌霄的健翮,
能飞去把太阳追随!
白昼在我面前,黑夜在我背后,
青天在我上面,大海在我下边。

(见郭译浮士德)

薛德林的诗：

> 你们�突，快活地无羁地从坚固的根柢里向上跑突出来。仿佛巨鹫攫食似地你们握住用有力的臂腕，握住太空。直刺着流云的是你们洒满了阳光的顶枝，像一个王冠。

这奋飞，这跑突，只是没有目的地向上，向上，到天上去偷星的闪闪的光，去偷白云边上的虹；浑浑的一片诗的境界，在这境界里，没有了中世纪，也没有了希腊，只有“美”，只有“全”，只有诗人的心，向幽渺的更高的更高的地方向往迈进的心——

到这种境界，有这种心的，才是真正的诗人，因了这心，诗人才能化入幻虚里，化入渺濛里，同宇宙冥合了。才能从一片花里看出了天国，从一粒砂里看出了永恒。

1934 年

跋：

这是我 61 年前清华大学的学士论文，原名 The early poems of Hölderlin，是用英文写成的。因为我的导师艾克（Gustav von Ecke，字锷风）教授是德国人，不通华文。今天我又读到它，宛如古旧书中夹的一片红叶，光华已失，而红艳未褪，使我顿生恍如隔世之感。古今文人编定自己的文集时，往往有大刀阔斧加以砍伐者，雅不欲别人看到自己穿屁股帘时的作品，其劲头有如古代印度语法学家写梵文语法口诀时越短越好，能砍掉一个字母就好像是暮年得到能传宗接代的宝贝儿子那样。我窃以为不可。我自己的作品，只要能找到的，除了个别篇内容重复太甚者外，一律收入文集，不加删削。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自己一生写作的过程和真相，决不以今日之我掩盖昨日之我。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对上面这一篇文章，只改动了几个非改不行的错别字，全篇一仍旧贯，连一些今

天看起来有点古怪的措词也保留不动。

1995年1月7日

救救小品文

自从鲁迅先生把小品文封为小摆设以后,一向沉寂的小品文蓦地热闹起来。但它却倒了霉。

中国是小品文的国家,这只要一想就会明了的。在外国,所谓文学者往往分为诗歌小说戏剧三大类。小品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然而在中国呢,小说戏剧是不被人认为是文学的,剩下的只有诗歌,来填这个空的是小品文,所谓某某文集者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品文,而这些文集的作者就正占据着文学史顶显赫的篇幅,例如唐宋八大家,桐城派等不都是每天挂在人们嘴上的吗?

然而在这样一个小品文的国家里,小品文却一向给人利用。

在极渺远的时代,我们就看到小品文的萌芽,似乎一下生就走着黑运,给大人先生们拿来作载道的工具,一直到魏晋六朝,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人们用小品文来说自己的话,然而引起了哄笑和嘲讽,说自己话的小品文也就被埋在这哄笑和嘲讽里,度着自己的暗淡的命运。

于是到了明末,我们又看到人们用小品文说自己的话。然而又引起了哄笑和嘲讽,说自己话的小品文又被埋在这哄笑和嘲讽里,外面又贴上满洲皇帝禁书的封条,喘不上气来,一直到新文学的起来,小品文依然在寂寞暗淡里活下去。

最近又有人说新文学的成功就是小品文的成功了,他们提倡小品文,提倡明末人的小品文,这使我高兴,我自己想,不管怎样,

居然有人在哄笑和嘲笑里注意到小品文终归是好的;然而不久我却发见他们作起斗方诗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名士,只有名士才能把白话文里加上之乎者也,而美其名曰语录体,在名士们自己摇头摆尾之余,恐怕很有一些陶然的逸趣,但在我们俗人看来,却正像看一个猴子穿起人的衣裳来,忸怩作态,顶大的用处也不过催人呕吐。明末的小品文是好的,但我们却不愿意看见死鬼在活人身上复活!

然而我们终于有了小品文大师,小品文也终于倒了霉。

于是鲁迅先生看出小品文的危机来了,接着是一片闹嚷嚷哄声。鲁迅先生是说了自己的话,但在这哄声里我们却听不出什么东西,先是热烈地攻击小品文,仿佛小品文这三个字就反革命,无论是谁,只要作小品文就是封建余孽,因为英国小品文作家特别多,于是我们这些聪明而又勇敢的批评家(?)又把英人的意识鉴定了一下,结果判了英人是毫无希望的民族,一个响应着一个,这哄声延长下去,个人都把自己的嘴脸表演一番,但在这庞杂混乱里我却只见到愚妄与浅薄!

接着是一个转机。人们发见了,小品文是随便可以注入任何东西的,他们不再骂小品文,而只骂小摆设似的小品文。他们要求匕首,于是又一个接着一个,把自己的嘴脸表演一番,这哄声终于又延长下去,拿着纸剪的匕首,他们要的,坐在软椅里喊着拿匕首却动也不动的,他们要的,从没看到过匕首,只把自己梦里的影子画出来的,他们要的——他们要一切这样的匕首,但有谁有过真铁真钢的匕首吗?上帝知道。

小品文终于给他们利用着,终于倒着霉。

而且还要倒下去。在混乱庞杂里我们要救救小品文,我们要小摆设,只要它真的是从内心里流出来的,我们将不眩惑于纸糊的大摆设,我们也要匕首,只要它是真铁真钢的,我们将不眩惑于纸

剪的玩意儿。我们绝不能忽视了文艺里的“真”。

1934年8月23日

大学外国语教学法刍议

我们学习外国语,不是在大学里才开始的。从中学起,有的人甚至从小学起已经学起外国语来了。但是小学生和中学生智力发达尚未成熟,所以他们应该有他们独特的学法,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要讨论的只是大学里外国语的教学法。

我这里说的外国语是指的平常所谓第二第三外国语,就是在大学里才开始学的。在中国读过大学的人大概都有学习第二外国语甚至第三外国语的经验。有的学一年,有的学二年三年甚至四年。学习的期间虽有短长,但倘若问一个学过的人,他学的成绩怎样,恐怕很少有不摇头的。

我也在大学里学过两种外国语。教务处注册股的先生们或者认为我已经学成了。因为在他们的本子里我的分数都是非常好的。而且还因了其中一种的分数特别好而得到出国的机会。但是我却真惭愧。送我出国的这一种外国语还是我到了他的本国以后才学好的。另外一种也是在那个国度里学到能看书的程度。同我同时学的朋友们情况也同我差不多。当然,这里也正像别处一样天才是缺不了的。他们念上十页八页的文法,一百个上下的单字,再学会了查字典。以后写起文章来,就知道怎样把英文的 As if 翻成德文的 Als ob,括弧里面全是洋字,希腊,拉丁,德文,法文全有。这样就很可以吓倒一个人。至于他们能不能看书呢,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虽然有这样的天才撑场面,但人们还是要问,为什么中国大学

生学外国语的成绩这样不高明？难道他们的资质真不行吗？我想无论谁只要同外国大学生在一块念过书都会承认，我们中国学生的天资并不比外国学生差。原因并不在这里。

但原因究竟在哪里呢？这问题我觉得也并不难回答，我们只要一回想我们自己学习外国语的经过和当时教员所用的方法就够了。普通大概都是这样：教员选定一本为初学者写的文法，念过字母以后，就照着书本一课一课地教下去，学生也就一课一课地学。速度快的，一年以内可以把普通文法教完；慢的第二学年开始还在教初级文法。有的性急的教员等不到把文法学完就又选定一本浅明的读本一课一课地讲下去。学生在下面用不着怎样预备，只把上一次讲过的稍稍看一看，上堂时教员若问到能够抵挡一阵，不管怎样糊涂，也就行了。反正新课有教员逐字逐句讲解，学生只须在半醒半睡中用耳朵捉住几句话或几个字就很够很够了，字典是不用自己查的。于是考试及格，无论必修或选修都得了很好的分数，堂皇地写在教务处注册股的大本子里。教员学生，皆大欢喜。

就这样，学上两年甚至三年外国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以外，普通学生大概都不能看书。最初也许还能说那么十句八句的话，但过上些时候，连这些话也忘净了，于是自己也就同这外国语言绝了交。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大好光阴白白消耗掉，这已经很可惜了。但更重要的却是放掉一个学习现代学者治学最重要的工具的机会。现代无论哪一国哪一门的学者最少也要懂几种外国语，何况在我们这学术落后处处仰给别人的中国？而且这机会还是一放过手就不容易再得到，因为等到大学毕业自己作了事或开始独立研究学问的时候，就很难再有兴致和时间来念作为工具用的外国语了。

这简直有点近于一个悲剧。这悲剧的主要原因，据我看，就在

教学法的不健全。自从学字母起,学生就完全依赖教员。教员教一句,学生念一句。一直到后来学到浅近的读本,还是教员逐字逐句地讲。学生从来不需要自动地去查字典,学生仍然不能知道直接去念外国书的困难、仿佛一个小孩子,从生下起就吃大人在嘴里嚼烂的饭,一直吃得长大起来,还不能自己嚼饭吃,以后虽然自己想嚼也觉得困难而无从嚼起了。

我们既然知道了原因所在,就不难想出一个挽救的方法,这方法据我看就在竭力减少学生的依赖性。教员应该让学生尽早利用字典去念原文,他们应该拼命查字典,翻文法,努力设法把原文的意思弄明白。实在自己真弄不明白了,或者有的字在字典上查不到,或者有的句子构造不清楚,然后才用得着教员。在这时候,学生已经自己碰过钉子,知道困难的所在,而且满心在期望着得到一个解答,如大旱之望甘霖,教员一讲解,学生蓦地豁然贯通,虽然想让学生记不住也不可能了。这样练习久了,我不信他们会学不好外国语。这方法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在外国,最少是在我去过的那个国度里,是最平常的。我现在举一个学俄文的例子。第一点钟教员上去,用了半点钟的时间讲明白俄文在世界语言里尤其是印欧语系里的地位,接着就念字母。第二点钟仍然念字母。第三点钟讲了讲名词的性别和极基本浅近的文法知识,就分给学生每人一本果戈里的短篇讽刺小说《鼻子》,指定了一部字典。让每个人念十行。我脑筋里立刻糊涂起来,下了堂用了一早晨的力量才查了六行,有的字只查到前面的一半,有的字根本查不到,意思当然更不易明白。心里仿佛有火在燃烧着,我恨不能立刻就得到一个解答。好容易盼到第二堂上课。教员先让学生讲解,但没有一个人能够讲一个整句。结果还是他讲,大家都恍然大悟,不自觉地轻松地笑起来。他接着又讲了半点钟的文法,才下了课。就这样,在一个学期内念完了初级文法和果戈里的《鼻子》。

这教法或者有点霸道,我承认。学生在课外非有充分的时间来预备不可。但是成绩却的确比我们大学里流行的教法好。除非学生低能,在两年内一定可以看普通的书。与其让学生不痛不痒地学上两年结果是等于白学,何如让学生多费点力量而真得其实惠呢?

十九世纪德国大语言学家 Ewald 就用这方法教学生,而且应用得还特别认真。跟他念过书的学生一谈起来没有一个不头痛的。后来他自己也听到了,就对人说:"学外国语就像学游泳。只是站在游泳池旁讲理论,一辈子也学不会游泳。我的方法是只要有学生到我这里来,我立刻把他推下水去。只要他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我希望中国的教员先生们有推学生下水的勇气,青年同学们有让教员推下水去的决心。

1946 年 10 月 31 日　北平

论自费留学

昨天(11 月 10 日)在天津大公报上读到汪敬熙先生的星期论文“自费留学万万不可开放”,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自己好多年来想说的话,汪先生一下子都给说出来了,他仿佛替我在心头扫去一片积闷,蓦地觉得异常轻松起来。倘若金圣叹看了这文章最少也要浮上一百大白。

但是有一点汪先生说得还不到家。也许汪先生有心存点忠厚,没有尽情地说。汪先生只说:“纨绔子弟之中不是没有好的,不是没有肯勤学的,不是没有学有成绩的。但是他们的大多数在外国是荒嬉游戏,挥霍无度的。他们自己是以为这样方显出家中富有。然而在外国人眼里,他们所做所为都是可以耻笑的。近些年来他们真是为国家招来耻辱!”无论谁只要亲身在外国见到过这些纨绔子弟的,都会知道汪先生这些话是怎样有含蓄而厚道了。

我自己在欧洲的一个大国里住过十年,一个大国里住过半年,也见到不少的事情。初到那个大国的首都的时候,天天在街上、饭馆里遇到的就是这些纨绔子弟,每个人都是把眼睛安置在头顶上,上下打磨得耀眼明亮,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念哪一门学科,因为他们很少与学校发生关系。但他们的生活也并非不紧张。每天一起来就到中国饭馆去。吃完早点,找几个同志下一盘棋,闲谈一下,就到了正午。午饭当然就地解决。吃完又结队出去逛马路看电影。晚饭再回中国饭馆,吃完又出去看戏坐咖啡馆或到其他他们所想去的地方。每人都少不了三“机”:照相

机、无线电收音机和野鸡。外国文很少有几个通的,但也用不着。因为他们所接触的外国人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不三不四的女人。同他们在一起嘴还有更重要的用处,不是用来说话的。再一种是警察。这些英雄们贩卖黑钱或犯了其他别的罪,倘若逢巧父亲是大使,自然可以大模大样地掏出红护照来吓外国警察。其余的就不免捉将官里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用不着说话,反正只要能听懂判多少年月徒刑就可以坦然走进监狱里去。等到出来的时候,又可以到处尤其是在中国饭馆里高谈雄辩,叙述他们在狱里的丰功伟绩。据说在里面每人必须作手工,编点什么。他们只学上几天,就可以教同狱的外国难友。这些外国人当然钦佩得五体投地。这样他们就很替中国争了些面子。旁人听了对这些为国争光的英雄也不免肃然起敬了。

这样说也许有人以为太笼统了。我现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位院长的公子。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很久了。至于在那个大都会里做了些什么,我不大清楚。但以后我们竟然得到一个机会同学过半年。我们差不多天天在一起吃午饭;但一直到他离开学校,我始终不知道他学哪一科。从他的谈话里我知道他听过耶稣教的神学,听过体育原理,听过微积分,听过流体力学,听过生理学、听过法律,对这些他似乎都没有什么兴趣。他念念难忘的只是医学院的产科讲演。他常常向我用很生动的姿态表演他在讲堂上听到的女人生产时的情形。同时复述教授的一句话:“男人无论如何英雄,无论能征服多少国家,也没有女人生产时那种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力量。”于是他也就对女人的伟大赞不绝口起来。但他也有他的伟大,在街上只要看到漂亮女人,便跟上去,百折不挠。挨了耳光,仍然是面不改色,不由得也让我赞叹起来。

第二个是一个上海大商人的儿子。据说从小就学那一国的语言。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住了八年。有一次替一位中国

老太太写一封请求信，拿到财政局，外国人说看不懂。这位老太太拿给我看，我才知道他替我们当时住的那一国造了一种新文字。后来他又从另外一个国度寄给她一个中文(记住是中文)明信片，老太太年纪大了，有些字认不清楚，又拿给我看。我又发现他替我们中国造了几个新字，创了一个新文法。他虽然学的是航空工程，但小代数和平面几何都弄不清楚。外国同学都奇怪，他就告诉他们，中国的逻辑和外国不同，数学也另成一个系统。这位先生在那里住了十几年，一天忽动归兴，临走告诉我，他回国要“组织”飞机。我用十二分的虔诚祝他成功，虽然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什么是“组织”飞机。

上面两个例子，一个代表荒唐，一个代表低能。作风虽不同，但总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各擅胜场。类似这样的英雄我最少也还能举几十位来。我虽然不久就离开那大都会，无缘继续欣赏他们的伟业。但在下风逖听之余留在脑海里的故事也足够写一本四百万言的留西外史。无论谁都可以想象到这些人们在外国替我们国家招多少耻辱。在外国浪费金钱还是小事。

这些人物最好都留在国内，当接收大员也可以，当什么什么专员也可以，无论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出国，因为外国人没见过中国，只要看到一个中国人的举动，他们就会想到全中国的人都这样。难道我们就甘心让这些人到外国去代表四万万人宣扬中华民族的伟大么?

我们都应该起来拥护汪先生的主张！我也同汪先生一样希望舆论界给我们鼓励！

1946年11月11日

现代德国文学的动向

——从个人到大众(Vom Individuum zur Gemeinschaft)

倘若我们要谈现代德国文学的动向,最少应该回溯上半个世纪去。当时自然主义虽然还如火如荼,但同时已经有一股暗潮在凶涌起来。有一群新作家认为当时的文学离开民众太远;无论在思想或语言方面都只能代表上层阶级。尤其是对当时流行的文学语言他们感到不满意。在他们看,这只是矫揉造作的东西,没有生命,没有活力,只是死板板一大堆字母排成的字,同大众的活的语言很少有什么关系。他们认为高级德语的生命源泉就在方言里面。同时民间的一切风俗习惯也永远是完成德国民族性的新力量。他们想在文化与艺术,时代与民族精神中间建筑一座桥梁,像以前 Herder 和 Grimm 兄弟一样。所以他们发起了一个运动,叫做乡土文学运动。

无论哪一个文学运动的开始,往往都是理论超于创作。乡土文学运动也不是例外。这一群新作家们虽然写了不少的作品,小说、戏剧、诗歌都有;但谈到真正伟大的作品他们还未能创造出来。不过他们在另一方面的成就却也不容抹煞:他们真正创造了为民众所爱读的文学作品,他们征服了民众。所以,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不是基于他们有什么惊人的巨著,而在他们真正替大众创造了消遣文学(Unterhaltungsliteratur)。我们不要把德国的消遣文学同我们的所谓“闲书”,譬如说张恨水之流的小说,相提并论。这中间的区别很大,简直就是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的区别。德国的

消遣文学不描写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它只是写平民，尤其是乡村里平民的日常生活，一群极简单的农人的极简单的欢乐和悲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苹果花的灿烂；听到青草地上的牛鸣，项下的铃声敲碎了山村的幽静；看到蜜蜂群围了盛开的樱桃花嗡嗡地飞；嗅到刚割送的野草放散出来的香气。在这样一个氛围里，一群农民单纯地过着日子。这一切都难免有点泥土的气息。但就正是这点点泥土的气息给住在大都市里的人们已经干枯了的灵魂带来了新的生力，从大地的最深处流出来的生力。使他们，哪怕是一霎那呢，又从死板的现实里解脱出来。明白这一点，再回头看我们的所谓“闲书”，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了。

这种文学在德国北部尤其发达。Hermann Löns（1866—1914）和 Gustav Frenssen（1863—）描写北德风物的小说，真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无论谁，只要在德国北部住过的，只要在一望无边的草原上领略过那里的风光，或者大森林里散过步，懂得森林的神秘的语言，看过松鼠像一缕黄烟似的在树梢上飘飞，经历过“叶干闻鹿行”的境界，读了他们的小说，怎样能不神往这里面描绘的境界呢？

我上面说过，这些乡土诗人多半未能写出多样伟大的作品，但他们总算是开辟了一块新园地。园地开辟好了，不久就来了许多青年文学家到这块园地里种植起来。他们种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的收获也非常丰富。无论在内容形式方面，他们的作品都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很完美的境界。他们把一般民众的愿望、苦闷、悲哀和欢乐都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而他们的精神的源泉也就来自民间。他们的作品仿佛是一面镜子，德国的民众又在里面照见了自己，这自己的真象从不知多久以来就给别的文学家歪曲了。在这以前的文学作品里流行的一切病态的，反常的和夸大的成分都被他们扫得干干净净了。他们所向往的就是单纯，正常的健康。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us）和唯知主义（Intellektualismus）他们都认

为是已经死僵的东西了,只有为大众的从大众里来的东西才有活跃的生命力。他们要冲破个人的圈子,走到广大的群众里去:

人类不是寄托在一个人身上的:
一个人只是一条芦苇,风一来就会折断;
只有在群众里一个人才能生存,像一条芦苇。
柔弱的联索是容易折断的,
这些联索把一个个的人同全民众系在一起:
诚敬、忠实,爱重一切现存的,
对坏人的恐惧,对好人的爱,
习惯、人情、顺服、风俗,
服从的技巧,命令的技巧。

Paul Ernst 金子(Das Gold)

在这一群作家里,我们第一个应该论到的就是 Paul Ernst (1866—1933)。他虽然也写小说,但他的最大的成就却是戏剧同诗。当时流行的说法就是一切道德的价值都是相对的。他竭力反对这说法,他认为道德的价值是绝对的。戏剧就成了他的武器,他用这武器来同敌人奋斗,同时来建立自己的世界观。他的戏剧很多,譬如 Das Gold, Brunhild, Adriadne auf Naxos, Manfred und Beatrice, York 和 Chriemhild 都是很出名的。在这些作品里,他显明地表现出脱离个人主义而到大众里去的倾向,上面引的一段就是一个好例子。他晚年最伟大的作品就是史诗 Kaiserbuch(1922—1928)。他从德国历史里找出几个皇帝来,赋予他们新生命,让他们在他的书里又活起来。

在 Paul Ernst 的影响下起来了一群新诗人。我们先谈一谈 Hermann Stehr(1864—)。在他的大作 Heiligenhof(1916)里他描写了

一群 Schlisien 地方的人在皱着眉苦索人生的意义。他主要的是要指明,生在一个集团里的人们的命运是密切地联在一起而不能分开的。一个人的命运只不过是一条大链子上的一个环子,仍然是受整个链子决定的。他以后许多作品的中心思想也总离不开这意思。他时时在提醒我们,只有生活在群众里,同大众休戚相关,一个人的生活才有意义。

第二个要谈的诗人是 Emil Strauss(1866—)。他初期的作品虽然走的是另一方向,但在他的长篇小说 Engelwirt(1900)里他已经有了乡土文学的色彩。在另外一个长篇小说 Der nackte Mann 里他才真地转向民间。在这里他描写了人与人间的忠实。只有彼此忠实人们才能活在一起。

现在我们再谈 Wiehelm Schäfer(1968—)。虽然他并不像别人那样大声疾呼为民众而艺术,但事实上他的作品却很多是为民众而写的。我们只要一看这些书名就可以了然了:Dreizehn Bücher der deutschen Seele, Der deutsche Gott. Schäfer 最大的成就是在他文字的完美。在他以前的德国散文可以说是已经走上雕饰不自然的途径。有的剑拔弩张,有的矫揉造作。作者费很大的力量,读者念了,只觉得他们是费力不讨好,一点也没有从容不迫同时却又不浮浅的韵味。在 Schäfer 手里散文又得到新生命。

在文字方面同 Schäfer 有同样大的,或者还可以说是更高的成就的是 Rudolf G. Binding(1867—1938)。无论他的诗歌,他的小说在文体上都能达到古典派作家的完美。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切合典雅,不生硬,也不夸张。但古典派作家的文章多半是典雅有余,而生动不足。Binding 的文章既典雅,字里行间又洋溢着活力。这种永远不退缩勇往直前的生命力可以说是 Binding 的最显著的特点。因了这缘故,这位诗人生平最爱的就是马,这作为前进的大无畏精神的象征的马。他养了几匹骏马,也写了几本关于马的书,来

颂扬马的美。我前面说到他的文章的美,但我们不要因而误会他是唯美派,只注意外表的美。他同上面谈过的那几位作家一样,认为艺术是目的就是要表现现实,同时也就是现实。(Wirklichkeit)。

应该同 Binding 相提并论的是 Hans Carossa(1878—)。同 Binding一样,他也是以抒情诗出名,虽然他也写了许多别的东西。他从来不说到民众。然而却并不是因为他离开民众太远了,不关心他们。正相反,他自己就在民众里面,他所说的写的都是民众的话。这样倘再口口声声不离民众,反而是多余了。

写到这里,我们就到了现代德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关键。我们上面常用民众大众一类的字眼,说这些作家怎样为民众大众而写作。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作家都是德国人,他们心目中所谓民众大众也就是德国人。这同民族主义的距离已经很近了。最初这些作家们也许还没有什么民族思想,他们不过认为艺术应该为大众而已。但是他们生的这时代和环境却把他们从这思想渐渐拖开,终于把他们拖到民族主义上去。一般人大概都知道德国民族确有许多优点,他们认真,严肃,不苟且、爱秩序,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底。这些好处德国人自己也知道,所以德国人都以德国的彻底(Deutsche Gründlichkeit)自傲。他们无时不意识到自己的优秀。但据我自己的观察,德国人性格的致命伤就在一种随了这优秀感而生的莫明其妙的迫害狂。他们总觉得别的民族都压迫他们,总觉得以他们的优秀得到的待遇太坏。至于他们究竟想得到些什么呢?恐怕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把全个地球都送给他们,他们仍然不会满意。这种性格在德国国势全盛的时候,虽然也不时流露,但究竟不十分显著。譬如说在俾斯麦时代德国人就差不多都很平心静气。但时代一变,到了威廉第二就了帝位,德国吃了一个大败仗,别的国家,尤其是法国,也许对德国真有点压迫。在外人看起来,这是古今通例,一个战败的国家照例是没有什么理可讲的。但

在德国人看来,他们本来就觉得别的民族都对他们不起,这样他们的自尊心更完全被损伤了。埋在德国人心灵深处的迫害狂就乘机抬起头来。诗人的感觉是最灵敏的,于是以前为民众而艺术的趋势现在一变而为为民族而艺术了。

表现在文学里的这种因了优秀感而生的迫害狂大体是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是温和的,只追怀德国过去的光荣,表彰过去日耳曼民族的功绩。意在言外,他们的用心无论谁一看就可以领会的。一方面是激烈的,大声疾呼,对当前的世界现况不满意,要求所谓正义和合理的待遇。说德国人口怎样多,而地方怎样小。目的就在争殖民地。

我们先说第一方面。单就欧洲说,德国民族算是比较年青的,比意大利法国都年青。他们真正形成一个大帝国是很近的事,历史本来不长,要到历史里去发掘光荣并不很容易。事实上既然没有,就只好用幻想来把历史拉长再用幻想来创造光荣了。这毛病虽然有的学者也难免,但德国学者爱真理的心究竟很切,所以真正学者是没有的。诗人本来有权利去幻想,现在他们就滥用这权利了。结果就产生了无数的历史文学。作家简直如雨后春笋,无论诗人、小说家、戏剧家都到这里来显一显身手。结果历史文学就在现代德国文学里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这种风气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在二十世纪初年德国还在全盛 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写作的动机当然与后来有点差别。大概人们都觉得现实太难令人满意了,空想将来又有点太渺茫。所以无论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喜欢把自己拖回到历史里去,到一个离现在很远却又真正存在过的时代里去。当时的残暴与黑暗都用很美的幻想来遮盖起来,剩下的就只有令人向往的带有点神秘气味的美。中国的小说多半都是历史小说,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在欧洲,只要一想到中世纪时候的武士,骑了骏马,臂上架了鹰,从

崇高宏伟的古堡的大门里飞驰出来,高高的窗子里正有一个花般的面孔向他微笑,有谁不向往这情景呢?因了这向往,于是过去的一切都似乎值得留恋了。德国初期的历史小说也不过就是表现人们这种对过去的向往。在这里我们要提到的是两个女作家。一个是 Ricarda Huch(1864—),第二个是 Frciin Enrica von Handel - mazzetti(1871—)。她们能超出俗流,在历史小说里创一新的风格。

但比她们更进一步而影响也更大的历史小说家却是 Hars Friedrich Blunck(1888—)。我这里说他是历史小说家,他自己也许不很同意;因为他在别的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他爱他的故乡,爱他的祖国。就德国说起来,他是一个乡土主义者;就世界说起来,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相信自己的民族是永生的。过去的现在的一代代的人们就仿佛是一条链子,这条链子从渺茫的远古就开始了,到了现在当然不会停下的,它还要蜿蜒下去到更渺茫的未来。Blunck 的主要思想就是怎样把这链子续下去。在他最早的三部曲里:Stelling Rotkinnssohn(1924),Hein Hoyer(1922)和 Berend Foch(1923),他描写了他的故乡 Niedersachsen。跟着来的是另一部三部曲:Gewal tüber das Feuer(1928),Kampf der Gestirne(1926)和 Streit mit der Göttern(1926)。在这里他更大胆地到茫昧的远古里去取材料。这些作品虽然都各有长处,但据我的看法,这还不能代表 Blunck,在 1934 年出版的 Die grosse Fahrt 才在 Blunck 的创作上开了一条新路。

我们在这里应该先谈一谈 Die grosse Fahrt 的出现的远因和背景。我上面曾说过在每个德国人的心里都埋着一种优越感。在平常时候,这种优越感只是潜伏着,很少有人来大声疾呼地传告世界。但一到德国受到外族的压迫,立刻就有人起来提醒德国人了。在近代德国历史上拿破仑第一次给了德国以侮辱。在那时候大哲费希德(Fichte)就作为德国民族的代言人而出现了。他的 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是我们都知道的。差不多同费希德同时的还有一个人名叫 Friedrich Ludwig John(1778—1852)。他看了当时德国尤其是普鲁士的怯弱,于是就大声疾呼要恢复德国的民族精神。稍晚一点的 Paul de Lagarde(1827—1891)是著名的东方语言学家,但也是一个火热的爱国者。他梦想一个德意志大帝国的实现,写了很多的文章。反犹太的举动在他以前在欧洲很多国家亦都发生过;但从他起才真正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在他以后,Eugen Dühring(1833—1921)更是有名的反犹太的健将。但不但反犹太人,而且也反对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是从犹太教里演化出来的。以上这许多人的意见虽然不完全一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就是所谓 Nordische Rasse (北方种族)。这是一种黄头发长头颅身体很高的人种,老家是在瑞典、挪威、苏格兰。后来渐渐向外扩散到丹麦、荷兰、巴尔干半岛,法兰西北部和全德国。德国人属于这一族,每个德国人都知道,而且引以为荣。于是就渐渐造成一种学说,说只有这一种人才能创造文化,任何别的民族都只能接受。这些民族之间的高下就以他们接受的本领与程度而定。文化创造是谈不到的。这种学说我们都知道是毫无根据的,但它却正合了德国人的口味。Blunck 也是一个忠实的信徒。

现在我们再来谈 Blunck 的 Die grosse Fahrt,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它的用意了。这书里描写一个北方人 Diderik pining 发现新大陆的故事。在他以前 Wikinger 人已经到了美洲。他不过随了 Wikinger 人走过的路发现了美洲,在哥仑布发现以前。发现美洲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大事,平常都把这一切功归给哥仑布,Blunck 却抬出一个北方人来同他争一争,在 Die grosse Fahrt 以后 Blunck 又写了两部相似的小说:König Geiserich(1936)和 Wolter von Pletteuberg(1938)。据说在写以前,他对搜集材料很下过一番工夫。换一句话,就是他

所写的都有所本,并不是全从幻想里拉出来的。这话可靠到什么程度,我们虽然不能知道;但从上面我们谈到的创作背景来说,这几部小说恐怕都有别的用意吧!

同 Blunck 并立的还有一位历史小说家 Erwin Guids Kolbenheyer (1878—)。同大多数的近代德国文学家一样,他也是为民众,或者还不如说是为民族而艺术。在他的作品里这种倾向更清楚了。他不主张艺术家应该只是沉默地创作而不说话,他们到应该说话的时候,就要挺身起来说,他自己就写了不少的带有政治味的论文。他不厌其详地指出一个民族就是这一族里面每个人精力和生命的根源。离开了民族,一个人就不能生活。德国民族是有生命力的,在生理上说是很年青的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虽然战败了,但它的生命力却比那些战胜的国家大得多。这一切的灾难艰苦只不过使这年青的民族更成熟,是找到一个适当的生活方式的必要的前奏曲。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的前例可以证明德国人的生命力。当中世纪就要结束,现代才渐渐开始的时候,人们仿佛从一个恶梦里醒转来,眼前慢慢看到光明。几百年以来天主教的顽固抹煞理智漆黑一团的思想像一片黑雾笼罩了每一个人的心灵。但现在这一片黑雾渐渐给光明照穿了。在这时候,在每个德国人血管里的原始日耳曼人的血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又找到了自己。这从外面来的对他们始终生疏的中世纪思想方式,虽然以前也曾像铁甲似地包围过他们,但他们现在却在把这铁甲穿透了。

代表这过渡时代的精神的是 Paracelsus。Kolbenheyer 最著名的历史小说的三部曲就是写 Paracelsus 的:Die Kindheit des Paracelsus (1917), Das Gestirn des Paracelsus(1921)和 Das dritte Reich des Paracelsus(1926)。在这里 Paracelsus 成了日耳曼精神的象征。他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在他以前无量数的祖先和在他以后无量数的子孙。古代日耳曼人的信仰同基督教很不一样。基督教虽然

统治他们很长的时间,但旧信仰的根苗并没有枯死,终于又在 Paracelsus 心灵里复活起来。他生的时候又正是在两个时代中间。他一方面为原始日耳曼精神所鼓动,一方面又对就要来到的新时代有无限的向往,于是就成了这个新时代的先驱。

除了 Paracelsus 三部曲以外,Kolbenheyer 还写了许多的历史小说。譬如 Amor Dei(1908)是写大哲 Spinsja 的,Meister Joachim Pausewang(1910)是写 Jakob Böhme 的。在历史小说方面他也还有别的东西,散文、短篇小说、戏剧、抒情诗,描写近代生活的长篇小说他都写。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讨论了。

上面我们谈的是现代德国文学发展的第一方面,就是对德国过去光荣的追怀。现在我们再来谈第二方面,就是呼吁所谓正义和合理的待遇。他们认为德国民族是优秀的,能够创造文化的。然而其他的民族却来压迫他们,抢走他们的殖民地,让他们没有充分发展的可能。这方面的代表我们可以举 Hans Grimm(1875)。他在德属西南非洲住过很久。第一次大战后,德国失掉了他们的殖民地,他也只好回国,他看到在他的祖国里无论是大城市小乡村都挤满了人,然而别的列强却在原有的广大土地之外还到处占据殖民地。这未免太不公平了。他以为一个人既属于一个民族,他就应该同这民族休戚相关,一个诗人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民族而生活,尤其是当自己的民族在艰难困苦的时候。然而当时的一般德国文人对这事毫不关心,只深深地埋在象牙塔里。他认为这是怯懦、昏愦。一个诗人看着现实有什么缺点,就应该挺身而起,出来改正。他应该放弃自己的安逸,为了民族的福利。Grimm 的名著 Volk ohne Raum 就是在这种思想下产生的。只是这书名,没有土地的民族简直就是一个反抗的口号。

另外他还写了几本书,大半是西南非洲的写照。因为在那里看到英国人同黑人混血的情形,所以他有时候也讨论种族的问题。

我们一提到种族问题就很容易想到当时曾如火如荼而现在已经烟消云散的国社运动。种族思想可以说是国社运动的中心思想之一。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提倡北方民族而反对犹太人的运动,这运动到了国社党手里更发扬光大了。按时间讲起来,我们上面谈过的许多作品都已经属于国社运动时期。但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没有谈到国社运动。现在我们在这里系统地谈一谈。我不是历史家,不想在这里论国社运动的功过得失,我想谈的只是它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在历史上没有一件事情没有原因。在某一个国家发生某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必然性,虽然有时候这必然性表面上看起来不容易发见。要了解苏联须拿整个的俄国历史作背景去看,要了解国社党也要拿整个的德国历史作背景。没有一件事情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上面已经说到德国人的特性:优越感和迫害狂。这种特性虽然潜伏在每个德国人心里,但平常时候不容易显露出来。第一次大战后的德国处处受人压迫,这种特性就乘机抬起头来。表现在文学里的就是我们上面谈过的那两大潮流。表现在政治上的就是国社运动。最初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有意识的联合,虽然他们的发动力是一个来源,他们都是民族特性和时代精神的产品。但自从国社党执政以后,统治思想,压迫异己。国社党的领袖们看到还有一群文学家同他们的主张差不多,于是就设法拉拢;而这般文学家也觉得国社党很合他们的口味,当然也不拒绝,终于就变成国社党的发言人,替国社主义大事宣传起来了。他们以前的作品里本来就有这种思想,现在更系统化,更偏激了。譬如北方民族,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这在人类学上究竟有多少学理的根据,我说不上来。但国社党所谈的北方民族学说却差不多都是呓语。连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来究竟谁是北方民族,究竟谁不是。有的今天是,明天忽然又不是了;有的不是,忽然又是了。当英国同德国感情还好的时候,英国当然是北方民族。但战端一

启,英国立刻就被取消了资格。以此类推,只要同德国要好的就是北方民族;只要反对德国的就不是。弄来弄去,世界上只剩了德国一国是北方民族了。我想到戈林的一句名言:"我说他不是犹太人,他就不是!"这就是国社党的逻辑。表现在文学里的思想也同样的幼稚、偏激、无理性。文学家成了国社党的工具。我并不是说,这种思想只表现在文学里,在其他的精神科学里也表现得很清楚。甚至连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受了影响。Lenard 教授在提倡所谓"德国物理",Bieberbach 教授高呼所谓"德国数学",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因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文学,这一切我们就只好省略了。

在国社运动正式发动以后的德国文学,表面上看起来派别虽然很多,也同以前的文学一样,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倘若仔细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他们打得无论是什么颜色的旗帜,除了很少数的例外,都多少同我们上面谈的那两大潮流有点关系。现在我们在下面谈一谈。不过我在这里还要声明一下。在我们谈到国社运动以前谈过的文学家,他们早期的创作当然都在国社运动以前,但晚期也属于国社运动时代,有的甚至很受了国社运动的影响。我们为了清楚起见,连他们晚期的作品也在谈国社运动以前叙述了。以下我们要谈的是比较年青一点的,同国社党关系很深的作家。我们根据他们的作品来分一下类:

第一是农民文学。专写农民的生活。农民政策本来是国社党主要政策之一。他们希望德国土地里产出的食粮能够供给德国人民,所以拼命提倡归田运动。在城市里生长起来的青年都一定要到农村去工作一个时期,不然就没法入大学或找职业。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有许多文学家来倡导农民文学。我们第一个应该提到的是 Friedrich Griese(1890—)。在他的两部农民小说 Der ewige Acker(1930)和 Das letzte Gesicht(1934)里他提醒人们应该回到田地

里去,应该放弃了个人主义走到大众里去。描写南部农民生活的有 Josef Geoy Oberkofler(1892—)。他的作品 Das Stierhorn(1938)和 Der Baunwald(1939) 也同样把农民生活神圣化了。以前国社党健将 R. Walther Darré 在他的名著 Das Bauerntum als Lebensquell der nordischen Rasse(1929)里所表现的思想,现在就成了这一般农民文学家的指南针。

第二是大德意志帝国文学。我们都知道国社党主要目的就是在联合一切日耳曼种的人民组成一个大德意志帝国。这本来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也反映在文学里。在德国本土当然出了很多作家,用种种形式来宣扬描绘鼓动德意志大帝国的实现。在奥国也有作家来响应。譬如著名的抒情诗人 Josef Weinheber(1892—)就是里面的一个。他是一个天生的抒情诗人,在近代抒情诗人中独树一帜。他忠实于他的艺术,并不像一般德国宣扬大德意志帝国的作家那样浅薄。不过他以奥国人竟赞成国社党,所以我们就把他列在这里了。在瑞士响应的有 Jakob Schaffner(1876—)。他是德国种的瑞士人。梦想所有的日耳曼人,无论什么国籍,都要联合起来。作品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地方,我们不能详细谈了。

第三是战争文学。一提到战争文学我们就容易想到当时曾风靡一时的雷马克(E.M. Remarque)的《西部前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 (1928)。这书的中心思想是反对战争。所以国社党一上台立刻禁止了。我这里要谈的是赞成战争颂扬英雄主义的文学。在这方面的作品非常多,但好的却很少。我们只能举几个例子。Hans Zöberlein 的 Glauben an Deutschland 是宣扬英雄主义的。Josef Magmes Wehner 的 Siebenvor verdun(1930)更歌颂德国士兵的勇敢。国社党的色彩都很重。

第四是爱国文学。提倡极端的民族主义,认为德国是神圣的,最高无上的。作品虽多,但没有什么好的。只有 Heinrich Lersch,

karl Bröger 和 Rudolf Alexander Schröber 的诗还像个样子。

第五是国社运动文学。以上所谈的四类文学都同国社运动有关系。但那些作家多半在国社运动以前就成了名,所以他们不能算是国社运动的产儿,顶多算是同路人而已。我们这里要谈的是真正从国社运动获得灵感的作家。譬如诗人 Baldur von Schirach 就是国社党青年运动的领袖。小说家 Hannes Kremers 的长篇小说 Gottes Rune 就是描写国社党冲锋队(SA)的。国社党执政十几年,在文化方面用尽了全力宣传。在这方面作品之多,我们大概可以想象。但无论在哪一国的文学史上,政治意味太浓含有作用的文学作品都不能成为第一流作品。德国也不是例外。这些国社运动的产品几乎没有一本有什么价值的。我们也就不再谈了。

上面这许多派别,表面看起来,虽然都不一样;但实际上都同那两大潮流有点关系,这我们已经说过了。但这两大潮流根本上还是从一个来源分出来的。追想德国或北方民族过去的光荣,目的不过是带给现代的德国民众勇气,鼓舞他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过去的伟大。虽然目前环境不好,但这只是暂时的。德国民族过去既有这样光荣的历史,将来也一定是光明的。至于替德国民众呼吁,要求所谓合理的待遇,所谓正义,更显明地是为民众了。所以,这两大潮流实际上都以民众为对象。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初年流行的许多主义都同民众很少有什么关系。有的诗人更是深沉埋到自己制成的象牙塔里,做着美丽的梦。但我们以上论到的这些真正现代的诗人却主张文学应该是民众的,来自民众的。所以我说现代德国文学的动向倘若用一句话来表示的话,就是:从个人到大众。

1947 年 1 月 15 日

西化问题的侧面观

什么是西化问题呢？这我似乎有点明白，又似乎不明白。理论方面我总觉得有点深奥；所以十几年前当许多名流学者热烈讨论这问题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这样大的勇气和决心把一篇讨论西化问题的文章从头到尾看完过。只知道最初有什么全盘西化的论调，后来又有人出来提倡中国本位文化，真可以说是热闹。但我却像一个看足球决赛的旁观者，陪球员高兴一阵，甚至手舞足蹈的时候都有；终于还是回家睡大觉，人家的胜负与我毫不相干。不过我想在这里附带说一句：倘若当时参加讨论的名流学者们能把一百年以前俄国学者讨论西化或斯拉夫本位文化的文章拿来看一看，也许可以省下许多笔墨纸张。

理论既然不明白，那么我们就谈几个实际的例子吧！不过我仍然要声明，连这几个实际例子我也未必真明白，只是觉得似乎有点明白了而已。

我们先谈飞机。倘若真正要西化的话，无论是不是“全盘”，飞机大概总要“化”过来的。我这话似乎又有语病，因为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飞机也是“古已有之”的。据说孙膑或墨子曾制过能在空中飞行的木鸢，这就是现代飞机的始祖。这样一来，似乎西洋的飞机还是从我们中国“化”去的。我不反对这说法，这是替我们黄帝子孙们增光的事情。不过，我们的木鸢不但没变成飞机，甚至连木鸢现在也看不见了。人家的飞机却天天在我们的天空里飞。没有办法，只好还是到西方去学，而且现在也就正在学中。

学成了会成什么样子呢?这我有点说不上来。我虽然上下古今乱谈,但究竟没学过算卦,现在不能预言。无已,我们就先谈从外国买来的飞机吧!

飞机买来的时候,大概还是新的。于是就有人来驾驶,天天在天空里飞。我们的驾驶员并不笨,也能像西洋人一样要出许多花样,或者还更多。当飞机落到地上,他们从里面走下来的时候,样子异常地神气。穿了全付的美式配备,臂上挂了如花的少女,高视阔步,昂然走在街上。虽然他们现在是在地面上,但看神气却仍然仿佛从天空里往下看一样,这些凡人们在他们眼里都只像蚂蚁一般大小。世界是属于他们的。

就这样,一天天地下去。他们愈来愈神气,飞机也愈来愈旧。间或这里掉了一个螺旋,那里缺了点什么,或者什么地方应该擦一点油了,普通大概是不会发见的;因为飞机买来是在天空里飞的,既然落到地上,管它干什么?而且我们的驾驶员们还有别的心事,每天看报纸,先要看黄金的涨落,上海比北平究竟差多少,值不值一带,这些都需要很多的精神。即便碰巧发现了飞机有点小毛病,觉得也没有什么严重,掉了个小螺旋有什么关系呢?模模糊糊对付着能飞就行了。像西洋人那样在飞机起飞前严密的检查更没有必要了。于是照常驾驶,飞机也就照常飞。然而说不定哪一天这飞机忽然“失事”了。于是报纸用大字登出来,这里打电报,那里作报告,连“最高当局”也“震怒”了,当然又下了“手令”。一时真像煞有介事。但过了不久,除了受难者的家属以外,人们对这事情都渐渐淡漠下来。报纸上也就再没有下文。当然更不会有人追问。反正自己没有被难,管这些闲事干什么?不久这件事就被埋在遗忘里。于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又有新买来的飞机在天空里飞。

从飞机我想到钟表。时间本来是很神秘的东西,是联绵不断的,钟表就是用来把时间分割开来的。这当然是一个很笨的无可

奈何的办法，一定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分割应该统一。一个地方或一个城市的时间无论如何应该一致。倘若你的表是五点，我的是十点，另外一个第三者的是十二点，那么钟表还有什么意义呢？

钟表是欧洲人发明的，关于时间统一这一点他们总算做到了。有些需要精确时间的地方甚至一分一秒都不差。但自从明末天主教士把钟表带到中国来以后，钟表大概也震惊于我们精神文化的伟大，把在欧洲时的作风渐渐改变了。满清皇宫里和贵族家里的钟表，譬如说贾府上的，改变到什么程度，因为我究竟不是历史家，有点考据不上来。没有办法，只好举眼前的例子。北平一个学校里当然有很多的钟，几乎每间办公室里都有。数目虽然多，但没有两个钟的时间是一样的。工友拿来当作标准摇铃的一个钟，也许有点年高德劭了，每天总慢走五分钟。三天以后就会慢到一刻钟。然而这就是这一院的标准时间。有人告诉工友，工友说他知道。问他为什么不拨正了，他说，只差一刻钟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上课时间总会是五十分钟的。同时另外一个离这里不远的院里的钟，大概走得比较对一点。结果是两院摇铃的时间相差一刻钟，这里还没下课，那里已经上课了。在两院都有课的同学就真有点“伤脑筋”了。一天我看到一位德国先生用了跑百米的姿势冲进学校里来，头上满是汗。到了，他才知道，原来学校里连预备铃还没有摇。另一天，我下了课去赶汽车。计算时间可以赶得上，但汽车却早已开走了。

在北平这古城里，像这样的钟还多得很。大马路旁的所谓标准钟，银行大楼上的大钟，样子都很堂皇神气；但倘若仔细观察就都有问题。有的从不知什么时候起就干脆不走。有的性急，总是走在时间前面，让时间在后面拼命追。有的性慢，反正据哲学家说，时间是永恒的，马路上又终天有热闹可看，有美国吉普车撞三

轮,有军人打汽车售票生,慢慢地走着瞧吧！慌什么呢？于是这些堂皇的钟就各自为政起来。

倘若干脆不走,我不反对。因为从不知多久以来,钟表对许多人们就只是一件装饰品,像钻石戒指什么的,虽然他们原来不是用来作装饰品的。这次大战的时候,德国人有几年没有看到咖啡,一个杂志就提议把咖啡豆镶在白金戒指上代替钻石。咖啡豆都有当装饰品的资格,何况钟表呢？欧洲的,恐怕我们中国的也一样,贵夫人赴夜会的时候,穿了晚礼服,脖子上挂了真的或假的珠子,手腕上带了金表,珠光宝气,炫人眼睛。但一说到时间,就回头问自己的丈夫。原来她们的表从买来后就没有走过。所以有一个时期我想提议:以后替女太太们制手表,里面不必用机器,只用一块金子,作成表形,用笔画上钟点就行了。倘若这位太太喜欢八点钟,就画上八点;倘若她喜欢九点钟,就画上九点;依此类推,无论什么时候看,都只是一个样,这多有意思？还可以从她们喜欢的钟点上替她们起浑名,譬如八点太太九点太太等等。心理学家可以从这里推测这些太太们的个性。象征派诗人也可以从这些钟点上幻想出这些太太们的灵魂是红的,或是绿的,岂不很热闹有趣？反正人们都知道太太们的金表多半是不走的,不会误事。

但我们的钟表却偏不这样简单,它们也走也不走。我们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不走;哪一只走,哪一只不走。在钟表没有输入以前,我们中国人大概是颇快乐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多么简单明白？太阳反正不会罢工,而且有目共睹。当时虽然也有什么漏,但也只是贵族人家的玩意儿,与一般平民无干。“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不是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向往这境界么？但钟表却偏要挤进来。据一位哲学家说,我们中国的思想是有“完整性”的,用我的话说,就是混沌一团。可惜自从钟表挤进来以后,这“完整性”有点难于保持了。这真是大可哀的事情。

另外一件大可哀的事情就是抽水马桶的输入。以前我在北平读书的时候，常听到刚回国的留学生们的伟论，读到他们的文章。既然镀过金了，再看到我们这古老的国家，就难免有许多感慨。但第一件让他们不满意的却是在中国有很多地方没有抽水马桶。这当然有很充足的理由。谁不知道坐抽水马桶的干净方便呢？但也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用过后一定要拉一拉链子，或按一按钮子，让水流下来，把马桶冲洗干净，不要让后来的人掩鼻而过之。这件事看来虽简单，但却复杂。连认为中国没有抽水马桶就是野蛮的象征的留学生们，当他们还没回国的时候，就常常因为用过马桶后不放水冲洗因而被外国房东赶出来。他们回国后怎么样呢？这我有点说不上来。反正在我们中国，只要有抽水马桶的地方——我先声明，这种地方恐怕只有上等人才能住——就难免有上面说的那种现象。从前一位厕所诗人有两句名句："板斜尿流急，坑深粪落迟。"这多么有诗意？拉链子，按钮子，抽水，真未免有点太"散文的"了。虽然有点气味，但"入鲍鱼之肆"，久了也就嗅不到了。我想恐怕只有这样有诗意的地方才是我们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处。

同抽水马桶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有自来水的白瓷洗脸盆。这也是从西方来的玩意儿。脸盆当然我们从很早就有，虽然不是像西洋一样装在墙上上面有冷热水龙头的。顾名思义，脸盆当然是用来洗脸的。但据我所知道，正像中国的许多官吏，它也有兼差。普通是用来盛什么东西，也可以用来洗菜和面。有的人早晨用它来洗脸，晚上再用来洗脚。这我总觉得有点不雅，大概可以算是很下乘的了。不过比这更下乘的还有。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位住同屋的同学，他的脸盆，早晨用来洗脸，晚上洗脚，夜里小便。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先到厕所把小便倒掉，稍稍用水一洗，立刻就再倒上水洗脸。一天早晨他起得比较晚一点。工友进来送脸水，看到脸盆里面有黄色的液体，以为不过是茶水什么的，就把热水倒在里

面。这位同学起来一看，心里当然比谁都明白；但又懒得再喊工友。于是拿过毛巾肥皂来，就用手往脸上捧水。脸上的汗毛一根都不动。我一直到现在还佩服这位英雄。

西洋来的有自来水的白瓷洗脸盆到了中国以后是不是得到同样的命运，我没有看见，不能乱说。但它们的命运却也不太好。我们中国同胞强迫它们兼差。兼了多少差，我没有统计，也不能乱说。有一种差使却很普遍，到处可以发见。我去年夏天在南京一个国立什么馆住的时候，最初因为人还不多，大体还过得去。后来人渐渐多了，每天早晨到盥洗室去洗脸的时候，总发见白洋瓷盆里面满是水果皮，花生皮，喝过的茶叶；开了自来水，不用胶皮塞，水也不会流下去。下面装的泄水的管子等于虚设。到了北平也发见同样的现象。我们宿舍里盥洗室里的白洋瓷盆也永远不往下漏水，里面仍然是水果皮，花生皮，喝过的茶叶。贴了布告，仍然没用。看来恐怕还是我们的国粹老瓦盆好，可以随处挪动。即便里面丢上水果皮什么的，只须拿出来一倒，立刻就又干净了。这不比装在墙上有冷热水龙头的永远不能挪动的白洋瓷盆好得多么？

我开头说到，我不懂什么是西化问题，只能举几个实际的例子。现在例子举出来了；但这与西化问题究竟有没有关系呢？我想不出来。想来想去，自己也有点糊涂起来了。在糊涂之余，我忽然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有人告诉了我下面的故事：

有一位外国教授，因为看到人们天天吃猪肉，但猪的本身和它住的地方却实在有点不干净，这样的肉吃到肚子里当然不会好的，于是就替猪们建筑了一座屋子，四壁洁白，光线充足，空气流通，地上还铺了洋灰。洗澡吃东西都有一定的地方，器具也都漂亮洁净。把猪们引进去以后，满以为大功告成，心里异常高兴。但过了不久，猪却接二连三地死起来。他以为猪本身有了病，于是把这群死猪拖出来，把屋子消过毒，又引进一群新的去。但过了不久，猪又

接二连三地死起来。现在这位教授只好去找兽医了。检查的结果是因为过于兴奋不安，心脏扩大而死。原来猪们看了这样洁白的墙，这样干净的地，这样充足的光线，心里怕起来，日夜坐卧不宁，终于死掉。

故事到这里为止。但这故事离题却有点太远了。难道这也会同西化问题有什么关系么？这我说不上来。正面看西化问题，我没有这能力。侧面看呢，仍然没看出什么道理来。既然在糊涂之余在梦里听到这故事，就把这故事写下来作个结束吧。

1947年1月16日　北平

邻　人

古书上说:“德不孤,必有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德,但邻人我却是有了,而且很多。因为我现在住在一座外面看上去似乎像工厂的大楼上,上下左右都住着人,也就可以说都是我的邻人。

古时候有德的人的邻人怎样,我不敢说,也很难想象出来。但他们绝对不会像我现在这些邻人这样精深博大,这是我可以断言而引以自傲的。我现在的邻人几乎每个人都是专家。说到中国戏剧,就有谭派正宗,程派嫡传,还有异军突起自创的新腔。说到西洋剧和西洋音乐,花样就更多。有男高音专家,男低音专家,男不高不低音的专家。在这里,人长了嘴仿佛就是为了唱似的。每当晚饭初罢的时候,左面屋子里先涌出一段二簧摇板来。别的屋子当然也不会甘居人后,立刻挤出几支洋歌,其声呜呜然,仿佛是冬夜深山里的狼嗥。我虽然无缘瞻仰歌者的尊容,但我的眼却仿佛能透过墙壁看到他脸上的青筋在鼓胀起来,脖子拼命向上伸长。余音在长长的走廊里回荡,我们这房子可惜看不到梁,不然这余音绕在上面怕是永远再不消逝了。岂能只绕三天呢!古时候圣人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我听了这样好的歌声,吃到肚子里去的肉只是想再吐出来。自己发恨也没办法。以前我也羡慕过圣人,现在我才知道,圣人毕竟是不可及的了。

但这才只是一个开端。不久就来了乐声。不一定从哪间屋子里先飘出一阵似乎是无线电的声音,有几间别的屋子立刻就响应。一转耳间已经是八音齐奏,律吕调畅,真正是洋洋乎盈耳哉。但却

苦了我这不懂音乐的人。有时候电忽然停了,论理我应该不高兴。但现在我却从心里喜悦,以为最少这无线电收音机可工作不成了。但我失了望。不久就又是一片乐声从烛光摇曳的屋子里洋溢出来,在黑暗的走廊里回旋。我的高邻们原来又开了留声机。他们一点都不自私,毫不吝啬地把他们的快乐分给我一份,声音之高,震动全楼。他们废寝忘餐地一直玩到深夜,我也只好躺在枕上陪他们,瞪大了眼睛望着黑暗。

他们不但在这方面表现出一点都不自私,在别的方面他们也表现出他们的大度。他们仿佛一点秘密都不想保守。说话的时候,对方当然要听到,这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还恐怕别人听不到,尽量提高了喉咙。有时候隔了几间屋还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倘若他们在走廊里说话,我的屋里就仿佛装了扩音器,我自己也仿佛在听名人演讲。当他们说话中再加上笑声的时候,那声势就更大。勉强打个譬喻,只有八月中秋的钱塘怒潮可以比得来。真足以振懦起弱,回肠荡气。我们这座楼据说已经有了点年纪,我真担心它会受不住这巨声的震荡蓦地倒下去。

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屋子或者回自己屋子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秘密,而且是唯恐别人不知道。他们关门的声音和底上钉了铁块的大皮鞋的声音就是用以昭告全楼,说是他们要出去或者回来了。在我的故乡,倘若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放轻了脚步走到人家窗下去偷听人家的私话,我们就说这个人是踏鸡毛鞋。意思是说他的鞋底是用鸡毛做成的,所以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我们的高邻却绝对不踏鸡毛鞋,他们的鞋底是铁做成的。有时候我在屋里静静地看一点书,蓦地听到一阵铁与木头相击的声音,我心里已经知道是我的邻人来了。但我还没来得及再想,轰的一声,我的屋子,当然我也在内,立刻一阵震动,桌上玻璃杯里的水也立刻晃动起来,在电灯光下,起了成圈的水纹,伸张,扩散,幻成一条条的金光。我

在大惊之余,脑海里糊涂了一阵。再仔细一想才知道是我的邻人在关门。

这一惊还没有定,头顶上又是轰的一声,仿佛中了一个炸弹。我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我忘记我现在是在北平,我又仿佛回到两年前去,在德国一个小城的防空洞里,天空里盘旋着几百架英国飞机,就在不远的地方,响着一声声的炸弹。每一个炸弹一响,我就震得跳起来。每一霎那都在等着一个炸弹在自己头上一响,自己也就像做一个恶梦似地消逝了。自己当时虽然没有真地消逝,但现在却像一个被火烧过的小孩,见了一星星的光,身上也就不自主地战栗起来。但是我的头顶上还没有完。一声轰以后,立刻就听到桌子的腿被拖着在地板上走,地板偏又抵抗,于是发出了令人听了非常不愉快的声音。不久,椅子也被拖着走了,书架也被拖着走了,这一切声音合成一个大交响乐。住在下面的我就只好义务地来听。而且隔上不久,总要重演一次,使我在左右夹攻之中还要注意到更重要的防空。

这种生活确不单调,确不寂寞,也许有不少的人喜欢它。但我却真有点受不了。在篇首我引了两句古书:“德不孤,必有邻。”那么倘若一个人孤而无邻的话,那他就一定是不德了。韩文公说:“足手已无待于外之谓德。”谁都知道德是好东西,我也知道。但倘若现在让我拣选的话,我宁取不德。(红楼小品之一)

1947年2月5日

我们应该同亚洲各国交换留学生

——给政府的一个建议

十几年前,当我还在北平念书的时候,只听到同学们都想到外国,尤其是欧美,去留学,却极少听说有外国学生到中国来留学过。虽然当时北平有几个大学里有日本留学生,我还同其中的一个同屋住过一学期;但他们据说都是土肥原将军的部属,做学生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其实是留而不学的。

现在一转眼过了十多年,世界经过了一次空前的战争。这次的战争在种种方面都引起了很大的变动,地图的颜色也改变了许多。在亚洲也有许多国家同战前大大地不一样了。中国已经成了X强之一(原来是四强,后来又改成五强,现在恐怕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几强了,故以 X 代之)。印度也正走向独立自主的路。朝鲜的命运现在虽然还没定,但独立大概是不成问题的。波斯内部的变化也不小。其余许多比较小的国家都多少有点变化,这些变化大体说起来都可以说是有利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亚洲正走向一条光明的路。

正在这时候,有几个亚洲的国家开始派留学生到中国来。一个土耳其的女生已经到了北平,就在北大念书。有七八个印度学生不久也可以到,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先生是由印度政府派来的,现在已经在北大开始演讲了。据说还有几个土耳其学生要到中国来。我们虽然不能知道,印度同土耳其政府派学生到中国来的用意是什么,但从各方面推测起来,他们大概也意识到这次大战后亚

洲局面的改变,觉得亚洲各民族的命运真正休戚相关,大家非互相团结合作不行了。要想团结合作,那只有先互相认识。他们派学生来就是要认识中国的。

我们当然热诚地欢迎这些来中国的客人。他们不远万里到我们这里来,无论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学科,哲学也好,历史也好,语言也好;无论他们过去的成绩如何,有的已经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了,有的才开始学;但我相信,他们都抱着近于宗教家的虔诚,还有一份不小的勇气,跋涉重洋,到我们这国度里来观察和学习。在我们历史上曾有一个时期,外国人到中国来学习过。但那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连我自己想起来都有点渺茫了。一百多年以来,我们只是向别人学习,而且(我这里想加一个英文字 Alas)学习的成绩还不太高明。但现在居然又有外国学者到中国来观察和学习了。我想,这恐怕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高兴的,虽然也难免有人怕这些客人会失望的。

我自己对这事情当然也是颇为高兴的。不过我总觉得还有点遗憾。以幅员的广大论,以人口的众多论;以历史的古老论,以在目前世界政局上占的地位论,我们中国无论如何也应该先来做这件事情;我们无论如何也应该先感觉到亚洲民族有互相认识团结合作的必要,来领导做这件事情。我这里用领导两个字,并不是说我们要做亚洲的盟主,指挥其余的民族。我只觉得我们是亚洲的老大哥,而且我们的同胞散处亚洲各地,我们有更迫切的需要去认识别的国家,同时也希望别的国家认识我们而已。

然而事实上怎么样呢?现在别的国家有的已经派学生到中国来了,有的正预备选派。但是我们的政府却仍然只是处在被动的地位,一声也不响,仿佛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人家来了,我们当然欢迎;而且我相信,我们政府的诸公也一定高兴看到这些远方来的客人;只要可能,他们也一定会帮助这些客人的。但

也仅只是高兴而已。他们似乎还没有时间去追问这些客人来的原因,再进一步来决定自己的做法。也许我们的政府诸公还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件“小”事情。他们正忙着公使升格,派遣大使,派代表出席泛亚洲会议。这些事情当然也并不是不重要。但实在说起来,这都是些表面文章。倘若两个国家事实上有认识的必要而不能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即便把大使改成特使,每年举行四次泛亚洲会议也还是无济于事,只是报纸上登起来热闹而已。

现在人家既然比我们早走了一著,我们在感到遗憾之余,也不必责难任何人。我只希望我们能设法补救一下,而且愈早愈好。因为现在时间还不算太晚,倘这样再蹉跎下去,将来恐怕连补救都不可能了。我虔诚地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做到几件事情:第一,我们也派学生到亚洲各国去。在十几年以前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到这些国家去的。人们出国是想去镀金。镀金只能在欧美。有谁肯白牺牲时间到这些小国去呢?但现在我相信一定有许多有眼光有志气的青年也感觉到亚洲民族有互相认识互相团结的必要而希望能够到这些国家去的。最近几年来许多青年同学对东方语文兴趣的增加就是个好例子。而且事实上我们国家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了,也需要许多真正了解这些国家的外交人才。我们政府以前派过许多所谓外交家到波斯埃及等国去。他们对当地的民情风俗隔膜到万分,闹了许多笑话,到现在这些国家还有人谈起,他们怀疑为什么中国政府派这样的人去作外交家。第二,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在几个在国际上有声望的大学里,譬如说北大和清华,替亚洲各国的留学生设上二三十名特别公费生。每月发给他们的钱足够吃用。由外交部通知各国的政府,请他们选派学生来。甚至来回的旅费我们都可以担负。对我们全国的开支,这简直连九牛一毛都谈不到,真正是多一点也不成问题。在这些学生来中国以前,或者先由我们政府在他们的大学里设几名奖学

金,让他们先对中国语文有相当的研究,然后再到中国来。他们在中国住上几年以后回国去,对中国同他们国家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上我敢相信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中国同他们国家的外交和文化的关系一定会更密切起来。我们的国家目前确有点糟,令人看了悲观。但我还没悲观到认为我们中国什么东西都坏,简直是一无可取,一无可学。倘若这些学生真地能从中国学了点值得学的东西回去,他们也就不算白白地长途跋涉了。

倘若还需要援古征今替我这建议找根据的话,我们只须看一看现在世界上几个像样的国家的做法就够了。譬如美国英国,他们为什么把庚款退回让中国派留学生去呢?德国在没有战败前也设了种种花样的奖学金给外国学生。我们不愿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他们有什么用意。无论如何,我现在这样建议却完全出于诚意,目的只在希望中国同亚洲各国能够互相认识互相了解,文化同外交关系会一天比一天密切起来,再进一步能够团结合作。我们既然都被派定了住在亚洲,我们只有努力去“睦邻”。

为亚洲将来计,为中国将来计,我诚恳地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实行我这建议。

1947年4月4日　北平

我们应该多学习外国语言

对世界上任何国家,尤其是对我们中国,学习外国语言的重要似乎用不着我们再来讨论,这已经是不成问题的了。我想,我们现在恐怕都羡慕五六十年前中国学者的福气。他们当时只须背过四书五经,加上注疏,学着写几篇八股文,运气一到,立刻可以考上举人进士,做起大官来。即便有些特别有天才有本领的,能把四书五经的本文和注疏正背倒背,甚至另外还弄点"杂学",但也总脱不出中国书的范围。他们只须学会一种语言就够了。

但欧美的洋人偏要带了他们的学问挤进来。他们这些学问又真有些不可及的地方,连最顽固的中国文化本位派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优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在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解嘲的口号,用来安慰自己的。现在我们看了,固然有啼笑皆非之感,这种感觉恐怕当时有许多人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这一代的祖父们,其中比较开明的,都热心研究过"洋务",在读四书五经之余也只好尖起舌头来念哀比西的衣。

念的成绩怎样呢?这话很不好说。从那时候到现在,中间隔了五六十年。穿西服的,吃西餐的(以前叫做番菜),的确是一天比一天多了。哀比西的衣当然仍旧念下去。但有的人也就仅只念到哀比西的衣,这些哀比西的衣连在一起写成的书他们看着便有点不顺眼,不大高兴同他们发生什么关系。在大学里的情形比较好一点。在这里,在学习外国语言,尤其是英文方面,已经有了颇为明显的进步。有些大学除了中国语文学系的课本外,多半都用英

文课本。甚至有些教授简直就用英文讲,请来的外国教授当然更不必说了。

这似乎应该很让我们满意。但倘若我们计算一下时间,我们很有理由觉得我们的进步还太慢。五六十年是一段颇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现代。我们想一想,五六十年前有汽车么? 有飞机么? 但现在天空里飞的、街上跑的,却就是这些五六十年前没有的东西。同这一比,我们在学习哀比西的衣方面的进步真未免太小了。而且,倘若我们仔细推究,连以使用英文课本,用英文来讲授自诩的大学里出身的大学生,有几个人能够拿起笔来就写一篇英文论文? 只有在不懂英文的小姐面前,他们的英文才说得起劲,见了外国人就难免要红脸的。

我们倘再看一看我们国家以外别的国家学习外国语言的情形,这些国家学术水准比我们高到不知多少倍,然而人家却仍然在努力学习外国语言,读外国书籍,我们真不得不悲观了。在欧洲许多国家,一个大学生懂五六国文字是颇为平常的事情。比如说在德国的中学里,一个学生除了学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腊文以外,一定要学英文和法文。有不少的学生还在课外请教师学俄文或意大利文。他们进了大学,看外国文参考书绝对不会再有什么困难。倘说他们要念语言学的话,当然还要另外学许多新的语言。比如说,要念斯拉夫语言学,他们至少要学俄文波兰文或捷克文南斯拉夫文,要念比较语言学,学的语言当然更加多了。虽然不一定每一种都能精通,但只就数目说,也就够我们吃惊的了。

在另外几个国度里,比如说丹麦荷兰瑞典挪威,他们的学术水准也非常高,甚至有些地方还胜过那几个大国,但因为国家小、在世界政治上占的地位不重要,他们的语言没能像现在事实上已经成了国际语言的英文德文法文那样流行世界。他们的学者写专门论文的时候,便利用英文德文或法文。有的人用一种两种,也有不

少人能用三种。有些人或者认为这些学者是可有可无的。但其实不然。这些国家虽小,但也产生了不少的世界权威。瑞典中国音韵学专家高本汉就是一个例子。高本汉在中国也不是生疏的名字。他的论文早年用法文写,现在用英文。还有丹麦语言学家Otto Jespersen也是语言学界的权威之一,他能用英德法三种文字写论文。只有这样,他们的论文才能让世界各国的学者都能读到,他们苦心研究的结果才不致因了文字的障碍而被埋没。

回头看我们中国怎样呢?我们的学术水准不但比不了英德法,也比不了瑞典丹麦那些小国。我们学习英文的情形上面已经谈过了。但那还是战前的情形。复员以后大学里的同学据说英文程度不很好,我们这里不谈原因,只谈事实。事实是很多的大学生不但不能看英文参考书,而且连念英文课本都不知费多大力量。这样毕业后再做研究工作就会处处感到困难。再说到德文法文,情形就更惨。现在德文同法文只算作第二第三外国语。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课程,最多也不过能念三年。实际上念到三年的非常少,即便念到,真正不用字典而能看书的更加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形下,外国学者研究的结果我们当然就很难利用了。在另一方面,我们一般的学术水准虽然不太高,但有不少的学者也有时有非常有价值的发现,值得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学者看的。除了很少的学者自己能用外国文写论文以外,用中文写成的论文便都因为文字的问题湮而不彰,这对世界学术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我上面说过,英德法三种语言事实上已经成了现在的国际语言。一直到现在我谈的也就是这三种。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是这三种就够了。另外还有几种语言可以加入到里面来。我现在只谈其中的一种,就是俄文。有些人或者会说,我有点势力眼。看到俄国这次打了胜仗,成了大强国之一,所以我才这样说。而且目前中国以谈俄国为时髦,我现在也不过就是投合这种心理。其实

我并没有这意思。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也不是我现在才有的意见。十几年前我就有过这种意见,而且多少也实行过了。俄国在现在和将来世界政局上的重要,尤其是对我们中国的重要,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的,不管他是不是共产主义的信徒。现在再列举理由说明俄文的重要,真可以说是蛇足了。至于我现在在这里提出俄文,还另外有一个理由。我曾遇到种种不同的专家,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他们都承认俄国在许多学科的研究上有很大的贡献,值得外国学者的注意。并且这不限定革命以后,在沙皇时代已经开始了,虽然还不能同现在比。就我自己研究的这一行说,俄国学者写过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关于梵文和佛学的书,从沙皇时代起一直到现在,这传统没有断过。有名的佛学丛书就是个好例子。谈世界上的蒙文文法和字典就是用俄文写的,倘不会俄文,蒙文几乎是不能研究的。我说了这许多话,用意却很简单,我只是希望中国的青年或非青年在英德法文以外还要注意到俄文,当然最好是有勇气去学,真正学成一个俄文专家,把上海滩上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英雄们赶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去。

我想现在一定有人抗议了。我上面说到,我们连只学一种文字成绩都不十分高明 ,但现在我却一口气介绍了四种,英德法文以外,还加上俄文,这不是闭了眼睛在做梦,我的话都出自清明的理智,我觉得外国学生不比中国学生聪明,在中学里学外国文只是一个教授法、教本和教师的问题,这都是可以解决的。只要这个问题能解决,多学一种外国语言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事情,即便再退一步,我承认我在做梦,梦也有时候可以做的,只要它美丽。

1947年5月6日　北平

送　礼

我们中国究竟是礼义之邦，所以每逢过年过节，或有什么红白喜事，大家就忙着送礼。既然说是“礼”，当然是向对方表示敬意的；譬如说，一个朋友从杭州回来，送给另外一个朋友一只火腿，二斤龙井；知己的还要亲自送了去，免得受礼者还要赏钱；你能说这不是表示亲热么？又如一个朋友要结婚，但没有钱，于是大家凑个份子送了去，谁又能说这是坏事呢？

事情当然是好事情，而且想起来极合乎人情，一点也不复杂；然而实际上却复杂艰深到万分，几乎可以独立成一门学问：送礼学。第一，你先要知道送应节的东西，譬如你过年的时候，提了几瓶子汽水，一床凉席去送人，这不是故意开玩笑吗？还有五月节送月饼，八月节送粽子，最少也让人觉得你是外行。第二，你还要是一个好的心理学家，能观察出对方的心情和爱好来。对方倘若喜欢吸烟，你不妨提了几听三炮台恭恭敬敬送了去，一定可以得到青睐。对方要是喜欢杯中物，你还要知道他是维新派或保守派。前者当然要送法国的白兰地，后者本地产的白干或五加皮也就行了。倘若对方的思想“前进”，你最好订一份《文汇报》送了去，一定不会退回的。

但这还不够，买好了应时应节的东西，对方的爱好也揣摩成熟了，又来了怎样送的问题。除了很知己的以外，多半不是自己去送，这与面子有关系；于是就要派听差，而这个听差又必须是个好的外交家，机警、坚忍、善于说话，还要一付厚脸皮；这样才能不辱

使命。拿了东西去送礼,论理说该到处受欢迎,但实际上却不然。受礼者多半喜欢节外生枝。东西虽然极合心意,却偏不立刻收下。据说这也与面子有关系。听差把礼物送进去,要沉住气在外面等。一会,对方的听差出来了,把送去的礼物又提出来,说:“我们老爷太太谢谢某老爷太太,盛意我们领了,礼物不敢当。”倘若这听差真信了这话,提了东西就回家来,这一定糟,说不定就打破饭碗。但外交家的听差却绝不这样做。他仍然站着不走,请求对方的听差再把礼物提进去。这样往来斗争许久。对方或全收下,或只收下一半,只要与临来时老爷太太的密令不冲突,就可以安然接了赏钱回来了。

上面说的可以说是常态的送礼。可惜(或者也并不可惜)还有变态的。我小的时候,我们街上住着一个穷人,大家都喊他“地方”,有学问的人说,这就等于汉朝的亭长。每逢年节的早上,我们的大门刚一开,就会看到他笑嘻嘻地一手提了一只鸡,一手提了两瓶酒,跨进大门来。鸡咯咯地大吵大嚷,酒瓶上的红签红得眩人眼睛。他嘴里却喊着:“给老爷太太送礼来了。”于是我婶母就立刻拿出几毛钱来交给老妈子送出去。这“地方”接了钱,并不像一般送礼的一样,还要努力斗争,却仍旧提了鸡和瓶子笑嘻嘻地走到另一家去喊去了。这景象我一年至少见三次,后来也就不以为奇了。但有一年的某一个节日的清晨,却见这位地方愁容满面地跨进我们的大门。嘴里不喊“给老爷太太送礼来了”,却拉了我们的老妈子交头接耳说了一大篇,后来终于放声大骂起来。老妈子进去告诉了我婶母,仍然是拿了几毛钱送出来。这“地方”道了声谢,出了大门,老远还听到他的骂声。后来老妈子告诉我,他的鸡是自己养了预备下蛋的,每逢过年过节,就暂且委屈它一下,被缚了双足倒提着陪他出来逛大街。玻璃瓶子里装的只是水,外面红签是向铺子里借用的。“地方”送礼,在我们那里谁都知道他的用意。所以

从来没有收的。他跑过一天,衣袋塞满了钞票才回来,把瓶子里的水倒出来,把鸡放开。它在一整天"陪绑"之余,还忘不了替他下一个蛋。但今年这"地方"倒运。向第一家送礼,就遇到一家才搬来的外省人。他们竟老实不客气地把礼物收下了。这怎能不让这"地方"愤愤呢?他并不是怕瓶子里的凉水给他泄漏真象,心痛的还是那只鸡。

另外一种送礼法也很新奇,虽然是"古已有之"的。我们常在笔记小说里看到,某一个督抚把金子装到坛子里当酱菜送给京里的某一位王公大人。这是古时候的事,但现在也还没有绝迹。我的一位亲戚在一个县衙门里作事,因了同县太爷是朋友,所以地位很重要。在晚上回屋睡觉的时候,常常在棉被下面发见一堆银元或别的值钱的东西。有时候不知道,把这堆银元抖到地上,哗啦一声,让他吃一惊。这都是送来的"礼"。

这样的"礼"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接受的。他一定是个什么官,最少也要是官的下属,能让人生,也能让人死,所以才有人送这许多金子银元来。官都讲究面子,虽然要钱,却不能干脆当面给他。于是就想出了这种种的妙法。我上面已经提到送礼是一门学问,送礼给官长更是这门学问里面最深奥的。须要经过长期的研究简练揣摩,再加上实习,方能得到其中的奥秘。能把钱送到官长手中,又不伤官长的面子,能做到这一步,才算是得其门而入了。也有很少的例外,官长开口向下面要一件东西,居然竟得不到。以前某一个小官藏有一颗古印,他的官长很喜欢,想拿走。他跪在地上叩头说:"除了我的太太和这块古印以外,我没有一件东西不能与大人共享的。"官长也只好一笑置之了。

普通人家送礼没有这样有声有色。但在平庸中有时候也有杰作。有一次我们家把一盒有特别标志的点心当礼物送出去。隔了一年,一个相熟的胖太太到我们家来拜访,又恭而敬之把这盒点心

提给我们,嘴里还告诉我们:这都是小意思,但点心是新买的,可以尝尝。我们当时都忍不住想笑,好歹等这位胖太太走了,我们就动手去打开。盒盖一开,立刻有一股奇怪的臭味从里面透出来。再把纸揭开,点心的形状还是原来的,但上面满是小的飞蛾,一块也不能吃了,只好掷掉。在这一年内,这盒点心不知代表了多少人的盛意,被恭恭敬敬地提着或托着从一家到一家,上面的签和铺子的名字不知换过了多少次,终于又被恭而敬之提回我们家来。“解铃还是系铃人”我们还要把它丢掉。

我虽然不怎样赞成这样送礼,但我觉得这办法还算不坏。因为只要有一家出了钱买了盒点心就会在亲戚朋友中周转不息,一手收进来,再一手送出去,意思表示了,又不用花钱。不过这样还是麻烦,还不如仿效前清御膳房的办法,用木头刻成鸡鱼肉肘,放在托盘里,送来送去,你仍然不妨说;“这鱼肉都是新鲜的。一点小意思,千万请赏脸。”反正都是“彼此彼此,诸维心照不宣。”绝对不会有人来用手敲一敲这木头鱼肉的。这样一来,目的达到了,礼物却不霉坏,岂不是一举两得?在我们这喜欢把最不重要的事情复杂化了的礼义之邦,我这发明一定有许多人欢迎,我预备立刻去注册专利。

1947 年 7 月

论伪造证件

伪造证件的风气不自今日始,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历史我们不必去查了,只说我记得的。十几年前,当我到北平来投考大学的时候,就听说,琉璃厂有什么地方专门印制中学毕业证书。价钱也似乎不太贵。还有几个中学和大学公然出卖毕业证书。据说只要能交一年的学费,就算上了一年学,可以立刻升入二年级。交足两年的学费,就立刻升入三年级。倘把四年级的学费交足了,那就不必到学校里来,马上就毕业了。

这究竟是过去的事情:而且我自己没有看到过,详情有点儿说不上来。但现在怎样呢?我只能引一句老调,就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甚。”

今年夏天我回到十二年没有回去的故乡去,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其中有几个是现任的专科学校或中学校的校长。据他们说,今年投考的新生有很多是拿伪造的证书去的。有一天,有二十个学生去报名;但他们当场就查出十二张假文凭来。这里面并没有什么诀窍,其实很简单。只要照着文凭上所载的,问学生几句,马脚立刻就可以露出来了。譬如一个学生是北平崇实中学毕业的,你问他:崇实中学在北平哪一部分?他立刻瞠目不知所对,因为他根本没来过北平,虽然他在这里毕了业。又如文凭上明明写着校长是张三。但倘若你突然一问:你的校长叫什么名字?他也会红了脸说不出话来,这表示他在家里把这张证书没有念熟。再如你问他是哪一年毕业的,他有时候也会说不上来。还有很多学生拿

了绥远,云南,黑龙江,甚至于新疆中学的毕业证书去报名,而且证书上就写着,是上学期刚毕业的,黑龙江是共军区,他一点都不知道。东北现在在战争中,他也不知道。倘若你问新疆毕业的学生怎样到这里来的,他会说是坐火车。再问绥远毕业的学生为什么到绥远去念书,什么时候到那里去的,他在红脸之余,会说,他回家去问一问他爸爸再回来答复。

我上面虽然举了许多例子,但我并不是说,这伪造证件的风气只限于青年同学。在成年的教员和公务员中间这风气也很普遍。我的许多亲戚,我知道,他们连中学都没有上过,有的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但现在一别十几年,他们有的大学已经毕了业,手里拿着很堂皇的证书。勇气最小的也高中毕业了。古人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我现在又体验到这句话的真实。但这里面也有运气。其中有一位大概运气不大好。当他把大学毕业证书呈上去检验的时候,他的上司竟告诉他,这证书是伪造的;因为他毕业的那一年,那个大学还没有成立。我这位亲戚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面也有这样多的花样。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此处不毕业,自有毕业处。”他只好再到别的大学去毕业了。

还有我一位中学的同学,有一天去找我,希望我能替他谋一个中学教员的位置。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我当然答应他。他立刻给了我一张简历片,上面恭恭整整地写着:北平孔教大学毕业。这使我有点糊涂。孔教大学我当然知道。我每次走过西单,抬头就可以看到陈焕章写的几个大金字,在发着黯淡然而却炫目的光。但我从没听说过孔教大学招过新生,开过课。眼前我的老朋友却就在这个大学里毕了业。我仿佛自己在做梦,又像在听一个传奇的故事,不糊涂又有什么办法呢?

伪造当然并不只限于毕业证书,别的证件同样可以伪造。倘若每件都举出来,不但占篇幅过多,而且我也有点做不到。我现在

只举出一件“应运而生”的伪证件来谈一谈。我们现在抗战是胜利了。政府正在努力做两件事情，一件是“赏善”，一件是“罚恶”。这善恶的分野就看你是不是抗过战，或参加过伪组织，两样都要证件。一要证件，我们中国人就来了他的拿手好戏：伪造。真正抗过战的当然不必发愁，但有时候也还觉得不足。最好能找到被日本宪兵逮捕过坐过监牢的证件，那才够味。倘若再能有受酷刑灌凉水的照片，那就再好没有，很可以放在皮夹里，到处随身带着，预备随时拿出来给人看了。参加过伪组织的也不必发愁。事实上连以前替日本宪兵队当走狗的特务陷害了不知道多少同胞的，现在都摇身一变成了地下工作者。你不信吗？他们有的是证件。

倘若有人要问：这些伪造的证件能行得通吗？那我就可以回答说：不但行得通，而且有时候非这样不行。我没研究过政治，铨叙部里面的情形我不大清楚。据说铨叙有一定的章程和格式。他们要求的是合于这章程和这格式。至于证件的真伪好像他们没大注意。只要格式合了，就可以通过。要求铨叙的人注意的也就是这格式。有时候有真的证件，但不合这格式，他们也只好再伪造合格式的证件了。

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当然很好看，整齐划一，一点也没有缺欠，全国所有的厅长局长都是大学毕业，所有的科员书记都是高中毕业，真是“猗欤盛哉”。倘若魏德迈特使，或别的国的什么特使，再奉命到中国来“调查”，走到铨叙部，一看中国官吏这样的出身，学业这样的整齐充实，我想他们一定大吃一惊，会五体投地地佩服的。中国说不定又成了 X 强之一。而我们中国的大学和中学都可以关门，只剩下琉璃厂几家印制证书的铺子。国家省很多的钱，岂非一举两得？

我并不是道德家，慨叹什么“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这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以前我们都知道中国

人两大敌人是贪污(就是所谓揩油)和马糊。现在我想加上一个第三个,就是作伪,伪造证件就属于这一项。假设我们对中国还没有完全绝望,我们还希望中国能慢慢好起来,那么我们大家就应该注意这风气,应该努力来扑灭这个敌人!

1947年9月

论现行的留学政策

前几天,胡适之先生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教育十年计划,目的想在十年以内替我们中国的学术开辟一条独立的路。据报纸上说,胡先生自己也承认这是一炮。这一炮果然没有虚放。自从这谈话发表了以后,南北各地,许多刊物和报纸都有文章来讨论这问题。有的赞成,有的反对。眼看就要引起一个大规模的论战。昨天一个小报上说,胡先生已经挂了免战牌。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我今天也来讨论这问题,并不是想制造“事件”,再启战端。我只是因为自己有许多话要说,以前虽然也说过几句,但总没有说痛快,现在就利用这机会再来乱说几句。

胡先生谈话的前半是关于留学政策的。他反对政府每年花大量的美金送学生到外国,尤其是到美国,去镀金。这意见我完全赞成。自从去年十一月间汪敬熙先生首先发难攻击自费留学以后,有许多人都来写文章讨论这问题。我自己也在天津大公报上写过一篇短文,响应汪先生。我当时只谈到自费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自费留学生全要不得,官费生全好。自费生也尽有很好很有成绩的,而官费生里面也有不少的纨绔子弟,一点书也不念。不过因为汪先生只谈到自费留学,而官费生究竟还有点限制,所以我就大作其偏锋文章,仿佛我同自费生有什么宿怨,大有同他们不共戴天的意思了。

我现在要谈的是整个的留学政策。不管官费与自费,现行的留学政策都有毛病。假若我们现在还不起来纠正,这样下去,再送

一百年留学生,中国学术也不会独立,永远只是跟着别人跑,而且永远隔着一个很长很长的距离。

现行的留学政策的毛病究竟在什么地方?这真如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处说起。我们先说留学的动机。我想有很多人到外国去,并不是想去念书。他们只是想去混一个资格,回来好做事,就是所谓"镀金"。这实在也难怪,因为中国社会把留学生看得太重了,仿佛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到外国去吃上几天面包牛油,立刻就可以脱皮换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当前的政府要人,大学教授,有几个没有镀过金的呢?难怪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们,想尽种种方法要到外国去了。

因了这样的动机而到外国去的,我们就很可以想象到他们到外国会不会念书。他们一下火车或船,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打听,哪一个学校最容易,哪一个教授最好通融。教授选定了,第一次见面,谈不到三句话,就张嘴要论文题目。论文题目一拿到手,当然毫不迟疑立刻就向这题目进攻。在英美情形或者好一点,因为英文他们在中国都学过,也许(我只说是也许)没有语言文字上的困难。在德国法国就有了问题。在国内学过德文法文的很少,一到了那里,话听不懂,书看不懂,甚至到馆子里去吃饭,到街上去买东西都有困难。但对论文进攻的勇气一点也不减少,自己在下面做的时候,还可以找别人帮忙。倘若教授要请他去讨论,立刻就来了困难。教授说话,他听不懂。他说话,教授听不懂。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究竟高于西洋。有很多的先儒都提倡"不动心"。虽大难当前,此心皆可不动。现在说几句鬼子话听不懂又有什么不得了呢?他仍然能沉住气,脸上的汗毛都不许竖一竖。但洋人教授却受不了了,头上的汗立刻流下来,青筋也一条条地暴露出来,呼吸紧促,心也跳动得厉害了。一位德国教授告诉我,他同一个中国学生谈一次话,他仿佛经一次冲锋,说起来还

有余惊。

让外国教授冲过几次锋以后，论文终于进行起来。这时候需要教授帮忙的地方更多了。于是有许多中国学生就施展出另一套中国人特有的本领：送礼，不客气地说，就是贿赂。当然他们还不敢像在中国一样公然送钱给教授，因为外国教授还没进化到能懂得贪污。今天请教授看戏，明天请教授吃饭，教授太太生日的时候，绝不会忘记用高得荒谬的价钱买花送了去。他们觉得这样也就可以勉强安心了。有些勇气大的，买了照相机之类的贵重东西送了去。教授看了，大惊失色。他们不知道中国学生的用意何在。在惶惑之余，让中国学生再把照相机带走，自己留在家里纳闷。心里说不定又想到那个“中国之谜”。

好容易费尽九牛二虎的力量把论文做完，或请求教授认为是做完，他们就开始预备口试。同时心里已经开始做回国的计划了。好歹口试再及了格，有些人连等候领毕业证书的耐性都没有，立刻就捆起行李来回家。博士头衔终于拿到了。他们又可以利用这头衔再往高处爬，对他们说，这总算是功行圆满了。

请读者不要误会，认为所有的留学生全像我上面说的那样子。我上面只是说了留学生的一种，不过可以说是最普遍的一种。在这一种以外，也有不少的学生真正埋头读书，让外国教授都佩服的。但也有许多学生根本一句书也不念，终日游手好闲，坐咖啡馆，找女朋友，甚至贩卖黑货，上法庭，坐牢狱，专门替中国丢脸。在数量上说，这一类的学生非常多。国内达官贵人的孩子几乎全属于这一类。倘若列一个等级的话，这一类恐怕是最下乘。回头再看这一些专门到外国去考试的学生，就觉得他们也未可厚非了。

但是，无论如何，就连这些“未可厚非”的学生对中国的学术也不会有什么裨益。我们派留学生的目的是要到外国去学在国内学不到的东西。但他们却带了一肚皮在国内大学里学到的一知半解

的学问,到外国去给自己镀金。他们就用了这点学问,七拼八凑,在外国教授全力帮助下,勉强写出一篇论文,立刻就回来了。我不信,他们能学到什么新学问。

据我自己的观察,中国学生的天资最少也可以同外国学生比肩。只要肯用功,他们是不比人家差的。但可惜的是,不肯用功的学生固然不必说了,连肯用功的学生也只肯用到学业结束为止。仿佛证书一拿到手,学问就已经登峰造极,用不着再求进益了。平常我们都认为是形式上的一个学业结束,对很多的中国学生就真成了结束。但对外国想终身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这不过只是一个开始,在没考试前有许多限制,自己不能任意随了自己的兴趣研究。现在这限制没有了。自己可以任意研究一个题目,读一本书。再没有什么东西来束缚限制自己的天才和自己的兴趣了。所以我们观察一个外国学者的经历,虽然有不少的人已经在学生时代露了头脚,完成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但大多数的人都是在考过毕业以后才真正渐渐走上研究的路,终于成了大学者。这条路有时候是很艰苦而悠长的,说不定同时要忍受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压迫。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学者们走这样一条路也没有什么值得惊怪的。

在现行的留学政策下送到外国去的学生顶多也不过走到这条路的开端,向悠悠的前路看一眼,也许根本连看一眼都不知道,就镀满了一身金回来了。回来了以后,觉得已经功成名就,不愿意去做官的十有八九可以做到教授。同他们同学的外国学生这时候才走上那条悠悠的长路,路上有许多困难要克服,要有无比的勤勉,惊人的耐力,才能一步步走上去。说不定十年八年,甚至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一个教授的头衔。倘若这两位同学再有机会会面,我们中国的这一位教授就会发见,以前说不定功课还不如他的这位外国同学,现在真正可以称得起一位学者了;而自己却连以

前学的那一点都有点模糊了。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中国学术的悲剧。

倘若我们看着这悲剧演下去,中国学术永远不能独立。但现行的留学政策就正是支持这悲剧的。有的人会说:我们也可以派留学生出去,让他们在外国一直住到把那条长路走完,最少也可以在外国大学里做到教授,然后才让他们回来。但试问,这能行得通吗?先不必说政府没有这许多钱,送大批留学生在外国住那样长的时间。即便政府能有这样许多钱的话,有几个人肯在外国住这样久呢?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中国现行的留学政策都非要改变不行。我并不是说,只要我们的学生都安安稳稳地住在中国,新的学问就会从天上往他们脑袋里灌输,我们用不着借助外国学术的研究,我们的学术就可以独立了。不但我们中国做不到这一步,连世界上的学术先进国也不能每一科都研究到家而不必向别人学习。他们有时候也要派学生到外国去学习的。我的意思只是说,要靠学生到外国去留学,造就大学教师,替中国学术撑门面,这不是一个永久的办法。

但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呢?我觉得,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请外国有地位的学者到中国来。这当然并不一个新办法,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大学里还有不少的外国教授。但是,我们截止到目前所请的外国教授很少有真正有地位的学者。他们多半都是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在外国找不到饭吃,于是就到中国来做教授。他们唯一的本领就是能说外国话,谈到学问,有的还不如我们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这种人对我们的学术不但没益,而且有害。我常常自己想象,当这些人回国的时候,也许有人问他们在外国的职业,他们当然回答说是教授。我真不知道,他的国人会把我们中国的大学想成什么样子。我一想起来,脸上就发烧。从现在起,我们应该请

在外国真正有地位的学者到中国来任教。他们当然未必全肯到中国来，我们可以仿效苏联请美国工程师的办法，出极高的薪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定不会没有人来的。这样可以有两个好处：第一，他们可以长期留在中国。学生在大学毕了业以后，甚至做了讲师以后，还可以有机会同他们研究。不至于半途而废，演了我上面提到的那种悲剧。第二，有天才的青年不致因为没得到留学的机会而埋没了。我们都知道，照现行的留学政策做下去，只有一小部分家里有钱或运气好的青年才有留学的机会。这些青年未必就是最优秀的。倘有外国大学者到中国来，没有钱的或运气不好的青年都可以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才能了。这对中国的学术是有莫大的裨益的。倘若有时候有些部门某一国研究的特别好，我们仍然可以派学有根柢的学生到那里去观摩。这样，我们一定可以慢慢走上学术独立的路，这是我可以断言的。

以上说的话，我当然不敢说全对。但这些话都是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得来的，自信还不至捕风捉影。为中国学术前途计，我诚恳希望教育最高当局能考量并采纳我这个建议。

1947年9月23日　北京大学

中国人对音译梵字的解释

中国虽然从印度译过来了很多的佛经,但其后梵学失传,了解音译梵字就成了一个极困难的问题,因而出了很多笑话。这种例子多得不胜枚举,我下面只举两个。

梵文字 Paramita,意译是究竟,到彼岸,度无极。音译是波罗蜜多,播啰弭多,缩写为波罗蜜。后来人们不知道这是缩写,遇到《波罗蜜多心经》这名字,就把波罗蜜看成一个字,把多同心经分在一起,但他们也感觉到这个多字有点奇怪,于是大作其文章,来解释这个多字,说多心就不是一个心。从这里推论下去,写成一篇幻想极丰富的解释。虽然言之成理,无奈这个"多"字只是一个音,用来对梵文的 ta。

第二个例子,我想举"南无"这两个字。我先从《坚瓠广集》卷一抄一段前人的解释:

> 《听雨纪谈》:释氏称佛名号,皆冠以"南无"二字。宋叶少蕴云:"夷狄谓拜为膜。《穆天子传》:'膜拜而受'。已有此称。若云:居南方而拜耳。既膜为膜,又因之为南无南摩。"予闻之一老儒云:"佛居西方。西方金也。至南方而无火尅金也。"

这解释有考据,有引证,有幻想,甚至连五行相尅都牵扯上了,似乎应该是很可靠了。但可惜"南无"两个字不是意译,而是音译。梵文原字是 namo 从动词 nam 变来。意思是"敬礼"。与中国的

“膜”字,“南”字没有意义上的关系。

1947年11月3日

语言学与历史学

语言学同历史学虽然都是独立的科学,但有许多地方可以互相帮助。历史学能帮助语言学,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因为要研究一种语言,第一步先要知道说这种语言的民族的历史:这用不着我们再详细去说。至于语言学能帮助历史的研究,甚至有些历史上的问题只有从语言上去解决,似乎还有特别提出来谈一谈的必要。我预备在下面举两个例证。

第一个例证我想举印度欧罗巴民族原居地和以后迁移的情形的问题。这当然都是历史的问题;但提出这问题而又把这问题解决了的却是语言学。要叙述这问题,我们应该先从比较语言学说起。十八世纪末叶,十九世纪初年欧洲学者才开始接触到梵文。不久他们就发现,梵文同希腊文、拉丁文相似的地方非常多。经过细密的研究,他们终于知道了,他们一向认为是有色人种的印度人用的语言,原来同他们自己的古代语言竟是一系,皮肤黑色的印度人原来也同他们是一家。几千年前分了家出走的一个兄弟,现在忽然又回来归了宗。对白种的雅利安人这是多么大的一件喜事。所以欧洲一位大学者说,Dyaus - pitṛ(梵文) = Zeus - pater(希腊文) = Jupiter(拉丁文)。这个公式的发现是十九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他们既然知道了梵文,希腊文,拉丁文和欧洲近代语言原来都是一个来源,于是他们就根据这线索研究下去,终于把所谓原始印度欧罗巴语言拟构出来。这种语言就是后来一切印度欧罗巴语言的祖先。在这语言里有一个舌根音。这舌根音后来不知道为

了什么原因分化起来。在印度语系的东支语言里,它变成摩擦音;在西支语言里,它变成 k kh g gh。譬如说表示“狗”的字在希腊文里是 kuon,在拉丁文里是 Canis,这是西支。在梵文里是 Svan,在立陶宛文里是 Szuo,这是东支。“百”字在拉丁文里是 Centum,在希腊文里是 Hekaton,在 Avesta 里是 Satem,在梵文里是 Sata,在立陶宛文里是 Szimtas,在古保加利亚文里是 Suto,在俄文里是 Sto。学者们平常就用 Centum 这个字来代表西支语言,用 Satem 来代表东支语言。这些语言虽然都是从原始印欧语里演变成的;但却各有各的特点。间或也有两种特别接近的,像古代波斯的 Avesta 和梵文。以上这许多事实都是纯粹由研究语言得来的。倘若把这研究语言得来的结果应用到历史上,我们可以对印欧民族迁移分化的情形得一个清晰的轮廓:现在散布在欧亚两洲的白种人在纪元前几千年的时候原来都是一家。他们定居在旧大陆的某一个地方,人口大概也不会太多。后来也许是因了宗教意见的冲突,也许是因为政治意见的冲突,终于分了家。一支往西走去,几千年来,子孙蕃衍,形成了许多国家。一支往东北或东南走去。在向东南去的路上,他们停留在现在的伊朗地方,共同住了一个期间。大概内部又起了冲突。于是一部分留在原地,一部分却越过高山,冲进了印度,成了现在印度雅利安人的祖先。看了我这简短的叙述,谁也会知道,这事实在世界历史上有多么大的意义;但在世界历史上有这样重大的意义的事实却不是历史学告诉我们的、而是语言学。

我上面说到原始印欧民族曾定居在旧大陆的某一个地方。倘若现在要问,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当然又是一个历史上的重要问题。考古学、史前史,人类学都能帮忙解决这问题;但倘若没有语言学,其他科学都只能给我们一点零碎的知识。只有语言学能把这些零碎的知识贯通起来,给我们一个清晰而具体的答案。所以我们仍然只有先从语言学下手。我们先看一看学者所构拟成

的原始印欧语言里究竟有些什么字，尤其是动物和植物的名词。动物名词有牛、马、羊、狗、猪、熊等；但没有虎、象、狮子、驴、骆驼。植物名词有柳树、桦树、山毛榉等。既然没有虎、象、狮子，可见原始印欧民族还没见到这几种动物；因而也就可以推论到，他们的原居地一定不会是热带。同时又因为原始印欧语里没有表示“海”的字，足见他们住的地方也不近海。没有“骆驼”，可见他们不是住在沙漠里。但从这些字里面，我们仍然不能确定的指出一个地方来。让我们再看看植物名词。在这些字里面，最重要的是“山毛榉”这个字；因为据学者观察和研究，倘若在欧洲北部从德国的大城 königsberg 起向南画一条经过俄国的 Kiew 一直到黑海岸的 Odessa 止，那么只有在这条线的西面才有山毛榉，东面没有。所以原始印欧民族的老家一定是在这条线的西面。把上面这些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印欧民族的原居地大概就在中欧至北欧一带地方，而且还稍稍偏东。有了这语言学告诉我们的知识作基础，然后其他科学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才有所依附，得到的结果才不至茫无边际。所以在研究这个极重要的历史的问题的时候，语言学为主，其他如考古学，人类学都只能帮助语言学。原始印欧民族的原居地的问题是个极大的问题。我上面虽然说了许多，而且得到一个似乎是结论的结果；但这问题并不像我上面说的那样简单，那结果也还不就是结论。将来的发展还有待于学者的努力。不过，将来无论研究到什么程度，那些由语言学观察出来的结果却绝不会被推翻，学者们只能把这结果补充修正，使它更接近真理。

同这问题相连的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语言学提出来而现在还没有解决的。我们上面说过印欧语系有东西两支。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属于西支，在欧亚大陆偏东部的属于东支。这似乎非常自然，一点也没有问题。在十九世纪比较语言学者所知道而加以研究的

许多印欧语系的语言都合于这个区分,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文法现象和地理部位毫不冲突。但二十世纪初年学者们又在中亚发现了几种新语言,吐火罗文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些语言都毫无疑问的属于印欧语系。按地理说,吐火罗文应该属于东支,因为吐火罗文残卷都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但吐火罗文的文法却确实是属于西支的。"百"字在吐火罗文里是 kant,这就足以说明吐火罗文是一个 Centum 语言,为什么在一群印欧民族的东支的民族里会有一个属于西支的民族呢?目前我们还没有方法解答这问题。但我们相信,倘若将来这问题一旦解决了,我们对世界史,尤其是印欧民族迁移的历史,一定有很深的了解。

另外一个问题也同印欧语言有点关联,我们也在这里提出来谈一谈。钢和泰先生曾指出来,中国语言里有几个字似乎同印欧语言有点关系(见北京大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胡适之先生译)。譬如说,"犬"字似乎同希腊文的 Kuon,拉丁文的 Canis 同源。倘若这种例子找多了,我们说不定就可以证明中文同印欧语系同出自一源,也许能把中国人同印欧民族拉成一家。我虽然不敢说,这一定可能;但也不敢说,一定不可能。我只能说,在目前还没法证明。倘若认真想解决这问题,我们只有效法欧洲学者的办法,去研究中国古音,把原始中国语言构拟出来,然后再同原始印欧语言去比较。这当然又是一个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也只有先走一条路,就是语言学的路。

以上讨论第一个例证。第二例证我想举古代西域人种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住在中亚和中国新疆一带的是突厥种。但在突厥人到这里以前是什么人在这里住呢?我们古代的历史书虽然有一些对西域特别注意的,特别专写一章论西域的事情;但从那些记载里,我们很难窥测到这些所谓胡人都究竟属于哪个种族。对这些胡人的相貌,《魏书·西域传》于阗国条算是给了一个比较具

体的描写："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但是只是"深目高鼻"四个字也只能告诉我们，他们同"华夏"人不一样。白种人固然是"深目高鼻"，突厥人又何尝不这样呢？我们仍然不能确定他们的种族。自从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初年，中亚古器物文献出土以后，我们研究的凭藉增加了。我们从壁画上可以看到这些"胡"人的面貌；但给我们的印象仍然只是"深目高鼻"四个字。连从地里掘出来的头盖骨也只能告诉我们，在突厥民族没来到以前，中亚民族一定是属于印欧民族的白人。我们仍然不能知道，究竟是白人的哪一种。在这里能帮助我们解答这问题的又只有语言学。

在中亚新发现的三种古代印欧语系的语言中，吐火罗文是独立的一支。关于说这种话的民族的归属问题，学者们的意见还非常不一致，我们这里不能详细讨论。其余的两种，于阗文和窣利文都已经学者研究认为是属于印欧语系伊兰语系的。所以说这种话的人们大概也就属于伊兰氏族。现在我们再回头看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在古代西域突厥人未到以前究竟住的是哪一种人？我们就可以回答说：最少有一大部分是伊兰民族。

以上讨论第二个例证，可举的例证当然还非常多；但只是这两个也就足够能表示出来，语言学是怎样能帮助历史的研究了。我上面说的有一些只是老生常谈；但我为什么特别提出语言学同历史学来讨论呢？因为我觉得，有许多科学都能作史学的辅助科学；但语言学似乎还没被人特别重视过。我特别提出来，只是想唤起大家的注意。此外我还觉得，有很多纯粹的语言学者把研究的范围死死的限制到语言方面，不向外走一步。这我也认为很可惜。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语言学研究的结论都可以应用到历史上去；但最少有些是可以的，而且把语言学的结论应用到历史上获得的结果多半都非常可靠。为了让语言学家注意起见，我写了这

篇短文。

1947年11月29日　北京大学

论聘请外国教授

中国学术落后,大学师资尤其感到缺乏;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不聘请外国教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当然不能反对;但是却有条件。

我先说一点我自己的经验。十几年前我在北平的一个国立大学里念外国语文。这个大学的外国语文系是非常著名的,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主要原因就是外国教授多,而且据说又都是有地位的学者。我为这盛名所震惊,怀了一颗虔敬的心,走进了学校,走进了课堂。最初我当然不敢说什么;但渐渐地我却怀疑起来。这些教授们多半是英美人,英文当然会说;但也就只是会说英文,说到他们有什么专门研究,那就很成问题了。一位美国女教授是斯丹佛大学的硕士,教我们英文文字学。第一学期,她拿一位丹麦语言学家论普通语言学的书当教本。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著作;但她愈讲我们愈糊涂。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很难懂的格林定律当时却没有一个人能明白。原因就是这位女教授除了英文以外,古典语言似乎一点都不会,恐怕连她自己也愈讲愈坠入五里雾中了。第二学期换了课本,她要讲她的据说是最拿手的乔叟。第一堂上去,高声背诵了乔叟的杰作 Canterbury Tales 的第一段。我们都大惊失色。幸而我们不久就发现了她的全部的本领就在背诵乔叟的杰作的第一段,我们的"色"才不至继续"失"下去,否则"失"出病来也未可知。我们看,她似乎连中古英文法也不甚了然;所以不久我们就读起翻成近代英语的乔叟来。一年读完,我们算是学了英文文字

学。

另一位教授,也是美国人,他教我们欧洲文学史,用的是他自己著的一部五六百页厚的精装的巨著当教本。无论谁看到这部大书,也会不由的对这位教授起尊敬心;但倘若一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部书除了厚大以外没有别的任何长处,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肯出钱替他印这部书的。里面对世界上的许多名著的内容都有一撮要的说明;倘若仔细推敲起来,这些说明却不可靠,几乎都有问题。这些名著的原文他当然没读到过,连译本他似乎也没读了几种,他只是直抄别人的书,而且抄得极荒疏,极不小心。这证明他连抄的耐性都没有;然而他就是我们国立大学的名教授。

我在这里不能替每一个我的外国老师都作一个介绍。总括一句,除了很少数的例外外,他们都差不多,不管他们是哪一国人。在他们本国,他们都在大学毕过业。我不知道他们在本国究竟能够找到什么职业;但一定不会是大学教授,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他们有的或者可以在大学里作助教,有的或者可以作中学教员,有的只配在商店里作一个店员,在机关里作小公务员。然而这些称呼都不响亮,于是他们就来到中国,在我们的大学里成了名教授。

倘若他们老老实实的作教授的话,作上几年,说不定也可以作出点成绩来。倘若认真读书,也一定会有所得的;但有些人来中国的目的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的完全为了好奇心,想来看一看这神秘的国度。结果学了一脸假笑,挤鼻子挤眼,打拱作揖,自命为中国通,能说三句半中国话,回国去了。不久就写成了几厚册论中国的书,于是出了名,发了财,皆大欢喜。有的在本国研究汉学,找到一个机会到中国来想继续研究。在中国大学里担任的课程与他们自己研究的毫无关系。他们可以教历史,教哲学,教希腊文,拉丁文,教古典文学;德国人教法文,美国人教德文,他们简直是万

能。同时还忘不了自己的工作,找自己的学生或化钱雇助理帮自己翻译中国的古书,诗词歌赋全行。译的时候尽可能找别人;但书籍出版的时候却只剩下自己的名字。于是也出了名,发了财,说不定让本国的大学请回国去作汉学教授,仍然是皆大欢喜。

从这样的教授那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我们一想就可以知道。但这不过是在中国误中国的青年学生而已,还不足以尽他们的任务。他们一回国,当然就会有人问他们在中国的职业,他们也当然就会回答说作教授。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定很惊奇,像他这样的人居然在中国能够作到教授,中国的大学教育也就可以想见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们脑筋里都有了先入之见,即便再想把中国大学的真象告诉他们,也没有用了。我说中国大学的真像,意思是说,中国大学教授的本质固然不能同其他学术先进国家比,但也不像他们想的那样坏。我们不否认,有很多中国教授同这些外国教授差不多;但也有些真正有地位的学者,他们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大学里都能作到教授而无愧。把这些学者同这些外国教授拉在一起,相提并论,简直是不伦不类。要想避免这不伦不类的滑稽剧,我们只有让够作大学助教的外国人留在他们本国作大学助教,够作中学教员的留在他们本国作中学教员,够作店员小公务员的留在他们本国作店员小公务员。倘若我们非聘请外国教授不行的话,我们要聘请的是另外一些人。

这些人我们也聘请过,可惜数目很少,只能算作我上面说到的少数的例外。譬如北京大学以前聘请的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就是其中的一个。葛先生是世界上有名的学者。在中国住了半生,弟子遍中国。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能有这样的成绩,我们要归功葛先生。这样的外国教授我们才需要,才真值得我们聘请。有葛先生这样的外国教授,是我们中国大学的光荣。即便有许多学者不能像葛先生一样在中国住那样许多年;但这也没有关系。杜威

罗素在中国只是旅行了一趟;但他们在几个讲演里留给中国的影响仍然很大,是那些挤鼻子挤眼打拱作揖的中国通和那些让别人做工作自己来出名的所谓汉学家万万想不到的。

除了这些真正有地位的学者以外,为了中国学生学习外国语言起见,我们也可以聘请外国人来教。但我们绝不应该像现在这样随便一个外国的张三李四都给他教授的名衔。我们并不是没有前例可援。我们可以学英国德国的办法,只要教实用语言的外国人一律给他教员的名义。只有真正有地位的学者,最少在外国也能作到正教授的,我们才给他教授的名义。这就是我在开头说到的条件。

1948年1月30日　北京大学

论正义

我先说一件小事情：

我到德国以后，不久就定居在一个小城里，住在一座临街的三层楼上。街上平常很寂静，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一排树寂寞的站在那里。但有一天的下午，下面街上却有了骚动。我从窗子里往下一看，原来是两个孩子在打架。一个大约有十四五岁，另外一个顶多也不过八九岁，两个孩子平立着，小孩子的头只达到大孩子的胸部。无论谁也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孩子真是势力悬殊，不是对手。果然刚一交手，小孩子已经被打倒在地上，大孩子就骑在他身上，前面是一团散乱的金发，背后是两只舞动着的穿了短裤的腿，大孩子的身躯仿佛一座山似的镇在中间。清脆的手掌打到脸上的声音就拂过繁茂的树枝飘上楼来。

几分钟后，大孩子似乎打得疲倦了，就站了起来，小孩子也随着站起来。大孩子忽然放声大笑，这当然是胜利的笑声。但小孩子也不甘示弱，他也大笑起来，笑声超过了大孩子。

这似乎又伤了大孩子的自尊心，跳上去，一把抓住小孩子的金发，把他按在地上，自己又骑他身上。面前仍然又是一团散乱的金发，背后是两只舞动的腿。清脆的手掌打到脸上的声音又拂过繁茂的树枝飘上楼来。

这时观众愈来愈多，大半都是大人，有的把自行车放在路边也来观战，战场四周围满了人。但却没有一个人来劝解。等大孩子第二次站起来再放声大笑的时候，小孩子虽然还勉强奉陪；但眼睛

里却已经充满了泪。他仿佛是一只遇到狼的小羊，用哀求的目光看周围的人；但看到的却是一张张含有轻蔑讥讽的脸。他知道从他们那里绝对得不到援助了。抬头猛然看到一辆自行车上有打气的铁管，他跑过去，把铁管抡在手里，预备回来再战。但在这时候却有见义勇为的人们出来干涉了。他们从他手里把铁管夺走，把他申斥了一顿，说他没有勇气，大孩子手里没有武器，他也不许用。结果他又被大孩子按在地上。

我开头就注意到住在对面的一位胖太太在用水擦窗子上的玻璃。大战剧烈的时候，我就把她忘记了。其间她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毫没看到。等小孩子第三次被按到地上，我正在注视着抓在大孩子手里的小孩子的散乱的金发和在大孩子背后舞动着的双腿，蓦地有一条白光从对面窗子里流出来，我连吃惊都没来得及，再一看，两个孩子身上已经满了水，观众也有的沾了光。大孩子立刻就起来，抖掉身上的水，小孩子也跟着爬起来，用手不停的摸头，想把水挤出来。大孩子笑了两声，小孩子也放声狂笑。观众也都大笑着，走散了。

我开头就说到这是一件小事情，但我十几年来多少大事情都忘记了，却偏不能忘记这小事情，而且有时候还从这小事情想了开去，想到许多国家大事。日本占领东北的时候，我正在北平的一个大学里做学生。当时政府对日本一点办法都没有，尽管学生怎样请愿，怎样卧轨绝食，政府却只能搪塞。无论嘴上说的多强硬，事实上却把一切希望都放在国际联盟上，梦想欧美强国能挺身出来主持“正义”。我当时虽然对政府的举措一点都不满意；但我也很天真的相信世界上有“正义”这一种东西，而且是可以由人来主持的。我其实并没有思索，究意什么是“正义”，我只是直觉的觉得这东西很是具体，一点也不抽象神秘。这东西既然有，有人来主持也自然是应当的。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以强国欺侮弱国，我们

虽然丢了几省的地方,但有谁会说“正义”不是在我们这边呢?当然会有人替我们出来说话了。

但我很失望,我们的政府也同样失望。我当然很愤慨,觉得欧美列强太不够朋友,明知道“正义”是在我们这边,却只顾打算自己的利害,不来帮忙。我想我们的政府当道诸公也大概有同样的想法,而且一直到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他们还似乎没有改变想法,他们对所谓“正义”还没有失掉信心。虽然屡次希望别人出来主持“正义”而碰了钉子,他们还仍然在那里做梦,梦到在虚无飘渺的神山那里有那么一件东西叫做“正义”。最近大连问题就是个好例子。

对政府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毅力,我非常佩服。但我更佩服的是政府诸公的固执。我自己现在却似乎比以前聪明点了,我现在已经确切知道了,世界上,除了在中国人的心里以外,并没有“正义”这一种东西,我仿佛学佛的人蓦地悟到最高的智慧,心里的快乐没有法子形容。让我得到这样一个奇迹似的“顿悟”的,就是上面说的那一件小事情。

那一件小事情虽然发生在德国,但从那里抽绎出来的教训却对欧美各国都适用。说明白点就是,欧美各国所崇拜的都是强者,他们只对强者有同情,物质方面的强同精神方面的强都一样,而且他们也不管这“强”是怎样造成的。譬如上面说到的那两个孩子,大孩子明明比小孩子大很多岁,身体也高得多,力量当然也强。相形之下,小孩子当然是弱小者,而且对这弱小他自己一点都不能负责任;但德国人却不管这许多。只要大孩子能把小孩子打倒,在他们眼里,大孩子就成了英雄。他们能容许一个大孩子打一个小孩子;但却不容许小孩子利用武器,这是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倘用武器就不算好汉?或者认为这样就不 fairplay?这一点我还不十分清楚。

我不是哲学家,但我却想这样谈一个有点近于哲学的问题,我想把上面说的话引申一下,来谈一谈欧洲文明的特点。据我看欧洲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力的崇拜,身体的力和智慧的力都在内。这当然不自今日始,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这个倾向,所以他们要征服自然,要到各处去探险,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在中世纪的时候,一个法官判决一个罪犯,倘若罪犯不服,他不必像现在这样麻烦,要请律师上诉,他只要求同法官决斗,倘若他胜了,一切判决就都失掉了效用。现在罪犯虽然不允许同法官决斗了;但决斗的风气仍然流行在民间。一提到决斗,他们千余年来制定的很完整的法律就再没有说话的权利,代替法律的是手枪利剑。另外还可以从一件小事情上看出这种倾向。在德国骂人,倘若应用我们的"国骂",即便是从妈开始一直骂到三十六代的祖宗,他们也只摇摇头,一点不了解。倘若骂他们是猪、是狗,他们也许会红脸。但倘若骂他们是懦夫(Feigling),他们立刻就会跳起来同你拼命。可见他们认为没有勇气,没有力量是最可耻的事情。反过来说,无论谁,只要有勇气,有力量,他们就崇拜,根本不问这勇气这力量用得是不是合理。谁有力量,"正义"就在谁那里。力量就等于"正义"。

我以前每次读俄国历史,总有那一个问题:为什么那几个比较软弱而温和的皇帝都给人民杀掉,而那几个刚猛暴戾而残酷的皇帝,虽然当时人民怕他们,或者甚至恨他们,然而时代一过就成了人民崇拜的对象?最好的例子就是伊凡四世。他当时残暴无道,拿杀人当儿戏,是一个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都不正常的人。所以人民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做"可怕的伊凡"。可见当时人民对他的感情并不怎样好。但时间一久,这坏感情全变了,民间产生了许多歌来歌咏甚至赞美这"可怕的伊凡"。在这些歌里,他已经不是"可怕的",而是为人民所爱戴的人物了。这情形并不限于俄国,在别的

地方也可以遇到。譬如希特勒，在他生前固然为人民所爱戴拥护，当他把整个的德国带向毁灭，自己也毁灭了以后，成千万的人没有房子住，没有东西吃；几百年以来宏伟的建筑都烧成了断瓦颓垣；一切文化精华都荡然无存；论理德国人应该怎样恨他，但事实却正相反，我简直没有遇到多少真正恨他的人，这不是有点不可解么？但倘若我们从上面说到的观点来看，就会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了，可怕的伊凡更可怕的希特勒都是强者，都有力量，力量就等于"正义"。

回来再看我们中国，就立刻可以看出来，我们对"正义"的看法同欧洲人不大相同。我虽然在任何书里还没有找到关于"正义"的定义：但一般人却对"正义"都有一个不成文法的共同看法，只要有正义感的人绝不许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打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在小说里我们常看到一个豪杰或剑客走遍天下，专打抱不平，替弱者帮忙。虽然一般人未必都能做到这一步；但却没有人不崇拜这样的英雄。中国人因为世故太深，所以弄到"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有时候不敢公然出来替一个弱者说话；但他们心里却仍然给弱者表同情。这就是他们的正义感。

这正义感当然是好的；但可惜时代变了，我们被拖到现代的以白人为中心的世界舞台上去，又适逢我们自己泄气，处处受人欺侮。我们自己承认是弱者，希望强者能主持"正义"来帮我们的忙。却没有注意，我们心里的"正义"同别人的"正义"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自己虽然觉得"正义"就在我们这里；但在别人眼里，我们却只是可怜的丑角，低能儿。欧美人之所以不帮助我们，并不像我们普通想到的，这是他们的国策。事实上他们看了我们这种委委琐琐不争气的样子，从心里感到厌恶。一个敢打欧美人耳光的中国人在欧美心目中的地位比一个只会向他们谄笑鞠躬的高等华人高得多。只有这种人他们才从心里佩服。可惜我们中国人很少有勇气

打一个外国人的耳光,只会谄笑鞠躬,虽然心被填满了“正义”,也一点用都没有,仍然是左碰一个钉子,右碰一个钉子,一直碰到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做梦,梦到在虚无飘渺的神山那里有那么一件东西叫做“正义”。

我希望我们赶快从这梦里走出来。

1948年4月16日北京大学

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

国民大会还在进行着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许多离奇古怪的笑剧。里面原因当然很多，而且表演的人也不限于民社党和青年党；但最精彩的几幕，我们却不能不归功于民青两党。我不懂政治学，不知道在外国召开像国民大会这一类会议的时候是否也可以由一党或几党来分配代表的名额；但在中国，这次开国民大会的时候却确实是这样。倘若分配的技巧稍微高明一点的话，说不定还可以掩遮天下人的耳目；但这次分配的技巧拙劣到万分，叫人不敢领教。于是跟着就来了一大串精彩的表演：抬棺进会场、国大代表坐在棺上让美国新闻记者照像，代表白天绝食夜里吃水果饼干请医生注射葡萄糖、遗书要跳江自杀却溜之乎也，等等。同时民社党和青年党也因为没有得到事前分配到的位子，屡屡向国民党抗议，扬言要退出政府，自居所谓在野党，做出种种丑态，表演了种种嘴脸。于是闹得满国风雨，给在战火和饥饿中挣扎着的人民添了不少的笑(还是哭?)料；好奇的美国新闻记者也得到了许多比人猿泰山和其他充满了大腿和手枪的影片更精采更惊心动魄的镜头。我想他们一定会伸出大拇指，高呼三声："顶好"，然后满载而归，让美国人在试验原子弹和赚钱之余大笑几次。大笑以后，说不定脾气变好，把骂俄国的次数和激烈的程度减低一下，然后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但我们的民青两党的人士真不愧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在许多抗议、交涉、谈判、声明之后，虽然依然没能全盘如意；但在大会

里的位子总算多得到了几个。他们于是就适可而止,率领了三军,昂然走进国民大会会场,为国宣劳,“代表”我们老百姓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他们甚至为了国家连嫌疑都不避了。自己的亲戚,亲戚的亲戚都成了国大代表。青年党某要人的两位女公子也都被“选”为国大代表。于是新闻记者又有了好材料。我们常从报纸上的所谓“国大花絮”里读到“两位姐妹花”的消息,说她们怎样坐在一起低声谈家常,织毛衣。我想无论谁读到这消息都会不自觉的脸上浮起一片微笑,心情立刻轻松下来。让我们忘记了就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会场里代表我们民意的国大代表们正“代表”我们演着全武行,嘘声四起,掌鸣如雷,主席也许正在台上流着汗。她们仿佛是一片战场里的两朵小花,静静的寂寞的开在雷鸣的金鼓声中,挥动着的干戈丛里。让战士们和非战士们看了,紧张的心情立刻就平静了下来,仿佛做一个甜美的梦。这赐与真太大了。我们还能不衷心感谢这位青年党的要人吗?

但民青两党让我们脸上能浮起微笑的也就只是这“一对姐妹花”,其余的举动只能引起我们的厌恶。我一想到这两党同国民党交涉、谈判、讨价、还价的情形,浑身就有说不出的难过。他们同国民党争府委,争部长,争国大代表,争立法委员,争地方政府官吏,只要有官可做,有利可图,无一而不争。每次都是义形于色,非常坚决;但结果却是,只要国民党稍稍让一点,他们立刻就接受条件,宣言同国民党“合作”。这使我想到——请原谅我这个联想——一位大老爷的两位姨太太。当她们对老爷有所要求的时候,譬如想要一个钻石戒指或一身花衣服,她们就撒娇撒痴,扭屁股,抹眼泪,甚至寻死觅活,投河上吊。老爷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不愿意把这事情声张出去,于是一面恫吓,一面欺哄,终于让她的目的多多少少达到一点。她们也就嫣然破涕一笑,又到大老爷怀里去了。

这样的情况,我们看了只能作呕,而且表演的次数愈多,表演

得愈精采入倒神，催呕的程度也就愈大。然而最近我看报纸，立法委员位子分配又成了问题，民社党和青年党已经声明不参加立法院，他们又准备表演那一幕催呕的丑剧了。同以前一样，这次也是义形于色，非常坚决，将来的演变虽然还不可知；但我不妨在这里学一学星象家表演一下我的预言的天才。我敢预言：民社党和青年党将来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大老爷的怀里。

民社党和青年党也许有他们自己的苦衷。国民党并不见得怎样慷慨大方。他们事前答应的条件也许事后并不怎样高兴去履行。但民青两党一定也不乏明智之士，他们一定也可以看到，国民党之所以请他们参加政府完全是想利用他们作配角来演一出喜剧。国民党弄到今天这样地步，眼看众叛亲离、烽火遍地，一不小心，就会有全盘垮台的危险。唯一的救星就是太平洋对岸的山姆大叔；但山姆大叔偏偏不了解别人的苦处，不体谅别人的困难，硬要国民党民主，不然就不给钱。“民主”这一幕剧当然不是国民党一党可以表演得来的，别的党又没有意思参加。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民社党和青年党毛遂自荐，正如了国民党的意。配角既然找到了，国民党就毫不迟疑的以导演和主角的身分出场演起来。他们心目中的观众虽然并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而是隔洋的山姆大叔；但我们也沾了光，我们连续看到许多精采的演出，大饱眼福，比上海戏院里演的X本火烧红莲寺还惊心动魄。

我从来不敢看不起配角。倘若民社党和青年党老老实实的演这配角的话，也许还能博得一片掌声；但我总有一个感觉，觉得他们现在已经轶出了他们配角的范围，演起丑角来了。倘若他们老老实实的演丑角，也还可以催人发笑，大有益于卫生，我也不敢看不起；但当一个丑角浑身严肃板起面孔来表演的时候，就不但不能让人发笑，只能让人作呕了。

这样的丑角我们小民已经看够了。我们不了解民社党和青年

党究竟算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虽然也有很多年的历史;但这些历史回想起来只能增加人们的卑视。左倒右倒,今天同这个军阀合作,明天同那个军阀合作,这历史能算光荣吗?他们大概也有党员;但数目恐怕只有天知道,请原谅我没有见过世面,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民社党或青年党员,我只在报纸上读到过。多少年来活动的只是那几个要人。他们活动的目的也并不是争取党员,而是猎获高官。官到了手,然后再像钓鱼似的用官位来引诱别人入党。说到党纲,他们虽然也有;但民社党的党纲空疏不得要领,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做些什么,而且似乎是"发达"了以后赶做成的。青年党的党纲同他们的"党格"一样,令人哭笑不得,或者啼笑全非。他们最有名的两句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二十年前,当我还在中学的时候,我已经听到这口号了。他们当时所谓"国贼"当然实实在在的指的某一个人,他们所谓"强权"也实实在在的指的某一个国家。但到了现在,多少年以后了,中国同世界的政局都有过惊人的变动,变动得几乎换了一个新中国,换了一个新世界;但青年党却"以不变应万变",他们的口号仍然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我们在糊涂之余,禁不住要问:究竟谁是国贼,谁是强权?难道他们现在所谓的国贼还是二十年前的国贼,现在他们所谓的强权还是二十年前的强权吗?这事实上恐怕不可能。既然不可能,那就表示,他们所说的"国贼"和"强权"可以随时变换,今天是甲,明天是乙。仿佛演代数一样,我们可以用XY来代替"国贼"和"强权"。XY所代表的虽不同;一个"国贼"和一个"强权"总须随时都存在才行,不然我们的青年党就无从"除"起,也无从"抗"起,让这两句有名的口号落了空,岂不太煞风景吗?我想他们每个人都希望,或者假定,中国永远有一个"国贼",永远有一个"强权"。他们的用心虽苦,但我却替我们中国担忧起来。试问一个永远有一个国贼和一个强权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

这样的政纲,倘若青年党员自己想一想的话,恐怕也会觉得滑稽。但连这滑稽的政纲他们也不宣传了。民社党根本什么都没有,无从宣传起。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做上了官,恐怕他们自己觉得已经没有再宣传党纲的必要。反正没有党员依然可以成党,只要有个党就会有人来垂青,来赏识,来利用。只要有人肯利用,就不愁没有官做,不愁没有肥分。他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向国民党大老爷撒娇撒痴,争府委,争部长,争国大代表,争立法委员,争地方政府官吏。官争到手,就把自己的亲戚,亲戚的亲戚,亲戚的亲戚的亲戚一齐开上去,替新闻记者制造更多更精采的"花絮"。他们甘心作配角,作丑角演这悲剧性的喜剧(tragicomedy)给山姆大叔瞧。他们没有想到,也根本不愿意去想,山姆大叔现在已经有点看穿了这出戏的后台,有点不大感兴趣了。

我对民社党和青年党从来没怀过什么希望。倘若他们自己对自己还怀着希望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走出国民政府、立法院和其他一切大小衙门,走向民间去。

1948年5月9日写于北京大学,
外面正有日蚀,
太阳被罗睺吃进去了一半,
天地变色。

可怕的隔膜

中国现在的大学教育有许多要改善的地方,这与大学有关的人们差不多都知道,而且专家们也都指出来过了。我在这里不能,而且也不敢来讨论这问题。我只想找出一点来谈一谈,就是同学与教员间的关系。我是一个外行人,说的当然也就是外行人的话;但这些话都是由我亲身观察得来的,刍荛之议,也许可以供专家们的参考。

我觉得,现在在大学里,同学与教员很多只是职业上的关系。“职业关系”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恐怕不大容易了解。我的意思是,教员的“职业”是教书,同学的“职业”是念书(我在这里把“职业”两个字用到同学身上,与报纸上常见到的那个不通又含混的名词“职业学生”无关),因了“职业”的关系,同学与教员才聚在一起,也就藉了“职业”,他们的关系才能维持下去。换句话说,倘若一方面这“职业”终止了,关系也就随着断绝。仿佛是一个大百货商店的店伙和主顾,店伙卖的是货,主顾买的也是货;只有在交易的时候,他们才有关系,一旦交易完毕,各走各的路。

但实际上知识却同货物绝不相同,它并不像西红柿土豆之类的东西,只要主顾付了钱,就可以从店伙手里拿到,用袋子装走,回家炒着吃煮着吃。知识是人类心灵经过了学习而获得的东西,其中含了无数的甘苦。学者不但要知道学习获得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得到这样结果的过程。其中有很多的曲折,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所以,只有授者与受者能常常接触,要

把彼此间的隔膜完全打破,要破除一切的官样形式,要彼此都能坦白的说出自己的真正意见,知识才能传授,彼此才能都得到好处。有时候在无意间从心里说出来的极简单的话比在讲堂上的长篇大论还要能给学者以启示;但这样简单而富有启示性的话只有在打破一切形式的束缚的时候才能说得出来。

但在现在的大学里除了很少数的例外以外,同学与教员间的隔膜能说已经都打破了么?我们敢坦白的彼此说出想要说的话么?我只觉得,现在同学与教员间的隔膜愈来愈大,彼此都没了信任。有些事情,因了年龄的差别,同学与教员的看法不能一样,这是不能勉强的事情。但也有些事情,看法本来可以一样;不过中间让一座墙隔起来,两方面不但不想把这座墙推倒,反而努力加高它,结果就演变成现在这情形。在这样的情形下,知识成了石头一般的死东西。教员怎样说,学生怎样记,心里同意的时候,不能再进一步多得到一点;心里不同意的时候,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教员,让教员知道自己不同意的地方究竟是在哪里。这些不同意抑压在心里,愈积愈多,有时候也难免要发泄一下,于是又便宜了民主墙。

我并没有责备同学的意思,我知道,一位同学是否敢向教员说他心里想说的话主要关键还在教员手里。我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一位现在"发达"了成为南京二等要人的先生教我们英文。有一次,一位同班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大声做狮子吼:"回去查字典去!"全班在大惊之余,面面相觑,以后再没有人问他问题。他的宝座于是大稳,但同学同他之间的墙也随着高了起来。

我一直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位先生是什么心理。我想他大概觉得同学根本不配问他问题,不配同他讨论,所以他就用禅宗大师的办法断喝一声,把这"乱""戡"了下去,以杜后患。于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他也得以从容从教授爬到要人。

我不否认,大体上说起来,教员比同学知道的总多一点,因为他们对一门学问最少也用过很多年的功了。但学问之道无穷,愈是有学问的才愈觉得自己的学问不足,只有疯狂荒谬的人总会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具备了一切学问。即便研究一个极窄狭的问题,而且已经费了多年的时间,我们也不敢说已经知道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有时候也难免有疏漏的地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有时候反而能看到一位老学者看不到的地方,因为他对这门学问还没有那样许多成见,那样许多“蔽”。说到观点,我们更不能证明旧的一定就比新的好;换句话说,同学们的观点也可以给教员们许多参考和反省的机会。

那么我们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非要打破这隔膜不行。要想打破这隔膜当然两方面都要努力:教员应该把同学看成朋友,同学也应该把教员看成朋友,我们要忘掉自己的年纪;我们不说,一个是在“教”,一个是在“学”。我们说,大家在共同“学”,大家共同努力探寻真理。彼此心里有什么话,要立刻当面说出来。说对了,对方可以改;说不对,自己也可以反省一下。这样的话,教员才可以在自然流露中说出他的给同学很多启示的心得。同学也可以把他用年青灵动的眼光看到的东西告诉教员。只有这样,学习才是一种快乐,年长的和年幼的在一团和谐的空气里共同学习。

希腊哲人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我希望现在中国为人“师”的有接受同学的批评和意见的雅量,同学有向教员坦白说话的勇气。

1948年8月8日

论所谓大一共同必修科目

现在大学里有所谓大一共同必修科目,文理法农工医六个学院都有。教育部规定这些科目的时候,当然也请教过许多专家,用意也不能说不好;但我始终觉得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我自己是学文科的,所以我现在只谈文学院的科目。我自己也知道,我说的也或者不过只是一个人的偏见,但偏见也有供专家参考的价值,所以就写了出来。

文学院的大一共同必修科目共有下列几种:

国文	中国通史	
外国文	西洋通史	以上两种选习一种
哲学概论	逻辑	以上两种选习一种
普通数学	普通物理学	
普通化学	普通生物学	
普通地质学	普通心理学	以上六种选习一种
法学概论	政治学	
经济学	社会学	以上四种选习一种

在上面列的这许多科目里,我觉得只有几种大学一年级还有学的必要,譬如外国文是治学的重要工具,逻辑也许对思考和方法方面有点帮助,社会科学在中学里多半没有学过,这些在文学院里都不妨学学。但其余的科目我实在想不出一个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为什么还要“必修”。

我们先说国文。现在大一国文的选本,花样尽管怎样翻新,内

容尽管怎样不同;但材料同中学课本不会又多么大的差异,反正不过是几篇文言,加上几篇白话。实在用不着再让学生牺牲一年的时间来念也许已经念过几遍的文章。要说是增进同学的国文程度吗?那么,在六年小学六年中学之余,一个学生的国文程度似乎应该已经有了点根基;倘若还有同学在十二年以内没有把国文念好,这位同学几乎可以说是已经不可救药,想在大学一年里补起来也绝不可能了。

说到历史,我更觉得滑稽。现在我不知道中小学里的课程已经变到什么程度。我在高小的时候,念过一遍中国历史,到初中又念了一遍,到高中又念了一遍,同时还念了西洋通史。倘若想对中外历史得到一个概念的话,我想这三遍也就够了。即便大学教员比中学教员讲得或者不同一点;但也没有再念一遍的必要。我并不是否认历史的重要,对文学院的同学说,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无论研究什么题目,总免不了同历史发生关系,对这个题目的历史背景总要先弄清楚;但在这里所需要的历史知识多半是很专门的,并不是普通历史课堂上可以学到的。在这时候,能帮助同学解决问题的是史学系比较专门的课程,所谓"中国通史"或"西洋通史"并没有多少用处。

我们现在再谈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一共有六种;这六种内,除了数学对研究数理逻辑有用处外,其余的我实在看不出对一位文学院的同学有什么用处。倘若说要获得一点自然科学的常识,那么在中学里念过的也就够了。倘若说要得一点专门的知识,我觉得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举个例子说,对一个专门研究阿拉伯文或梵文的学者动物学和地质学有什么帮助呢?不懂果蝇遗传规律或地质构造的人一样可以写出很好的阿拉伯文或梵文文法,正如一个不会缝纫的厨子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菜来。

我们都知道,大学的年限按规定只有四年。即使我们从第一

年级起就开始学本系专门的功课，在四年内恐怕也不会学多少；但现在这短短的四年里硬扣除了一年学习这许多所谓“大一共同必修科目”，这真让人难了解。教育当局一方面声明大学是研究专门高深学问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把年限只缩成三年，难道在三年内就可以把专门的高深的学问研究好了吗？倘若大学毕业后还有继续研究的机会，譬如说入研究院或出洋，当然还有时间继续研究；但有这种机会的人实在太少了，大多数的大学同学在一生中只有三年时间研究专门学问；然而三年又是多么短的一段时间呵！

我们中国现行的大学制度有许多毛病，譬如说学分制和学年制搅在一起，实行起来就有许多困难，而且理论上也有点说不过去。但这许多毛病影响学生最大的据我看就是这所谓“大一共同必修科目”。这只能浪费学生的时间，缩短学生学习专门知识技能的期限。现在有些同学已经感觉到了，将来他们一定更真切的感觉到。所以我诚恳的希望教育当局能重新考虑一下这些“大一共同必修科目”，最好是干脆取消。

1948年11月13日

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

关于是不是应该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这个问题，现在几乎没有详细讨论的必要了。我想，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人还反对这样做，还想把学术关在天上，只放出点余光来，让留在地上的人民大众仰头赞叹，顶礼膜拜。但我为什么现在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我的主要用意是想把一个在旧社会里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关于这方面思想改造的过程写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对有些人也许还有点参考的价值。

我自己是一个在旧社会里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自从自己有了点知识那一天起，我就有一个偏见：我反对一切通俗化的举措，看不起一切通俗化的书籍。我当然崇拜专家，但我所最崇拜的却是专门研究一个问题的专家。问题的范围愈小愈好，牛角愈钻得深愈好。最好是一头钻进去，钻上三年五载，然后写出一篇论文来，这篇论文也许世界上只有几个人肯读，只有几个人能够读得懂，这样一个专家在我眼中才真正是一个专家，才真正值得佩服。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崇拜过爱因斯坦，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神童，十几岁就了解了相对论。相对论我到现在还一丝一毫都不了解，何况二十年前？我当时甚至不知道爱因斯坦是男是女，是哪一国人，相对论是属于哪一门科学的。我只听说，相对论世界上只有七个半人懂，我于是立刻觉得，学问到了这个地步才真正算是学问，便对这位爱因斯坦先生肃然起敬了。后来自己弄印度和古代中亚语言学。倘若有人也研究印度语言学或古代中亚语言学，我当然

并不反对。倘若有人在这方面有什么著作,我当然很高兴看到。但我自己所最向往的却是能够对印度语言学或古代中亚语言学上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问题写上一部大书,对一个简单的单字写上一篇长长的论文,最好还是能够写到深奥复杂到一个程度,让一般人,连专家在内,都看不懂,这样我觉得才够味,这样才是真正的学术,学术的妙处就在这一点神秘味。倘若有人写一部通俗的书,无论这个人是怎样有地位的专家,我过去也许对他曾经一度崇拜过,我立刻就会看不起他。他的书无论写得多么好,我总拒绝去看。有时我甚而还搜寻世界上最刻毒的话来批评,武断地抹煞它的一切好处,即便勉强看了有时候也觉得的确写得还不坏;但我的偏见却不让我去赞美它。我总觉得一本让大家都能看懂的书一定没有价值,大家都能看懂了,学术还有什么神秘味呢?学术而没有神秘味,那还值得我们崇拜吗?

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当然并没有想到这问题,因为根本没有意识到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是不是有奇货可居的意思呢?在意识里,我自问确实是没有;但在潜意识里,那就不敢说了。几千年以来,无论是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土里,在所谓文明国家里也好,在所谓野蛮国家里也好,学问都操在一小部分的特权阶级手里,学问成了一部分人统治和压迫另一部分人的重要武器。中国古代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这完全暴露了统治阶级的心理。"民"怎样才可以"知"呢?有了学问就会知了。正像古代的天神把火的秘密紧紧地握在手里一样,统治者把学问紧紧地握在手里。他们还散布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谣言,劳心者就是有学问的人,劳力者就是没有学问的人,人而没有学问当然只好被治了。同这谣言同时流行的还有一首大家都知道的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些谣言和这些诗歌都只有有学问的人才能创造。于是统治者就利用这些有学问的

人,这些有学问的读书人也就帮助他们的“天子”把“民”一下统治了几千年。

在古代的印度情形也差不多。当时研究学问的种种方便都操在第一阶级的婆罗门手里,只有他们有权利可以同神们办交涉,他们可以诵读吠陀圣典,可以唱赞美神的诗,他们是有学问的人。他们也就利用他们的学问,把原始人创造的神话加以改变或者自己创造神话,来麻醉人民,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在古代印度人第一圣典梨俱吠陀第十卷里有一首诗叫做原人歌,里面有两首诗,我现在译在下面:

> 把原人分割开来,有几种变现呢?他的嘴是什么?他的胳臂怎样?他的腿怎样?他的两足叫什么名字?
>
> 他的嘴是婆罗门,他的胳臂是王族,他的腿是吠舍(平民),从他的双足里生出首陀罗(最低阶级)。

整个原人歌的意思就是把宇宙万有幻想成一个巨人,太阳是他的眼睛,风是他的呼吸,空界是从他的脐里生出来的,天界是他的头化成的,地界就是他的足——这些都可能是原始人类的想法。但有学问的婆罗门人就利用了这原始神话,把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四个阶级的来源也神化了。因为自己是第一阶级,就说什么自己是从原人嘴里生出来的,阶级愈低,生出的地位也就愈低,到了首陀罗,就只好从原人的脚下面产生了。这当然都是鬼话,但学问在婆罗门手中,谣言也只好由他们来造,别的阶级只好受他们的麻醉了。

在欧洲中世纪我们找到同印度几乎完全相同的例子。当时教士阶级也是第一阶级,学问也几乎完全操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命是具有神圣性格的人,他们有独占管理圣餐的权利,与一般凡人迥

乎不同。他们先用种种方法脱开了普通法律的羁绊,终于完全不受政府的支配。罗马有一位主教基拉西乌斯曾说:"支配世界的有两种力量,教士与国王。第一种力量当然在第二种之上,因为人类行为,连国王在内,都是由他们对上帝负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作风,完全同他们在印度的同事婆罗门一样。倘若有人说,上面这一段话是一位印度婆罗门说的,我想,也没有人会怀疑。

类似上面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来;但只是上面举的几个例子也就可以告诉我们,特权阶级怎样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利用学问来巩固他们的特权,维持他们在社会上高高在上的地位。我自己以前之所以反对把学术通俗化,是不是也有这个动机,我自己确实还没有意识到;但在潜意识里恐怕就很难免有这样的动机。

但终于来了解放。对我自己说,解放真像暗夜里一线光明,照澈了许多糊里糊涂的思想。我过去当然不会是唯物,但也谈不上唯心,我根本没有唯什么,只是模糊一团。我自己研究的是印度语言学和中亚古代语文。这一切就是我的天地,我天天同各种奇形怪状的字母相对,脑筋里想到的只是文法变化,根本没有时间、也根本没有兴趣来谈哲学上思想上的问题,谈唯什么的问题,虽然思想里存在着许多唯心的不科学的成分。解放以后,大家都搞学习,我也参加进去。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我绝不敢说,我的思想已经打通了,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却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大大地改变了。以前根本没有想到像自己这样一个人还有这样多的问题。当然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已经是尽善尽美;但也没有觉到自己还有检讨一下自己的必要。让我改变看法的主要原因,除了书本子上的理论以外,就是实际的例子。我几乎天天在报纸上读到作为新中国的主人的工人的创造天才,读到关于工人工作情绪高扬的记载。我钦佩这些以前被压迫的从来没有多少机会求得学问的人们的精神。另外,我还看到了真正的民间艺术。对这些艺术我以前也没

有什么了解,也可以说是,没有了解的机会。但我现在却亲耳听到了民歌和根据民歌改造的歌,我亲眼看到了在匈牙利获得特奖的民间舞蹈艺术腰鼓舞。这些歌声才真正是盛世之音,里面洋溢着一片生机、一团力量,确实能够表达出新中国伟大的精神,象征出中国将来远大灿烂的前途。再回想起解放前随地都可以听到的柔媚的歌声,古人所谓亡国之音大概就是那样罢。说到民间舞蹈,更是住在大都市里的知识分子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腰鼓舞获得世界特奖,有少数的人还觉得奇怪;但我却以为,像中国腰鼓舞这样的艺术,倘若在世界上得不到特奖,那才是怪事呢。像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我现在才真正认识了人民大众的伟大,我仿佛是一个井底之蛙,今天从井里跳出来,看到了天地之大。过去有一个时期我也是相信"英雄造时势"的。我觉得历史就是几个所谓伟人造成的,没有他们,社会就没有变化,他们就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说到学术,我更坚定不移地相信,一部学术史就是几个大学者的历史。没有哥白尼,我们就一直到现在还会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转。没有爱因斯坦,我们就不会有相对论。在学术史上大学者的地位就同在历史上的"英雄"完全一样。

但是现在人民大众创造力的伟大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不容我们不承认。历史上一切进化的根源都是从人民大众那里来的,他们才真正推动了历史的巨轮。历史上所谓"英雄",同学术史上的大学者一样,当然有他们一定的作用,无论谁也不会一笔抹煞;但他们只不过适应了人民大众共同的要求,或者把人民大众所获得的经验总结起来使社会进化加速一步或学术水平提高一步。脱离了人民大众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人民大众的创造力既然这样伟大,在过去得到应得的发展没有呢?根本没有得到,因为学问操在极少数的特权阶级手里,学问是他们最重要的武器和护身符,他们把学问谨慎地锁起来,像一个

囤积商人囤积奇货,不让它与人民大众发生关系,恐怕秘密泄露了,失掉自己的地位。人民大众失掉求得学问的机会,自己的创造力只好在极不正常极艰苦的条件下慢慢发展。现在解放了,我们应该把学术交还给人民大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第四十九条明确地规定了:“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这就是要指明,我们应该走的方向。无论哪一行的专家都应该严格执行这一条的规定,把他们专门研究的学问用通俗的形式写出来,让人民大众能够了解,能够接受。倘若大家都这样做,我敢相信,人民大众的创造力,得了专门学问的辅助,将会更高地发扬起来,空前地发扬起来。然后我们再在普及的基础上把学术水平逐渐提高,普及的程度愈大,水平也就愈提得高。过去是几个学者把自己关在图书馆或研究室里孤独地研究和发明,现在是全体人民大众都参加到这发明和研究工作里来,这样一来,一方面普及,一方面提高,愈普及就愈提高,愈提高就愈普及,交互影响,学术将会飞跃地前进。只有这样,被封锁了几千年的人类创造的智慧,才真正地得到解放。

1949 年 11 月 18 日

纪念开国后第一个国庆日

纪念今年的国庆日是有特殊意义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有空前的意义的。是不是因为这是开国后第一个国庆日呢？这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据我们看，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而且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先向国外看一看国际形势。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们现在恼羞成怒，发起疯来。美国竟公然侵略台湾，侵略朝鲜。对帝国主义者侵略别人，我倒并不觉得奇怪。野兽本来就是要吃人的；要它不吃人，只有打掉它的牙。我只替美帝觉得有点遗憾的是，他们的记忆力何以竟坏到这个地步。去年今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时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连美国人民也在内，都同声庆祝。当时美帝战争贩子们夹起了尾巴，躲到一边去，大约他们脑子里还没有忘记被人民解放军赶出中国去的狼狈的情形。但隔了还不到一年，这群家伙竟又耀武扬威地向全世界表演起他们的嘴脸来。我们的办法很简单：我们要用和平的力量压倒这一群战争贩子；假如他们真不识相，那我们也就用不着客气。对待疯狗只有棍子最有效。

今年的国庆日，我们就向这群战争贩子示威，我们要帮助他们恢复记忆！

我们再向国内看一看。一年来，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方面的进步真是说也说不完。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只谈一谈我比较熟悉

的吧。据我的了解,自从中国有历史以来,就有少数民族问题。但在几十年以内这问题解决过没有呢?一点也没有。大民族主义一直在作祟。结果是我们的兄弟民族有的被赶到深山密林里去,有的人口日渐减少,眼看就有灭种之虞。他们以前当然也有机会到首都来,但那是来进贡的。在皇帝老子跟前三跪九叩之余,也许被赏吃一顿饭。吃完仍然是回家去,等候“天兵”剿抚。但现在不同了,除了全国的解放,我们的兄弟民族也翻了身。今年国庆日有几百位代表到人民的首都来。他们不是来进贡,他们不再是奴隶,他们同样成了主人。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破天荒的事情。这象征中国各民族永远大团结,象征一个光明的未来的开始。

对外向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示威,对内是全国大家庭的大团结,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今年国庆的意义,也就是我上面说的空前的意义。

1950年9月18日

语言学家的新任务

今年6月25日真理报上发表了斯大林的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以后又接着发表了几篇讨论语言学的通信,立刻引起了全苏联,全新民主主义国家,我们甚至可以说全世界,各科学部门进步学者们的注意,大家公认这些论文和通信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将会无比的深广。斯大林在这里不但给语言学指出了一条新路,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学者们这种热烈的响应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专就语言学家来说,我觉得,他们都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为什么喜呢?正在大家陷入扑朔迷离的五里雾中的时候,正在大家彷徨无所归的时候,斯大林给他们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把那些乌烟瘴气一扫而空,让他们看到自己研究的这门学问的远景,可以大踏步走上去,他们当然要喜了。但是为什么又忧呢?斯大林在这些论文和通信里只作了原则性的指示,至于新语言学究竟应该怎样,这门学问究竟怎样建立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他都没有,而且在短短的几篇文章里也不可能详细讨论。这任务就落在全世界进步的语言学家的肩上。

统观过去的语言学,大体上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以来发展成的偏重历史比较的语言学,也就是马尔所谓的"唯心主义的"语言学;另一派就是马尔创立的自称是"唯物主义的"语言学,所谓"新学说"。在斯大林的论文发表以前,这两派的关系,我觉得非常离奇。有人说,两派互相水火;但我认为这说

法是非常不恰当的,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我现在只能找一句俗语来表示两派的关系,就是:“烟袋锅子一头热”。在马尔一方面,他对“唯心主义的”语言学大肆攻击,叫嚣讥讽,无所不用其极,他几乎要把资本主义国家过去100多年的研究成绩一笔抹煞。连斯大林都说:

> “马尔给了语言学一种不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不谦虚的、骄横的、目空一切的腔调,轻浮地空口否定语言学中的马尔以前的一切成就。”

到了他的“门徒”手里,就更变本加厉,把马尔的著作不管好的坏的一律神圣化了。无论写什么关于语言学的书,一定要写上献给伟大的导师马尔,又是在马尔的旗帜下怎样怎样。谁要反对马尔,谁就是反革命,撤职、查办、遭受到迫害。“会使人认为在马尔以前不会有过任何语言学,语言学只是从马尔的新学说出现以后才开始的。”(斯大林语)结果就形成了语言学中军阀式的统治制度,大大妨碍了语言学的发展。

被斗争的敌人怎样呢?我不知道,马尔活着的时候对他的敌人的态度是怎样想法,我觉得是非常奇怪的:他们似乎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同他们不共戴天的伟大的敌人。在他们的著作里很少,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过马尔的名字,当然更谈不到对他的攻击加以批评或反攻。他们一点也不动声色,安安稳稳地进行自己的工作。他们用的还是100多年以来那些大师们用过的方法,只在这里或那里加一点修正或补充,老师这样教,徒弟这样学,老的少的埋头在自己研究的那个范围里工作,钻自己选定的牛角,论文照常一篇一篇地写,书照常一本一本地出,总而言之,一切照旧。只有在德国侵略苏联的时候,有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写过一个小册

子,“介绍”马尔的学说。当然完全是恶意的。在这小册子里他把马尔写成丑角,把他的“新学说”写成笑话,目的在昭告全世界:苏联竟有这样的学者,其他学术文化也就“盖可想见”,作为“超人”的德国民族当然就有神圣的义务去征服苏联了。

然而这事情同老牌的语言学家无关。老牌的语言学家既不关心马尔,更不关心希特勒御用学者对马尔的谩骂。

但这些老牌的语言学家也是有自己的悲哀的。悲哀,并不是因为自己唯心,因为他们没要求唯物过。他们悲哀的是,自己选定要钻的牛角似乎已经钻到了底,再也钻不进去了。

在一百多年以前 Henry Thomas Golebrooke (1765—1839), William Jones (1746—1794), Franz Bopp (1791—1867)等人从梵文研究出发,发现了印欧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因而发明了所谓历史比较方法。整个19世纪,这方法用得可以说是很顺利。所有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几乎都研究了。以前认为绝对没有关系的两种语言,两个民族现在也发现了其间的关系。譬如印度,在十五六世纪欧洲人初到印度去通商去侵略的时候,他们看到印度人的黑色皮肤,看不顺眼,于是叫他们有色民族。他们绝对没想到天之骄子的欧洲人会同这有色的劣等民族有什么亲属关系。但是19世纪的语言学家却明确地证明了,印度人是他们几千年以前分家出去的兄弟。对这些天之骄子们,这事情当然有点不愉快;但这是事实,又只好承认。在19世纪前半在欧洲流行的学说是,梵文是一切印欧语言的祖宗。连马克思都说:

> “他们的(印度人的)国家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宗教底摇篮,扎提表现古日耳曼人底典型,婆罗门表现古希腊人底典型。”(不列颠在印度统治底未来结果)

可见19世纪50年代欧洲学者们的看法。语言学家注意的当然还是语言的本身。他们的研究多偏重语言形态学，他们利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字根，研究字尾的形成，研究文法变化；但是他们最感到兴趣的却是音变。在这方面他们用力最勤，收获最大。他们接二连三地发现了许多所谓音变定律，像格林定律(Grimm's Law)，魏纳定律(Verner's Law)等。既然名之曰“定律”，可见方法之严密，俨然与自然科学相颉颃。到了19世纪后半，他们又向多方面发展，开始奠定一般语言学的原理，注意活语言的研究，以前疏忽的造句法，现在也开始研究起来了，连欧洲以外的语言也有许多人注意。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的中文文法，到现在还没有超过它的。同时又出了几个大家像Karl Bruggmann(1849—1919)等，博大精深，兼而有之。Bruggmann综合所有以前研究的成绩写成了几大册印欧语言比较文法(Grundriss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煌煌巨著，令人惊叹。语言学到了这个地步真是如日中天，辉煌灿烂，大有登峰造极的样子。每个语言学家都以为，照这样下去，语言学前途还有无限光明。

但是到了20世纪初年，不但人们盼望的光明没有来，而且还逐渐暗淡下去。大师一个个凋零了：Karl Verner死于1896年，Johannes Schmidt死于1901年，Henry Sweet死于1912年，Ferdinand de Saussure死于1913年，Bruggmann死于1919年，Berthold Delbrüick死于1922年，Hermann Paul死于1921年，Hermann Osthoff死于1907年，Vilhelm Thomsen死于1927年，Wilhelm Streitberg死于1925年。后起的语言学家不但数目极少，而且一代不如一代。只剩下几个老头在那里撑门面，像德国的Jakob Wackernagel和Wilhelm Schulze，法国的Antoine Meillet等。在这方面出版的书籍和论文，在量的方面一天比一天减少，质的方面也极贫乏。人们讨论研究

的题目差不多都极琐碎，极无关重要。我们可以说，牛角已经钻到顶了。拿希腊文来作例子。从大处着眼的著作已经不多见，人们多半找一个极小的题目，搜集一点以前没有人注意的材料，就开始搞起来。正统的古希腊文很少有人再注意，人们注意的多半是方言碑刻。譬如荷马及希腊悲剧家就不再成为研究的对象。大师Wilamowitz - Moellendorf虽然到1931年才死，但他生在1848年，实际上他的学术活动还是在19世纪。在梵文研究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在19世纪，大家研究的都是吠陀，印度古典文学，印度文法，印度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有几个大家研究这一套学问。现在欧美梵文学者很少人还搞这一套，他们研究的差不多都是佛典，他们学会一点中文和藏文，专门从事佛典的比较研究，校刊新发现的佛典残卷。在其他部门也一样。我们举一个小例子。一种名叫Ilyrisch的古代方言，只有几个人名和地名，还有点碑刻流传下来，大家知道的字数少得有限，但也竟成了许多专家研究的对象，对这有限的几百个字竟也写了几本书和许多论文。在整个的印欧语言学领域里令人只感到琐碎渺小，没有活力，没有创造性。我们再也听不到还有什么人发现音变定律，再也看不到那种元气淋漓的著作，一切都在暗淡消沉中。

我现在谈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从这里可以看到，旧的语言学家对自己研究的这一门学问的想法。我初到德国不久，本来想专门研究印欧语系的比较语言学；但按照传统办法，想研究比较语言学最少要会三种语言，就是：梵文、希腊文、拉丁文。我于是决意先念希腊文；但又彷徨起来。我就找到一位在德国语言学界极有声望地位的老语言学家E. Hermann，去问他的意见。他觉得很吃惊，他干脆告诉我，最好不研究这一门学问，因为它的前途已经很暗淡。大家所熟知的材料都已经一遍又一遍地研究过了，在这些嚼过的骨头里很难再嚼出什么油水。除非再有新材料发现，这门

学问就不会有什么发展。但哪里有那样许多新材料给人发现呢?这位老人只有摇头慨叹了。他最后告诉我,要想研究语言学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研究中亚新发现的印欧语系的古语言,一条是研究亚洲的语言,像藏缅语系等等,这还都是没有开辟的园地,前途是有无限光明的。这是一位研究自己的学问有 50 多年历史的老教授对自己这门学问的前途的看法。

这一切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说起来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明白的。我只预备就两点来谈一谈。

第一,材料问题。无论什么学问离了材料就无从研究起,语言学当然也不例外。19 世纪初,当语言学家初次发现印欧语言间的亲属关系的时候,到处都是材料,而且到处都是问题,仿佛眼前蓦地展开了一个新天地,令人目迷五色,应接不暇。在这个语系里,每一种语言都需要研究,音变规律需要搞明白,文法变化需要弄清楚,同其他语言的关系需要确定,还随时有可能发现属于同一语系的新语言。材料多得很,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们仿佛在开荒,到处是肥沃的土地,只要你肯用力,随便在什么地方掘上两下,播上种子,一定可以开花结果。当时的语言学蓬蓬勃勃,一片新气象。材料只愁多得用不完,不愁没有。但是材料这东西究竟是有限的,并不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间一久,大家所熟知的材料就渐渐减少起来,有的那一些也给大家一而再再而三地研究过了。于是材料就发生恐慌。再拿开荒做例子。这一片荒地都已经开完,到处都种上了花草树木,连平常人们不注意的角落都有人去开辟过,种上了东西。这时候假如还有人想来弄块地种点什么,岂不很难了吗?

因了材料的缺乏,大家无论想搞什么名堂,也难搞出新花样来。20 世纪初年以来的印欧语言学界就是这情形。只有两个部门还算有点生气:一个是研究 Hittite 语言的,一个是研究吐火罗文

的。这两种都是新发现的语言,是19世纪那些大师们所梦想不到的。有了这一点新材料,语言学这一门学问又仿佛注入了一点新血液,大家的眼界又放宽了一点。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来研究新发现的这点材料,没有一个语言学家肯弃权的。现在的比较语言学家对这两种新发现的语言几乎都有点研究,仿佛不懂这个就算落了伍似的。他们当然从这里得到许多启示,能够修正和补充许多以前作的假设和结论。就外表看起来,新发现的这点材料似乎又给语言学带来了活力,在一般的暗淡上加了一点生气;但就全体看起来,暗淡依然是暗淡。这一门学问走到这个地步决不是这一点新材料可以挽救的了。

第二,方法问题。我们都知道,印欧语系语言学家所用的主要方法就是所谓历史比较法。不能否认,这种方法在过去确有过很大的用处,起过很大的作用。斯大林说:

> "历史比较法虽然有其严重的缺点,还是比马尔的真正唯心主义的四种要素的分析法要好些,因为前者还推动着研究语言的工作。"

这是很中肯的批评,19世纪语言学家利用这种方法发现了印欧语言间的亲属关系,确定了这些语言发展的迟速,和它们之间的远近亲疏的关系。那些鼎鼎大名的音变定律也是利用这种方法发现出来的。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阐明一下。父亲在梵文是Pitṛ,古波斯文是Pita,希腊文是Pater,拉丁文是patar,Gothic是fadar,德文是Vater,英文是father;母亲在梵文是mātr,希腊文是mater,拉丁文是māter,俄文是Maīb,德文是Mutter,英文是mother;兄弟在梵文是bhrātṛ,古波斯文是brātar,希腊文是phrater,拉丁文是frater,Gothic是brothar,俄文是Брат,德文是Bruder,英文是brother ,即便不懂语

言学的，一看也可以看出这些语言间有亲属的关系。假如观察得仔细一点，还可以发现音变的现象，譬如在德文里是 tt 和 d，为什么到了英文里就成 th 呢？这种现象观察多了，材料汇集多了，就能推衍出音变定律。极简单地说，历史比较法就是这样子。但是这种方法是不是就是十全十美没有缺陷了呢？当然不是。首先，这种方法应用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它只能应用到同一系统的语言上。当然这个系统并不一定限制在印欧语系上。欧洲有许多语言学家也把这种方法应用到非印欧语系的语言上面获得了良好的成绩，譬如德国阿拉伯语言学家 Brockelmann 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塞姆系语言的研究上，写成了一部大著塞姆系语言比较文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semitischen Sprache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方法只有应用到同一语系的语言上才会生效，否则就无从比较起。可惜世界上的语言并不都属于一个系统，专靠这种方法当然就不行了。在 19 世纪的时候，印欧语系的语言学家利用这种方法，再加上那些丰富的材料，所以他们获得了很好的成绩。他们把问题研究得很精细，钻得很深，有时候也很琐碎，可以说是已经精细到头，深到底，琐碎到家。到了 20 世纪人们才发现，细到不能再细，深到不能再深，眼前是一座钻不透的坚壁，不得不打住了。敏感的语言学家，像 Hermann 已经感觉到，这一门学问照这样下去是没有前途的，仿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

但是是不是还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当然有的。马尔本来自己坚决相信，他已经找到了这个“又一村”，但是现在看起来，他找到的原来也是一条死路。他努力了许多年，只创立了一个“军阀式”的学派。尽管他的“门徒”们大声疾呼：“我们坚信：唯物主义的语言学是唯一正确的语言学。我们以它的奠基人苏联学者马尔自傲。”（莫山宁诺夫语，见缪灵珠教授苏联新语言学 122 页）。但死

路依然是死路,比“唯心主义的”语言学的路还更不通。斯大林说:

> “我认为,我们的语言学摆脱马尔的错误愈快,就能愈快地摆脱它现在所处的危机。”

那么,旧路走不通,马尔的新路更不通,语言学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找一条真正的新路,“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语言学中去”,这就是全世界进步语言学家的新任务。

这样一条新路斯大林已经给指出了方向。在他那几篇论文和通信里,他作了许多原则性的指示,他说,语言不是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语言没有阶级性,语言的基础是基本文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等等。无论这些指示怎样宝贵,但也只是替新语言学搭了一个架子,至于如何藉着这架子把这所新房子盖起来,却是其他语言学家的任务。这所新房子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两天的时间内可以盖成的,大家应该同力合作,应该从各方面贡献意见,来完成这艰巨的任务。我们首先应该把旧语言学批判地研究一番,看看在材料方面,方法方面,结论方面还有哪些值得保留,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接受的。再研究一下马尔学派,也用同样的态度来研究。因为虽然马尔学派有它的严重的缺点,但斯大林也说过:

> “但是马尔有个别的、优秀的、写得很精彩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忘掉了自己在理论上的狂妄倾向,诚实的而且可以说是很有办法地研究了个别的语言。在这种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有价值的和值得学习的东西。”

所以我们对马尔也不能一笔抹煞。

我自己对语言学,无论新的旧的,都知道得很少;但既然想到这些问题,所以就不揣谫陋,把自己想到的极不成熟的几点意见写出来,供建设新语言学的专家们参考。

第一,我想谈一谈基本出发点的问题。斯大林说:

> “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在于研究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

他又说:

> “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语言也将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因此要了解某种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进行研究,才有可能。”

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但是过去的语言学家是不是这样研究语言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绝对不是。旧语言学家根本不懂什么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他们当然也不懂社会怎样发展。他们往往把语言孤立起来,当作一个与外界社会绝缘的现象来研究。他们研究语言演变的时候,有时候也注意到社会对语言的作用。但是他们所了解的社会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有很大的差别。结论当然也就很难搔着痒处。我们现在应该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上来研究观察语言,看看是不是能够把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同社会发展的规律结合起来。

其次,我想谈一谈“母语”学说和历史比较法。德国语言学家August Schleicher是第一个认真想构拟所谓印度日耳曼母语的学

者。他把这问题看得异常简单,他居然敢用这种母语写短的寓言。在他以后,语言学者当然也都承认有这样一个母语,但他们却觉得这东西不这样简单,他们愈来愈感到这问题复杂,不但再没有人敢用这种语言来写文章,连构拟几个简短的字的时候,也小心翼翼了。但对母语的存在却没有人怀疑。因为利用他们的方法——历史比较方法——,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假如他们不先假设有这样一个母语,他们的音变定律就无所附隶,各语言间的音变现象就无法解释。但是有人见过这种语言没有呢?它有什么痕迹留下来没有呢?有没有碑刻文献呢?这一切都没有,也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一个虚无缥渺的东西。马尔彻底反对这种母语学说,斯大林也似乎不赞成。但斯大林却承认语言间的亲属关系,他认为这种研究"是会使语言学在研究语言发展规律方面有很大益处的。"现在恐怕就有人要问:假如不先假设一个母语的存在,这些亲属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呢?为什么这个语言同那个语言甚至在"基本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方面都有这样相似,或甚至相同的地方呢?这个问题恐怕要同历史比较法结合起来研究。我们也要研究一下,历史比较法的"严重的缺点"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些都需要我们彻底地仔细地考虑研讨。

最后我想谈一谈"从一到多"或"从多到一"的问题,也就是,是由一个语言演化成许多语言呢?还是由许多语言融会成一个语言?这问题同母语说分不开。因为,印欧学派即然承认有一个母语,当然就承认这一个母语会孳生许多子语,换句话说,现在所有的已经知道的或死或活的印欧语言都是由一个母语演化出来的。马尔对这种说法大肆攻击,但是他却没注意,印欧学派的语言学家并不否认,一个语言在形成的过程中必须吸收很多外来语的成分。拿英文作例子,谁都知道英文是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支的,但里面却有许多拉丁文、法文等的成分,这事实大家并不否认,也并不觉

得奇怪。甚至有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纯粹的没有外来语成分的语言。所以马尔的攻击有点无的放矢。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既然所有的语言都不纯粹,都有外来语的成分,那么从什么地方来看一个语言的系属呢?再拿英文作例子,既然里面有许多拉丁文法文的成分,怎样知道它属于日耳曼支呢?我想,我们可以借用斯大林的说法:我们确定一个语言的系属,主要是根据它的"基本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只要在这两方面相同,就可以确定。波斯文里的阿拉伯字多得很,但并不妨碍波斯文是一个印欧语系的语言。以上只是粗略地谈了下这个问题,在这方面也需我们彻底地仔细地考虑研究。

我再说一句,我对语言学,无论新的旧的,都知道得很少。上面说的都是极不成熟的意见。我之所以把这些不成熟的意见写下来,完全是为了抛砖引玉,向大家请教。不过,有一点我敢相信:语言学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非找一条新路不行了,虽然斯大林已经指出了方向,但这条路怎样走通,还需要我们自己去试,这就是全世界进步语言学家的新任务。

1951年1月11日

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

列宁说过：

“语言是人类交际极重要的工具。”

斯大林在他的著名的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里也发挥了同样的想法。无论是在生产领域里，在经济关系领域里，在文化的领域里，在社会生活里，在日常生活里，人类的活动都离不开语言。语言能交流人们的思想，在不断的同自然的斗争中，在为了生产必需的物质财富的斗争中，它能协调人们的活动，它是社会和发展的主要工具。

但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注意，斯大林虽然承认语言是一个工具，却坚决否认马尔的“语言是生产工具”学说，因为“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财富，而语言则什么也不生产。”语言在某一些点上的确与生产工具相似，但基本上却仍然是不同的。

作为交流思想协调共同活动的工具的语言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并不是的。我们研究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没有找到一个不变的，只是因了时间、地点和其他条件的不同，有的变得快，有的变得慢而已。譬如说土耳其语言变得就比较慢，侨民的语言也比本土的变得慢。关于语言的变化，斯大林在他的论文里也谈到过，他说：

> “这就首先说明，语言，主要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差不多不断改变的状态中。”(解放社版，第 9 页)
>
> “因此语言的词汇对于各种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几乎处在经常变动中。”(同上，第 25 页)

但变化并不只限于词汇，文法构造也同样变化。不过“文法构造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它在语言中已是根深蒂固，所以它的变化要比基本词汇更慢。”(同上，第二十六页)

总之，我们可以说，构成语言的两个要素：词汇和文法构造都要变化，都能变化，没有一个是一成不变的。

现在我们再谈一谈语言这一种“工具”的效率问题。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语言数目非常多，种类非常复杂，作为交流思想协调共同活动的工具来看，效率当然不能一样。而且其间的差别恐怕还相当大。就拿我们熟悉的印欧语系里的几种语言来说，在文法构造方面，在词汇方面，在表现能力方面就有相当的差别。英文虽然名义上还是屈折语，但文法变化已经很少表示出屈折语的特点。这是好是坏，各个人的看法不同。虽然我们不能同意那些复古派的说法，他们慨叹英文的“尾巴”丢掉了，简直是“世风日下”因而摇头叹息；虽然我们也承认，大体上说，英文发展到目前的样子，是进化的，但在表现方面，英文有时候有模糊的地方，有时候可以作模棱两可的解释，这也是事实。据说过去中国同英国订条约，英国人就曾利用英文这种模棱两可的地方让我们吃过亏。法文在这方面一般都认为是比较好的，比较精确的。所以以前订条约，除了两个有关国家的文字外，还有时候用法文。说到德文，德国人一般都非常骄傲有这样的语言。他们说，德文能够表现极抽象的别的文字不能表现的思想。这恐怕也有点对，德国出过这样多唯心论的大师不能说同语言没有关系。

总结起来,我们在上面主要谈了三点:

一、语言是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

二、这个工具是经常变化的,改进的;

三、作为工具的效率各种语言是有差别的。

现在谈到中国语言,我们首先就要问:作为一个交流思想的工具来看,中国语言的效率怎样呢?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中国语言有许多优点,是任何语言里都没有的;但是我们也同样不能否认,它有许多缺点。大家都承认,方块字也有些缺点,但我在这里并不预备谈方块字,因为那只是记音的符号。我在这里要谈的只是基本文法构造。J.K.先生说:

> "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的余孽,还紧紧的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是工农群众!)。"(鲁迅全集,四、"关于翻译的通信",页 361—362)

这说法或者有点过火。但鲁迅先生也说:

>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倘若永远用着糊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糊涂的影子。"(鲁迅全集,四、

“关于翻译的通信”,页 377)

在其他文章里,他也常常说到中国文法的不精密,这里不能多引。

我想,这种感觉我们大家也许都有的,特别是从事翻译工作的同志们更容易感到。在把外国文译成中文的时候,原文句子一长,副句一多,立刻就来了困难。不拆散吧,译成中文,句子太长。不容易懂;拆散吧,又与原文神味不合,左思右想,总是没有办法。倘若把中文译成外国文,问题就更复杂。在中文原文里的那许多概念,我们当然都能懂,但倘若用外国文把这许多概念表达出来,这些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严密确定——这我们往往做不到,因为在中文里这种关系是太活动太不严密了。再谈到文言,问题就更多。过去有许多大家,“文起八代之衰”,一提起来,人们就要五体投地的;但根据我们现在的所谓逻辑,根据我们现在的文法观念来研究一下他们的杰作,就到处发现不周密,不客气点说,不通的地方。另外还有许多地方,意义模糊,怎样讲都行。到了明清的八股文,这种趋势更发展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譬如下面一段妙文: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

念起来,声调铿锵,抑扬顿挫,倘若摇头摆尾而诵之,也可以得到暂时的陶醉;但倘一用脑筋,立刻糟糕,恐怕要化陶醉为作呕了。

这种缺点是不是可以补救呢?当然可以。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作为交流思想协调共同活动的工具的语言是随时变动的,倘若加以人力,中国语言也未始不可以逐渐变化,逐渐精密起来。词汇需要增加,而且也能够增加;文法构造需要改进,而且也能够改进——中国语言过去发展的历史证明了这事实。

我们先拿文言来作例子。文言演进的历史似乎还很少有专家去研究,详细情况我这样一个外行当然不敢说是知道。但我总感到,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文言史上是一个关键。从西域,特别是印度,借来了大量的新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用不着再详细说。连文法方面,据我看,也受了外来的影响,虽然这一方面不大引起人的注意。梵文那种绵密的,抽象的,有时候却又有点重复得过火以致弄得头绪不清楚的表现法也在中文里留下了痕迹,譬如苏轼的文章有些地方就受佛典翻译的影响。

这是第一次翻译带给中国语言的影响。

到了近代,我们大量翻译欧美日本的书籍。这些翻译不但带来了新思想、新科学,而且还影响了我们的文和我们的话。假如我们把《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拿来同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的小说比一下,立刻可以发现其间文体方面和表现法方面的区别。我们必须承认,这区别是非常大的。我们再看毛主席的著作,看到思想的绵密,句法的细致,我们不能想象,用100年以前的,甚至50年以前的白话文能写出这样伟大的著作。

这样的文体也是翻译带给我们的。

写到这里,倘若再谈什么翻译的"直译"和"意译"的问题,那么答案可以说是已经给出来了:我们赞成"直译"。

主张"直译"最力的是鲁迅先生。在文章里,他屡次谈到这问题,他拥护欧化语法。他说:

> "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鲁迅全集,13,页380)
>
> "但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若精密,中国原有的语化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

永久含糊下去。”(鲁迅杂文,页 72)

但“直译”是不是毫无限制地“直”下去呢?当然不是。直译也是有限度的,并不是原文有一个字,就译一个字,而且次序也不颠倒,那不是翻译,而是编字汇。我们决不能把“天河”译作”牛奶路”,把“仰卧”译成“躺在他的背上”,把“火车误点”译成“火车有晚”,把“我陪你”译作“我给你一点社交”,把“你叫什么?”译成“什么是你被叫?”,把“张三说”译成“说张三”等等。这不是“直译”,而是“死译”。真正的“直译”是在照顾中文基本文法构造的原则下,逐渐输入一点欧化语法进来,目的只在把我们不太精密的文法慢慢地有步骤地改造得精密起来。倘若文法构造绝对不能变化,这工作当然徒劳无功。我们上面已经谈到,文法构造是可以变化的,所以这工作也就有了意义。但倘若操之过急,想把我们的文法构造一下子推翻,另创一套,那就会如斯大林所说的,“在社会生活中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使社会受到崩溃的威胁。”(前引书,页 8)所以这工作只能逐步去做。有些欧化句法最初看到也许不太习惯,但慢慢总会看惯了的。譬如,“美国一定会失败,虽然美国战争贩子认为自己不得了。”这样的句子,让我们的祖父看起来一定会觉得很怪,甚至认为不通,但现在我们不也司空见惯了吗?这种例子真是俯拾即是。鲁迅先生说:

> “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鲁迅全集,四、“关于翻译的通信”,页 378)

也许有人认为,这种欧化句法人民大众不能接受,我们这样做

是忘掉了人民大众。这说法并不正确。人民大众的语汇很丰富,很有生命力和表现力,这是我们绝对应该承认,而且学习的。但文法构造却同“文人学士”的一样不大精密,也同样是需要改变的。我再引一段鲁迅先生的话:

> “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鲁迅杂文,72—73页)

上面拉杂写了一大篇,除了引用的别人的说法以外,自己的看法大半都是很肤浅,很不成熟的。我诚恳希望在这方面有兴趣的同志们指正。

1951年1月20日

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编修中国翻译史是一件极重要但也极艰巨的工作。我们中国过去在翻译方面的成就,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而翻译历史之长,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成就大、历史长,所以整理起来问题也就多。真要想编一部完整的中国翻译史,非集合许多专家通力合作不行。

谈到时代的划分,我目前还没有什么成熟的意见。但第一个阶段是佛典的翻译,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从后汉到宋朝一千多年,外国和尚跟中国和尚从梵文、巴利文,还有其他西域"胡语"里译过来的经典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因为中文同梵文文法构造非常不同,所以最初翻译的时候,当然感到很大的困难。由于实际的需要,许多译经大师都谈到翻译的标准和理论。这些理论有的非常深刻周密,一直到今天还不能不让我们叹服。但假如真想了解这些理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译文同原文对一下。可惜这些经典的原文,绝大多数都散佚了。在印度本土也早销声匿迹。最近几十年来陆续在中亚西藏迦湿弥罗等地发现了许多原本,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把现存的原本拿来同译文对校。最少我们也应该把中国翻译史上几个大师像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的译文用这方法来仔细研究。鸠摩罗什说过:

> "天竺国俗,甚重文制……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他把翻译比作“嚼饭与人”，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的翻译都可以说是意译。他的徒弟僧睿说：

“梵文委曲，师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

现在我们把他译的大庄严论拿来同新发现的梵文残本一对，虽然发现他常删去原文的繁重，不拘原文的体制，而且变易原文。这样我们对这些书上的记载就了解得具体而深刻了。鸠摩罗什这种办法不一定值得我们学习，但他的译文之所以为大家所爱好，之所以流传这样广，恐怕与他的译法很有关系。又如义净，他的译文我们读起来觉得不像意译。拿他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同梵文原本一对，我们才知道，在散文部分他的译文对原文很忠实，一到了诗体部分，他有时候也有删削。

以上只是随便举了两个例子。假如我们把这几位大师的译文同原文仔细校对，我相信，一定能够发现许多可以供我们参考或学习的地方。当然，想编修一部中国翻译史工作多得很，决不能只限于把译文同原文对校；但要编一部完整的中国翻译史，这种对校的工作却也是不可缺的。

1951年4月17日

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

我们文字结构的规律是一字一音的，我们的眼睛也早就习惯于这样的形式，我们看到一个方块字就念一个音。除非将来在文字方面有重大的改革，方块字不存在了，汉字本身的一字一音的现象基本上不会改变的，而且也不应该改变的。

但是目前许多人写东西却用了许多复音字，不是一字一音，而是一字二音，甚至四音。最常见的例子如：芇(革命)，庤(共产)，忩(同志)，閅(问题)，邗(干部)，厍(历史)，愽(博物馆)，帟(帝国主义)，筊(资本主义)，嫈(无产阶级)，資(资产阶级)，阪(阶级)，郊(支部)，囩(国际)。在书写方面，大家也不十分一致，似乎都在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譬如“革命”也写作“芮”，“问题”也写作“閅”。还有更异想天开的创造，像“燵”，我想大家都不认识这个“字”吧！这就是“禁止烟火”四个字合成的一个复音字(见《中国青年报》，1952年7月11日，吉林省榆树师范学校于廷仕，赵世令来函)。从上面几个例子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复音字的构造方法：把张三的脑袋，安在李四肩膀上，有时候也拿赵五一只胳臂，再加上王六的一条腿，间或还掺杂上一点外国成分，这是字形。至于音呢，几个字凑在一起就念几个字的音。这真可以说是一盆大杂烩，一团混乱。虽然目前这样的怪字在数目上还不算太多，在印刷上也还没采用，但是它们已经产生了不良的作用。平常读一篇东西，一字一音，眼睛看上去不别扭，念起来也满顺溜。假如加进一些这样的复音字，虽然同样是一个方块块，但有的是二音，有的是四音，甚至

还可能有五音六音的。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一定会不自主地停一停，想一想，结果是疙里疙瘩，读不顺溜，大大影响了阅读的效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复音字违反了汉字结构的规律，在文字方面引起了混乱。此外，假如这样的复音字再多起来，我们除了旧有的汉字外，还要认这样的新字，增加学习负担。这实在是不必要的。

过去我们是不是有类似的复音字呢？是有的。譬如，“不可”两个字就合成“叵”，“不用”两个字就合成“甭”，“勿曾”合成“朆”，“勿要”合成“嫑”。但是同最近创造的复音字有基本上的区别，就是，过去这些字虽然也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但它们并不是复音，而是上字取它的声，下字取它的韻，用反切的办法合成一音，结果仍然形成一个单音字。这样仍然遵守了中国文字结构的规律。

据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这样的复音字是圕。这个字大概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最初大家对这样一个怪字意见很不一致，有的捧，有的反对。但因为在书写方面究竟有些便利，这个字终于行开了，在印刷上也应用起来。随了人民解放事业的开展，中国语言不可避免地在各方面都有了些比平常更迅速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词汇、新简字，也出现了上面举出的新复音字。按照一般语言的发展规律，在中国这样一个从旧社会转到一个崭新的社会的天翻地覆的大变动，语言有了变化，是并不奇怪的，而且有些变化也是值得我们欢迎的。由于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空前地提高，学习情绪空前地发扬，大家听报告，记笔记，感到中国方块字写起来实在有些麻烦，有些慢，所以大家就把常用的词儿改编成速记符号似的复音字，目的就在写起来方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作为速记符号这些新复音字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根据上面已经说过的理由，这些小小的作用同它们破坏中国文字结构规律引起的混乱不能相抵。这样并不能解决中国文

字中目前存在的问题,对文字改革工作也没有帮助。为了不再增加混乱和困难,这种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

1952年7月

学习《实践论》心得

这次学习《实践论》，最初总认为领导上布置得时间太长。这样一篇短短的文章，我以前已经看过几遍，难道还要用这样长的时间来学习吗？我希望领导上能指定几本参考书，愈厚愈好，这样学习起来才过瘾。但是在学习过程中，钻研得愈深，发现的问题愈多，愈感到自己对这篇文章的了解不够，自己学习的兴趣与决心也就愈随着提高。现在感觉到，时间真是太短了。这篇文章仿佛是一个汪洋浩瀚的大海，每多学一次，就会有新的体会，可以从里面吸取无限丰富的智慧。我在学习过程中，随时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心得相当多，但是很杂乱，我只能提纲挈领地提出几点来谈一谈：

一、认识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性

过去自己学了一套死板的知识，敝帚自珍，认为了不起。长期理论与实践脱节。无论处理什么问题总是从主观出发，从来没想到什么客观规律。仿佛只要我一个人这样想，别的人也都应该这样想。我是要求客观现实来适应我的主观愿望，而不是使我的主观愿望来适应客观现实。这样一来，当然会随时随地都碰钉子。钉子碰过，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灰心丧气，消极悲观。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来。我在这里只举一个。去年春天，三反运动刚一结束，学校又开始上课。当时据许多同学的表示，他们学习东

方语言的时间不够多,希望增加些钟点。我当时认为这意见很正确,也不考虑我们系里的具体情况,就贸然决定所有语言课每周一律增加到 24 小时。当时真觉得这是个“英明”的决断。大家都经过三反,思想大大提高了一步,还会有人反对吗?而且我既然认为正确,别人也一定会认为正确。教员们确是几乎没有人反对。但这“英明”的决断仍然贯彻不下去,因为一个教员教两班,无论如何也是忙不过来的。有的科教材成问题,勉强每天上四小时,也只是一种形式。过了几天,只好收回成命,还是请授课的教员斟酌各班的具体情况增加钟点。这样工作才继续下去。当时心里颇为别扭了一阵,不了解为什么自己想的办法竟会行不通。因为钉子碰多了,逐渐领悟到,自己的主观想法不一定完全正确,还是客观一点好。这样一来,有时候也能发现些规律,根据这些规律去做事情,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现在学习了《实践论》以后,在这方面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有了理论的基础。这对以后的工作有莫大的好处。但是主观主义并不是这样容易克服的,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努力才有可能逐步加以克服。

二、对效果有了适当的估价

过去无论做什么事情总认为主观努力是唯一的标准。只要我主观努力够了,或者自己认为够了,就觉得自己的责任已经尽到。效果好,当然高兴,效果不好,也以为与自己无干。我不是已经努力过了吗?努力而没有效果,我有什么办法呢?在这情形下,也总是怨天尤人,到别人身上去找责任。媳妇娶的不好看,怨抬轿子的。其实这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中国古语说:“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以前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这也是只看动机,不管效果的。记得在批判《武训传》的时候,原导演

人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的检讨，承认了《武训传》的危害性，但却强调说，自己的动机是好的。我当时颇寄以同情。后来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到"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身上出了一阵汗，认识到以前那种想法的错误。毛主席也并不是说，动机与效果是平等的，他说："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在《实践论》里他也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我现在认识到，检查一个人的工作主要是看效果。过去我却只看他是否努力。为什么努力不能成为唯一的标准呢？假如一个人有很多社会实践的经验，有多年革命的锻炼，不主观，能掌握客观发展的规律，做事情先调查研究，仔细分析综合，摸到的才放矢，这样一个人他的主观努力愈大，效果也就会愈好。但是假如一个人没有上面这些条件，他完全主观、不调查、不研究、不睁眼看问题，无的放矢，这样一个人，他主观上想搞的工作愈多，效果也就愈糟。这不是很明显吗？拿我的工作来作例子。过去我只注意如何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如何改进教学方法。但不太注意去检查同学学习的效果。同学学习的效果不知道，如何能判断我们的教学方法的好坏呢！

三、认识了自我改造的必要性

我在解放前，觉得人是不能改造的。我认为俗语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知道了，社会生活是在不间断地运动与发展的。一个人的思想也经常处在不断地运动与发展的。在同一个时间，一个人的思想里有旧的东西，也有新的东

西;有生长着的东西,也有死亡着的东西。这样一来,自我改造当然就是可能的了。

改造既然是可能的,但是怎样去进行改造呢?有些人说:“存在决定意识,我们现在的存在已经改变了,那我们的意识就等待着存在来决定罢,我们何必去努力呢?”这说法完全不正确。存在决定我们的意识不能机械地理解,我们主观的努力在这里有很大的作用。毛主席在《实践论》里也指出来,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很大。所谓主观能动性就是改造世界的意志,革命的意志。有了这样的意志,我们就要检查我们的思想里哪些是新的进步的东西,哪些是旧的落伍的东西;所谓新的进步的东西就是适合客观发展规律的,生长的东西,我们要利用主观的努力帮助这些东西生长。所谓旧的落伍的东西就是违反客观发展规律的,死亡的东西,我们要利用主观的努力促进它们的死亡。这样,就是一个人自我改造的过程。

我们实行自我改造,不是为了改造而改造,而是为了改造世界。但要达到自我改造的目的又必须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我的初步体会这就是自我改造与改造世界的辩证的关系。而它们又统一在实践的基础上,所以要想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必须参加社会实践,革命的实践。没有这样的实践,自我改造不可能,改造世界当然也不可能。

1953年5月10日

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中国和缅甸都是亚洲的国家。从地理上说,我们壤地相接;从历史上说,我们已经有了几千年的传统友谊。今天我们两国的人民又都为了保卫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现在让我们趁缅甸总理吴努访华的时候来回顾一下两国人民历史上的文化、贸易、外交各方面的关系,也许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吧。

根据历史记载,至迟在汉代,中缅两国已经有了往来。汉书二八下地理志下记载着,在前汉时代,中国商船自雷州半岛开行,到的地方有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这些国家今天究竟在什么地方,这问题当然不容易确定。但是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都在缅甸。当时中国运出去的货品里有绘彩等丝织品。假如这些学者的意见可靠的话,那么公元前一二世纪时中国丝就已经运到缅甸了。张骞于汉武帝时奉使西行。在大夏国看到中国出产的邛竹杖和蜀布。他问大夏国人,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大夏国人说:“我们的商人从身毒(印度)贩运来的。”中国四川一带出产的东西从哪一条路贩运到印度去的呢? 最可能的路就是通过缅甸。

中国正史正式记载中缅交通始自后汉书六顺帝纪和一一六南蛮西南夷传。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和帝永元九年(公元九七年)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臣经过几度翻译到中国来通好。安帝永宁元年(公元一二〇年)掸国王雍由调又派遣使臣到中国来,他带来了音乐和幻人(魔术师)。这种幻人能变化吐火,自己支解,把脑袋换成

牛头马头。又善于跳丸,一跳就上千。他们自己说是海西人。海西就是大秦。到了顺帝永建六年(公元一三一)掸国又遣使来我国。这里所说的掸国就是现在的缅甸。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公元后一二世纪的时候,中缅来往相当频繁。中国运到缅甸去的东西是丝绸,而由缅甸传入中国的是宝石之类的东西,也就是后汉书所谓“秦国珍宝”。同时缅甸还在中国与大秦(究竟是哪一国,还有分歧的意见)的交往中起居间的作用。

缅甸不但在中国与大秦的交往中起居间作用,在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中,缅甸也是一个重要的过道。在印度笈多王朝时代(公元三二〇—六四七)中国有些和尚就从云南入缅甸,然后转印度。这条路一直到唐朝还是一条捷径。中国西南一带,特别是四川,是产丝的名区。左思的《蜀都赋》赞美四川出的锦说:“贝锦斐成,濯色江波。”中国丝绸很早就西传了,缅甸又邻近川滇,所以中国丝织品也就传入缅甸,再由缅甸西传入印度。

到了唐代,中缅关系更加强了。虽然新唐书一四七下南蛮列传说:“衣用白氎(棉花),朝霞以蚕帛伤生,不敢衣。”但是这几句话却不可尽信,即使可靠的话,不敢穿丝帛的也仅限于一部分人。因为根据别的书的记载,这一带的女人多披罗缎。罗缎是从哪儿来的呢?当然仍是中国。缅甸的音乐舞蹈传入中国也就是在这时候。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骠国王雍羌遣介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到成都献其国乐。当时的西川节度使韦皋因为看到这舞容乐物都不平常,于是就画成图献给皇帝。其音有八:金贝丝竹匏革牙角。乐器很复杂,花样很多,有铃钹四,有击磕应节铁板二,有螺贝四,有凤首箜篌二,有鼍首筝二,有龙首琵琶一,有云头琵琶一,有大匏琴二,有蜀弦匏琴,有小匏琴二,有横笛二,有大匏笙二,有小匏笙二,有三面鼓二,有小鼓四,有牙角笙,有三角笙,有两角笙。曲名有十二个:佛印、赞

娑罗、白鸽、白鹤游、斗羊胜、龙首独琴、唱舞、甘蔗王、孔雀王、野鹅、宴乐、涤烦，亦曰笙舞。从这样复杂的乐器上也可以看到，缅甸音乐在唐代必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些乐器合起来搞一个乐队，一定很有可观。无怪中国当时的伟大诗人白居易专为缅甸国王进乐这件事写了一首诗——骠国乐。骠国就是缅甸在唐时的称呼。

除了音乐以外，当时从缅甸传入中国的还有木棉，就是所谓兜罗棉，是这一带的名产。琉璃罂和宝石也输入中国。缅甸出产的宝石名色很多，最著名的有琥珀、瑟瑟等。这些宝石早就输入中国，为中国人民所喜爱。

宋代的中国史籍多称缅甸为蒲甘，因为缅王阿奴律陀自公元一〇四四年起创蒲甘王朝。宋朝和蒲甘王国仍然像以前一样有外交上的往还。蒲甘国王曾于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一一〇五年)送白象和香物给大理国王段正淳。第二年更随大理国的使臣到宋朝来求经籍。宋徽宗以后一直到南宋高宗和孝宗时代，蒲甘国王与中国都保持联系。

元明清三代，中缅两国除了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外，曾发生过几次军事冲突。元朝的征服者，明朝的皇帝以及清朝的征服者都曾派兵进攻过缅甸。这几次作战都是违反了中国人民和邻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愿望的。我们两国人民仍然照常是朋友，我们的传统友谊并不为一小撮统治者的野心所损害。

在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者阻碍了我们两国人民的互相往来。十九世纪末年英国侵略者带了他们的坚船利炮利用印度作基地闯进了缅甸。从那以后，勤劳的爱好和平的缅甸人民就不得不在帝国主义血腥的统治、压迫和剥削下过生活。同时中国人民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压迫，我们两国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缅交谊史上是一个新

的起点。中国人民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胜利。六亿人口的解放给东方各国受过帝国主义压迫和还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勇气和信心。大家都以十分关怀的心情注视着新中国的建设。中国人民同样关怀我们的老朋友们。套在我们脖子上的枷锁既然打碎了,我们就获得了最可珍贵的自由。同时缅甸人民也走上了一个新时代,有了可能来恢复和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我们阔别已久的两个老朋友又找到一起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一个伟大的新的起点。

我们两国人民十分重视这个新的起点。一九五一年十月仰光就成立了缅中友好协会。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在访问了印度之后到缅甸去访问,受到缅甸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一九五二年四月缅甸文化代表团到中国来答聘,同样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同年十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缅甸派了一个包括三十一名代表的代表团来参加,团长是年高德劭在缅甸人民中有极高威望的著名的诗人和学者德钦哥都迈先生。缅甸政府也派过几次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像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土地国有部部长德钦阵为首的缅甸土地改革参观团,一九五三年四月以波木昂为首的缅甸政府劳动考察团,今年九月以德钦阵为首的贸易代表团。新中国成立后,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都有缅甸工会的代表团来观礼。至于出席在其他国家举行的会议的缅甸代表短期留华参观的事情更是每年都有。今年四月二十二日签订的中缅贸易协定受到中缅两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中缅人民新的友谊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在中国解放前,我们互相翻译的书籍是极少的。近五年多以来,翻译的书就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我们曾译过缅甸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缅甸方面翻译

了大量的新中国出版的书籍，其中包括毛主席的著作，像《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也有刘少奇委员长的著作，像《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等，还有优秀的文学作品，像鲁迅的《阿Q正传》等。此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等书也有了缅文本子。这些书都为缅甸人民所喜爱。

今年六月间,周恩来总理应缅甸政府的邀请到缅甸去访问,以及现在缅甸总理吴努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到中国来访问,都标志着中缅两国人民新友谊的新发展,对中缅两国人民来说,对亚洲和平及世界和平来说,这访问都有极大的意义。我们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友谊了,这友谊是这样古老,同时却又这样新,不但表现友谊的方式是崭新的,而且友谊的内容也是崭新的。我们两国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这个在二千多年古老的友谊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崭新的友谊。

我自己很荣幸地在一九五一年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访问过缅甸。我们访问过缅甸首都仰光,访问过避暑胜地东枝,在明媚的燕尔湖上游览过,又访问过文化古都曼德勒。日子虽然只是短短十几天,但这十几天是在我一生中永远不能忘记的十几天。我永远不会忘记缅甸人民对我们热烈的欢迎,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文化艺术展览会门前排成的长达几里路的观众。缅甸人民把对新中国的无限的热爱尽量倾注到我们身上。我们虽然隔得很远,但是我们的心是挨近的。为什么他们这样热爱新中国呢?一方面当然因为他们把中国人当作老朋友,当作“抱胞”(同胞)看待,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热爱和平,热爱自由幸福的生活,而中国人也是热爱和平,热爱自由幸福的生活的。我们的利益完全一致,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在这个一致的基础上,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一定会更发扬光大。让我们为了和平,为了自由幸福的生

活而共同奋斗下去吧！

1954年11月

充满了信心,迎接 1955 年

中国解放已经五年多了,每到旧年结束新年开始回顾过去的时候,我总觉得过去一年生活很充实,比以往的任何一年都更充实。五年以来,年年如此,今年也不例外。

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说起来可就话长了。我们先从眼前的事物说起吧!今年夏天,我们学校的印度教员陪一位访问中国的印度朋友参观校园。走到离他们宿舍不远的地方,我们的印度教员忽然感觉像是迷了方向,眼前矗立着一座崭新的、他们从没有注意到的金碧辉煌的大楼,仿佛是魔术师一夜之间从地里面咒出来似地挺立在那里。印度朋友们都大为吃惊。他们吃惊的是中国人民建设的能力和建设的速度。他们再三说:假如不是亲眼看到,亲身经验到,无论谁也不会相信这是事实。

这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因小可以见大。我们的学校这样,我们人民的首都——北京也是这样。只要我一个星期不进城,再进城就会发现沿途有一些地方变了样子。再扩大一下范围,我们全国各地也都是这样。我们不是天天在报上读到各地建设的消息吗?我们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为和平而建设,为社会主义而建设。我们修建学校、医院、工厂、文化宫;我们也修建巨大的水利工程,修建铁路。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有利于和平的我们都修建。过去一年内,我们就修建了不知多少。我说过去一年的生活是空前地充实,难道不是普遍的感觉吗?

但是,这不过是一方面。在其他方面,我们也获得了空前的成

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选举出来了，保证我们胜利地完成过渡时期的任务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订了，我们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出席了日内瓦会议，我们的国际地位大大地提高了。这一点大概远在国外的华侨同胞更容易感觉到。谁还会否认我们过去在一年内的生活特别充实这个事实呢？

三年多以前，我听过一位负责同志的报告，他说的几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具有高度智慧的民族。过去受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力量都潜藏着没有发挥出来。毛主席就像是一把钥匙，他一开，我们的力量都给他开出来了。"这几句话虽是一个比喻，但却是真理，我们中国人民现在之所以能蓬蓬勃勃像生龙活虎一般从事于各种建设事业，使我们的祖国天天在改变着面貌，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上面那些胜利，是和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有了这样的领导，再加上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我自己，也就是全国人民在这新旧年交替时所想到的。

伟大的 1954 年过去了，1955 年将会带给我们更辉煌、更伟大的胜利。在这新的一年内，我们的生活将会比过去的一年更充实。我充满了信心，迎接 1955 年。

1954 年 11 月

为我们伟大的节日而欢呼

伟大的国庆节就要来到了。我们全国人民,全体华侨都将为这个普天同庆的节日而欢呼。我们虽然一年一度地庆祝国庆,但是每年的意义都不相同。这就说明,我们的祖国每年都有新的成就,它正在我们的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日新月异地向着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迈进。每一个国庆都是前进的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在过去一年我们有哪些成就呢?我们的成就是说也说不完的。在工业和农业方面,规模宏大的新厂建立起来了;丰富的资源被发现了;铁路线延长了;水库修成了;荒地开垦了;产量普遍提高了。在文化教育方面,教学改革有了新的进展,科学研究工作普遍展开了,为国家建设培养干部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所提高。我们在任何方面都有了进步,有了光辉的成就。至于我们身边又添了几座大楼,修了几条新的马路,那更是司空见惯,谁也不会再觉得奇怪了。

假如要我们说出一件突出的事情,谁也立刻就会想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为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创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提出给全国人民明确地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它有无比重要的意义。自从这个伟大的计划公布以后,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民都欢欣鼓舞,劳动热情空前地提高,纷纷表示决心,要提前实现这个计划。在今后几年内,它将会成为

我们工作的主要动力。

以上谈的是国内的情形。国际上的情形怎样呢？我们在过去一年内在国际上同样获得极其光辉的成就。去年夏天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的时候，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先后共同发表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并且首先把这些原则应用于中印、中缅关系之中。从那时以后，中国同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就成为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范例。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帝国主义分子宣传的那一套全是谎话。今年四月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了亚非会议。他抱着真诚坦白的态度，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同亚洲和非洲的二十几个国家的领导人物会谈，终于使亚非会议获得最后的胜利。虽然在会议文件的辞句上没有用五项原则，实际上五项原则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得到贯彻。许多以前不了解新中国甚至对新中国有某些误解的国家都开始了解了新中国。即使还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同许多国家都成了朋友。埃及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要想详细叙述过去一年内我们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就是需要很多篇幅的。我们在这里只能极简略地谈一下。侨胞们身处国外，一方面关心国内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同样关心我们的国际关系的进展，这样谈一谈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一谈到国际关系，恐怕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埃及。解放后，我们同埃及一直还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在过去一年内，埃及部长级的领导人物却曾两度访华；第一次是宗教事务部长艾哈迈德·哈萨尼·巴库尔，第二次是工商部长穆罕默德·阿卜·努赛尔。这充分说明了中埃两国的友谊日益增长。至于日本，过去一年内我们来往也很频繁。李德全、廖承志、雷任民、刘宁一都访问过日本。日本各阶层领导人物到中国来的更是不胜枚举。同我们的老朋友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的来往不用说是愈来愈多，我们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愈来愈厚。

这三个国家的政府领袖都来访问过中国,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热烈的欢迎。文化交流工作也加强了。以郑振铎为首的中国文化代表团曾于去年年底访问印度、缅甸,今年6月26日又到印度尼西亚去访问。以阿尼尔·库马尔·钱达为首的印度文化代表团也于今年6月8日来到我国,到全国各大城市去演出,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一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现在我们回想起过去一年在各方面的成就来,就会觉得这一年还算不短。这样许多伟大光辉的成就难道真是在短短的一年内完成的吗?我们不相信什么奇迹,地球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过去一年内我们这些近于奇迹的成就就是中国六亿人民在人民政府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勤勤恳恳不屈不挠地做出来的。经过一年的愉快的劳动,现在我们又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愈来愈愉快,我们的前途愈看愈光明,我们愈来愈接近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谁能抑制住心头的愉快和兴奋呢?让我们为这伟大的节日而欢呼罢!

1955年9月

入党一年

去年四月四日，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员党支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我入党的请求。今年四月四日，支部大会又讨论并通过了我转正的请求。我想谈谈在过去一年内，自己在提高觉悟、改正缺点方面的一些肤浅的体会。

对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来说，提高觉悟和改正缺点并不像一些人想得那样十分困难，当然也不会特别容易。组织上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以及个人的努力，三者缺一不可。前二者可以说是外因，最后一条可以说是内因。只有内因与外因相结合，觉悟才能逐渐提高，缺点才能逐渐改正。

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但只有在实践中，我们才会发现，能够把内因与外因结合得恰如其分却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最初，并不是所有组织上和同志们提出的意见自己都完完全全心悦诚服地接受。其中难免跟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有些抵触。因此就产生了思想斗争。在斗争中自己能不能胜利，能不能比较迅速地胜利，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关键，这就是：自己是否时时刻刻都想到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

拿文人相轻来做个例子吧。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过去很多文人都有这个毛病，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小毛病。历史上许多患自大狂的文人轻蔑别人的故事还传为文坛佳话。到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这方面却仍然是流风虽

息,余音犹存。从个人的关系来看,这也许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如果从党的事业这个角度上来看,这就决不是什么小毛病,而是能影响党的事业的大毛病。想通了这一点,改正这个缺点也就有了真正的动力,真正的把握。

再拿组织性和纪律性来做例子。据我的了解,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不肯申请入党,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二十年来一向靠拢党,但是他不肯入党,原因就是害怕党的纪律。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入党后,最初也容易在这方面感到不习惯。这里也就产生了思想斗争。怎样在这个斗争中胜利呢? 关键也就是:要时时刻刻想到党的事业。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必须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否则战斗就无法进行,胜利就无从获得。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也并不是孤立地强调组织和纪律。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与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党内生活是极严肃的,同时又是极活泼的。体会到这些,就能够把组织性和纪律性放在自觉的基础上。能够把组织性和纪律性同自觉的精神结合起来,那么组织性和纪律性就不但没有什么可怕,而且会觉得非这样不可了。

我上面说到内因与外因结合得恰如其分是不容易的。怎样叫做恰如其分? 据我的了解,那就是实事求是。拿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说,抗拒批评,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当然是不对的;异常容易地接受别人的意见,把别人的意见一古脑儿全接受下来,这里面也就有问题。难道别人提出的大大小小的意见都完全正确吗? 能作自我批评,这当然是很好的。如果一个人总是自我批评,一作就非常过火,把自己说得一文不值,这里面同样也有问题。难道他就真地一点优点都没有吗?

这样作,就不是实事求是,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再往思想深处挖一步,就会发现,这是个人主义在作祟。别人提的意

见,自己不见得完全同意;但是为了息事宁人,干脆全盘接受下来,免得麻烦。自己也不见得就认为自己真有那一些缺点;但是为了"过关",免得别人给自己提意见,先下手为强,干脆给自己戴上一大堆帽子。这还不是考虑个人吗?

上面说到的那些顾虑、想法和缺点,我自己都有过。在过去一年内,通过外因和内因,终于有了上面这些认识。

古代的贤人子路据说是"闻过则喜"。我以前认为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人,这只是古人的幻想。在我受了一年的党的直接教育之后,我觉得,这个境界是可以达到的。毛主席曾说过,天下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但是,党对同志们缺点的态度,却是"与人为善"的。在组织上和同志们指出我的缺点的时候,我能够感到这一点。当然,我也并不否认,受批评总不如受表扬舒服。这是人之常情,谁也否认不掉的。我觉得,听同志们给自己提意见,好比吃橄榄,最初的确有点苦,但是余味却是甜的。即使改正缺点还要有一个过程,发现了缺点就能对症下药,改正它也就有望了。所谓"喜"也者,恐怕就是这个意思吧!

根据上面的一些感受,即使我目前还有许多缺点,将来也还可能有新的缺点产生,但是我却坚决相信,我能够改正任何的缺点。给了我这样的信心的就是我们的党。

1957年4月

又是光辉的胜利的一年

——国庆日的感想

又是光辉的胜利的一年。

祖国的面貌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

现在,在国庆日的时候,要想给过去的一年算一笔细帐,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天都从各个战线上传来各种各样的胜利的消息——从工业战线上,从农业战线上,从科学研究的战线上,每天都有令人兴奋的消息,一年365天,天天这样,一时要让我从脑筋里把这些旧帐都翻一遍,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下手。

但是,在过去365天内,我看到、听到或者读到这些令人兴奋的胜利时,我的心情的激动,却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清晰地回忆起来而且描绘出来的。我现在每天都感觉到,生命愈来愈充实,愈来愈有意义了。

这是不是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呢?我想不是的。因为我相信,每个人每天都有看到、听到或者读到祖国各方面伟大的胜利的幸福。就拿海外的侨胞来说吧!他们虽然身在海外,但是却心悬祖国,他们眼前看到的当然不是天安门,他们眼前可能是金光闪闪的佛塔,可能是茏葱苍翠的椰子林,可能是汪洋浩瀚的大海,也可能是四季如春的绿岛。眼前看到的尽管有所不同,心里想到的终归还是一样。他们也一定是每天都要从报纸上读到祖国建设的消息。他们也一定为了这些胜利的消息而欢欣鼓舞、而手舞足蹈。海外的侨胞同祖国的兄弟姐妹们,尽管相距百里、千里,甚至万里;

但是我们的思想感觉是一样的,我们的心是挨得很近的。

前几天,我去看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先生。我对这一位老人一向有很高的敬意。特别是在解放以后,他无形中给了我许多启发和教育。他对我们的党、我们的毛主席的热爱,对新社会一切伟大的成绩、一切可歌可泣的事迹的欢欣鼓舞,使我非常感动。这一天,我走进门,他正在同别人谈话。他谈的是他们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不久以前来看过他。因为才从西藏回来,就谈到路上的情形。这个学生说,他坐着中国自己制造的解放牌的汽车,走过新开辟的公路,七八天的时间就从拉萨到了青海的省会。这位老人回忆起自己童年时走过这地方的情形,今昔一对比,高兴得站起来热烈地拥抱他的学生。他再三说:"我是很少拥抱人的。"然而这一次,他竟忍不住拥抱了。用不着多说,他的心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如果我们身处其境,我们不是也会不自主地站起来拥抱别人吗?

说实话,在现在的新中国,值得拥抱一下的事情也实在太多了。每天从工业战线上,以农业战线上,从科学研究的战线上传来的那一些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胜利的消息,都值得我们相互拥抱的。远的不必说了,只说近的吧! 尽管今年许多地区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但是南方许多省份稻米又获丰收;听到这样的消息不值得我们相互拥抱吗? 祖国最大的河流长江几千年几万年以来,从来没有什么人能够在它身上架上一座桥。但是新中国的人竟有这个胆量。几天以前,第一列火车已经胜利地通过了长江大桥;听到这样的消息不值得我们相互拥抱吗?

这种事情真是俯拾即是,说也说不完的。在这国庆日的时候,我实在没有法子给过去一年的辉煌的胜利来算一笔细帐。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不管这些胜利是大是小,也不管它们是来自哪个方面,当我看到、听到或者读到的时候,我的心就经过一番震动;

它们又带给我更大的信心,更多的勇气;我将工作得更带劲。祖国的面貌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在这个伟大的工作里面,每一个劳动的中国人民都尽了一番力量。我自己也献出了自己的绵力。我坚决相信,在明年国庆节的时候,海外的侨胞们和国内的兄弟姐妹们,会看到、听到或者读到更光辉更伟大的胜利,我们祖国的面貌会改变得更迅速。

1957年9月

在大跃进声中庆祝国庆节

几年以来,每年在庆祝国庆节的时候,我都要给侨胞们谈一谈祖国建设的情况,说一说自己的感想。我以前常用"祖国的建设简直是日新月异"这一句话;但是在今年,这一句话无论如何也不够了。如果允许我杜撰的话,我想改为"祖国的建设简直是秒新分异"。

自从我们的党向全国人民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来,全国人民热烈响应。现在全国真是万马奔腾,一日千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情况,我们现在亲身经历到了。我们的大跃进是全面的,是千头万绪的。要详细谈各方面的情况是不可能的。我在下面只能举几个例子。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小麦的产量每亩只能达到几十斤,最多也不过一二百斤。稍稍高过这个产量,大家就奔走相告,以为奇闻了。因此小麦向来就被称为低产作物。然而在新中国,低产作物竟一变而为高产作物。最初在报纸上读到有人想亩产千斤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也满是问号。然而不久亩产千斤的纪录就出现了。不但出现了,而且像是给风吹着一样,纪录一天天升高。有的时候晚报上的最高纪录,第二天早晨就被打破。有一些科学家也着了慌,他们用最高深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来证明,小麦每亩最高产量是三千多斤;然而事实却打了他们一记耳光,纪录一直升到七千多斤。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现在有许多农民和科学家已作出计划,明年的产量不是以千斤计,而是以万斤计。

稻子也一样。早稻的最高记录已经达到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中稻竟达到四万三千多斤。有些人觉得这些数字简直是神话,他们有点半信半疑。信嘛,他们不能够想象,在那有限的一点点地方,这样多的稻子如何摆得下;疑嘛,他们又知道,中国报纸从来不说谎话。不管这些人怎样想,我可以告诉诸位侨胞:这些纪录还只是牛刀小试,不用说明年,就是在今年,也还会有许多地方打破这一些纪录。至于最高纪录究竟是多少,现在很难预言;我只希望侨胞们有一个思想准备,将来不至于过分吃惊。

我们都知道,在解放前,我们国家的粮食是不够吃的,经常要从外国输入。但是现在经过了短短八年的努力,今天我们所考虑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粮食够不够的问题,而是粮食多了如何处理的问题了。

在炼钢方面,我们同样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蒋帮统治了几十年,最高纪录只能生产几十万吨。我们在八九年内,就增加到几乎十倍。现在全国除了有规模极大的炼钢厂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用土法炼钢的小炉。我们的口号是土洋并举,大中小相结合。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年钢的产量更突飞猛进。至于明年,那就将有更大的发展。我们要在十五年或者更短一点的时间内赶上英国。这个“短”字里面大有文章。我不想在这里充当预言家,预言究竟短到什么程度。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侨胞们就可以知道其中底细了。

这样的事情是说也说不完的。侨胞们也许愿意知道一些学校里的事情,我就来谈一谈我身边的一些事情吧!

我们学校里正在搞一个科学研究大跃进的运动。科学研究也能跃进吗?对许多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最初,我们这里也有一些观潮派,他们不相信这个办法,他们准备以后同我们算账。然而这运动开始到今天才不过二十几天,由于全校师生员工的共

同努力,已经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辉煌的战果。只是化学系一个系,就完成了研究项目一千多项;经过严格的审查,其中七十几项超过国际水平。这种事情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现在我们敢想了,而且敢做了,而且已经做出了成绩。观潮派不得不认输了。

我所在的东语系,在这短短的二十几天以内,也取得了极大的成绩。我们已经完成了很多项规模异常地大、做起来异常地艰巨的工作,我指的是词典编纂工作。我们已经编成了汉朝词典、朝鲜外来语词典、华日词典、越汉词典、乌尔都汉语词典、印地汉语词典等等词典。印尼汉语词典、阿拉伯汉语词典、蒙汉词典,正在编纂中。泰汉词典、缅汉词典、波斯汉语词典已经开始编纂。在这些词典里,最大的一部包括词汇十万。无论是从量的方面来看,还是从质的方面来看,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种事情也是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现在我们敢想了,而且敢做了,而且做出了成绩。

了解中国过去亚非语言研究情况的人,就会知道,编纂这些词典有多少重大的意义。现在中国同其他亚非国家的来往日益密切,我们人民之间的友谊日益增长。我们迫切希望能够互相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过去由于没有合用的词典,工作中有很大困难。现在,词典编纂出来了,这大大有助于我们同亚非各国的文化交流,有助于我们的互相学习,互相了解。

前几年,我们用了四五年的长时间,五个教员长期脱产,经历了千辛万苦,勉强编了一部朝汉词典。现在我们编这一部汉朝词典,实际上只用了八天,而且质量还相当高。这一件事情不是可以充分说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决走群众路线的正确性吗?

在全国大跃进声中,我们这些工作只是沧海之一粟。现在,在全国各地、各个行业、各个机关,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用这种惊人的速度向前跃进。这种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过去,一年本来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现在一年却是很长很长的

了。可以预料,到明年国庆节的时候,我们伟大的祖国会出现更新的面貌。

1958年9月

会降低教学质量吗？

——我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的体会

我们正在进行深入的教学改革。这一次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这三件工作拧成一股绳，使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才在开始，系统地做总结，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在过去极短的实践过程中，我们所得到的一些成绩已经可以证明，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正像对别的新鲜事物一样，对这一次的教学改革，也有一些人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他们担心教学质量会降低。我们现在他已经可以告诉这一些先生们，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些怀疑派的理由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五花八门，很不一样；但是他们共同的理由都不外是：学生的“本份”应该是学习，不然还怎能算是学生呢？现在一搞生产劳动，学习时间就给占掉了；学习的时间比以前少，学习的效果当然也就会相应地降低。

看来这种说法就跟数学一样地精确，是十分合乎逻辑的。

即使真是合乎逻辑的话，也是形式逻辑，而绝非辩证逻辑。时间当然是学习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决不是唯一的条件。除了时间以外，还有许多条件。如果缺少了这些条件，时间再多，也不会学习好。

我们都知道，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足够而正确的动力。没有这种动力，就如升火缺少煤，火当然不会燃烧起来。从什么地方

能够得到正确的动力呢?

学习方面的正确的动力是与对学生正确的思想认识紧密联系的。认识愈正确,动力也就愈充足。有了正确的动力,学生就知道,他们学习是为的什么;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这样的动力是持久的,是经得起任何困难的考验的。它决不会泄气。

思想认识怎样来提高呢? 方式是很多的,生产劳动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

上面这一些话有点“虚”,我们就来讲一点“实”的吧。

生产劳动不仅是能提高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它还能直接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

解放以后,同学们一般都是很努力的。学习成绩也是逐步提高的;但是同我们国家发展的情况比起来,这提高的速度就十分不相称。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教,一方面是学。

在教的方面,教材内容还是严重脱离实际,教的方法还是老一套。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村畜牧,以及其他学科的教授,在讲堂上讲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讲义里充满了高深的数学公式,看起来吓人一跳。但是一接触实际,一到现场,很多老教授就束手无策;讲农业的不辨五谷,讲工程的开不动最简单的机器。这样教出来的学生,能够顶什么事,就可想而知了。

在学的方面,老师怎样教,学生就怎样学。学生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把老师教的都囫囵吞下去。一接触实际工作,他们的本领决不会胜过老师,他们的思想受了层层的束缚,满脑袋迷信,迷这迷那,学习方法一点也不敢改。这样的学生究竟有什么用,也就很可以怀疑了。

如果参加了生产劳动,这些缺点都可以克服。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师生都接触了实际,知道什么是麦子,什么是韭菜,知道稻子

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他们也知道了机器如何开动,电线如何接。现实是比书本子丰富得多的。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也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因此,教学的内容就大大地丰富,教学方法也大大地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学质量怎能会不迅速地提高呢?

有了上面这一些条件,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更如立竿见影。过去有一些人搞科学研究,实际上只是茶余酒后的消遣。他们读外国某专家的论文,在里面发现了漏洞。于是就想把这洞补起来,结果就写成了论文。至于这样的论文究竟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他们是不大管的。他们的目的只是钻冷门,好一鸣惊人。有一位水稻专家,费上多少年的时间来研究水稻的"呼吸"。农民种植水稻的成绩已经达到了每亩十三万斤,这一位专家恐怕连每亩一千三百斤也种不出来。我们决不轻视理论,我们也决不目光短浅,只看到自己的鼻子尖。但是我们的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只是一些概念游戏,我们决不承认是理论。

学习过毛主席的"实践论"的人都知道,"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在反反复复的实践过程中,理论就形成了,反过来再为实践服务。这样,实践一步步提高,理论也一步步深入。我们的公式是:实践—理论—实践。

从我上面简单的说明里,我们可以看到,实行这种新的教育方针,不但不会降低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而是能提高。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上面已经说过,这个新的教育方针才实行不久。将来实行的时间长了,我们一定会拿出更多的成绩来证明这个方针的正确。

1958年12月

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

王国维在他著的《人间词话》里说了一段话：

>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又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尽管王国维同我们在思想上有天渊之别，他之所谓"大学问"、"大事业"，也跟我们了解的不完全一样。但是这一段话的基本精神，我们是可以同意的。

现在我就根据自己一些经验和体会来解释一下王国维的这一段话。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思是：在秋天里，夜里吹起了西风，碧绿的树木都凋谢了。树叶子一落，一切都显得特别空阔。一个人登上高楼，看到一条漫长的路，一直引到天边，不知道究竟有多么长。王国维引用这几句词，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人立志做一件事情时的情景。志虽然已经立定，但是前路漫漫，还看不到什么具体的东西。

说明第二个境界的那几句词引自欧阳修的蝶恋花。王国维只是借用那两句话来说明：在工作进行中，一定要努力奋斗，刻苦钻研，日夜不停，坚持不懈，以致身体瘦削，连衣裳的带子都显得松

了。但是,他(她)并不后悔,仍然是勇往直前,不顾自己的憔悴。

在三个境界中,这可以说是关键。根据我自己的体会,立志做一件事情以后,必须有这样的精神,才能成功。无论是在对自然的斗争中,还是在阶级斗争中,要想找出规律,来进一步推动工作,都是十分艰巨的事情。就拿我们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吧,搞自然科学的,既要进行细致深入的实验,又要积累资料。搞社会科学的,必须积累极其丰富的资料,并加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在工作中,会遇到层出不穷的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坚忍不拔,百折不回,决不容许有任何侥幸求成的想法,也不容许徘徊犹豫。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成功。

工作是艰苦的,工作的动力是什么呢?对王国维来说,工作的动力也许只是个人的名山事业。但是,对我们来说,动力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我们今天的工作动力同王国维时代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了。

所谓不顾身体的瘦削,只是形象的说法,我们决不能照办。在王国维时代,这样说是可以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既要刻苦钻研,同时又要锻炼身体。一马万马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

此外,我们既要自己钻研,同时也要兢兢业业地向老师学习。打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老师和学生一教一学,就好像是接力赛跑,一棒传一棒,跑下去,最后达到目的地。我们之所以要尊师,就是因为老师在一定意义上是跑前一棒的人。一方面,我们要从他手里接棒;另一方面,我们一定会比他跑得远,这就是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说明第三个境界的词引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意思是:到处找他(她),也不知道找了几百遍几千遍,只是找不到。猛一回头,那人原来就在灯火不太亮的地方。中国旧小说常见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王国维引用

这几句词,来说明获得成功的情形。一个人既然立下大志做一件事情,于是就苦干、实干、巧干。但是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 对于这个问题大可以不必过分考虑。只要努力干下去,而方法又对头,干得火候够了,成功自然就会到你身边来。

这三个境界,一般地说起来,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就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来说,他在科学研究方面所获得的成绩是极其辉煌的。他这一番话,完全出自亲自的体会和经验,因此才这样具体而生动。

到了今天,社会大大地进步了,我们的学习条件大大地改善了,我们的学习动力也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都应该立下雄心大志,一定要艰苦奋斗,攀登科学的高峰。

1959年7月

新年随笔

1960年元旦来到,新的一年又摆在我们眼前。

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一年只有365天,实在短得算不了什么。但是从目前中国发展情况来看,“一天等于二十年”,在365天中就可以做出许多惊人的事业。

1959年是我国继续大跃进的一年,从全国工、农、财贸交通运输、文教卫生各个战线上,捷报如雪片飞来。10月到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大会,更是一件十分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许多走在时间前面的英雄们早已跨进了1960年、1961年,甚至更远的年份。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新的一年究竟有些什么想法呢?

我想到的是:再经过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我们的国家还不知道美好到什么样子哩。

就从身边的事物谈起吧。去年此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两旁还是一片矮小的旧房子,同耸入晴空的天安门比起来,显然有点不相称。然而现在怎样了呢?左边是堂皇富丽的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右边是庄严巍峨的人民大会堂。到了明年此时,现在的那一片空地上会有些什么样的建筑物矗立起来,我自己想象不出,恐怕别人也很难想象。

只有现实的事物出现以后,想象才有用武之地。

上面说的只是小例子。不用说全国,就拿北京一个地方来说,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来。

从各方面看起来,我们伟大的祖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迈进。千百年来没有人敢在天堑长江上建造桥梁;现在不但有了武汉大桥,重庆大桥也已像一条长虹一样横跨长江。铁路好像是长了腿,到处爬行;最近北京到承德的铁路又修通了。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已经投入生产。一燕知春,大概过不了多少年,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会有铁牛代替真牛。到了那时候,牛的作用恐怕也要大大地改变:它不再是耕种的主力,而只是奶和肉的来源了。

这样想得似乎远了一点,我们就谈已经来临的新的一年吧。在这继续大跃进的一年,在祖国的边疆地区目前还是一片沙漠的地方,谁又敢说这里不会矗立起一片高楼大厦、一片烟囱呢?在那些目前还是高山密林的地区,谁又敢说这里不会架起了铁架,装上了机器呢?在我们的城市里和乡村里,现在是一片平房一片田地的地方,在新的一年中,谁又敢说这里不会建成高大宏伟的大建筑物和规模巨大的工厂呢?

只有现实的事物出现以后,想象才有用武之地。

以前我总觉得,现实是慢的,只有我们的想象最快。现在我只有承认,慢的不是现实,而是我们的想象。我现在要努力让自己的想象赶上现实,行动赶上想象。这就是我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立下的决心。

1959年12月

必须用拼音字母的读法来读

读了本刊1960年12月1日和12月15日的几篇文章，以及文汇报1960年12月13日周建人同志的一封信，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因而值得展开讨论的问题。因此不揣谫陋，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为这个问题的讨论贡献一砖半瓦。

开门见山地说，我主张：必须用拼音字母的读法来读数、理、化科中的拉丁字母。

理由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现在世界上使用拉丁字母的国家非常多。英、美、德、法、意、葡、西、荷，以及北欧的丹麦、瑞典、挪威等等，都使用拉丁字母。甚至亚非许多国家，经过了一番文字改革，也都使用拉丁字母，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越南使用的也是拉丁字母，只是加了一些符号。斯拉夫语系的语言绝大部分也使用拉丁字母。许多古代语言，像梵文、巴利文等等，尽管有自己的字母，现在有时候也利用拉丁字母来刊印书籍。这只是几个例子，但也足以看出拉丁字母势力之大。

但是，尽管字母的形式相同，在不同的国家，读法却是不同的。原因也很简单：古代拉丁文字母的正确的标准的读法已经失传，因此各国就都有自己的读法，也认为自己的读法是正确的。大家都知道英、美与德、法的读法就不一样。其他国家亦然。

经过一番文字改革现在使用拉丁字母的亚非国家，不像欧洲国家那样，不可能经过一段历史发展过程，形成自己的读法。它们基本上都采用现成的读法；它同哪一个殖民主义国家关系密切过，

就采用哪一个国家的读法。比如印度尼西亚语同马来语基本上是一种语言，印度尼西亚语已经拉丁化，马来语也有人尝试拉丁化。前者字母的读法接近荷兰语，后者则采用英文读法。

上面这些事实都说明，如果说：照英文字母的读法来读拉丁字母是国际通用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既然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标准的读法，也不存在一致的读法，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一定要照英文字母的读法去读拉丁字母呢？以前有许多人这样读，那是有原因的。我们以前在中学里和大学里学习外语，英文几乎占了垄断的地位。我们照英文字母的读法去读拉丁字母，是很自然的。现在我们既然有了自己的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字母，对每一个字母又都规定了名称，那么，把数、理、化科中那些拉丁字母看成是自己的拼音字母，用拼音字母的读法去读是十分自然十分合情合理的事。现在，广大的中小学生，广大的劳动人民、机关干部和解放军的官兵，都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学习拼音字母，如果在拼音字母的读法之外再强迫他们学习英文字母的读法，那就是自找麻烦自寻苦恼。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

有人强调老教授们的习惯，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习惯既然能养成，那也就能改掉。而且在六亿多人民中间，懂得英文的老教授究竟占几分之几？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迁就这少数几个人而给广大的劳动人民、机关干部、解放军官兵，以及中小学生造成困难让他们学两套读法呢？这样做是很可笑的。

有一些从外国借来的词儿，比如 X—光，已为大家所熟悉，我们一说“爱克斯光”，大家都明白。像这样的词儿，我们就不一定非按照拼音字母的读法把它读成“希光”不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叫做“爱克斯光”的借词儿保留下来，像“咖啡”、“可可”那样。

总之，我觉得，必须用拼音字母的读法来读数、理、化科中的拉

丁字母,不再把它们看成是拉丁文的字母,而把它们当作我们自己的字母。

1961年1月2日

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

——看话剧《三人行》有感

话剧《三人行》(阳翰笙作剧、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描写了解放前后三个大学教授思想转变的情况。三个人物是三个典型。赵文浒,政治上爱憎分明;解放前夕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运动;解放后,积极改造自己,争取作一个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吴思贤,有正义感,对国民党不满,也热爱新中国;但是在政治上往往分不清敌我;参加土改后,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石人俊,顽固地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包庇自己的恶霸地主哥哥,终于彻底暴露了自己,为人民所唾弃。

作者塑造了这样三个典型,对每一个典型都有生动、具体、细致、深入的描绘。石人俊实际上是一个"反面教员"。解放后,他对新中国没有一点感情,别人兴高采烈,他却满腹牢骚;参加土改也十分勉强。他根本不关心农民,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身体和营养。他还包庇了他的恶霸地主哥哥。石人俊实际上是站在与农民为敌、坚决反对土改的地主立场上。这样一个人必然会坚决拒绝改造自己。他走的道路是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吴思贤可以算是一个中间派。他不太关心政治。虽然有一点正义感,但也是比较空洞的。他下乡去参加土改,当然不能说他没有改造自己的愿望;但是,他最感兴趣的却不是土改本身,而是他自己的业务。他偷偷地瞒了别人,让一个坏分子、恶霸地主的狗腿子罗三带路到山上去找化石。他坚决相信罗三是好人,为他百般

辩护。等到罗三的真面目被揭露,被逮捕以后,他才“仿佛从恶梦中惊醒了过来”。吴思贤接受了这个教训,全心全意参加土改,锻炼自己。赵文浒申斥石人俊包庇自己的哥哥,石人俊拒绝承认,吴思贤也认为“包庇”二字用得过分了一点。但是,一直到剧本快要结束的时候,他那种认识模糊的中间态度还没有完全改掉。

至于赵文浒,他当然是剧中的正面人物,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作者在这里塑造了一个立场分明、追求进步、永远严格要求自己、老当益壮的知识分子的左派人物。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他是一个学习的好榜样。在解放前,他不顾自己的性命,坚决同国民党的统治作斗争。解放后,他热爱新中国,热爱我们的党,时时要求进步。下乡参加土改,能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最后终于提出了入党的申请。赵文浒走向进步的过程,是使人感动的。

就是对这样一个人,作者也并没有姑息,还描绘了他的另一面。这一面就是自高自大、主观片面,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在解放前夕参加反对国民党的斗争的时候,他对石人俊说:“共产党有共产党的主张,我有我的看法,有些问题,我们的主张和看法都很一致,那倒是事实。”好大的口气!他俨然想同共产党分庭抗礼了。到了解放后进行土改的时候,他一方面非常自信,相信有办法帮助石人俊转变过来,同时又觉得自己已经锻炼得差不多了。到了农村以后,他仍然是那样自信,他同梁二顺在一起住了半个月,就认为,二顺已经把心掏给他,什么话都对他说了。他儿子赵伟森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还觉得伤了他的自尊心。他相信自己而不相信群众。土改回来以后,他的思想觉悟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了,并且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的申请。就在这时候,石人俊悄悄地耍了一个手段,他就信以为真。他对石人俊的女儿石晓芬说:“你别还拿老眼光来看他,他可跟从前大不相同啦!”这就说明,他那主观片面、过于自信的毛病还没有完全改掉。

赵文浒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虽然有些缺点,但是总想改掉,总是要求向前,要求进步。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他虽然对自己要求严格,努力前进;但是总还有一些小毛病留在身上,需要加以涤除。

作者笔下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就是这个样子。这三种类型,特别是赵文浒这样的类型,对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还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知识分子从解放前夕到今天所走过的漫长的道路吧。

在临近解放的时候,全国除了解放区以外,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统治集团胡作非为,贪污腐化,好话说全,坏事做尽,连一向生活比较优裕的大学教授也弄得焦头烂额,朝不保夕,他们即使想藏在象牙之塔里,也没有可能了。大家都感到国民党土崩瓦解之势已成,大风暴就在眼前。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刻,有的人满怀信心,像迎接朝阳一样迎接新时代;有的人迟迟疑疑,彷徨无着;有的人心怀不安,愁绪满腹。

不管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抱着什么态度,客观形势的改变并不以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终于"换了人间"。从此知识分子就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一条思想改造的道路。应该说,这一条道路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是一模一样的;走这样一条道路还是要费一些劲的。它有时候是平坦的,有时候也有一点坎坷不平;有时候带来无限的快乐,有时候也带来一点烦恼;有时候豁朗通达,有时候也碰到阻塞;有时候鸟语花香,春意盎然,有时候也难免有点阴云,带一点寒意。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有我们党的英明领导,有毛泽思想的指路明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还是大踏步地走上前去了。同时,我们身边的一切事物,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着面貌;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越来越美丽,国家的地位和声誉越来越高,社会上的

风气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改善。而且,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都可以感觉得到。这更给知识分子带来巨大的鼓舞,使我们欲罢不能,非走上前去不行。还有一个伟大光明的前景在我们眼前,光芒辉煌,强烈地吸引着我们,使我们越过越愉快,越活越年轻,干劲越来越大,精力越来越充沛。到了今天,同解放初期比起来,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像剧中的赵文浒那样,成了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了。

但是,是不是就可以说,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改造得很好,不需要再改造了呢?根据我自己的体会与观察,我觉得还远得很。我们的改造才只是一个开端,我们身上需要改造的东西还多得很。在这里,人们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有的人有这样的缺点,有的人又有那样的缺点。但是,知识分子们也有一些比较共同的缺点,那就是自高自大,主观片面。阳翰笙同志在塑造赵文浒这个典型人物的时候,优点方面写了很多,这里不再去说它,在缺点方面写了这两点,可以说是恰恰搔到知识分子的痒处。这些缺点是旧知识分子多年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工作方式所决定的,是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逐渐克服掉的。这是一个反复的、长期的过程。

因此,我们今天看到《三人行》的演出,在这三个人身上,特别是在赵文浒身上,看到这些比较普遍的缺点,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它好像是一面镜子,我们在里面可以照见自己。它一方面告诉我们,人们是可以改造的,缺点总是越改越少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告诉我们,自我改造是长期的,也并不是很容易的。我们面前还有很长的道路,我们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

最后我还要对演出说几句话。我不懂戏剧艺术,但是我觉得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出是成功的。石羽、耿震、李丁三位扮演的

三个教授各有各的特色。舒强的导演手法干净利落，效果很好。

1963年9月

看《革命自有后来人》的一点感想

我平常不大看京剧，对京剧可以说是一个外行。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对京剧就没有保守思想。我常常想：只有穿上金光闪闪的滚龙袍，登上厚底的靴子，迈着台步，这才能算是京剧；如果换上现代的服装，演现代的题材，这如何能算是京剧呢？

昨天晚上我就是带着许许多多的问号去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京剧团演出的《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可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从第一场起，紧张的剧情和精采的表演就牢牢地把我吸引住。看完之后，我的心很激动，我觉得，我一方面获得了一次艺术欣赏，另一方面又受到了一次教育。我带去的那一些问号一扫而空。

这是一次成功的演出。题材确确实实是现代的，但又确确实实是京剧。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如果由于演现代戏而取消了京剧的主要特点，那就等于取消了京剧，根本谈不到什么改革了。我觉得，这个剧保留了不少的京剧的表演特点，但又有了新的发展。

看了这次演出，我对京剧的前途有了信心。我觉得，京剧现代戏是给京剧这个剧种添注新的生命力，使它延年益寿。在今天的社会里，京剧能不能存在下去，能不能发展，就决定于它做为上层建筑能否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如果京剧墨守成规，它就会脱离广大的群众。为什么过去许多青年人不喜爱看京剧，而今天他们又排队争购现代戏的票？这个现象是耐人深思的。

是不是京剧现代戏现在就已经十分完美了？我是外行，我不敢说。但是我想，任何改革都要有一个过程，只要方向对头，大家

努力,就会逐渐从不完美到完美。当事人应认识到这一点,批评家也要认识到这一点。京剧现代戏这个方向是完全对头的,它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1964年5月

迎春杂感

“人生易老天难老”,每年都有一个春节,今年的春节又快来到了。可是,解放十五年以来,每届春节,我的感受都有所不同,心情也就不一样。年年有喜事,岁岁乐满怀,而且是一年比一年乐。

今年春节我的心情怎样呢?

先从老话谈起。在解放前,我曾在欧洲住过十年多。在这一段漫长时间内,我的心情一直是抑郁的;因为,随时随地,我都被提醒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中国人”这个词儿在当时是并不光彩的。租房子,会碰到困难,在英国尤甚。旅行,会碰到困难。甚至走在街上,坐在饭馆子里,也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横祸”。见到人,人家总问我:“你是日本人吗?”第一次这样问,我没有在意。第二次,第三次又这样问,这就引起了我的疑心。我问:“你为什么不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呢?”对方说:“我这样问曾碰过日本人(当然是那些法西斯分子)的钉子。”于是我的心头投上了一片暗影,沉沉地压在那里,一压就压了十年多。

解放以后,我又曾多次出国。每一次出国我都有新的感受。我觉得,新中国在日新月异地变,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也在随着变。“中国人”这一个词儿越来越增添着光辉,它已经走向它解放前涵义的反面了。

去年夏天,我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非洲。从开罗到卡萨布兰卡,从阿尔及尔到巴马科、科纳克里、阿克拉。所到之处,迎接我们的都是亲切的笑容、温暖的双手。从政府领导人,一直到工厂

里的工人,农村的农民,学校里的大学生和小学生,都把我们看成是亲密的朋友,有的人甚至把我们称做“兄弟”。我们随时随地沉浸在真挚的友谊中。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没有到过中国,有的人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但是他们向往新中国,热爱新中国,感觉到同中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他们有一些人读过毛主席的书,对这一位伟大人物有真诚的尊敬,他们说毛主席是“革命的灯塔”。

最使人感动的是这些国家的小孩子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儿童们对于世界大事不一定很明了,对于自己祖国同中国的关系不一定很清楚。他们可能只是从父母和老师的嘴里听到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情况,于是就在小小的心灵里埋上了一颗向往和热爱中国的种子。见到我们,眼前总算是看到中国人了。这种子就开了花、结了果。他们向我们欢呼鼓掌,有的也不知从哪里学来了一句中国话:“你好”,这时也搬了出来。有的甚至喊:“北京——毛泽东”、“北京——周恩来”。有的什么也不说,只用自己的语言说:“中国人,中国人!”这个词儿是我当年住在欧洲时听惯了的。然而,今天听起来,味儿却同当年大不相同。我只觉得它异常顺耳,异常亲切,异常甜蜜,异常动人;我感到自豪。

还有一件使我感到自豪的事情,这就是,我在许多国家都遇到中国的专家。这些人背离乡井,来到迢迢几万里之外的地方,在同祖国迥乎不同的气候条件和生活条件下,同当地的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创造出许多奇迹。他们从来不考虑自己的生活问题,只是一心一意地为当地人民服务。当地人民也不把他们当成是外国人。这同其他一些国家的所谓专家一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人一下飞机,就提出不知道多少条件:要冷气设备,要电气冰箱,要延长假期,要带家眷,要汽车,要洋房,要外汇,要这要那。这不能不使我想到,如今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么值得自豪啊!

当然,我们应该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在历史上,我们同许

多国家互相学习。今天,我们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又是互相支援。我们把这些国家的人民看做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兄弟,彼此血肉相连,休戚相关,为一个共同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今年,当春回大地的时候,我心里想到的就是这一些事情。春天是刮东风的。虽然“东风压倒西风”是一句象征性的话,但是,从全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来看,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态度来看,在这个春天开始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一句话,而且了解到这一句话的真正涵义。瞻望前途,快乐满怀。

1965年1月

坚决打击美国强盗

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越南南方碰了壁,栽了跟头,现在狗急跳墙,跑到越南北方来捣乱了。

以前他们干这种事还找一些借口,要一些花招。这一次是火烧到眉毛,急不可待,约翰逊干脆丢掉一切遮羞布,赤膊上阵了。

美帝国主义这次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又一次教育了全世界的人民,帝国主义的本性是决不会变的,对这一群坏家伙是决不能抱任何幻想的。对他们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打、打、打!

越南人民是久经考验的人民。他们过去没有对其他帝国主义屈服。今天也没有对美国帝国主义屈服。奠边府的光辉胜利指引着他们前进。他们今天挺身而起,拿起了武器,在这一条胜利的道路上走上前去,他们把美国强盗迎头痛击。只要这些强盗想来送死,天空来也好,海面爬上来也好,他们就一律照收,不给收条。

中国人民一向把越南人民看做自己的兄弟姐妹,自己的同志,他们有事,我们决不会袖手旁观。我们政府的严正声明表达了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心愿。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支援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

对于美国帝国主义这样一个敌人,我们中国人民是有充分的认识的。当年它曾扶植蒋介石匪帮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予以打击。这一批坏东西终于被消灭,或者夹着尾巴逃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美国帝国主义又到朝鲜去捣乱。

我们派出了志愿军,配合朝鲜人民军,把他们狠狠地揍了一顿,他们才夹着尾巴逃到三八线以南去了。

对待这样一个敌人,我们有效的经验就是打、打、打。

目前,美帝国主义还在张牙舞爪,拼命挣扎;但是,毛主席说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美国帝国主义当然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如果它不停止在越南的玩火,那么,它疯狂捣乱之日,就是它进入坟墓之时。

1965年1月

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

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经结束了。中国队取得了光辉的胜利,获得了男女团体、男子单双打、女子双打冠军。比起我国在上届比赛中的成绩来,这届无疑是一个大跃进。这些胜利鼓舞了全国各行各业的干劲,它已经变成了物质力量,在许多方面表现了出来。最近几天来,全国人民街谈巷议,无非是乒乓球比赛;而且谈起来精神抖擞,兴趣盎然,可见它是怎样深入人心了。

我们获得了几项冠军,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年轻选手们表现了新中国人民的风格、斗志和精神面貌。在鏖战的紧急关头,对方打了一个擦边球,裁判没有看到,而我们的选手却自动报告。在决定胜负的一局中,我们的选手能在分数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敢打敢拼,越战越勇,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他们还能在某些复杂的情况下,从容不迫,挥拍迎战。所有这一切都给外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能够从几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伟大的新中国。难道这不是十分重要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吗?

我们获得了几项冠军,这可以说是意料之内的事;但也不完全是意料之内的事。比如女子团体赛的胜利,对一些人来说,就是出乎意料的。外国朋友有这种想法的更多一些。日本朋友说,他们早就感到中国女选手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可是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女队竟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进步得这样快,打得这么好。那么中国女队进步这样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细心观察的人们一

下子就会联想到徐寅生同志对女子乒乓球运动员的讲话。这一篇充满了辩证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讲话,无可置疑地已经在她们心里产生了作用,变成了物质力量。这,已经在夺得女子团体冠军这一胜利上充分表现出来了。

我们常说,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哪里应用上它,哪里就有成绩,有胜利。这一次的乒乓球比赛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强有力的例证。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热火朝天地大学主席著作。最近几天,乒乓球赛胜利的战报又频频传来,而这些胜利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结果。我相信,全国人民会更深刻地领会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从而加倍努力地学习和应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新的胜利将会不断地传来。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根据自己亲身的体会,也会更加努力学习主席的著作,永远虚怀若谷,胜而不骄。他们的新的胜利也将会不断地传来。

1965年4月

埋葬美帝国主义

好多年以前,在春末夏初、雨季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曾在越南南方的西贡住过两个多月。那时候,美帝国主义还没有挤进越南;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在那里横行霸道,越南人民用种种方法同他们进行斗争。每天夜里,当雷鸣电闪,倾盆大雨下过之后,我伏在枕上,总听到郊区浓绿的椰林中传来清脆的枪声。越南朋友喜形于色地告诉我,这是越南人民伏击法帝国主义者。

到了今天,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西贡人民赶走了一个帝国主义,但又被另一个帝国主义挤了进来。这个帝国主义更凶狠,更残暴,更阴险,更狡猾。它使用的武器也更精良。它不但是帝国主义中的魁首,而且也集人类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之大成。它手中摇晃着导弹、原子弹,它的飞机在天空乱飞,它的军舰在公海上横行。它还拉拢了一批走狗喽啰,送来了一批批炮灰。这一批家伙什么坏事都敢做,都做得出来。他们烧、杀、掳掠,砍脑袋、割舌头、挖心、剖腹、吃肝,而且以此为乐。他们放毒气,丢凝固汽油弹,血洗村庄,焚烧房屋、树林。他们的残忍性,比起野兽,有过之无不及;野兽吃人只是为了充饥,决想不出这些两足野兽所要的花样。

但是,这样他们还不满足。他们还要到越南北方去捣乱。他们不但狂轰滥炸和平的乡村和城市,不惜使用导弹,而且大言不惭地昭告天下,咸使闻知。在他们心目中,根本没有其他国家的尊严,没有其他民族的尊严,只有他们是人上人,是天之骄子,他们有权派兵到任何他们愿意去的地方,有权到处“维持秩序”。他们自

封为国际宪兵、世界的主宰者。

对待这样的侵略者，人类共同的敌人，决不能只动口不动手。只有动手，才能使他们头脑稍微清醒一点。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是正义的，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他们拿起了枪，抗击侵略者。不管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弹，不管你空中飞的是什么飞机，你一来我就打。越南北方人民是正确的，他们也拿起了枪。不管你的飞机是什么式样的，来了就打你个倒栽葱。美国人民是正确的，他们集合起来，从四面八方涌向约翰逊的老窝，向他示威，表示坚决反对侵略越南。全世界人民也是正确的，他们函电交驰，呼声震天，抗议美国强盗的暴行。约翰逊这帮匪徒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中，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我们中国人民对这一群家伙从来不抱什么幻想，我们也不相信他们的什么“明智”。我们决不相信，他们会忽然发善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他们张牙舞爪，我们觉得这是正常的；如果他们慈眉善目，摆出一副菩萨面孔，我们也不会上当。我们要撩开他们的燕尾服，看清藏在里面的狐狸尾巴；我们要拨开他们的橄榄枝，看到他们手上的利剑。

也许有人说：现在，核垄断已经打破，美国的工业又比较集中，美帝国主义还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战争，扩大战火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知道，古今中外一切的反动派是有他们自己的逻辑的。在这方面，他们同人民没有共同的语言。侵略、压迫成性，不会有什么慈善心肠。他们总是夸大自己的力量，低估人民的力量；直到碰得头破血流，进了棺材才罢休。东条英机、墨索里尼、希特勒就是最好的例子。约翰逊之流是下定决心要走这一条路的。连美国议员都说，约翰逊每天二十四小时搞的全是战争。我们对他更千万不能稍存幻想，或有半点侥幸的心理，不能失去警惕。

对世界上的一切坏东西,往坏处想它总是不会错的。是毒蛇,就会咬人。是狼,是老虎,就会吃人。天底下决没有不咬人的毒蛇,没有吃素的老虎。老虎如果吃素,就不成其为老虎了。反动派如果不干坏事,也就不成其为反动派了。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3 页。)像美帝国主义这样反动的东西,不管它手里拿的是利剑,还是橄榄枝;是大棒,还是胡萝卜,当头给它一棒,是绝不会错的。

现在全世界人民已经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个道理了。全体越南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这个道理。他们的斗争越来越取得辉煌的胜利。从越南南方到北方,从西贡周围,从昏果岛到一切战斗着的乡村和城市,天天都传来胜利的消息。我想,现在住在西贡的人们,夜里伏在枕上听到的将不仅仅是从郊区浓绿的椰林里传来的清脆的枪声,而且一定还有从喧闹繁华的市区内传来的剧烈的爆炸声。如果再听得远一点,我们还会听到从非洲的刚果(利)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从拉丁美洲的多米尼加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从世界上一切有美国强盗的地方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这些声音将会汇成一股无比强大的洪流,把美帝国主义彻底埋葬。

1965 年 5 月

亚非人民心一条

最近十几年来我曾在国内各种场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亚非各国的朋友；我也曾在亚非两洲辽阔的大陆上访问过许多国家。无论从自然环境上来看，还是从历史传统上来看，这些国家都是十分不同的。风俗习惯是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字是五花八门的；考虑问题，各有各的角度；观察事物，各有各的方法。就是在生活细节方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喜欢吃甜，有的喜欢吃辣；有的坐在桌旁，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穿棉袄、披羊裘；有的一生没有见过冰雪，终年单衣。

这样的差异是数也数不完的。

我最初同他们交往，心里确有些顾虑。我要跟他们说些什么话呢？要说“今天天气好”嘛，说上一两次，自己都感到烦腻了。要谈他们的东西，我又不完全明白；要谈我们的东西，又怕人家听了不感兴趣。有些时候，我真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尴尬了。

但是，过了不久，我就发现，自己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是十分可笑的。尽管我们说的话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有共同的语言；尽管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却亲如兄弟；尽管我们思考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却有共同的一条心。

有一次，我又经过巴基斯坦。在东巴基斯坦刚换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一位驾驶员就走过来同我寒暄。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却非常喜欢中国人。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把飞扬跋扈骄纵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狠狠地揍了一顿，给亚

洲人民脸上增了光。他又告诉我,周恩来总理不久以前乘过他驾驶的飞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光荣。中国领导人那种亲切友好平易近人的风度,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周总理同他们每个人都握过手,而且是热情地握手。当我们分别时,他也热情地同我握手,仿佛想把周总理对他的那种热情分给我一点似的。

我们在达卡下了飞机。因为飞机票事前没有订好,我们无法前进了。我们都是第一次到这个城市来,既无中国领事馆,又无朋友,可以说是举目无亲。而且那时候正是穆斯林到麦加去朝圣的季节,飞机场上闹闹嚷嚷挤满了人。如果排队,三天以后才能轮上。我们到办公室里去了一趟,里里外外挤着不知多少人,其中也有不少的外国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到卡拉奇去。我们心里真有点急了。我们的日程安排得像螺丝钉一样地紧凑,一天也不能等,何况三天呢?我们左找右找,最后终于找到一个穿航空制服的巴基斯坦朋友。看来他并不是专管卖票的。我们的请求显然给他带来了困难,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但他并没有拒绝。他带我们东闯西闯,最后在一间离开大楼有一段路的行李室里弄到了明天凌晨起飞的票。我们好像是漫游奇境的阿丽斯,票到了手,还不知道是怎样来的。我们脸上有了笑容,我们的巴基斯坦朋友的眉头也伸展开来。他请我们喝了几瓶汽水,告诉我们,他在不久以前就在这个机场上看到过周恩来总理。

又有一次,我从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乘飞机到开罗去。我的邻座上坐上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她的身体胖得出奇,她不但把整个座位都填了个满而又满,而且还胖了出来,把我的座位也侵占了一角。她的胖腿堵塞了座前仅有的空隙。我局促在一个角落里,老实说,我是多么希望飞机赶快起飞,赶快到达目的地呀!然而那一位老太太说话了。她告诉我,她是叙利亚人,是到开罗去看亲戚的。她把开罗绘声绘色地描述给我听:高耸的洋楼、繁华的

街道、汪洋浩瀚的尼罗河、广阔无垠的大沙漠在她的嘴里都成了活生生的东西。我越听越有兴趣。最后,她的话一转,就转到中国。她说,她对中国是一点都不了解的;但是,她却知道,中国人赶走了帝国主义者,人民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她们的国家也把那些坏东西赶走了。她希望亚非各国的人民都把那些瘟神消灭,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说着说着,这一位老人脸上不禁浮起了微笑。我也不禁笑了起来,刚才那种局促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

非洲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一片蓬蓬勃勃的革命风云。沉睡了几百年的大洲现在觉醒了。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他们反对的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我所到的地方,同当地的朋友们谈话,谈来谈去,总离不开这一个主题。在塞得港,当我们乘船泛游苏伊士运河河口的时候,阿联朋友指给我们看河对岸的一片新房屋,那是英法侵略者破坏后阿联人民又重建起来的。一提到当年的搏斗,阿联朋友就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一种自豪感,同时也流露出对中国人民的感谢。在摩洛哥的名城卡萨布兰卡,当我们喝着加上薄荷和糖的龙井茶的时候,当地的朋友就告诉我们,当年就在喝茶这样一件小事上面,殖民主义者也不会忘记掐住他的脖子。这些坏东西从中国运了茶来,一转手就获利几倍。在英雄的阿尔及利亚,当我们乘汽车从阿尔及尔到君士坦丁去的时候,陪我们的一个阿尔及利亚的兄弟就给我们讲当年做为抗法战争一个根据地的君士坦丁的情况。这个兄弟是一个老游击战士,他的家就在这里,他也在这里战斗过。因此,他讲述这个圣战,就充满了激情。他历历如数家珍,指给我们,在某一个山头上是怎样战斗的,在某一片森林里是怎样战斗的。他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圣战中去,也仿佛把我们带到那个圣战中去。他再三说,他永远不能忘记,在他们最艰苦的日子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支援。在他还没有见到过中国人的时候,他的心早已

同中国人民的心联在一起了。

到了黑非洲,这种仇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情绪就更显得浓烈。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在这里,那些勇敢、聪明,有着悠久文化的人民,几百年来被看做是野蛮的、愚昧的人民。他们给殖民主义者束缚住手脚,只能做被指定做的事情。连种粮食、种菜、种水果都没有自由。殖民主义者规定好:这个国家种水果,就只能种水果;那个国家种菜,就只能种菜。一切以殖民主义者的颐指气使为转移。他们甚至不被看做是人。在科纳克里、阿克拉等靠海的城市里,可以看到许多矗立在海岸上的古堡。这是当年监禁非洲人准备把他们装船运走的地方。他们从这里像牛马一样被运出去,运到远离祖国几千里几万里的地方,世世代代,在那里做牛做马。他们的血肉把外国资本家养得脑满肠肥,他们的白骨铺平了农场和矿山。到了今天,谁走进这些堡垒,那又高又厚的墙壁和阴森可怕的地牢,还会让人毛骨悚然。这些不会说话的古代建筑将永远砥砺非洲人民的斗志,激发非洲人民的正气。它们是最好的教材。在这样的情况下,非洲人民念念不忘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很自然的吗?他们见到中国人,共同的命运带来共同的语言,把中国人像兄弟般地看待,这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这样的活教材,在亚非国家还可以找到许多。而且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还在那里天天制造。它们随时提醒我们:决不能忘记共同的敌人。我们走遍亚非大陆,到处都有同样的感觉。因此,不管我们风俗习惯是多么不同,不管我们的语言文字是多么有差异;但是,一讲到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大家立刻就有了共同的感情,有了共同的语言,我们的心立刻挨近了。我是搞语言的,我决不会低估做为交际工具、交流思想的工具的语言的作用。但是,有时候,我却也会觉得语言的作用不是那么大。在辽阔的亚非大陆上,我们碰到许多素昧平生的人,邂逅

一遇,转眼睽离。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说话,一握手,一微笑,仿佛就表达了千言万语。这不是小事情,这是巨大的力量,几亿人民心连心产生出来的力量。它能动星辰,摇山岳,去旧日,换新天。它终将干净彻底地埋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1965 年 6 月

从拿来主义谈到借鉴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众所周知的。他明确表示:“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在这里明确提到文艺。他自己就是毕生从事于介绍外国文艺的工作,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毛主席也教导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做为我们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就文艺而论,鲁迅的拿来主义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借鉴,二者的精神是相通的,都是大家所拥护的。

但是,怎样去理解这一教导的精神实质呢?为什么“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呢?如何把这些意见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呢?在这里恐怕就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看法。有一些看法是容易说清楚的,人们也敢于把这些看法说清楚的。另外有一些看法却不是这样。在过去许多年内,特别是在“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之日,我们好多人实际上是不敢说清楚,不许说清楚。不许我们动脑筋,因而也就不敢动脑筋。文章能不写,就不写;非写不行,则凑合一篇新八股,搪塞一番了事。

就以拿来或借鉴来做例子吧。这里面就有容易说清楚的问题

和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讲到拿来或者借鉴，不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或者艺术性；一个是内容，或者思想性。形式方面的拿来或者借鉴，是显而易见的，是容易说清楚的。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先例很多。比如歌德的《浮士德》，里面一开头就有一个“舞台序曲”。大家都知道，这种形式是从印度拿来的。有人甚至说，伊朗古代的四行诗(Rubayiyat)和中国的绝句(不管是五言绝句或是七言绝句，都只有四行)，也有姻缘关系。在这方面没见到什么有说服力的文章，不过有这样的猜测而已。至于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学作品，新诗、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等都包括在内，在最初确实是模仿西方的作品，这是人人都承认的。鲁迅的短篇小说，从形式上来看，既不同于唐代的传奇，也不同于明代的《今古奇观》式的短篇小说，同《聊斋志异》也不一样。这是鲁迅从西方，特别是俄国，拿来的。这是一种旧形式，鲁迅在里面加上了新的内容，就成了崭新的带有民族气息的作品。

但是，说到内容，问题就不这样简单，问题就不大容易说得清楚。我们究竟应该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拿”些什么样的内容“来”呢？即使在外国文学作品中是精华的东西，对今天的我们来讲，主要还是认识的意义，我们也决不会直接就拿来的。比如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那些唯物主义的思想，那些蔑视命运、批判腐朽的封建道德的思想，在当时当地，确实是凤毛麟角，十分难能可贵，确实是民主性的精华。但是我们还需要把这些思想直接拿来做为借鉴吗？毛主席所说的“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重点是否主要是放在形式方面呢？

与拿来主义或者借鉴有关的问题，并不限于上面说的这一些。比如欣赏问题，也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清代诗人赵瓯北(翼)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论诗绝句：“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的意见，我只同意一

部分,这就是,文学必须随时创新,不能老是墨守成规。但是,他说李杜的诗篇已经不新鲜,恐怕与事实不符。赵瓯北的"至今"是指十八世纪末叶或十九世纪初叶,到现在已经快二百年了。可是李杜的许多诗篇到今天还能引起人们感情方面的共鸣,难道说这不是事实吗?为什么阶级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而文学作品却照样得到人们的欣赏呢?马克思讲到古代许多神话有"永久的魅力",这话又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来,我就不再举下去了。因为,我在这里没有提出什么新鲜的见解,我的目的也不在于提出什么新鲜的见解,我只想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不容易说清楚或不敢说清楚的问题。我只想提出一个愿望,就是把这些问题说清楚。现在"四人帮"被打倒了,套在我们头上的精神枷锁已经打碎了,形而上学的紧箍咒也已失灵了。现在全国的知识分子真可以说是精神振奋,意气风发。他们的干劲空前高涨,他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以前被认为是"禁区"的,现在也有人敢去碰了。大家下定决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现在是时候了。我们从事于文学研究工作的人也不应该甘居下游,我们应该敢于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敢于对某一些旧的以前不敢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那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谨小慎微、万马齐喑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78年4月

回顾与前瞻

在“四害”横行的那些年月里，“四人帮”及其爪牙，出于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到处兴风作浪，给我们社会主义伟大国家造成极大损害，外国文学的研究也被糟踏得不成样子。在这里，同在其他领域里一样，是非混淆，人妖颠倒。善于以意逆志者，立地成龙；稍有触犯者，忽然化蛇。在那种白色恐怖下，我们这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们，日子真不好过呀！前也不行，后也不行；左也不行，右也不行；急也不行，慢也不行；干也不行，不干也不行。总之是让你彷徨迷惑，无所适从，堕入了一个疑团蜂拥的大漩涡中。

有青年同志想了解一点外国文学的情况，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要求介绍几本外国文学作品，我们不知道介绍什么好。在教学中需要讲一点外国文学作品，我们不知道讲什么好。偶尔有外国朋友问到中国研究外国文学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回答什么好。一个不知道，两个不知道，第三个还是不知道。

倘若在教学中碰到非讲点外国文学作品不行的时候，那就等于将了军。在无可奈何中，只有乞灵于道听途说，从中听那么一点气气儿，据说“首长”说了几句什么屁话，就仿佛捞到了一点什么。但捞到的是什么呢？是《飘》，是《基度山恩仇记》，如此等等。这样的东西能给青年学生介绍吗？我们走到书店里，看不到一本外国文学作品的汉译本。难道所有的外国优秀文学作品都不行了吗？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深通各国文学，特别是古代希腊

和罗马的作品。马克思能整段整章地背诵希腊悲剧,背诵莎士比亚的剧本,对但丁和歌德都有深刻的研究和确切的评价。他曾指出来过:古代神话有永恒的魅力。这些光辉的榜样都被抛到哪里去了呢?伟大的列宁也精通许多国家的文学,他对托尔斯泰的分析和评价是人所共知的。他教导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样具有深远意义的指示被抛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精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这些伟大的指示被抛到哪里去了呢?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毕生兢兢业业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就在他逝世之前,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包围中,在国民党特务张春桥一类的诽谤攻击中,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以惊人的毅力从事译作,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介绍不止。在逝世前不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鲁迅这一面光辉灿烂的明镜被抛到哪里去了呢?我反正是,满肚子疑团,满脑袋问号,彷徨迷惑,无所适从。有时候从朋友们那里听到点什么,自己也发牢骚说上点什么,但不得了呀!一遇到适当时机,"四人帮"及其爪牙要来追谣了,神经又要紧张上一阵。而这种时机是"四人帮"手中的杀手锏,随时可以使用。"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们在心中也这样叹息了。

"雄鸡一声天下白","四人帮"垮台了。我们同广大革命人民分享了胜利的喜悦。我们的心合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锣鼓声而颤动,我们的血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口号声而沸腾。特别令我高兴的是,我脑袋里疑团冰释,豁然开朗:原来如此。我立刻想到唐代

伟大诗人杜甫的那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著名的诗。诗的前四句是:“剑外忽传收苏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诗句才能表达我们喜悦的心情于万一。

但是,在庆祝了伟大胜利之后我仍然要先舒一舒愤懑,吐一口气。因为这口气不是个人的私气,而是人人共有的公气,大有一舒之必要。目的也只在提醒大家,我们有过那么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不能忘记,从而增添工作的动力,如此而已。

魑魅匿迹,魍魉销声,愤懑既舒,干劲倍增。纵观五洲四海,翻腾震荡;喜看赤县神州,安定团结。现在正是我们焕发精神,努力工作的时候了。我们首先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努力地学习革命导师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教导。我们的学习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我们应该,而且也能够,学出一个新的水平,用出一个新的水平。并以此为武器,来正确地分析评价外国文字作品。对于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教导,要更进一步加深理解。在这里,关键就在那个“用”字上,我们要认真体会,努力实践。对于译文质量,我们也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应该精益求精。我们要像鲁迅那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鲁迅曾再三强调,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还有一个发展完善汉语表达能力的问题。这一点好像为很多人所疏忽,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至于向工农兵学习,培养新生力量,自然同样适用于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贯彻双百方针,更是刻不容缓。“四人帮”造成的那种独断专横、求全责备、形而上学猖獗的作风,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总之,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既艰巨又光荣,既繁重又紧迫。但是,坚冰既已打破,航道必然畅通,行将见八亿神州,繁花似锦,万紫千红,春色满园。毛主席曾经指出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随着

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也必然有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伴之而来，让我们团结起来，去迎接这个伟大的文化建设的高潮吧！

1978年

欢迎啊，新同学们！

新同学已经进校了，我做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热诚欢迎你们。

我在北大工作已经超过三十年了。几乎每年一度的迎新，都带给我兴奋与愉快。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是自然界与社会的规律，有新鲜血液输入是一件大好的事情。我的兴奋与愉快不是很自然的吗！

特别是今年迎新，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我们：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但是我看更重的担子却是压在年青一代的肩上。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你们要发光发热，而且要越来越大、越多。我相信，你们会知道怎样去完成这个任务的。如果还需要我谈些什么的话，我就只能说几句老生常谈：要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做到三好，做到又红又专。红专这个概念已经被"四人帮"搞混乱了。他们讲"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实际上是既否定红，也否定专。红专是对立的统一，缺一不可。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什么时候也是这样。但这并不等于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都用到政治上，才算是政治挂帅。应该正相反，把时间主要用到钻研业务上。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把业务钻研好，这也就是政治。没有业务，四个现代化是无法实现的，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不知道，青年同志们对于"业务挂帅"、"智育

第一”一类的帽子是否也还“心有余悸”。那种“余悸”是完全不必要的,是害人的,是“四人帮”的余毒的一种表现,我们要彻底批判。

在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叫做《春满燕园》,颇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据说有一些地方竟把它选入中学教材中。我只不过是歌颂了燕园中琅琅的读书声。然而却竟冒犯了“四人帮”,他们口诛笔伐,对我进行了多次批判。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在大学里念书难道也算是犯罪吗?然而曾几何时,“四人帮”垮台了,我们现在的燕园中却又是书声琅琅,而且远远超过了十多年前的盛况。看今天的物候虽然已是深秋,然而,在我的感情上却觉得恍如三春。现在你们这一些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人又进校来了。你们更仿佛把繁花似锦的明媚春光带进燕园,如果我现在再写一篇短文的话,我就有了一个现成的题目:《春归燕园》。就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把这春光永远保留在这燕园里,在新的长征的征途上,大踏步前进吧!

1978年9月

外语教学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国各行各业都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外语工作者也决不能后人，要下定决心，把这项任务同我们的具体工作结合起来，努力奋斗，以求贯彻。

实现四个现代化，重点应该放在科技方面，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也决不能把四个现代化理解得过于狭隘，决不能认为科技以外的工作都不应该做。我们应该着眼于极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把眼光放远一些。

专就科技而论，尽管我们目前从事外语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多半对科技了解不多，做起工作来会有不少的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有大量工作可做。举其大者，约有以下诸项：

一、努力提高外语教学质量，钻研外语理论，试行新的教学法，使用最新的教学设备，多快好省地培养高质量的中学外语师资（这里指的是英、德、法、日、俄等通用语种）。

二、在综合大学内，加强理工科公共外语课的教学工作。

三、帮助理工科教员尽快掌握外语。

四、帮助准备出国学习的教师和学生尽快掌握有关的外语。

五、如果有需要的话，同理工科教师密切配合，翻译外国科技资料。

六、同理工科教师密切配合编好科技教科书。

七、同理工科教师密切配合编好科技词典。

八、办好外文科技刊物。

以上只是临时想到的几个例子。我们因时因地还会找到更多的工作。我们自己也必须而且能够学习一些科技知识,用来丰富我们的头脑。从长远来看,主要还是要靠科技人员自己去提高外语水平。我们相信,在将来的某一个时期,他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步。

从目前来看,我们外语工作者当然还有别的工作可做。小语种更是这样。我们还要在外国语言、文学、历史、现状等等方面进行探讨。这些也都是重要工作。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基础也决不能说是很雄厚,这些工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于提高我们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决不能说是可有可无。总之,我们从事外语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们,任务是多方面的,又是非常艰巨的。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吧!

1978年10月

大力开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了。在这一代人的时间内，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绩。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面，我们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成绩并不那么理想。

我们在这方面本来是应该取得更大的成绩的。首先，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其次，我们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优越条件：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历史的民族。当年我在国外读书时，一位教授曾对我说过：许多欧洲学者认为，世界古代只有中国人和希腊人有科学，而中国的科学就是历史。可见外国学者对我们传统的历史科学评价之高。事实上，我们已经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了，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正史。此外还有不知道多少形式的历史著作。经书里面，子书里面，文学家的集子里面，都有不少宝贵的史料。这些史料，真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尽管这里面也难免有一些歪曲事实的记载，有一些带阶级偏见的说法，有一些迷信和幻想的成分；但是总的说来，这些记载是比较翔实可靠的，比较实事求是的。这里面不但有对本国的记载，而且也有对外国的记载。我国历代都有许多官员、学者、旅行家、宗教信徒，特别是佛教僧侣，到过许多国家，写过许多著作。没有到过外国的历史学家，也尽量从别人口中、书上，搜集资料，写成著作。这些著作得到古今许多国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就拿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来做个例子

吧。这一部书已经被译成了许多外国文字。英国历史学家斯密士说:“对这一部著作无论评价多高也不会过分。”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教授说,《大唐西域记》的记述是“神奇的记述。”印度历史学家阿里教授说:“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要想重建印度历史是决不可能的。”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文学史、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引用玄奘的著作,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有这样优越的条件,为什么成绩并不算太大呢?这里面原因是很多的。我们对这方面注意不够,对研究中外关系史的现实意义认识不够,这是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在“四人帮”猖獗的时代,他们这一帮人骨子里是民族虚无主义,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民族自大狂。他们只允许人们说,我们的文化如何如何输出到国外,外国的人如何如何学习我们。一谈文化交流,一说我们也学习过外国,“洋奴哲学”、“崇洋媚外”的大帽子就立刻飞了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外关系史几乎成了禁区。连那些对这门科学有兴趣的人们也都觉得,还是以不碰为佳,免得招惹天外飞来的横祸,有口难辩。实际上,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国家无论大小,都各有优点与缺点;取长补短,是正常的现象,是发展自己的文化的重要手段;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光出不入的国家;一部灿烂的文明史就是各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创造出来的。善于学习是有力量的表现,而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衰落的朕兆。

今天,当我们全国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大力开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鉴往知今,促进我们建设工作的开展。我觉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大力搜集、整理、编纂、注释我们史书上有关外国的材料,同时也要钻研有关的外国著作,搜集外国有关的资料,把我们的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工作抓起来,向前推进一步。这是我们在学术上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应该当仁不让,把这工作承担起来。我最近几年来见

到不少的外国学者：印度、伊朗、日本、孟加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的都有。他们也都关心这个研究工作，他们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同他们的友谊是世界史上的佳话，是值得我们骄傲和欣慰的事情。他们都渴望同我们协作，各自搜罗自己一方面的资料，然后综合起来，写成有高水平的中国同他们国家的关系史。他们有的甚至提出十分具体的建议，比如双方各派学者若干名，组成一个研究写作班子，限期成书。我们应该热情地响应这种呼吁，同外国学者合作，继承和发扬我们这个光荣的传统，促进我们的友谊，为了加深我们的相互了解，为了各自民族更光辉灿烂的前途，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而作出努力。

1979年5月1日

漫话历史题材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文艺界迎来了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许多被“四人帮”血口喷人诬陷打击的老作家恢复了名誉，振奋了心情，正在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从事写作，希望在有生之年写出更好的作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一批年轻的小将，思想本来就没有多少框框，正在斗志昂扬，勇闯禁区，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写出了一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作品。眼前的文艺界确实一派大好形势，无论谁看到都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心有余悸，思想没有得到解放，前怕狼，后怕虎，活像小脚女人走路，同今天的形势，完全不能适应。甚至还有少数同志思想僵化，或者半僵化，望禁区而却步，谈帮派犹变色，无穷无尽的忧虑，数不完的清规戒律，这也不敢，那也不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已经开过，肯定了党的路线。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完全不适应的。群众“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文艺工作者必须倾听群众的呼声，满足他们的愿望。

这里面问题很多，我只谈一谈文艺作品的题材问题。

同别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让“四人帮”给搞乱了。根据马列主义经典作者的意见，题材本来不应该有什么限制的。主要问

题是作者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这是决定一切的。但是“四人帮”却别有用心地叫嚷什么只准写十三年,否则就棍子乱打,辫子乱抓,帽子乱扣,仿佛犯了弥天大罪。就算是写十三年吧,他们又设置了种种障碍,又搞什么三突出,仍然是一系列的枷锁,套在作家的脖子上,让人们喘不出气来。总之,“四人帮”的险恶用心,就是扼杀一切文艺创作,只剩下他们的“样板”,只剩下他们的儒法斗争。

我现在想再把题材的范围缩小一下,缩到利用中外古代题材的问题上。这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是不可想象的,没人敢谈的。连写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连写解放后十七年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不允许,更哪能谈利用中外古代的题材呢?但是世界各国文学史都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各国都有一些伟大的作家利用历史资料而取得伟大的成绩的。在外国文学方面,我只举一两个例子,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英国的莎士比亚,大家都知道,他写过不少的历史剧,一直到今天还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也是属于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列的德国的歌德和席勒,也都利用历史题材写过不少的受到人民群众热烈称赞的剧本。除了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和席勒以外,各国文学史上都有很多的大作家,不管是戏剧家,是诗人,还是小说家,都曾利用历史题材写出了为当时的人民群众所欢迎而一直到今天还葆其青春活力的作品。

我现在再举一些中国的例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利用历史题材的例子多不胜举。司马迁,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写的一些《本纪》和《传》,实际上是借历史人物的活动抒发自己的牢骚和愤懑,这些也都是文学作品。这当然同利用历史题材来创作还稍有所不同,我不过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而已。

真正利用历史题材来创作的例子也是很多很多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就是写的两个历史人物杨贵妃和唐玄宗的爱情。以后在宋代志怪及传奇文中，利用历史题材的还有不少，比如宋朝乐史作的《杨太真外传》，就是利用杨贵妃的故事；《赵飞燕外传》利用汉赵飞燕的故事。宋代的话本，历史题材更多，什么《唐太宗入冥记》、《孝子董永传》等等都是。利用唐僧玄奘赴西天取经的故事以创作文学作品，自宋元就已开始。到了明朝遂有了《西游记》这样脍炙人口的作品。《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也都可以说是历史题材。而从元代起，戏剧取材于历史的更是多得很，此风流传沿袭直至清代未衰。许多京剧或地方剧，题材都是从历史上取来的。有的是国家大事，也有些是市井小事。这些事件都变得家喻户晓，老幼皆知。过去许多不识字的老百姓之所以能够有一点中国历史的知识，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看剧、听剧。我们现在真正没法估计，中国旧剧在这方面究竟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近代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也曾利用历史题材写过一些小说，都收在《故事新编》里。鲁迅利用旧题材，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好多故事内容都经过了一番考证，比如《出关》和《采薇》等等。但这并不妨碍他用旧瓶盛新酒。他在这些小说中所表现的爱与憎，歌颂与讽刺，都是针对当前的人物和事件的，在这方面他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一点也不含糊的。

我们为什么要利用历史题材呢？我们今天的文艺当然要以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为主，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今天要写的题材多得很。我们要描绘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的动人事件和英雄人物，借以鼓励大家前进。我们要提倡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我们也要大力歌颂像张志新烈士这样的英雄人物、优秀党员。我们当然也要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当前的政治

服务的，都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向着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必不可缺少的。但是仅仅这一些还是不够的。文艺的生命在于丰富多采，单调是文艺的大敌。仅仅用一种题材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要提倡风格多样化，形式多样化，体裁多样化，也要提倡题材多样化。正如吃饭一样，天天吃同样的东西，是会倒胃的。天天是阳春白雪，不行；天天是下里巴人，也不行。因此古代历史题材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它同现代、当代的题材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表面不同，实则一致，它除了给人以艺术享受外，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历史知识，帮助人民总结历史经验，丰富人民的智慧，提高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帮助人民从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分清是非，辨别邪正。像包拯、海瑞一样的清官，今天不正在受到一些老百姓的欢迎吗？

利用历史题材，并不等于写历史。我们当然不能歪曲历史，但也不必斤斤计较历史细节。题材是旧题材，思想内容却完全是新的思想内容。用句通俗的话就是“借题发挥”。借用历史题材抒发自己的感情。历代利用历史题材的诗歌、小说、戏剧，抒发出来的感情都是作者的思想感情。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在这里关键是作者，题材不是关键。鲁迅先生说：

>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08页《革命文学》1927年）
>
> “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鲁迅全集》第十卷，第236页，1934.10.9信）

我们首先都要争取作一个“革命者”，一个“斗争者”。只要有了这个先决条件，我们不妨提倡一下利用历史题材写诗，写小说，编剧本，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迎来一个比现在更为光辉灿烂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文艺的春天。

1979年6月30日

从黄山向《边疆文艺》致意

我曾多次访问过昆明，也曾周游云南。对于苍郁浓绿的西双版纳，对于天下奇观的石林，对于昆明的龙门和滇池，我曾热烈地歌颂过，而且写成了文字。对于下关月、上关花，我也曾热情地歌颂过；但是这月、这花实在是太奇妙了，我怕我这一枝拙劣的笔玷污了它们，至今还没有写成文字，只在我的心中有这月，有这花，这比文字更加真实，更加永恒。有了这样的真实与永恒，我可以说是已经同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是同云南的文艺界结缘还是今年春天的事。今年初春，我又访问了昆明。想到含恨死在那里的老友李广田，悲从中来，不禁形诸文字，就发表在《边疆文艺》上。从此我又可以说是同云南文艺界结下了不解之缘。

今天我来到了名扬天下的、我梦寐求之已久的黄山。我登上了始信峰，我想起了昆明的龙门。我登上了飞来石，我想起了昆明的龙门。我登上了许多壁立千仞、下临无地的山巅，我都想起了龙门。所不同者只是，在龙门上看到的是汪洋浩瀚的五百里滇池，在黄山看到的却是汹涌翻滚、瞬息万变的云海。我在这里当然想到了云南的茶花。可惜现在黄山不是开花的季节，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早已开过，只在听本地人叙述开花时情况的谈话中，看到或者幻想到满山红影而已。现在展现在我眼前的是悬崖峭壁上苍翠欲滴的古松。但是，一转瞬间，我仿佛看到这些苍松都开满了碗口大的茶花，姹紫嫣红，五彩缤纷。这真是宇宙奇观；但是，在宇宙间能欣

赏这种奇观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不向别人谈到这个奇观,因为,此事只堪自怡悦,不足为外人道也。我当然也歌颂黄山。但是黄山的奇妙,至少不在下关月、上关花之下,我能否写文字,我敢不敢写成文字,眼前确实还没有把握。无论如何,继云南之后,我同黄山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现在在黄山也想到了《边疆文艺》。我觉得,它也像是一朵茶花,在我们祖国的边疆地区赫然怒放,发出了眩目的光辉。它同下关月、上关花一样,在我的心中占据着一个真实而永恒的地位。

我今天就从距离昆明数千里的遥远的黄山向云南致意,向昆明致意,向《边疆文艺》致意。对于云南和昆明,我相信,我一定还会回来的。对于《边疆文艺》,我相信,这一朵边疆的奇花将会永远开放下去,而且越来越发出更灿烂的光辉。从此以后,下关月、上关花、洱海、滇池、龙门、石林,连同那里的《边疆文艺》,以及这里的黄山,将在我的心中占据一个地位,真实而永恒。

1979年8月11日于黄山

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来的

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来的？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过去没有考虑过。我考虑得最多的反而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能倒转回去五十年的话，我是否还会走上今天这样一条道路？然而，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复一直是摇摇摆摆，不太明确。这里就先不谈它了。

我现在只谈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来的。我在大学念的是西方文学，以英文为主，辅之以德文和法文。当时清华大学虽然规定了一些必修课，但是学生还可以自由选几门外系的课。我大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杂家，爱好的范围很广。我选了不少外系的课。其中之一就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另一门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以《六祖坛经》为课本。我从来就不相信任何宗教。但是对于佛教却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我知道，中国同印度有千丝万缕的文化关系，很想了解一下，只是一直没有得到机会。陈先生的课开扩了我的眼界，增强了我的兴趣。我曾同几个同学拜谒陈先生，请他开梵文课。他明确答复，他不能开。在当时看起来，我在学习梵文方面就算是绝了望。

但是，天底下的事情偶然性有时是会起作用的。大学毕业后，我在故乡里的高中教了一年国文。一方面因为不结合业务；另一方面我初入社会，对有一些现象看不顺眼，那一只已经捏在手里的饭碗大有摇摇欲坠之势，我的心情因而非常沉重。正在这走投无路的关键时刻，天无绝人之路，忽然来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了

到德国去学习的可能。德国对梵文的研究,是颇有一点名气的,历史长,名人多,著作丰富,因此有很大的吸引力。各国的梵文学者很多是德国培养出来的,连印度也不例外。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我那藏在心中很多年的宿愿一旦满足,喜悦之情是无法形容的。

到了德国,入哥廷根(Göttingen)大学从瓦尔德施米特(E. Waldschmidt)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他给我出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印度古代俗语语法变化。从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础。苦干了五年,论文通过、口试及格。由于战争,回国有困难,被迫留在那个小城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应召从军。他的前任西克(E. Sieg)教授年届八旬,早已退休。这时就出来担任教学工作。实际上只有我一个学生。西克教授是闻名全世界的研究吐火罗文的权威。费了几十年的精力把这种语言读通了的就是他。这位老人,虽然年届耄耋,但是待人亲切和蔼,对我这个异邦的青年更是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学习吐火罗文和吠陀。我却不过他的美意,就开始学习。这时从比利时来了一个青年学者,专门跟西克教授学习吐火罗文。到了冬天,大雪蔽天,上完课以后,往往已到黄昏时分。我怕天寒路滑,老人路上出危险,经常亲自陪西克先生回家。我扶着他走过白雪皑皑的长街,到了他家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薄暗中,然后才回家。此景此情,到现在已相距四十年,每一忆及,温暖还不禁涌上心头。

当时我的处境并不美妙。在自己的祖国,战火纷飞,几年接不到家信,"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没有东西吃,天天饿得晕头转向,头顶上时时有轰炸机飞过,机声震动全城,仿佛在散布着死亡。我看西克先生并不在意,每天仍然坐在窗前苦读不辍,还要到研究所去给我们上课。我真替他捏一把汗。但是他自己却处之泰然。这当然会影响了我。我也在机声嗡嗡、饥肠辘辘中终日伏案,置生死于度外,焚膏油以继晷,同那些别人认为极端枯燥的死文字

拼命。时光一转眼就过去了几个年头。

如果有人要问，我这股干劲是从哪里来的？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简单地列出几个条条，也难免有八股之嫌。我觉得，基础是对这门学科的重要性的认识。但是，个人的兴趣与爱好也决不可缺少。我在大学时就已经逐渐认识到，研究中国思想史、佛教史、艺术史、文学史等等，如果不懂印度这些方面的历史，是很难取得成绩的。中印两国人民有着长期的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需要我们继承与发展。至于个人的兴趣与爱好是与这个认识有联系的，但又不是完全决定于认识。一个人如果真正爱上了一门学科，那么，日日夜夜的艰苦劳动，甚至对身体的某一些折磨，都会欣然忍受，不以为意。

此外，我还想通过对这方面的研究把中国古代在这方面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人们大都认为梵文的研究在中国是一门新学问。拿近代的情况来看，这种看法确实是正确的。宋朝以后，我们同印度的来往逐渐减少。以前作为文化交流中心的佛教，从十一二世纪开始，在印度慢慢衰微，甚至消亡。西方殖民主义东来以后，两国的往还更是受到阻拦。往日如火如荼的文化交流早已烟消火灭。两国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中，什么梵文研究，当然是谈不上了。

但是，在宋代以前，特别是在唐代，情况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在当时，我们研究梵文的人数是比较多、水平是比较高的。印度以外的国家能够同我们并驾齐驱的还不多。可惜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不但印度朋友对于这一点不清楚，连我们自己也不甚了了了。

解放以后，我曾多次访问印度。印度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很多印度学者也积极地探讨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从而从历史上来论证两国人民友好的必要性和

必然性。但是，就连这一些学者也不了解中国过去对梵文研究有过光荣的传统。因此，我们还有说明解释的必要。前年春天，我又一次访问印度，德里大学开会欢迎我，我在致词中谈到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要比我们现在一般人认为的要早得多。到了海德拉巴，奥思曼大学又开会欢迎我。看来这是一个全校规模的大会，副校长（实际上就是校长）主持并致欢迎词。他在致词中要我讲一讲中国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我乍听之下大吃一惊：这样一个大题目我没有准备怎么敢乱讲呢？我临时灵机一动，改换了一个题目，就是中国研究梵文的历史。我讲到，在古代，除了印度以外，研究梵文历史最长、成绩最大的是中国。这一点中外人士注意的不多。我举出了很多的例子。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有一段讲梵文语法（声明）的记载。唐智广的《悉昙字记》是讲梵文字母的。唐义净的《梵语千字文》是很有趣的一部书，它用中国的老办法来讲梵文，它只列举了大约千把个单词：天、地、日、月、阴、阳、圆、距、昼、夜、明、暗、雷、电、风、雨等等，让学梵文的学生背诵。义净在序言中说："不同旧《千字文》。若兼悉昙章读梵本，一两年间，即堪翻译矣。"我们知道，梵文是同汉文完全不同的语言，语法变化异常复杂，只学习一些单词儿，就能胜任翻译吗？但是，义净那种乐观的精神，我是非常欣赏的。此外还有唐全真的《唐梵文字》和唐礼言集的《梵语杂名》，这是两部类似字典的书籍。《唐梵文字》同《梵语千字文》差不多。《梵语杂名》是按照分类先列汉文，后列梵文，不像现在的字典一样按照字母顺序这样查阅方便。但是，用外国文写成的梵文字典这部书恐怕要归入最早的之列了。

至于唐代学习梵文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多。《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说："（玄奘）顿迹京辇，广就诸蕃，遍学书语，行坐寻授，数日便通。"可见玄奘是跟外国人学习印度语言的。大概到了玄奘逝世后几十年的义净时代，学习条件才好了起来。我们上面

已经讲到,义净等人编了一些学习梵语的书籍,这对学习梵语的和尚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于这些情况,义净在他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有所叙述。《玄照传》说:“以贞观年中乃于大兴善寺玄证师处,初学梵语。”《师鞭传》说:“善禁咒,闲梵语。”《大乘灯传》说:“颇闲梵语。”《道琳传》说:“到东印度耽摩立底国,住经三年,学梵语。”《灵运传》说:“极闲梵语。”《大津传》说:“泛舶月余,达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载,解昆仑语,颇习梵书。”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逝,学经三载,梵汉渐通。”义净讲到的这几个和尚,有的是在中国学习梵语,有的是在印度尼西亚学习。总之,他们到印度之前,对梵语已经有所了解了。

上面简略地叙述了中国唐代研究梵文的情况,说明梵文研究在中国源远流长,并不是什么新学问,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继承和发扬;其中当然也还包含着创新,这是不言自喻的。

我们今天要继承和发扬的,不仅仅在语言研究方面。在其他方面,也有大量的工作可做。我们都知道,翻译成中国各族语文的印度著作,主要是佛教经典,车载斗量,汗牛充栋。这里面包括汉文、藏文、蒙文、满文,以及古代的回鹘文、和阗文、焉耆文、龟兹文等等。即使是佛典,其中也不仅仅限于佛教教义,有不少的书是在佛典名义下的自然科学,比如天文学和医学等等。印度人民非常重视这些汉译的佛典,认为这都是自己的极可宝贵的文化遗产。可惜在他们本国早已绝迹,只存在于中国的翻译中。他们在几十年以前就计划从中文再翻译回去,译成梵文。我在解放初访问印度的时候,曾看到过他们努力的成果。前年到印度,知道这工作还在进行。可见印度人民对待这一件工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我们诚挚地希望他们会进一步作出更大的成绩。我们中国人民对于这一个文化宝库也应当作出相应的努力,认真进行探讨与研究。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比如欧美的学术比较发

达的国家和东方的日本,在这方面研究工作上无不成绩斐然。相形之下,我们由于种种原因显然有点落后了。如不急起直追,则差距将愈来愈大,到了“礼失而求诸野”的时候,就将追悔莫及了。

此外,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有大量的有关中国与南亚、东南亚、西亚、非洲各国贸易往还、文化交流的资料。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是人类的瑰宝。其中关于印度的资料更是特别丰富、特别珍贵。这些资料也有待于我们的搜罗、整理、分析与研究。有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这就是,最近一些年以来,印度学者愈来愈重视这一方面的研究,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论文,翻译了不少中国的资料。有人提出来,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印文化关系史。他们愿意同中国学者协作,为了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加强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而共同努力。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也应当当仁不让,把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展起来。

至于怎样进行梵文和与梵文有关的问题的研究,我的体会和经验都是些老生常谈,卑之无甚高论。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认识这种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在这个前提下,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不怕任何困难,终会有所成就。一部科学发展史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只有努力苦干、争分夺秒、不怕艰苦攀登的人,才能登上科学的高峰。努力胜于天才,刻苦超过灵感,这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脑袋里总忘不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朝三暮四,松松垮垮,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们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谁要是不懂珍惜时间,那就等于慢性自杀。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会工作,还要会休息,处理好工作与休息的辩证关系,紧张而又有节奏地生活下去,工作下去。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点个人的经历。我在国外研究的主要是印度古代的俗语和佛教混合梵文。最后几年也搞了点吐火罗文。应该说,我对这些学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回国以后,连最

起码的书刊资料都没有。古人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连一个"巧妇"也够不上！俗话说："有多大碗，吃多少饭。"我只有根据碗的大小来吃饭了。换句话说，我必须改行，至少是部分地改行。我于是就东抓西挠，看看有什么材料，就进行什么研究。几十年来，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杂家。有时候，也发点思旧之幽情，技痒难忍，搞一点从前搞过的东西。但是，一旦遇到资料问题，明知道国外出版了一些新书，却是可望而不可即。只好长叹一声，把手中的工作放下。其中酸甜苦辣的滋味，诚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样就可以回到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能倒转回去五十年的话，我是否还会走上今天这样一条道路？我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看起来似乎非常奇怪的问题，现在大概大家都明白了。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着一点惋惜、一点追悔、一点犹疑、一点动摇，还有一点牢骚。我之所以一直有这样一个问题，一直又无法肯定地予以答复，就因为我执着于旧业，又无法满足愿望。明知望梅难以止渴，但有梅可望比无梅不是更好一些吗？现在情况已经有了改变：祖国天空里的万里尘埃已经廓清，四化的金光大道已经辉煌灿烂地摆在我们眼前。我们西北一带——新疆和甘肃等地区出土古代语文残卷的佳讯时有所闻。形势真有点逼人啊！这些古代语文或多或少都与梵文有点关系。不加强梵文的研究，我们就会像患了胃病的人，看到满桌佳肴，却无法下箸。加强梵文和西北古代语文的研究已刻不容缓。这正是我们努力加鞭的大好时光。困难当然还会有的，而且可能还很大。但是克服困难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倘若我现在再对自己提出上面说的那一个问题，那么我的答复是非常明确、决不含糊的：如果我现在能够倒转回去五十年的话，我仍然要走这样一条道路。

1980年2月26日写毕

喜看新疆石窟壁画展览

去年夏天,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一个夏天。我南走黄山,探宇宙之神奇;西出敦煌、新疆,穷艺苑之妙境。普天之下,竟有这样的好地方,深感生为一个中国人是很幸福的。现在,“新疆石窟壁画展览”又在北京展出了。我应邀赶去参观,重温了一番旧梦,幸福之感,与日弥增。

我常说,新疆和敦煌都是中国的宝地,也可以说是世界的宝地。古代世界上的几大文明,都来这里汇合:中国的、印度的、伊朗的、希腊的,后来又来了阿拉伯的,汇在一起,开出了奇妙的花朵。世界上几个大宗教也都来这里汇合: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拜火教、基督教。世界上不同的文学艺术流派、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科学传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无不来这里汇合。这些都相当明晰地反映在各自文化的传统上,相互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这地方当然也是商业交通、外交往来的要道,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横贯这个地区。现在展出壁画的几个石窟寺,都处在“丝绸之路”的两边,可见古代宗教与商业关系之密切。这一条“丝绸之路”,实际上是古代东方和西方的一条大动脉。如果没有这样一条动脉,我们很难想象今天各国的发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

我说“艺苑之妙境”,是简单的概括。实际上,在宗教和艺术的背后,有更深刻的意义在。首先,这些艺术妙品是我们新疆各兄弟民族共同的创造,它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些民族团结合作的精神。

其次,宗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随着宗教而来的是其他有价值的人间的东西。最重要的还是,这些壁画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我们既能无私地慷慨地赠予,我们也能有选择地巧妙地接受。我们中国人的丝绸、纸张、造纸术、印刷术等等不是都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南亚、西亚、中亚和欧洲各国了吗?这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学习了不少的东西。仅拿壁画一项来说,故事内容很多固然都是外来的,以画风而论,外来的痕迹不也昭然可见吗?我们把这些外来的东西融会贯通,创造出来了灿烂的文明。这一点也是举世公认的。

在我们当前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伟大事业中,我相信,我们民族的这个特点一定会发扬光大。我们今天参观这个展览,就不仅仅是看一些临摹的壁画,而且还能看出更深更远更有意义的东西。

1980年4月5日

团结起来　共同前进

——祝贺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开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上,各个民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努力,创造了今天这样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了今天这样灿烂的文明,也创造了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

我们民族多,语言文字也就多。专就文字而论,就很不相同。把我们各民族的文字摆在一起,形式迥异,各极其妙。在今天是这样,在过去历史上更是这样。有的民族有字母,有的只有文字而没有字母,有的在某一段时间连文字都没有。在我国境内发掘出不少的古代文字,使用这些文字的民族有的在名义上早已不存在了,但是他们的文字却保留了下来。从这些古老的甚至已经死亡的文字中,我们还可以学习很多的东西。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在这个地区曾出现过多么繁荣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虽然今天可能只是一片荒漠。无论发掘出来的是哲学宗教的文书,还是科学技术的文书,甚至还有政治经济的文书,都能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当时这个地区的真实情况和这个地方的历史,还能告诉我们各个不同民族互相学习的情况,以及这些民族同外国民族往来的情况。无论在科学技术方面,在文学艺术方面,还是在宗教哲学方面,我们各民族之间确实是交光互影,互相渗透。民族有大小,文化基础有厚薄,作出的贡献有多少,但是总是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哪一个民族也不能自己吹嘘,只是给与而从不接受。像夜郎那样的国家(民族)毕竟

只是极个别的,而且那种自大狂也可能只表现在个别人身上。

我们各民族互相学习的例子,专从语言文字方面来看也是不胜枚举的。比如,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借用了多少不等的汉字词汇,但是汉语也借用了一些少数民族的词汇。至于字母,有一些学者就认为西藏字母同古代和阗字母有关系。至于蒙文和满文的字母,以及新疆一些古代民族使用的字母,有渊源关系,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实。文字和语言的互相借用,说明民族间文化的交流,说明民族间在各方面的互相学习。这种互相学习、互相理解和互相帮助,就是我们今天立国的基础。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这些古代文字的花样繁多上,更深刻地理解到我们的文化确实博大精深。

今天,我们搞一个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决不是在玩弄古董,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着眼于现实。我们是想从文字这一个看似比较小的角度上,让大家了解各民族古代文字的形象,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了解它们所包含的内容,了解与它密切相连的文化,更进一步了解我们各民族间关系之密切。

今天,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完成这样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决不是哪一个民族单枪匹马就可以胜任的,它要求我们各个民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同心协力,这既符合整个的中华民族的利益,也是与各个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的。

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灿烂的。眼前的一些困难,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是没有经验造成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同一个人一样,决不会永远走平坦的道路。道路暂时曲折崎岖,也是合乎规律的。总之,我们要树立信心,认清前途,为实现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祖国的伟大愿望而共同努力。

1980年9月25日

祝贺与希望

——致《大学生丛刊》

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世界未来的希望也寄托在青年身上。但是，现在专为青年人办的刊物，却实在少得可怜。这对青年德育、智育的成长是很不利的。因此，我热诚地祝贺《大学生》丛刊的出版。

我祝愿青年同志们发扬你们年龄的特点和优点，发扬善于学习，最少保守思想的特点，努力学习，吸收新鲜事物，把眼光放远，不但看到四个现代化的完成，而且看到完成以后，真正做到又红又专，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80年10月

祝《地平线》创刊三周年

承蒙陈国华、李裕森二兄隆情厚谊,赐寄《地平线》,使我有机会看到这个刊物的每一期。我对香港的刊物不熟悉,我没有看到过多少香港刊物,没有法子去比较,但仅就《地平线》而论,我觉得这确是一种图文并茂,清新俊逸,既能提供享受,又能获得知识的好刊物。它能沟通海外华侨的情感,增进彼此的了解。在它三岁生日的时候,哪一个读者不由衷地向它祝贺呢?

我不是华侨,但在欧洲住过十一年。我对海外华人的状况,他们的思想感情,内心活动一些细微的地方,我自信是了解的。华侨的特点是爱国、团结、吃苦、耐劳。这是环境造成的,不这样在国外就很难活下去。过去是这样,今后还将是这样。而《地平线》所提倡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这就是它受到海外广大华侨所热爱欢迎的原因。

三年是一段不长的时间。如果以三十年为一代的话,它也只不过是一代的十分之一。但是在这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地平线》已经表现出光彩动人,气象万千。它的前途正不可限量。我祝它日益繁荣昌盛,再过几个三年,十几个三年,几十个三年,为华侨造福祉,为世界谋大利,永远像一轮初升红日,闪烁于东方地平线上。

1981年8月30日于北京大学

热烈祝贺《中国俄语教学》创刊

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要出一个学术性的刊物《中国俄语教学》,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首先表示热烈的祝贺。

关于俄语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解放后三十多年来,我们的认识经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俄语的重要性是否已经认识够了。

近几百年来,俄国产生了一些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画家、音乐家、科学家、歌唱家、演员等等,灿如列星,同世界上任何国家比起来,都毫无逊色。对世界各国起了良好的影响。

我国对俄国学术文化的研究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对这些伟大的人物以及俄国和苏联的历史以及学术文化都研究透彻了吗? 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目前,我们有一支质量相当高、人数相当多的俄语教学研究队伍。教学工作不是太重,大有余力进行一些研究工作。除了上面讲到的以外,对俄语教学和教材编写都可以进行一些工作。我们国家的领导同志强调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除了本国的基础以外,还必须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想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必须有懂外文的人。在这方面,俄语也是重要外语之一。因此,我们教学研究工作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紧密相连的。我们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们能不黾勉从事,努力工作吗?

在这个意义上,我祝贺《中国俄语教学》杂志的创办。希望与

同志们共勉之！

1981 年 11 月 30 日

新年述怀

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总嫌日子过得太慢,总盼着日头和月亮飞得快一点,好尽快地过新年,吃点好东西,热闹一番。一转瞬间,自己已届古稀之年。现在总嫌日子过得太快,总恨没有办法把日头和月亮拖住,不让它们向前再走,新年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了。

但是,对于今年的新年,我还是充满了热切的希望的,希望好好地过它一过。

难道说我返老还童了吗?可以说是的,也可以说不是。我年逾花甲,也已过了十年,但是从无老的感觉。可是从今年年初起,也许是“古稀”这两个字对我起了无形的作用,我觉得自己确实是渐渐地老起来了。

觉得自己老也不一定是坏事情。越觉得自己老,就越寄希望于青年;越寄希望于青年,就对青年越有感情。新陈代谢,自然规律。这一点我早已参透,对自己思想感情没有一点影响,可以说是无动于衷。对青年的感情却是真切实在的。

我自己一生几乎都在北京大学工作。但在过去的三十几年中,对青年不能说一点感情都没有,但感情总不够深切。原因大概就是自己还没有老,就感觉不到青年之可贵与可爱。今天情况完全不同。我一看到青年,就会想到:世界是他们的,未来是他们的,将来的一切伟大光荣的担子都会加到他们身上。他们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就像那东升的旭日、初绽的鲜花。想到这一些,连我自己仿佛也年轻了起来。

尽管人类有时候也做一些不聪明的事情，但是对于人类前途，我还是充满了信心的：将来会胜于现在，青年总会胜于老年。人类的前途无限光辉灿烂。

就为了这一个缘故，我对今年的新年也充满了殷切的期望。我在这里向全校的青年同学，中、老年教师职工祝贺新年。祝愿我们在新的一年内共同进步，自强不息，使我们对着人类最高理想大同之域更向前走上一步。

1981 年 12 月 18 日

要反映社会中的新风气

我今天来，一是想听听，听听大家的意见；一是想看看，看看老朋友，没有准备发什么言。我写东西的时间不算短了，到现在已经有五十多年了。可我总感觉到自己是个外行，是个客串，我不敢讲自己是个作家。

听了几位同志的意见，对我启发很大。我想先讲个故事。以前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有个教授，名叫叶公超，后来当了台湾的“外交部长”。他当时教我们英文，说自己研究散文。他对我们灌输，说世界上只有英国有散文，别的国家都不行。法国蒙泰恩，勉强对付。我们当时的大学生脑子比较简单，所以就信了他的话。后来经过好多年，我觉得这说法不大对头，我发现，真正有悠久散文传统的还是中国。刚才冰心同志讲到的《古文观止》是散文，我看还可以扩大一些。在经史子集中，我看这各集都是散文，至少里边有很大一部分是散文。我们中国才真正是一个散文的国家。因此，我们现在的散文的成就应当大一些。可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刚才有同志讲，成绩没有小说大，我因为读得少一些，不敢乱说。我们应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把散文这个题材搞得比现在更好一些。但怎么搞好呢？刚才夏衍同志说，报告文学要真实，散文要清新，我觉得这个意见很精辟。不过，我还想补充一下，我有个偏见，我认为小说可以虚构，不虚构不行；可散文不能虚构，报告文学也不能虚构。有的同志会问，《桃花源记》算不算散文？它是不是虚构的？我说它是虚构的，因此不能算是散文，而是小说。魏晋南北朝

时期有这种文体。鲁迅的《一件小事》,你说它是小说也行,但我看是很好的散文,它里面没有什么故事性,抒情的成份比较大一些。所以,这里面没有什么标准。写散文,其实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实的真实。这一点上面已经说过。一个是感情的真实。看见了一个人,看见一件事,看见一片风景,如果没有使你感动,那你就不要写,勉强写一定写不好,自己都不感动,怎么会感人呢?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大家只要注意,确有很多感人的东西,周总理不必说了,像彭德怀同志,过去我们不大理解,后来他身边工作人员写了回忆,很感人。我们许多老同志有不少感人的事迹,可是,前一段我们的宣传有偏差,使人产生了一点误解。这几天,不是有几个青年人,一是不远千里去为人作女儿,一个是为人作儿子,你说这不是新东西吗?新风气吗?我们社会中的新风气多极了,就看你看不看。你如果真正看,一定会得到鼓舞,有了创作的欲望,你就写,才能达到好的社会效果。艺术性也很重要,叶老、健吾都讲了风格等,这都是值得研究的。我觉得艺术上应继承我们的传统,一个人一个风格。刚才,健吾同志举了好多英国人的名字,英国确实是出了不少散文作品的。法国有蒙泰恩,但像这样的作家不太多,德国好像就没听说谁是散文家,这些国家是不一样,但我们也应借鉴。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基础,就很有可能把我们的散文搞上去。我这个人有点儿眼高手低,看别人的东西,很少有看得上的,但自己又不行。要求很高,好像很空洞,可我看也不那么空洞,它很具体。我觉得散文跟诗很相近,有类似之处。我在一个地方曾讲过,写散文应当用写诗的办法来写。我又说写散文应该用写交响乐那样的方法来写。我做不到这一步,别人恐怕也要努力。我这种想法不知对不对。我写不好,但对散文劲头很大,很喜欢,现在中国的、外国的散文我还都看。我虽然写了五十多年,但至今仍然是一个学徒。我一定要努力不息,坚持不懈,学习古今中外的好散文。

只要我受到感动,受到启发,还是要动笔写一点的。

1981年12月

中印友谊谱新章

有如“天上来”的黄河，有如自天堂下降流过大神湿婆的头顶而一泻千里的恒河，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从远古起就源远流长，曲曲折折，有时候细流潺湲，有时候又奔腾澎湃，一直流到现在。

而且还将“不舍昼夜”地流下去，一直流到渺茫的未来。

在这友谊的长河中，当然会出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类的事件和人物，中印两国十七亿人民都能举出一些来，真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这些人物光芒四射，灿如列星，照亮了两国人民的心，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在这些灿烂的群星中，柯棣华是最光亮的星星之一。

但他又同过去所有的群星，不管这些星星有多么明亮，都完全不同。他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怀抱着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不辞万难，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在八路军中救死扶伤，鞠躬尽瘁，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以身殉职，长眠在他的第二故乡中国的土地上，由此而谱写了一曲空前的中印友谊的乐章。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到中国来的印度人，已经多得没法计算。有的人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来中国是为了宣传宗教。他们想把自己心目中的天堂乐园带给中国人民。天堂乐园当然是根本没有的东西，中国人民不会因此而得到幸福。但是这些印度朋友也带来了印度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对中国人民是非常有用的，它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从而丰富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中国人民是感激的。

有的印度人是政府派来的使节。他们在完成本国君王交给他们的使命之余,也带来了印度人民创造的一些珍贵的东西。他们既圆满地完成了政治使命,又加强了两国官员和人民的了解与友谊。中国人民对他们也是感激的。

还有一些印度人是商人。他们来中国的目的是贸迁有无,获取利益。他们跋山涉水,步行万里,运来了印度人民制造的珍贵商品和印度出产的天然珍品。这些物品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开阔了中国人民的见闻。中国人民对此也是感激的。

但是柯棣华却同以上这些人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一不是宗教家,二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商人,而是革命者。他带给中国人民的不是宗教,不是随宗教而来的文化,不是官府的使命,也不是商品。他带给中国人民的是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是国际主义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是以前从没有过的崭新的东西,这东西是以前决不会有的。中国人民对他当然更是非常感激的。

但是中国人民对柯棣华的心情决不仅仅只限于感激,而是远远超出感激之上的一种心情。

用什么词儿来形容这种心情呢?我们只能用“同志之情”这个词儿。

“同志之情”,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印友好的历史上,是崭新的词儿,这种感情也是崭新的感情。所以我说,柯棣华同志为中印两国人民古老的友谊谱了一曲空前的乐章。我相信,这一曲乐章将是万古长存的。

1982年2月8日

喜看《沙恭达罗》重新公演

印度古典名剧《沙恭达罗》,继 1957 年和 1959 年两度上演之后,又在我们舞台上演出了。这对于活跃文学艺术空气,开阔中国观众的眼界,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都是非常有利的。

印度戏剧已经有了二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出了不少杰出的剧作家和剧本。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

这个剧本的主题思想并无新奇之处。它主要歌颂了净修林内仙人的义女沙恭达罗与国王的爱情。至于这一个剧本产生的时代,在印度和其他国家都有很多争论,而且对时代的估计差别极大。一直没有大家一致同意的结论。但是一般都承认,迦梨陀娑生于公元后四五世纪。从印度历史的发展来看,此时正处于封建时期。因此,剧本所歌颂的爱情就是一个封建君王同一个山林(农村)少女的爱情。

沙恭达罗和国王的爱情都是坚定的。但是没有矛盾,就没有戏剧。印度剧本中的矛盾,往往蒙上一层神话的色彩。《沙恭达罗》也不例外。迦梨陀娑使用了印度剧作家有时候使用的手法,也就是仙人诅咒的手法,来制造矛盾,解决矛盾,终于皆大欢喜,来了一个大团圆。

读者也许要问:正如中国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那样,一个“后宫佳丽三千人”的封建君王能有纯真的爱情吗?但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却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描绘了他们之间的爱情。虽然

近似一出悲剧，但他们的爱情是真挚动人的。迦梨陀娑也以同样严肃的态度歌颂了国王与沙恭达罗的爱情。这应该怎样解释呢?

我想引用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说法来解释这个问题。歌德在描写对象身上区分出现实性与真实性。现实性就是客观存在的情况。真实性就是应该有的情况，也可以叫做理想性。诗人的职责就是通过现实性的外表，描绘真实性，换句话说就是，不管现实情况如何，在他的笔下，理想的爱情应该是纯正的、坚定的。在《沙恭达罗》这个剧本里，沙恭达罗与国王的爱情就表现为真实性或理想性。

这一点我觉得在今天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不是讲心灵美吗？心灵美的涵义很广，但是纯真的爱情也是心灵美的表现之一，这恐怕是大家都承认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沙恭达罗》中学习一些有用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值得我们借鉴。

在心灵美方面，还有一点我们可以向《沙恭达罗》学习的。在印度人民心目中，《沙恭达罗》的精华是第四幕，而第四幕的精华又是沙恭达罗与义父甘瓦别离时的那几首诗。父（虽然是义父）女之间那真挚的感情，在诗人的生花妙笔下，也确实是非常感人的。在中国舞台上，这种感动人的场面，中国观众也一定能够体验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在表演这一幕时，演技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谓予不信，请观众看完演出后再作评论。无论如何，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从《沙恭达罗》学习一些有用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也值得我们借鉴。

总之，尽管《沙恭达罗》是一出古典戏剧，而且还是外国的，今天我们上演它，除了艺术美的享受以外，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精神，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学习到不少东西的。所以我就写了这一篇简短的介绍，谈了谈我自己一些肤浅的看法，供爱

好戏剧的同志们参考。

1982 年 3 月 26 日

芳林新叶催陈叶

每年一到秋天,我们就看到落叶辞树;一到春天,又看到新叶生枝。自从地球上有了树木以来,多少万年就是这样变化着,而且还会继续变化下去。我们古人把这情况总结成了一句话,叫做:芳林新叶催陈叶。

我们看到河流或者大海,就会看到一浪跟着一浪,永不间断。自从地球上有了海河以来,多少万年就是这样变化着,还会变化下来。孔夫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古人也把这情况总结成一句话,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们的学校工作也是这样。我们每年欢送毕业生,又每年欢迎新学生。自从地球上有学校以来,情况就是这样,而且也还会继续下去。

但是我们对这送旧迎新的工作,往往不去深思,——"司空见惯浑闲事"——我们见惯了。年轻的要考大学的同学们大概也见惯了,我们都变成了"司空"。

如果我们从我上面讲到的新叶与陈叶的关系、后浪与前浪的关系来看,联系到我们今天的建设工作,那么我们会感到送旧迎新,意义深远。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永恒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又决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在这里,我们既有陈叶,又有新叶;既有前浪,又有后浪。新陈相继,前后相推,才能保证我们事业的发展和胜利。

今天我们大学招生的对象是想入大学的青年,你们现在都属

于新叶、都属于后浪。既然是新叶,就必须有朝气蓬勃的精神;既然是后浪,就必须有催赶前浪的劲头。建设社会主义伟大而艰巨的工作,陈叶和前浪当然都要积极努力;但从长远来看,重担将要落到你们肩上,落到你们这些新叶和后浪的肩上。

我们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一样,热烈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学习的行列,燕园的大门正向你们敞开着。有志于承担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又艰巨的工作的青年们,来吧!——来呀!

1982年3月29日

龟兹壁画展前言

看到把龟兹壁画应用到工艺美术品上，好像把古代的石窟搬到了眼前的世界中来，我的耳目陡然为之一新。

龟兹，就是今天的库车，是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唐代高僧玄奘在七世纪二十年代末赴印度求法时经过这里。《大唐西域记》里的屈支就是龟兹。玄奘描绘这个地方：

> 宜穈、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发巾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

在这一段简明的叙述里，此地的粮食、果品、矿产、气候、风俗、文字、音乐、服饰、货币都讲到了。可见此地在唐代已经非常繁荣兴盛。实际上，当时世界上几个最光辉灿烂的文明体系就在新疆，其中也包括龟兹，汇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奇迹，丰富了我们中国的文化，也丰富了其他国家的文化。

今天的库车，仍然是南疆的一个重镇。人民生活，绚丽多彩；古代文物，瑰琦动人。我自己曾在这里住过几天，看了克孜尔、库木图拉等等石窟，那些神奇的壁画真是惊心动魄，给我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今天中国工艺美术家们又把这些壁画搬到工艺美术品上来，我相信，不但会使中国同胞赞叹钦慕，连外国朋友也会击节

称赏的。

过去是通过国际文化交流形成了具有特点的龟兹文化，其中当然也包括壁画。今天我们又通过龟兹壁画达到国际交流的目的。这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我们同声赞美。

1982年7月22日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评介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第一卷出版了,第二卷也将在今年九月出版。称之为皇皇巨著,它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这是一部连插图在内共达三百六十万字的大著作,印刷装帧都是国内第一流的。参加编辑和写作的人来自全国很多地方:大学与科研机构相结合,专业与业余相结合,老中青相结合。这真是空前的壮举,值得大书特书的。这同时又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队伍的一次大检阅,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为了这一些原因,我们要为这部巨著的出版欢呼。

现在要我来对这部书做点评介工作,开始时我真有点诚惶诚恐。因为我的水平有限,怕工作做不好,玷污了这部书。同时又因为我既参加了编辑工作,又参加了词条的编写工作。"文章是自己的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我不应该避开一点吗?但是,在本书形成过程中,自 1979 年倡议,至 1981 年基本完成,每一个工作步骤我都参加了,我同大百科出版社的同志们,以及编辑与写作的同志们一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尝到顺利的快乐,也尝过挫折的痛苦;这部书的优点与缺点,我知之悉而感之切。我的认识,即使不能全部正确,作为一次个人的总结经验,不管多么浅薄,不也可以供同道者参考吗?

我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才敢于冒昧承担这个评介工作的。

要想做好评介工作,讲一点中国研究外国文学的历史,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的翻译工作虽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除了印

度一些古典文学披着佛教的外衣传入中国以外,我们认真研究外国文学的历史并不长,只不过八九十年的时间。鲁迅于1907年写成的《摩罗诗力说》,第一次比较广泛地讲到外国文学。他可能利用了日文资料,但那水平在当时是相当高的。著名的翻译家林纾,根本不懂外文;然而他翻译的书却最多,影响也最大。

从二十年代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但是单枪匹马者居多。也组成了一些研究文学的组织,比如文学研究会、未名社、创造社、沉钟社、新月社等等,都是民间组织。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其中有一些是间接介绍的,主要是通过英文和日文。

真正比较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地介绍研究外国文学,是解放后才开始的。我们第一次有了国家的组织,这就是中国科学院(后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这里集中了一批研究力量。许多省市和许多大学也相继建立研究机构。前几年又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总之,研究机构增多了,研究人员加强了,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语种增加了,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兴盛的新局面。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编写成的。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部《外国文学》的编写与出版,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使我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扬眉吐气,当然也促使我们考虑许多问题。现在我们评介这一部书,不能脱离这个历史背景,也不能脱离我们的现实环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这样的基础上,我觉得,这一部《外国文学》确实具备着许多优点,择其荦荦大者,可以有以下几点:

一、努力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编写词条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比如,对很多的国家的文学都有一个概述条。在这里,编

写者尽量避免像某些外国的百科全书那样,罗列事实,再加以烦琐的考据,看起来细致得很,实则没有搔着痒处。我们的编写者大都讲到这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阶段,民族和语言的形成,各个时代的特点,总是用发展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来探讨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的发展,对文学的演变、文艺思潮的起伏盛衰,以及某一国文学所给予和所接受的影响,只要有迹可求,无不加以叙述。对影响比较大的作家和作品,也这样处理。目的是给读者以全面而真实的知识。例子随处可见,不必一一列举。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受了外国某个国家的影响,同时也有国内极"左"的因素,我们运用马列主义有时候有点教条主义的偏差,对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掌握的分寸不妥。对历史上和当前的某一个文学家,往往以"政治态度"定优劣,论终身,好像把整风的作法应用到文学研究上来了。这就说明,我们掌握"政治标准"是不准确的。对他在艺术性方面的成就,往往注意不够,对他在历史上的影响和贡献,也往往忽视。现在,在《外国文学》卷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影响下,编写者纠正了这种教条主义和这种简单化的作法,力求全面地、客观地评介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我们认为,真正的马列主义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有这样一种感觉:由于我们比较正确地运用了马列主义,又掌握了比较充分的资料,对某些国家的文学和某些作家的研究,我们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二、对第三世界的文学,其中大部分是我们所谓的东方文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在当今的世界上,西方国家的学者,出于政治偏见,歧视东方国家的文学。他们言必称希腊,总认为自己的文学最好,"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种偏见过去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是有影响的。解放后,我们开始纠正和抵制这种不实事求

是的态度,在评介东方文学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在《外国文学》卷里,编写者继续发扬这个传统。他们认为,评论文学不能只有一个尺度,坚决否认欧洲中心论,过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恶劣作风必须铲除。东方文学之所以有价值,之所以光辉灿烂,就因为它同欧洲文学不完全相同。人类文学的发展,不能只有一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就是我们的信念。

为了贯彻我们的想法,编委会曾通过多次讨论,制定了一些作法,国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一律按其贡献,确定了词条的字数。对作家,一律不加桂冠:什么“伟大的”、“优秀的”。对于国别文学和作家,编写者的责任就是客观地加以介绍;东西方学者的意见,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都介绍,让读者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知识。这样一来,东西各国的文学,还有各国的文学家,一律平等对待。本卷中的词条基本上贯彻了这个精神。

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也都知道,西方对东方文学的看法,并不是一向如此。比如说,《风月好逑传》这一本书,在中国最多能同《今古奇观》中的一些故事争一日之长,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然而德国大诗人歌德读了一个法文译本以后,大加赞赏。他对爱克曼说:

> 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

一片赞美声,毫无歧视鄙视之意。歌德对《沙恭达罗》的赞美,也是

众所周知的。可惜他的子孙们早已忘记了这种情况,成了真正的"不肖子孙"了。

三、对西方文学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我们重视东方文学,重视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但并不轻视西方文学。

现在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国家,什么东西它都是世界第一,美其名曰: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是在那里宣扬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在个别报纸上也是每天一个"中国世界第一"。但很多同志立刻就认识到了这种做法的虚假性和危害性,坚决要求制止。我们认为,中国和东方民族,确实有些东西是世界第一,但并不是事事都是世界第一。中国和其他许多东方国家的近代文学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我们坦率承认,并且感谢。对于西方文化好的方面,我们决不能抹煞。因此,在《外国文学》卷中,所有关于西方文学的词条,都反映了我们对西方文学的重视。对那些文学大国,比如英、德、法、西、意、俄等等,对这些大国的有影响的作家,尽管根据我上面谈到的规定,不戴桂冠,不加任何形容词;但是他们的巨大成绩和影响,他们的重要性,词条本身已能够充分反映。书中精美的插图也能表现同样的情况。

四、着重指出了某一国文学、某一个作家、某一部作品同中国的关系

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我们的先民创造的文化光辉灿烂,影响了四邻的国家,甚至更远的国家;但是也接受了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文学当然属于这一个范围。这些事实都是我国人民还有其他国家的人民应该知道的。可是在过去要知道这些却非常困难。过去在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时,间或也讲到一点;总起来看,是很不够的,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上来对待。

今天，在《外国文学》卷中，我们力图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在几次编委会上，都强调了这一点，并且得到了全体写作者的响应，列为编写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全书的词条来看，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只要同中国有一些联系，比如说译成了中文，对中国有过影响，编写者都一一具体指明。在有关但丁、迦梨陀娑、歌德等等伟大作家的词条中，都讲到他们对中国的影响，他们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情况。连一些次要作家，只要他们的作品有中文译本，也都予以指出。这样一来，读者只要一翻阅有关词条，立刻就能了解这一个作家或这一部作品同中国的关系，能开扩中外人民的眼界，增进他们之间的了解与友谊。因此，这一个优点必须在这里着重指出。

五、力求全面，力求反映最新的情况

从我们当前的研究能力来看，我们还没有力量把全世界大小国家的值得上百科全书的大小文学家都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加以叙述。但是，一部百科全书不允许遗漏不该遗漏的东西。我们有能力的，我们当然都收进来。对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研究的，编写者也努力通过种种渠道，搜集资料，加以叙述，有时不能不用一些外国现成的资料。这些词条当然显得有点单薄，但毕竟是应有尽有了。对读者来说，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

还有一点，也必须在这里指出来，这就是如何对待目前还活着的作家的问题。过去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受了所谓“政治第一”这口号的影响，对活着的作家，连选他们的作品给学生阅读都有戒心。原因呢，据说是怕他们“变”。今天是“好”人，明天可能变成“坏”人，而“好”、“坏”又多半是主观的，完全以我划线。一旦“坏”了，他就变成了塔布，谁也不敢碰一碰。这种现象显然是不正常的。只要活着的东西，时时刻刻都在变。作家也一样。但这有什么可怕呢？我们只要掌握实事求是这个原则，一切都迎刃而解。

变就说他变;什么时候变,就说他什么时候变;变到什么样子,就说他是什么样子。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本卷中收了大量有关活人的词条。因此,当前外国作家的情况,读者也能了解。这个优点,也应该在这里着重指出。

六、对译名做了统一的工作,对文体规定了统一的原则

译名和文体好像不是重要的问题。实则不然。我国译名混乱,由来久矣。鲁迅曾举出一个例子:陶斯道,这名字实在高雅,但它指的是托尔斯泰呢?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目前我国译名仍然混乱,人名和地名都一样。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决非一个人或一个单位所能完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只是想在本书范围以内把译名统一,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称赞的。

对本书的文体,也努力使之比较统一。写百科全书词条,不是写个人的论文,更不是写抒情散文。我们并不否定文采,但文字必须朴素、简练、生动、准确,还要合乎逻辑,不必要的虚词,尽量减少。本卷绝大多数的词条做到了这一步。

以上六条就是我认为是《外国文学》卷的优点的。可能还可以列举出一些来,但主要的恐怕就是这些了。

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外国文学》卷也是要一分为二的:它既有优点,也有不足之处。我也只能举其荦荦大者:

一、词条水平不平衡,还有薄弱环节和空白点

这是我们研究工作不平衡的反映。在本书中,有的词条写得很好,资料丰富,观点正确,文笔简练,逻辑性强。这表示编写者对所写的对象研究有素,基础雄厚。也有少数词条,写得比较单薄,这反映了编写者对所写的对象不甚熟悉,甚至有点陌生。事实上,在外国文学这个领域内,我们确实还有薄弱环节,甚至空白点。比如古代希伯来文,国内专家就绝无仅有。对亚洲一些语言,例如柬埔寨、菲律宾、老挝等等,对印度国内的某些语言,我们都缺少专

家。只有个别人懂得,但又不研究文学。对非洲文学的研究,也还没有真正开始。这些薄弱环节和空白点都有待于我们去弥补。连一些人所共知的大作家,比如古代伊朗的菲尔多西和西班牙的一些多产作家,我们也所知甚少。菲尔多西的巨著《王书》只有片段的介绍,还是通过俄文。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憾事。挪威伟大作家易卜生影响了中国近代戏剧的创作,可是直到今天,我们读的还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作品。这也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憾事。还有不少世界知名的作家,我们只是久仰大名,却无从认识庐山真面目。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努力去改变。

二、掌握资料还有待于增多

对一些小国不必说了;对某一些文学大国,对某一些大作家,对一些有世界影响的作品,虽然我们掌握的资料已经比较多,研究的基础已经比较好,历史已经比较长;但最新的研究情况,最新的资料,掌握了解有时还不及时,还不够充分。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外国新出版的大作家的作品,我们有时也不能及时得到。世界最新的研究方向,最新的学说,我们不一定都赞成;但是了解与介绍总是应该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有时跟不上。所有这一些情况不能不影响词条的质量。在一些大中词条里面,介绍得不够全面者有,没有把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过来者有。这都是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

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还必须提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一点编写者都一致承认。但运用起来,却很不一致。有一些词条,运用马列主义,得心应手,比较深刻;个别词条在这方面,就显得一般。如果想进一步提高《外国文学》卷的质量,关键问题还在于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

四、国家与国家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词条长短的平衡还有

问题

我在上面已经讲到,编委会曾经反复讨论,概述条的字数,大中小作家词条的字数,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是古人还是今人,只要他们的地位与影响相等或差不多,字数也就应该相等或差不多,字数的多少就标志着他的重要性,或者我们对他的重要性的评价。一般说来,这个原则是贯彻了。但可惜没有完全贯彻。个别编写组和个别编写的同志,没有认真执行共同商定的原则:他们这一组的总字数膨胀了,他编写的某一个作家词条的字数膨胀了。结果就破坏了全书的平衡。现在词条是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的,读者一时看不出平衡破坏的情况。如果有细心的读者把每一个文学大国的概述条的字数计算一下,说不定就会产生疑问:为什么这两个地位差不多相同的国家概述条的字数却相差这样多呢?这难道代表着编写者或编委会对这两个国家文学的评价吗?以忠实介绍客观情况为主要职责的大百科全书本来是不应该给读者制造这样的疑问的。

以上四条是我认为《外国文学》卷的不足之处。

我在上面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评介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根据我对本书的理解,指出了它的优点与不足之处。限于自己的水平,肯定有片面甚至错误的地方,仅供读者参考。

出版这样一部巨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但是,更重要的是,正如我在本文开始时已经说过的,这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队伍的一次大检阅。检阅的结果是,摸清了力量,肯定了成绩,找出了差距,增强了信心。解放后,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努力,我们这一支研究外国文学的队伍大大地增强了。现在,在很多国别文学的研究中,老中青相结合的梯队已经形成,为今后的更大的增强奠定了基础。我们完全有信心把研究工作更推向前进。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的薄弱环节和空白点

仍然不少,对国外当前的研究情况也还有不能及时掌握的地方。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妄自尊大,当然为我们所不取;妄自菲薄,也同样为我们所排拒。希望全国研究外国文学的志同道合者,以《外国文学》卷为新的出发点和基础,继续前进吧!

1982年8月3日

团结起来，努力做好民族语文的研究工作

——祝贺党的十二大的召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拨乱反正，路线正确，全国各条战线上都或多或少出现了崭新的形势。特别是在农村，粮食年年增产，人人意气风发，这是人所共见的。现在十二大的召开，继往开来，更开创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更高了，建设四化的决心更大了，真是一片大好形势。

各条战线如此，我们民族语文工作者怎样呢？我相信，我们也决不会例外。民族语文的研究工作，表面上看起来，与四化，与我们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实际上，只要稍稍深入思索一下，就会发现，没有民族语文的研究，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社会，四化无法建设，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更难实现。道理很清楚，民族语文的研究，不管是本民族学者在研究，还是其他民族的学者在研究，都能提高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的水平，能促进民族间的了解，而没有精神文明的提高，没有民族间的了解与合作，四化当然是无法建设的。

除了国内兄弟民族的团结以外，国际上也有一个团结问题。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汉藏语系学术讨论会，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亲自出席讲话，受到了外国学者的欢迎。这一次盛会一定能加强中外中国民族语文工作者的了解与团结，而没有国际间的协作与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四个现代化也会有困难的。我们的了解与团结虽然表面上只限于民族语文工作者之间，但是实

际上并不是这样。通过民族语文工作,中外学者可以互相了解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们在国际上可以争取更多实事求是的了解我们的朋友,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总之,我相信,我们民族语文工作者,同其他战线上的同志们一样,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团结的基础上,乘十二大的东风之便,将会更加努力,更加意气风发,为实现祖国的伟大目标而奋勇前进。

1982年8月27日

伟大呀,我们的党!

我们党的十二大正在进行中。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心里非常激动。眼前看到的是希望与光明。但是同时也是思绪万端。既然是万端,就无法一一加以叙述。我只能选一件同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关的小事来谈一谈。

四十多年以前,我在国外求学的时候,曾从蜚声国际的吐火罗文大师德国的西克教授治吐火罗文。我是非常喜欢这种古代语言的。又因为所有的吐火罗文残卷都出在中国新疆,国外治这种语言的学者都眼巴巴地望着我们中国,而我们自己则无力解读。有的外国学者竟扬言:敦煌吐鲁番是在中国,而敦煌吐鲁番学则在国外。我听了心里真不是滋味,很想努力学好,改一改这样的局面。

但是,在解放前那样风雨如磐的日子里,报国有心,回天无术。我一回到国内,一无新出的资料,二无最必要的工具书。我在伤心之余,下定了决心,从此洗手不干。受到当时国内研究条件的限制,"有多大碗,吃多少饭",我就违反本愿,东抓一点,西抓一点,逐渐变成了一个"杂家"。每当有人"赞美"我方面广,读书多的时候,我深知自己的浅陋,也明白自己的苦衷,只是惨然一笑,"莲子心中苦",只让眼泪往自己肚子里流。就这样过去了三十多年。

今年春天,文物局的王东明同志和新疆博物馆的李遇春同志拿着新疆前几年新发现的吐火罗文 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的残卷的放大的照片来找我,让我考定经名,进行解读。我为他们的热情所感动,同时又觉得现在时机已经来到了,我直接了当地答

应了下来。于是就在猬集的杂事和频繁的会议的夹缝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找出了经名,初步确定了内容。写成了两篇论文。不管我的论文多么拙劣肤浅,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它也说明了,敦煌吐鲁番学不见得都在国外,因此也就有了一点意义。

但是,这种情况是怎样出现的呢?

我首先想到,在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的时候,即使发现了什么新材料,也决不会有人敢来找我解读。即使有人斗胆找上门来,我也决不敢接受。像吐火罗文这样一千多年前的死文字,货真价实的古董,按“左”的观点看,是地地道道的“四旧”。我已被某些人钦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等等,头上帽子一大摞,我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像吐火罗文这种玩意儿,我哪里敢去碰呢?

其次我又想到,在那十年内乱的风风雨雨中,我除了写检查、当靶子以外,简直是虚度年华。每天吃着人民的粮食,心里像火烧一样,感到无地自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我回答不出。有时候我甚至考虑,那样活下去是否还有什么意义。

然而今天怎样了呢?

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以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拨乱反正的政策深入人心。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信心空前,干劲倍增。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虽然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这个“黄昏”却是一个漫天红霞、满目青山的黄昏。我虽然只是平凡的个人,上面谈到的那一件事也是一件平凡的小事;但是小中可以见大,把一个个的个人加在一起就不再是一个个人,把许多小事加在一起也就成了大事。饮水思源,全国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人,不感谢我们的党又感谢谁呢?!

现在具有伟大意义的十二大又开幕了。这是一次继往开来,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盛会。它是一股强劲的东风,吹入亿万人民心中,让亿万颗心都开出了希望的花朵,绚丽夺目,光彩焕发。全国人民正在同心同德,奋勇争先,向着我们党既定的伟大目标大跨步前进。

伟大呀,我们的党!

1982年9月3日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闭幕词

同志们：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就要结束了，现在我代表会议领导小组讲几句话。

几天来，我们学习了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以及贺敬之、马洪等同志的有关讲话，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我们听了冯至会长的开幕词和叶水夫副会长的《工作报告》，并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感到，从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从三中全会以来，外国文学战线的这个时期，同党领导下的其他战线一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几年来，外国文学工作的队伍发展壮大了，外国文学工作者心情舒畅，精神焕发。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教学、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尽管我们的工作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但成绩毕竟是第一位的。

会议开始时提出的修改学会章程和调整增补理事。讨论1983—1990年外国文学工作规划（征求意见稿）、为准备明年召开全国外国文学工作座谈会交换意见这四项议题，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已经基本完成。修改后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章程》已经原则通过；理事会的调整增补已经完成，第二届理事会正式产生了。新增补的三十四名理事中绝大多数是中年人，这对于充实理事会的领导机构是有重大意义的，也是符合中央提出的新老交替这一战略思想的。我们希望下一届理事会，不仅

有较多的中年同志,而且有青年同志参加到理事会中来。

会议对《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八年规划》(征求意见稿)作了广泛讨论。大家认为,中央决定把社会科学工作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说明中央对社会科学的作用的高度重视。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在讨论中,大家对规划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如:应该重视外国文学的普及工作,应该加强对东方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国别文学史多而专题研究少,等等。

对于明年将要召开的全国外国文学工作座谈会,大家交换了意见,认为座谈会应该进一步解决外国文学工作中的一些方向性、政策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并且希望中宣部加强对外国文学工作的领导,把外国文学工作大大往前推进一步。

姜椿芳、吴富恒、陈嘉、孙绳武和陈冰夷等五位同志在大会上先后发了言。

同志们,这次理事扩大会议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描绘了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任务。这就很自然地使我们大家在会上思考一个问题,在外国文学工作中,怎样才能迈出新的步伐,打开新的局面,以便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经过几天的讨论,同志们认为要做的事情很多,千头万绪,然而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概括地说,这就是:

第一,我们在回顾过去几年的外国文学工作、总结外国文学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的原因时,一致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坚持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冲破了外国文学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实践告诉我们,过去外国文学领域中的拨乱反正,靠的是解放思想,今后要迈出新的步伐,打开新的局面,仍然要靠解放思想。真正的解放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

新问题;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在回顾以往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深切感到,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近几年来,在肃清外国文学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的同时,也确实出现了自由化的倾向。这种现象的产生又一次表明,外国文学工作如果稍一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就会滑向错误的道路。因此,我们希望广大外国文学工作者要坚持学习,在当前,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二大的文件,用十二大的精神指导我们的工作。

第二,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力争在本世纪末使我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伟大目标,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外国文学工作怎么办?当然,谁也不会把经济上的目标机械地搬用到外国文学领域。然而在外国文学领域中毕竟存在着一个树雄心、立壮志、攀高峰的问题,这同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是没有区别的。到本世纪末,在外国文学领域里,在翻译、编辑、教学、研究等方面,理所当然地应该力争拿出一批符合我国国际地位和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具有高质量和中国特色的成果。这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重任。因此,制定一个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规划,在当前是一件十分紧迫和重要的工作。

第三,党中央已经明确指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既互相关联又互为目的。这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的重要作用。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方面军——外国文学工作者,其任务同样是十分艰巨而又十分光荣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不可能离开全人类的文化发展的。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是全人类文化的合乎规律的继承者。毫无疑义,这种继承不是全部照搬,统统“引进”,而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批判地加以吸收和继承,做到“洋为中用”。外国文学自然也

不例外。我们既要反对闭关自守,也要在吸收外国文化的同时,特别注意外国资产阶级文化的挑战与侵蚀。

几年来,已经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这方面的成绩,在前面已经谈到。另一方面,我们也都看到,西方的一些形形色色的文艺思潮和流派也随之涌进我国,并且在某些青年和文艺工作者中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当然,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决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简单。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我们外国文学工作中的缺点,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在介绍的同时,评论工作没有跟上去。特别是,有的评论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所介绍的作品、思潮进行分析、评价,而是过多的吹捧,甚至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正确的,从而造成了某些混乱。当然,这是个别的现象。我们很多外国文学工作者对此早有所察觉,也进行过一些批评。总的看来,怎样才能既排除其消极作用,又吸收其有益成分,避免简单的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这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的问题。我们希望大家都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总的目标出发,遵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探讨,积极开展外国文学的评论工作。这里要强调一下,乔木同志在最近一次讲话中特别说明:宪法草案和十二大报告中没有提到双百方针,丝毫不意味着这一方针有什么改变。

加强外国文学评论工作的关键在于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文艺理论。应该承认,外国文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一般还都不高,基础也不厚,许多与外国文学思潮密切相联的理论问题,如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等等,还缺乏深入的、系统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说明。加强外国文学评论,还必须注意研究外国文学理论中的新探索与新问题,对其中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加以回击与批判,这方面的工作,长期以来是个薄弱环节,现在是迎头赶上的时候了。

第四,随着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的联系的日益加强,随着世界科技和通讯联络的日新月异,我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也将越来越多。作为外国文学工作者,对自己祖国文学的进程应多加关心,多加了解。一般地说,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关心不够、了解不够的。这些年来,我国文艺界讨论的许多问题与外国的文艺思潮是分不开的。探讨世界文学进程中的那些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已经提到议事日程,研究那些过去和现在、国内和国外交织在一起的、有着重大争论的理论性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了。外国文学工作者应为祖国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与繁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如怎样培养和发展外国文学队伍、加强和改进外国文学学会的工作,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等等,对于我们迈出新步伐、打开新局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会议的开幕词和工作报告已经涉及,这里就不谈了。

现在,我宣布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胜利闭幕!祝同志们一路平安,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982年10月30日

别丈八沟

在西安丈八沟宾馆住了八九天,今天就要离开了。

到西安以后,一直阴天,昨天还下了一场大雨。今天忽然晴了天,阳光灿烂,照亮了全园。我怀着满腔离情别绪,在全园漫步,意思是同这里的花、木、竹、石和联绵的湖泊告别。时届深秋,但是月季花、鸡冠花、菊花等等正在迎着寒风怒放,同红叶争奇斗艳。蜜蜂和蝴蝶在花丛里飞来飞去,令人想不到现在正是秋天。

我越是觉得林园美妙,离情别绪就越浓。我自己也觉得难以理解:自己已年愈古稀,游历过世界上将近三十个国家,雪泥鸿爪,到处遗留,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留恋一个地方。

原因何在呢?

原因只能向整个西安去找,不能只限于丈八沟。西安是中国的文化古都。在这里,耳中听到的地名和人名,眼睛看到的古建筑遗址,无一不让你想到我国古代光辉的文化,想到古代重大的政治事件和伟大的人物,让你不由自主地油然起爱国之心,觉得生为一个中国人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几天以来,在会议之余,我参观了许多地方,每一个地方都让我心情激动。我觉得西安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好地方;住在西安的人有福了。同来的一位老先生说:如果调他来西安的话,他将毫不迟疑地遵从。这是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决不只限于我们二人。

大概就因为有了这个想法,在离开西安之际才有那样浓烈的

离情别绪。

尽管这样,我终于还是愉快地离开了西安,离开了丈八沟;因为,我知道,我将来还会回来的。

1982年11月4日

教学科研应结合，人才要交流

现在学校出现了人人关心改革，人人谈论改革，人人希望改革的好形势。

改什么呢?

首先，要逐步解决教学和科学研究脱节，教学、科研与生产和应用脱节的问题。从全国讲，我们最大的毛病是照搬外国的模式，成立了两个科学院，国家花了大量科研经费，投资巨，效益不高。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已不这样做。据我所知，国外有些很有名气的科研机构，或者跟高等学校结合，附设在学校内，既出成果，又出人才；或者跟某些公司、企业结合，使研究成果同生产和应用结合起来。有些国家的科学院只有一个名称，人员几乎都在大学教书。我们的学校也有一个教学和科研结合的问题。一些外国朋友对我们的一些做法，觉得不可理解。他们说，不进行科研怎么能搞好教学；不教学怎么能称教授。我们的教学、科研方面，人员老化、知识老化问题很严重。再说，科学研究缺少生气勃勃的青年人，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主张，搞科研的人员，应抽出时间到大学里讲讲课，教学人员也必须抽出时间进行科研。教学和科研人员应定期轮换。

其次，为了解决人才积压、人员老化、知识老化问题，应该促进人才流动，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大的大学应该组成讲师团，定期到小城市或边疆的高等学校去任教半年、一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都可以。使大学教师不至形成学校所有制。我赞成老教师实行退

休制度。年纪大了不退休,占着编制,青年人就不容易上来。退休以后,有条件的老教师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带研究生,著书立说。多数老教师总是想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给社会的。他们对退休的顾虑,是退休后的研究条件,是否还有好的助手。学校应考虑安排解决。

总之,我们要从积极方面理解当前的改革,这就是要破除过时的条条框框,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人是要有一点压力的,没有压力,没有一点竞争,人就容易变懒。

1983年4月

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同志们：

下午的总结本来应该由吕叔湘先生来做。吕先生喉咙不好，所以委托我代表。稿子吕先生已经看过了。因此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个总结原封不动地念一遍，然后简单地谈几个问题：

一、会议总结

1. 这次年会开了近九个半天，其中差不多八个半天是学术交流，体现了学术年会的特点。

2. 分组宣读和讨论了 87 篇论文。办法是先连着宣读几篇，每篇一刻钟。然后集中讨论，讨论的时间略多于宣读的时间。最后由大会交流，方式还是可取的。分组讨论贯彻了临时党组提出的坚持原则，实是求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相当热烈。有的同志说话比较直率，我觉得这在学术讨论中应该是允许的。对我们学术的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对加强语言学界的团结，也肯定是有好处的。这样的讨论，以后要成为我们的习惯，成为大家觉得平常的事。

3. 也还有不足之处。一是有的论文不够成熟，有的内容比较空，这都是由于下的工夫不够。二是有的同志没有根据我们提出的要求准备 15 分钟的发言稿。有的同志论文很精采，超过 15 分钟也是可以的，可以灵活一些。但是个别同志不是讲，而是念论文，有的念了差不多 40 分钟，效果很不好。

4. 五日晚上开了一次《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这里重申一

下:年会论文要由学报优先录用。8月9日集稿截止。在这之前,不要向外投递。这里还发现一篇已经发表过的论文,再重申一下:已经发表过的论文不要向年会提交。

5.8日晚开了常务理事会。讨论了会章的修改,要发个修订稿,征求会员的意见。还讨论了学会组织机构改造的事,下届组织机构要精简一些,成员也要年轻一些,要发个候选人名单,由会员重新选举。年会想改为二年一次,下次年会可能于1985年秋在昆明开。已委托云南省语言学会筹备。

6.这次年会的筹备和进行,安徽省的领导大力支持,安徽省语言学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代表与会的同志向省领导、向省语言学会表示感谢。这次年会有不少同志参加服务,安排吃住、交通、送材料、做记录,很辛苦。我代表与会同志向参加服务的同志表示感谢。会议总结,到此为止。

二、下面谈几点个人的意见

我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谈如何欢迎新生事物,吸取新的研究成果,学习新的研究方法,使用新的研究手段。

大家知道,我们的学术是永远前进的。拿语言学来讲,中国语言学在世界上历史相当长。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邻国印度。有确实可靠的证据证明它已有2500年的历史了。波你尼的语法确实有它了不起的地方。现在英文、俄文、德文等印欧语系的语言字母排列混乱,元音辅音夹在一起,乱七八糟,可是波你尼的字母排列,在公元前5世纪或者4世纪已经很科学,他把元音摆在前面,辅音摆在后面,而且辅音按发言部位来排,清音,清音送气;浊音,浊音送气;最后一个鼻音。这种按发音部位排法非常科学。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中国和印度语言学有很长历史,很大成绩。这是不成问题的。一百多年以来,欧美几个国家在语言学方面,不管是比较语言

学,或者是语法理论、语音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过去的情况,我们了解得比较多,当代的情况,我们了解得比较少。最近几年稍微好了一点。国外目前语言学的各种学派,百家争鸣,确实兴旺发达。我们目前怎么样呢?通过这几天的讨论,我觉得自己学到了许多东西。比如有的同志讲到了机器翻译,有的同志讲到电子计算机。内蒙古的同志已经把《元朝秘史》整个输入电子计算机中,这就为元朝历史语言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工具。这样的例子很多。我听了后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一门学问如果老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这门学问就没法进步,要随时吸收新鲜东西,包括它的方法、工具(如电子计算机等),我们都要吸取。这样的话,再把我们过去的传统的成绩加在一起,我们将来的语言学就会发展得比现在更快、更好。

同志们知道,现在国际上,科学发展有几个特点:其中之一是比较研究。过去我们只知道比较文学、比较语言学,现在比较政治学、比较经济学都出现了。比较的方法很流行,什么都比较。边缘科学发展也很快,有些学科很难讲是属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最近我听了一个德国文学讨论会,数学也进入了文艺批评领域。这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将来在吸收新鲜成果方面应该多加注意。

第二点讲讲学风问题。

目前国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实取得了成绩。学会之多,杂志之多都是空前的。我觉得这还是有益的。但是一方面学术兴旺发达,另一方面学风却在极个别人的身上出现了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进行科学研究,首先应该大量积累资料,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后得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可是现在学术界有极少数的文章空洞无物,水分太多,没有传达什么信息,也没有什么社会功能。大半是空话。有些同志对这种现

象也是不满意的，说这样的文章他们就不看。而空洞无物的文章，不管印得多好，发行量多大，人们也不愿看。看来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都有这个问题。

另外，在学风问题上要讲求效益。我们研究语言学要探讨理论，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探讨理论的同时，是否也要讲求效益呢？罗竹凡同志在小组会上提出了我们研究语言学究竟为了什么？语言学科怎样为四化建设工作服务的问题。陈原同志的发言做了一个解答，讲得非常好。我们搞“文改”，更要讲求实际效益，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汉字拉丁化，为什么简化汉字，为什么推广普通话，没有一件不和当前的四化建设相联系。搞“文改”不讲求效益，恐怕有点麻烦。

现在我们中国的经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过去我不相信农民会很快富起来，去年回老家一看，果然富起来了，而且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们区里有几个万元户，超过了我们一级教授的工资。这样的成绩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很大原因是个别领导同志提出了经济效益的概念。讲经济效益要我们中国人能够接受，这要有很长的过程。如果不算经济帐，我们的四化永远也建不成。我们研究语言看来也该讲求点经济效益。

我还想谈谈学术道德问题。这是个自古以来就有的问题。是任何国家学术史上都存在的问题。解放30多年了，这个问题仍比较严重。有的同志把稿子寄给编辑部，编辑部不答复，官僚主义。过了一年半年另外一篇文章，一本书出来了，内容跟他这个完全相同或差不多。你怎样解释呢？我来的时候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个小消息，说一个人讲海上的丝绸之路。后来我想起，海上丝绸之路早就有人提过，最近北京大学东语系的一个教员又提出来。我想可能是英雄所见略同吧。于是向那位教员打听，他说：“这个问题很简单，稿子是我给他的。”谁知这位老兄竟自称是第一个讲海

上丝绸之路的,而他用的材料却是别人的。我给这位教员出主意,让他写封信给《北京晚报》,请《北京晚报》发表。我觉得这种学术剽窃风不可长,打击一下有好处。整个学术界像这种现象不是绝无仅有的。我认为学术道德还是应该讲究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这工作是我做的,我就承认。不是我做的,就不应该承认。我的这些话怎么听来的就怎么说,没看过的书就说没看过,不要装假。

第三个问题谈谈老中青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中央最近三令五申班子要年青化。现在已经这样做了。包括政协,中年人、青年人进去的也多了。我们学会也有这个问题,将来我们领导机构也要改一改。有些老同志要退居第二线、第三线,这个我看是很自然的。因为社会上万事万物都在发展,人也在发展,从少年到青年到老年,这是一个发展规律。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对于自然规律,我们用不着感慨。我觉得人老了,精力不行了,退居第二线是不奇怪的。我们中国有个很好的传统,尊师重老。那些不懂得尊重的是例外,这和国外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对欧洲的感性认识颇为丰富。他们那个社会讲求人的使用价值,你这个人对社会有使用价值,社会就尊重你,包括自己的儿女。你这个人今天对社会没有使用价值了,社会就不尊重你了,也包括儿女在内。在我们这个地方,假如儿女虐待父母,社会有舆论制裁。这个舆论在欧洲是没有的。在伦理道德上中国和西方是不一样的。我们对待老年人,虽说他今天不能工作了,但他过去工作过,而且工作得非常好,对人民有过贡献。不管他今天处在什么情况,我们还要尊重他。我们不能说一个老人现在不行了,没有使用价值了,我们就像丢双破鞋那样把他丢掉。这种思想在我们社会中不能说非法,起码大家是不承认的。一直到今天,我们仍提倡尊师重老。我们不是要学生做奴隶,但是要尊重师长。

我们任何事业都是要发展、要前进的。希望在年青人身上,这是不成问题的。那么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即老年人怎么看待年青人。老年人不能觉得青年人"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想当年我们做教授时,也没多大年龄,今天的青年为什么就不行了呢?年青人将来也要老,人类永远要生存下去,社会永远要进步,将来总要比现在好。我们每个人都像在跑接力,我跑一棒,你跑一棒,永远跑下去。关于后来居上,我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妥当。我觉得按学术研究讲,后来居上并不一定说的是后来的学生在任何方面都超过老师。举个例子,像章太炎、王国维,在很多方面我们今天恐怕很难超过。当然在某些方面我们能超过。学问继承和青老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来对待这个问题。在学会中,处理好老、中、青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安定团结。

我上面讲了三条。第一是不断使用新的研究手段,吸收新的研究成果;第二是要有好的学风;第三要安定团结。如果我们语言学界能做到这三点,我相信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工作一定会日益发展,我们的成绩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

1983 年 5 月 9 日于合肥

我的一点希望

——祝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五周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五年了。在这不算太长的时间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有水平的书籍，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老朋友之一，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觉得，社会科学出版社最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不像有一些出版社那样"向钱看"，因此出了一些明知道会赔钱但确有一些学术价值的书。如果所有的出版社都"向钱看"，只出那些能赚钱的书，那就一定会有一些销路不大但又确能填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空白点的书，无法出版，一些冷僻的学科无法得到发展。这对我们社会科学的研究，对我国国际学术地位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希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能在这个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提高出版书籍的质量，专在质量上做文章，而把数量放在次要的地位。有一些比较通俗的著作，是否可以让别的出版社去出，比如那些编著的或者编译的著作，普通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文，我们都可以不出，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出版那些穷年累月积累资料，确有真知灼见，确有所创新的著作上。一部书尽管只能销几千本，甚至不到一千本，只要真有价值，只要学术水平高，我们就出。别的出版社不肯作的，我们偏要去作；别的出版社不肯出的，我们偏要去出。这样一来，积之既久，总有一天，作者以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书为荣；读者看到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就感到放

心。这样,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牌子”就创出去了,对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的贡献,将比现在要大得多;对我国四化建设的贡献,也将比现在大得多。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我希望,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庆祝十周年建社时就能够做到这一步。

1983 年 6 月 15 日

祝　　词

——致高校东方文学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

高校东方文学教学研究会及学术讨论会在四川乐山举行。我因为要参加别的事前已经定好的会,不能来参加,谨向到会的同志们表示歉意。

研究东方文学,教东方文学,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这个权利。但作为世界大国,特别是东方大国的中国,应该说更有这个权利。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因此研究起来,教起来,更能得心应手,更能把东方文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我们决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对我们来说,研究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找出东方文学发展中的规律性东西,以利于创造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新文学,以利于更深刻地了解东方其他民族,从而加强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们古人说:“他人之石,可以攻玉。”邓小平同志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我们研究东方文学,教东方文学,首先应该抱着学习别人长处的态度。

祝大会顺利进行!

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983年7月22日

学习《邓小平文选》，努力开创外国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最近参加了一个读书班，用一周的时间，通读了《邓小平文选》，收获之大，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对小平同志那种革命的胆识，实在衷心钦佩，对他那种博大精深的思想，鞭辟入里的分析，真正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实在感到景仰。我相信，这是全国人民共有的想法，决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的。

但是知识分子们，其中也包括研究外国文学的同志们，更会有特别的感受，特别的喜悦。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在过去三十多年中给我们带来过不虞之誉，更多地却是带来了求全之毁。到了“文化大革命”，可谓登峰造极，我们竟落到“臭老九”的地步，为一些“高贵人士”所不齿。我自己当时常常想到“斯文扫地”这一句古语，颇有哭笑不得之感。此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自己真正“解放”以前，就高瞻远瞩，一方面提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发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他明确地说：“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隔了几年，他又毅然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立刻给知识分子头上吹来了一股强劲的东风，唤起了普遍的喜悦之情。

解放以来，广大知识分子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努力同工农相结合，应该说是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知识分子固然不应该效

法卖瓜的老王那样自卖自夸;但实事求是地去判断,我上面说的话决非夸大。在几次巨大的变革中,一般说来,知识分子已经证明是经得起考验的。说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实事求是的提法。不管怎样,对于广大的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精神上的解放无疑会大大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无疑会产生极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用到科学研究上,其中也包括外国文学的研究,必将产生优异的成果。

外国文学的研究从学习《邓小平文选》中能得到些什么启示呢?

我想首先从精神文明的建设谈起。党的十二大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并提,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在这个提法的形成过程中,小平同志有许多深刻的、正确的论述。比如他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内容是很广泛的。小平同志对此有一些论述,重要内容之一自然是上面提到的文化,其中包括文学,也包括外国文学;在陶冶人们的思想、理想和革命情操方面,文学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小平同志号召说:"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与此相联系,小平同志又提到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来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他说:"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围绕着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采,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

双百方针的正确早已为几十年的实践所证实。但在“四人帮”时代,他们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但实际上却束之高阁,名存实亡。那种十亿人口只有八个样板戏的苦头我们都尝够了。现在小平同志又明确地着重地提出了这个方针。他号召:“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在上面引的几段话中,小平同志都提出了艺术形式和风格的问题,提出了提高艺术表现能力的问题。我觉得这都属于艺术技巧这个范畴。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研究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的研究也一样),过分偏重思想内容。思想内容是重要的,可并不就是一切。但当时却被提高到压倒一切、实际上是代替一切的地位。艺术技巧虽然间或也提一提,实际上几乎成为陪衬,不占什么重要的地位。今天小平同志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艺术表现能力,创造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内容再好,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它也不能算是艺术品。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研究外国文学,要借鉴古今外国文学的优秀的表现形式和手法,这对于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常常有一个想法:我们研究外国文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借鉴,借外国文学之鉴,供我们在创造社会主义新文艺时的参考。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借些什么东西呢?是思想内容呢,还是艺术技巧?我的看法是,后者可借鉴的东西大大地超过了前者。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在这个总的方针指导下,我们当然也要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这样的新文艺必须以社会主义理想为主要内容,不能有其他违反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点丝毫也不能动摇。既然是这样,那么中国新文艺的思想内容就必须是中国的,这一点是再明确不过的。真正要向外国古今文学借鉴的是艺术技巧。

研究外国文学,在艺术技巧方面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以使我们文艺的形式和风格多样化,提高我们的表现能力,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愿与全体外国文学工作者共勉之。

1983年8月3日

对新入学的大学生讲几句话

全国高等学校都已经开了学,三十多万高中毕业生进入了大学。这在他们的一生中是一个关键时刻。

五十多年前,我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我们那时的大学生,同今天的大学生比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且不说社会制度不同,单就你们见识来说,就远远超过当时的我们。你们现在真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广播、电视等等,我们当时作梦也想不到的。

但是,你们也有自己的不利之处。你们是在甜水里泡大的,虽然也可能碰过一些钉子,但基本上处于顺境。你们根本没尝过"三座大山"压迫的味道。你们不懂什么叫帝国主义,不懂什么叫资本主义国家,至少是没有感性认识。因此,虽然谈到爱国主义我们也有共同的语言,但却比较空洞,缺少切肤之痛。我想,你们中间一些人有一些不清楚的或者糊涂的想法是很自然的。

我自己曾在旧社会生活过三十多年,其中十多年是在国外度过的。在新社会也生活了三十多年。我心里有一本帐,有一个清晰的对比:中外对比,新旧对比。就拿爱国主义来说吧。在旧社会,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剥削,我们时时处处都可以感觉得到。我们憎恶,我们痛恨,我们也反抗。但有时候也难免有点贾桂思想,总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直不起腰来。心里真是酸甜苦辣,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祖国仿佛是一个受难的母亲,我们爱这个母亲,但却有点束手无策。

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昭告天下:中国人民从

此站起来了。这一个“站”字,实在非常传神。我们的腰板挺直了,贾桂思想一扫而空。

但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的提高与降低,在国内的人是很难立即感觉到的。但在国外,不管是暂时居留的或者长期居留的华侨,他们简直像寒暑表、气压计。威望一高,立即感受到。1951年我到印度去访问,当地老华侨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印度人对他们立刻刮目相看。我听了心里很高兴。1955年,我又访问印度,老华侨又告诉我,印度人对他们彻底改变态度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美国侵略者之后。他们说,这才是真正的改变。从这一个小例子可以看出,海外游子不管离开祖国多么远,同祖国是息息相关、心心相印的。他们不一定懂共产主义,更不一定喜欢共产主义。但是提高祖国的威望的是共产党,他们爱的就是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祖国。

这些情况你们懂得吗?我想是不懂的。这不能怪你们。我们老一代的人有责任告诉你们。听说,有的大学个别学生说:“爱国教育能接受,对爱党教育有反感。”又说:“爱国与爱党有时不一致。”上面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难道能够把国与党分开来吗?没有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建成吗?没有共产党,抗美援朝能胜利吗?同这个有联系的就是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听说,有的同学说:“对大学生要求爱国就可以了,不能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今天,在我们中国,要讲爱国,就只有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你们想爱的那样的国就根本不能存在。

根据以上的理由,我非常同意一个提法: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个规律或者是一条必由之路。今天,绝大多数的青年热爱祖国,而愿意为共产主义献身的青年也越来越多。你们毕竟还年轻,好多事情不很清楚。世界上根本没有生而知之的人,一时的不知并不等于永远的不知。比如说,你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真实情

况就不清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这并没关系,你们迟早会清楚的。我们祖国的未来,就在你们身上。你们道德修养的高低,你们业务学习得好坏,你们身体锻炼的强弱,直接影响我们祖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我希望,你们能意识到自己肩头责任之重,努力学习,奋勇向上,从爱国主义逐步走向共产主义,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而献身。

1983 年 8 月 11 日

缺 页

我们在北京广播,广大的印度人民只需一开收音机,立刻就可以听到远在万里外的老朋友中国人民的消息。我们好像同处一室之内,好像在促膝谈心。我们的思想能够传递,我们的感情也能够交流。印度方面也有自己的电台,中印两个电台联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完成我上面谈到的任务。

印地语广播,在开始的时候,规模比较小,困难相当多。最初每天只播送两次,每次半小时,其中有一次是重播。后来应广大听众的要求,增加到每次一小时。现在是每天播送两次一小时的节目。广播的内容也逐渐扩大、充实,由最初的三个增加到现在的五个。此外每天还播送 10—20 分钟的音乐,内容不但有中国的音乐,也有印度音乐,如印度民歌、印度电影歌曲、印度手风琴独奏等,内容丰富多采。音乐是谁都能懂得的国际语言,通过音乐,我们两国人民的心,显得更接近了。

北京电台印地语广播,显然受到了印度广大人民的欢迎。印度朋友的来信,与日俱增。到了 1960 年已增至 804 封,1961 年 971 封。这些信不但来自印度,而且还来自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阿富汗、毛里求斯、尼亚萨兰、印度尼西亚、葡萄牙、东德、法国、苏联等国。可见广播影响之大。

我们常说,30 年算是一代。北京电台印地语节目的寿命已经超过了一代,不算短了。但是我相信,同我们两国间几千年友谊的历史比较起来,这只能算是短短的一刹那,只能算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相信,我们这个节目一定会继续下去,而且越办越好,一直到第二个 35 年,第十个 35 年……

不能否认,在我们两国的友谊的天空中,有时也会升起点乌云,比如中印边界问题。我认为,这是不幸的,但不是不能解决的。众所周知,这个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制造的。我们两国人民何必一定要"继承"帝国主义这一份并不光彩

的遗产呢?我们两国人民有一万个理由要友好、要合作,而没有一个理由作正相反的事情。我自己曾多次访问印度,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无限深厚的友情我是亲身尝到过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心中对印度人民的友情,我自己更是知道的。我们两国人民真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心相印。瞻望未来,对我们古老又新鲜的友谊,我充满了无比的信心与激情。

1984年3月10日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今天我要讲的这些意见，是深思熟虑多年而形成的。当然不一定正确，因为水平有限，但有些方面或许对同志们有所帮助。

我讲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怎样提高研究外国文学的理论水平的问题。

首先要提高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水平，这是基本，不能动摇。我跟大家一样，也是解放后才学习马列主义的。我像好多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一样，向马列主义学习，恐怕不是通过实践，而是通过理论，学习社会发展史，了解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我解放前没吃多少苦，没有“三忆三查”，就是学习社会发展史，认识到人类社会不管多么曲折，但终究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史告诉我，这条路绝没有错，是科学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我读过《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感到确实有说服力。在新中国要想搞文学的话，只有钻研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帮助我们弄清一些问题，只有靠这个，没别的办法。我还看过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感到他讲得很有道理，讲艺术起源，艺术的阶级性，艺术与劳动的关系。如果列宁不肯定普列汉诺夫，恐怕普列汉诺夫也没有今天的地位。我建议同志们看看这本书。还有德国梅林的文艺理论，我感到他讲得也不错，很有道理。我向在座的提一个要求，包括我自己在内，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没有看过的，可以看，看过的，还可以再看，因为看理论书，一遍很难看懂。

第二,学习中国文艺理论。就我国的文艺理论来讲,历史悠久,水平相当高,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不愧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艺理论非常丰富,有现成的书: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另外如郭先生编的中国古代文论选和文艺选,同志们也可看一看。这里我特向你们推荐一本敏泽的《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敏泽是中年人,他的书我看了,虽然资料不如郭老的多,但叙述得很有系统,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讲得非常清楚。有一次我问朱光潜先生:你看敏泽的书怎么样?他讲:不错,另外呢,他的写法跟我们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好,他要是跟老一代都一样,就没有什么进步了,要的就是不一样。我没有意思贬低老一代,老一代有老一代的成就。可是我呢,我始终相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轻一代超过我们,这是历史规律,你承认不承认都是这样。我认为九斤老太的思想是不行的,不符合事实。当然也不是说,年轻的同志不努力也比老的强,谁要说我比你年轻,不努力也比你强,就是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将一事无成。另外我想,同志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最好读读中国古代文论: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唐朝司空图的《诗品》,特别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面每一段都不是长篇论文,但却讲了许多文艺理论,我相信你们看了以后一定爱不释手。《文心雕龙》在世界上声誉很高,日本人研究的比较多。我国有四川大学的杨明照先生,他是《文心雕龙》专家;还有范文澜先生,他是搞历史的,但在二十年代初就搞过《文心雕龙》,我讲的这是老的。后来有年轻的,如王元化同志,他给我寄了一本《文心雕龙创作论》,我觉得非常精采,看了以后,感到跟敏泽相似,也是中年人,近代文学的路子搞得跟老的不一样。去年在日本召开了一个国际讨论会,王元化去参加了,谈了他对《文心雕龙》的意见,为我们国家增了光。《文心雕龙》这本书的内容、主要理论,要搞清楚是很不

容易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几代都要学习。

第三,学习西方文艺理论。西方文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在这之前也有。这里有一本书,同志们最好费点功夫看看: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书一开头就研究古希腊,有些我们不知道,如有一个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他是自然科学家,也有文艺理论,我认为相当精采,他从数学角度来讲。后来柏拉图也有,最后集大成者是亚里士多德,大家都知道。应该把朱先生的《西方美学史》看一遍,这本书不难懂。如看它一遍,再看一遍敏泽或是郭绍虞先生讲中国文学批评的书,两条腿走路,那就好了。我们的路子跟希腊很不一样。我的印象是,希腊一开始就讲文艺理论,而亚里士多德还有别的理论,多极了,因为是自然科学,跟他的整个哲学系统都有联系。他对问题分析很细,大概有名的是讲悲剧。希腊人一开始就讲悲剧喜剧。对悲剧,亚里士多德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就是悲剧能够净化人的思想,净化灵魂。他分析悲剧的路子方法跟我们早期的文学批评家包括刘勰在内的《文心雕龙》不一样。中国的文艺理论分析不很细,而是给人印象。西方讲分析,而中国讲综合。后来到了唐朝,又讲神韵,特别是司空图的《诗品》,那里把诗分成二十四种意境或境界。后来有许多人讲神韵,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讲文艺批评要神似、形似,形似就是形式、外表相似,我们要神似,精神相似。中国文论讲究韵,即神韵,讲究味。西方文论,从希腊开始,一直到今天,通过中世纪、文艺复兴,体系发展了,但同我们不一样。我们根据印象,如司空图的《诗品》都是些印象。什么雄浑、沉着、洗炼、典雅、豪放、含蓄、婉约等等。中国文论史上,有的人主“神韵”,也有人主“性灵”,就是讲有“性灵”,就有好诗;王夫之的“性情”说,认为诗最重要的是性情。还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他有“境界”说,认为有境界就是好诗。没有境界就不是好诗。如果没有接触欧美那一套,我一点

也不怀疑;接触了,觉得我们的不易说清楚。你说什么叫“雄浑”,讲不出来。“性灵”、“神韵”、“境界”,哪一种文字也翻不出来,白话也翻不出来。王国维还有一说,讲“隔与不隔”。说不隔就是好诗,如“池塘生春草”,池塘里长出春来了。王认为“不隔”因为一看就懂,一点也没有隔阂。但用“谢家池塘”,用了典故,说春草,却不讲春草,用“谢家池塘”讲春草,这就隔了,不行。用一两个典故有什么了不起,说用典故就隔,这就绝对了。我们的这些名词,包括司空图的《诗品》,说不清楚。一看就懂,一问就糊涂。我觉得应把中国文艺理论这一套,用逻辑语言讲出来,不要形象。中国过去评论一个人,从后汉特别是到了南北朝,是根据人的形象,如“出水芙蓉”。可你说究竟什么是出水芙蓉?是好是坏,不好说。这是些比喻,把形象给你,你接受形象的人,形象在你脑筋里面活动,转成思辩,然后得出结论来。我看这有点玄乎。出水芙蓉,我们都懂,可是你理解的出水芙蓉,跟他人不一样,中间都要经过脑筋加工,怎么叫出水芙蓉,就是池塘里面长出一枝荷花,那一定是很美丽的、很挺直的。很形象,但说清楚很费劲。诗词讲究神韵,李白的诗,杜甫的诗,两个都是大诗人,可完全不一样,哪一首是李白的,哪一首是杜甫的,你看得出来,甚至诗的一开头,讲这么几句就知道是李还是杜了。但要突出其区别,就不容易了。我们用“雄浑”等,给你一个概念,让你自己去分析。我看,保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其中包括内容,西方的文艺批评表达不出来,我们的就能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另一个是囫囵吞枣,含含糊糊,不太精确。我们怎么把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中国文艺理论,加上西洋文艺理论都吃透?要把这些东西说清楚很难。若能做到这一步,在世界就是先进的。有一个不妥的比喻:中西医的问题。中医能治病,针灸就很有效,但道理很玄乎。我倒不认为中医不科学,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我的意思是要把中国的这些概念说清楚,要提高理论水平才能把

它说清楚。希望大家看一些书,如《歌德谈话录》。埃克曼是哥德的秘书,他每天都到哥德那儿去,哥德跟他聊天,这是一个有心人,把谈话内容全都记录下来,成了一部书。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天,哥德拿一幅油画给埃克曼看,问画得怎么样,埃看了说好极了,是伟大的作品。哥德又问,你看画里有没有问题?埃说,我看不出。那幅画的背景是一个太阳,中间站着一个人。哥德说,太阳在后面,人在这边,那么人的影子应在什么地方?如果太阳在那边,人在中间,影子应该在相反的一边,对吧?埃克曼说对的,那影子画错了。哥德说,为什么画错了而你看不出来。关于这个,他的解释也不一定对,他的解释似乎是:伟大作家能改变自然。我感到这有道理,哥德的思想非常有趣,他解释:艺术家以违反自然的东西画出来,可叫你看不出来,你说是不是伟大的作品。也不能说每部伟大的作品都这样,我的意思是希望同志们能够看一看《哥德谈话录》,你当它看小说也行。还有莱辛的《拉奥孔》和《汉堡剧评》、海涅论浪漫主义、雨果论文学以及好多大作家论文学。这些确实与希腊是一个体系,总的来说,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但还是值得一看。关于哥德这个人,你扣他一顶完全唯心主义的帽子恐怕不行,他还有个讲法也很有意思,他研究植物说"花是叶子变的",我们看了一辈子花也没有想出来花与叶子的关系是什么。我看高尔基论文艺,同志们也可读一读,并不费劲,疲倦时翻翻,可以解除疲劳,增加知识。还有一例,是朱光潜先生五十年前上文艺心理学课时讲的,就是"为什么美"的问题。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似乎没有完整地接触这个问题。天下有美、有丑。我们研究语言文艺的,都有一个平凡的判断本能。在五十年前,欧洲有一派文艺心理学家作出了解释,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举个美国选电影明星的例子:他们在大木头杆上雕一个人形,让女孩子站在里面,要完全符合,不差一点,否则就扣分。要是进不去,就根本不行。另外,跳芭蕾舞,是

很美的,不美没有人去看。可四人帮时期,强调阶级路线,芭蕾舞演员得从农民、工人里去找,这是江青的路线,后来行不通。因为农村姑娘要参加劳动,劳动有其美,农村姑娘一般都很康健,皮肤发红,也是美,这是另一种美。可你要她转圈不行。阶级路线贯彻不了。如果你找个老太太,体重三百磅,让她跳芭蕾舞,就没有人看。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芭蕾舞很美,而三百磅老太太跳就不美,这就有个道理。奥地利心理学家李普斯的"感情移入"说就是我的感情移到自然界、客观事物上去。如我们看流云之泻,不让你在生理上感到负担,你就觉得美。当然还有静物,如泰山、黄山也很美。这是五十年前资产阶级的东西,但起码可以让我们的脑筋开开窍。为什么美,我是不能解答这个问题,让资产阶级来解答,用心理学。李普斯和弗洛伊一样是医生,他们不是瞎扯。今天的外国文艺理论流派我不清楚,但要是拜倒在它们的脚下,那是我们没有出息。可一概否认,既不了解,也不研究,也是行不通的。我们要了解,只要有机会,都可以研究,研究以后,才能决定拒绝还是接受哪一部分,这才是正确的。我认为现在有些人有点崇拜存在主义这个东西。特别是青年。可什么叫存在主义,并不清楚,抓住一点概念就以为是了,存在主义哪有那么简单。现在的文艺思潮,千奇百怪,恐怕二十年以后,剩不了几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好多主义,现在都没了。现在也是这样,千万不要迷信,包括意识流。还有朦胧诗,我是坚决反对的。我认为写朦胧诗的人有的接近骗子,看的人是傻子。文艺的目的是写出来给人看,要让人看懂,如果不让人懂,你就别写。

第四,印度文艺理论。印度文艺理论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印度很有意思,他的文艺理论讲戏剧与舞蹈是一码事,如电影,没有一部电影不突然给你来个歌唱,载歌载舞。问印度人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我们印度人的电影有两个条件,第一个要

有歌舞，否则没人买票；第二个是长，四小时以下，这电影不行。我们也有，越剧也是载歌载舞，还有京剧、黄梅戏都有散文与诗词结合在一起的情况。欧洲没有这种情况。一次看欧洲的歌剧，发给我唱词，一晚上才两页唱词，它并不在乎内容，翻来复去地唱这么几句，就像我们的戏《空城计》，内容早就熟知了，看了几十年，照样有人去看。要看情节，就得看霍元甲。外国的歌剧，也是重在听它的声音、音调，我们的《空城计》要看是谁唱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剧就不同，它是外来的。我问戏剧学院的一个人："话剧，农民接受不接受？"那人摇摇头。就拿北京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喜欢看评剧。在戏剧方面，我是个外行，但外行有外行的好处，能看到内行看不出的问题，如话剧有没有个民族化的问题。开个玩笑，你请我去看话剧，我不如坐公共汽车，那里每个人都是演员，都进入角色：有骂架的，有谈话的，这要比剧场真实得多。当然，这么说有片面性。我总觉得印度在文艺理论方面有些不足，但有些地方很有趣。如他们的文艺理论书中有一个例子，是一个词，叫"恒河上茅屋"，有三种意思：一是当面的意思，不通。茅屋只能在河岸上，不能在河上；二是引伸之意，即在恒河的边上；三是言外之意，意思是神圣安静，因为恒河是圣河，茅屋则表示安静，第三种意思是最高境界。这像我们的"言外之意"，欧洲人不讲这个，起码是不着重讲。我们中国，讲有个"味"，即你不直接讲，要有言外之意，让你琢磨琢磨，跟吃橄榄一样，回味方甘。在这上面，中国与印度相似。

关于文艺理论，我想讲这四方面。

第五，汉语问题。我希望同志们要学习古文。在座的年青人都研究外国文学，要具有一定的汉语基础，这就是先背上二百首诗词，旧的；古文也背上几十篇。我不是吓唬同志们，你脑袋里没有几百首诗词，几十篇古文，要写文章，想有什么文采，那非常难。希

望大家能补这一课。要多看一点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我推荐大家看《儒林外史》,在语言上,在中国古典小说里可与《红楼梦》媲美。这种书不要只看一遍,像《红楼梦》我起码看了七、八遍。邓小平文选中有几篇谈到文艺,说要提高表现力,这很重要。你要翻译,就要有一点文采。原作是部好书,经你一翻,一点文采也没有,你对不起原作。文学的论文,逻辑性要讲,也应有点文采。《儒林外史》的表现力很强,用词达到出神入化。如它表现劳动人民不缠脚,用了"大着一双脚",这个"大"字用得非常恰当,没有其他词可代替它。我们研究外国文学,是不是也有个提高表现力的问题。对外国文学,思想性可吸收的不是太多,而艺术性要吸收的则非常多。如《罗摩衍那》,其表现方法、表现力等,也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研究外国文学是有目的的,这目的就是要提高表现能力。

第六,外语。千万不要只学一种,应像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们大家都要学英语,英语是世界性语言。我们知道德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造诣有点自负:讲音乐,有贝多芬,讲文学,有歌德;自然科学也大有人在。可我1981年去德国访问时,我的老师,86岁了,是世界上搞梵文的权威之一,他送我几本书是用英文写的。要不是亲眼见,我是绝对不信的。这意思是德国人也承认今日英文的力量。用德文写,非洲去不了,印度也进不去,用英语写,就能走遍世界。希望同志们多学一点外语,最好学英语,这样写文章容易一些。

第七,知识面。搞文学,知识面非广不行。历史、地理、文化、社会、经济,你研究的国家的这些方面,都要知道。这我就不多讲了。

第八,要懂得科技。我们的同志最好学一学数学,要能使用电子计算机,现在这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了。我年纪大了,再学就困

难了,也没有这个雄心壮志。但青年人应学点数学。一次北大开德国文学讨论会,一位同志带来一本文艺批评的书,很厚一本,里面全是数学公式。韩素音跟我讲:“现在中国搞文学的,非用电子计算机不可。”在美国,电子计算机是家常便饭,人手一个,很方便。在内蒙古,《元朝秘史》蒙文本的词汇,已整本输入电子计算机内,现在他们研究《元朝秘史》蒙文本的语法等,就非常简单。而我们,查资料、卡片就一大堆。用电子计算机,一按,五分钟就全出来了。二次大战后,世界的形势飞跃发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飞速发展,我们中国落后了。新中国建国初期,我们的经济比日本要好得多,当时日本全垮了,现在怎么样呢?我 1946 年离开德国,那时那个国家全完了;前几年我又去,变化大极了,看起来那是了不起的。我们落后了,现在中央有这精神,要翻两番,这是很正确的。我们搞外国文学研究,首先应该认识到:你要是跟不上形势,就落后,落后就会挨打。我们要赶上去。希望青年同志要抓紧时间,不要光想着自己小家庭的现代化。我的家很简陋,当然我不反对在可能的情况下,把家庭搞得好一点,过得舒服些,但不要今天搞个三大件,明天又打个沙发,这样不行。有人说“时间就是金钱”,我说“时间就是生命”。别看我比你们中的一些人大五十岁,可五十年也是一晃就到。现在不努力,将来就后悔,这就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现在就有点伤悲,小时候不如现在努力,现在比较努力,但毕竟老了。同志们一定要珍惜时间,最好在房里挂个牌,写上“闲谈不过五分钟”。

今天讲了许多,对象是青年同志,我就倚老卖老,有过头的话,请原谅,并请批评指正。

1984 年 5 月 7 日

附注:

上面这些想法,是我多少年来根据自己的观察而形成的,曾在不同的学校讲过多次,但是始终没有写成文字。这次在上海外院讲,也没有稿子,连详细提纲也没有。上面的记录稿是根据我的原话录音写成的。它基本上保留了我的原话。但是我的原话措词不够细致,逻辑性也不那么强。想要改写,我目前没有那个时间。只好就这样披头散发地送到读者面前。请读者同志们只理解讲话的基本内容,认为有可取之处的,则取之;认为无可取之处的,则弃之;认为荒谬的,则批评之。这就是我的愿望。

1984年6月6日

语言混乱数例

写文章,是交流思想,传达信息的重要手段。要想交流、传达得准确忠实,就必须注意语法修辞,不能望文生义,数典忘祖,甚至生编硬造,写出一些除了自己谁也不懂的词句。

我先举几个例子。

今年二月二十日,一家大报在头版刊出一篇文章:《盼着减少这类现象》。内容是:饭馆取消了酒升酒杯的押金,储蓄所里准备了老花镜,"值得称赞"。作者笔锋一转,写道:"不过,在服务性行业的工作前进一步之后,差强人意的现象时有发生,朝外大街民众饺子馆的一半酒升不翼而飞,三里屯储蓄所里的三幅花镜也长了翅膀。"问题出在"差强人意"这四个字上。这个典故出于《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大体上还能使人满意。"酒升被偷,花镜被窃,还能令人大体上满意,岂不骇人听闻!要给作者上一上纲的话,他不是在号召鼓励大家来干这种"大体上还能使人满意的"勾当吗?

第二个例子出在本年五月十八日另一家报纸上,文章的题目是《莫要"等到整党时再说"》。其中有一句话:"此言差矣,不足为取"。我猜想,作者是想说:"不足为训"或者"殊不可取"。结果把二者混了起来,写出了"不足为取"这样怪的句子。

第三个例子也出在一家大报上,时间是今年五月二十四日。有一篇文章叫《春天的风》。讲的是小学生正在召开中队会:"一张张红扑扑的面庞神情专注,扑朔迷离。""扑朔迷离",在这里是什么

意思呢？我真有点扑朔迷离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出于《木兰诗》,意思是“比喻事物 错综复杂,难于辨别”。同小学生的面庞联系在一起,我百思不得其解。

语言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要它不变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也总是在想方设法,使它规范化;否则各行其是,语言就陷入混乱,不再成为交流思想的工具。一方面要变,一方面又要规范化,这就是语言发展的矛盾。对我们来说,应该力求遵守规范,避免混乱。

1984年6月9日

纪念印度民族运动的伟大领袖甘地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achand Gandhi)1869年10月2日生于印度古吉拉特邦卡提阿瓦半岛的波尔班达尔。今年10月2日是他诞生115周年。甘地出身于土邦大臣之家,属班亚(Bania)商业种姓,他的祖父和父亲在卡提阿瓦的一些土邦中当过首相。他的母亲是位虔诚的印度教徒。甘地从小受到宗教的熏陶,这对他后来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和策略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甘地幼时在拉吉科特上小学和中学。1887年他中学毕业后升入巴弗纳加尔的沙玛尔达斯学院深造,因为学习有困难而辍学回家。1888年他去英国,在伦敦大学攻读法律。三年后,即1891年,他取得律师资格,返回印度,在孟买和拉吉科特从事律师事务。1893年他应一名印度商人之聘到南非,先后在南非住了21年,中间曾两次回国。甘地在南非饱尝了南非当局的种族歧视和迫害,感受到不平等法律对有色人种的专横,这激发了他反对种族压迫的斗志。他领导那里的印度人开展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在斗争实践中,他初次制定了"坚持真理"的非暴力斗争策略,采取了示威游行、抗议请愿、不服从法令和故意激怒政府以招致逮捕等手段向南非当局进行斗争。这场斗争从1906年继续到1914年,终于取得胜利。南非当局被迫废除了某些歧视印度侨民的法案。

1915年甘地回到久别的印度。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各地旅行,了解印度的实际情况。这次旅行使他对印度的农民和工人的

生活和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17年甘地去比哈尔省的昌帕兰县调查靛青种植园农民受剥削和压迫的情况,在他的坚持下,省政府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调查农民的情况,甘地被任命为委员会会员。调查委员会后来提出了一份报告,建议废除当地流行的"三分田"制,为省政府所接受,从而废除了存在将近一百年的剥削农民的制度。甘地认为"昌帕兰的调查是对真理和'非暴力'的一个大胆的尝试"。(引自《甘地自传》,商务印书馆出版,1959年,第362页)这是甘地第一次在印度运用非暴力斗争的策略。

1918年甘地领导了阿麦达巴德纺织工人进行了印度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罢工。甘地采取绝食的方式鼓舞工人坚持斗争。罢工进行了三个星期,获得成功。不久,他又领导凯达县农民进行抗税斗争,迫使政府同意免征歉收农民的田赋。尽管政府实际上没有真正实施这一措施。但正如甘地所说的:"凯达的非暴力抵抗标志着古吉拉特农民觉悟的开始,他们的真正的政治教育的开始。"(引自《甘地自传》第383页)通过这些斗争,甘地同群众的关系密切了,穷苦工农把他看成是他们的旗帜。

1919年是甘地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发生转变的一年。在此之前,甘地虽然也反对过英国的统治,并且发动过反对英国政府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但他对英国的统治似乎并不是深恶痛绝的。他说:"我并不是不知道英国人统治的缺点,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当时我相信,英国人的统治,整个说来,对于被统治的人,是有好处的。"(《甘地自传》第151页)他认为英国在南非实行的种族歧视"是和英国人的传统背道而驰的,而且(我)相信这不过是暂时的和个别地方的现象。"(同上)他认为英帝国是正义、平等和民主的象征。在南非,当英国人发动波尔战争、朱鲁人举行反英起义时,甘地都站在英国一边,组织救护队为英国效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又组织印度救护队帮助英国作战。回到印度后,

他还向总督申请为英国招募担架队。但是191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动摇了甘地对英国的信念和忠诚。这些事件是:剥夺印度人民民主权利的罗拉特法案的实施,英国军警屠杀集会群众的阿姆利则惨案,以及由英国对土耳其实行苛刻和约而激起的印度穆斯林的基拉法运动。他开始斥责英帝国为"魔鬼"。他发表文章说:"我考虑了三十年,得出结论,英国目前的统治方式已证明它是印度的祸根。"他写信给总督说他不会像至今那样同英国通力合作。事实上甘地也是这么做的。他成立了"坚持真理同盟",发动了全国范围的总罢业和罢工。并且发动了反对英国的不合作运动。

1919年国大党阿姆利则年会是甘地积极参加国大党活动并参与国大党决策的开始。甘地说:"我应当认为我参加国大党阿姆利则会议是我真正参加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我出席过去的几届年会只不过是为了要重申我对于国大党的忠心罢了。"(引自《甘地自传》第423页)年会委托甘地负责修改党章,因为旧党章早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甘地完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1920年8月甘地发动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他号召印度人民退回英国授予的爵位封号,抵制学校、法院和政府机关,提倡土布,抵制洋布。甘地自己退回了英国在南非赠给的三枚勋章。同年9月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通过了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决议,确立了甘地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2月的那格浦尔年会进一步加强了甘地的领导地位。年会批准了不合作运动的决议,还通过了甘地提出的党章修改草案。党章规定,国大党的宗旨是"如果可能的话,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达到自治,如不可能,则脱离不列颠帝国而自治。""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仍将是和平的和合法的"。(引自《甘地自传》第436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大党还改组了组织机构,在村一级设立基层组织,在省一级设立省委员会。从此国大党便由一个散漫的组织建设成一个群众性的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政党。年会通

过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的决议,取消不可接触制和提倡土布的决议。也都反映了甘地的政治主张。甘地提出的一年内实现自治的口号,更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从此进入了以甘地为领袖的新时期。

从 1920 年起,不合作运动在印度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到 1921 年年底斗争达到高潮。1922 年 2 月,甘地决定在巴多利县开展群众性公民不服从运动。正在此时,发生了乔里乔拉事件。在一个名叫乔里乔拉的小村庄里,愤怒的农民为反抗用枪弹镇压他们的警察,焚烧了警察局,烧死了 22 名警察。甘地认为这是由于一些不了解运动精神的人参加了运动,违反了非暴力原则。于是他决定推迟运动。民族独立运动由此从高潮转入低潮。

此后几年,甘地致力于推广纺纱、提倡土布、抵制洋布、废除不可接触制和开展教育活动等的建设性纲领。他在全国各地旅行,宣传他的主张,实施他的纲领。他规定国大党员必须交纳土布作为党费。这一时期,甘地还积极促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

1928 年 12 月在民族独立运动重新高涨的情况下,甘地再次提出一年内实现自治的要求。遭到英国的拒绝后,他便发起了以废除食盐税为主要内容的公民不服从运动。1930 年 3 月 12 日,甘地不顾自己年过六旬的高龄,带领 78 名信徒从阿麦达巴德向西海岸丹地进发,开始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史上有名的食盐进军。这次进军,历时三星期,行程 240 英里,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4 月 6 日他们到达目的地后,便在海边隆重地熬起盐来。这一行动成为点燃全国公民不服从运动烈火的信号,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开展起来了。5 月 4 日甘地被捕后,运动更加高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农民自发地抗税,兵士拒绝向人民开枪,一些工人甚至占领了城市,建立了自己的行政机关。运动持续了一年。到 1931 年 3 月,甘地同欧文总督签定了“德里协定”后,运动才逐渐转入低

潮。1934 年甘地最后下令停止了这次运动。

从 1932 年夏天起,甘地把精力投入到改善贱民政治地位、废除不可接触制的斗争中。1932 年 9 月他在狱中致电英首相抗议对贱民的不公平的选举待遇。并决心绝食至死,迫使英国政府同意增加贱民的保留议席。他称贱民为“哈里真”,意即上帝之子。他创办了贱民周刊《哈里真》,为废除不可接触制而呼号呐喊。他积极为贱民筹措基金。他还不惜以生命为斗争武器,为哈里真事业而多次绝食。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甘地主张无条件支持英国作战。但不久,英国政府实行强迫印度人组织义勇军、制造军需品、捐款和迫使省议会休会等做法,使甘地改变了初衷。1940 年 10 月,甘地再次发起了公民不服从运动。这次运动是派遣各级国大党领导人到各地发表反战演说,在前一名领导人被捕后,第二名领导人接着前往。他们前赴后继,毫不畏惧。一年以后,几乎各级国大党领导人都被捕入狱,被捕人数达二万五千人。运动实际上停止了。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东南亚各国,战事迫近印度。英国为了加强它在印度的地位和谋求印度更多的支持,于 1942 年 3 月派出克里浦斯调查团,同甘地等各党派的领导人会谈。甘地认为克里浦斯调查团提出的方案不能接受,予以拒绝。他认为,为了抵抗军国主义的侵略,必须使英国人退出印度,否则处处受英国的压迫,无法发挥印度本身的潜力。一个“退出印度”的口号在他思想上开始酝酿成熟。1942 年 8 月 8 日,甘地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了有名的要求英国人“退出印度”的演说。国大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了“退出印度”的决议,要求英国交出政权。但决议刚刚通过,甘地和全体委员在第二天早晨一起被捕,被关押了一年半。在狱中,和甘地共同生活和战斗了 60 年的妻子卡斯杜

白(Kasturbai)不幸病逝,甘地悲痛万分,思念成疾。但是英国殖民者的高压政策阻挡不了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退出印度”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动员人民、组织人民的物质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世界殖民体系瓦解,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发布了蒙巴顿方案,宣告实行印巴分治。甘地内心不赞成分治,他一直在为统一的印度而斗争。他认为分治是“精神悲剧”;但鉴于当时的客观形势,他被迫同意接受分治方案。1947 年 8 月 15 日印度自治领宣告成立那天,甘地在加尔各答绝食一天。进行祷告和纺纱。对于分治带来的教派冲突,甘地忧心忡忡。多年来甘地一直在为印穆团结而努力,当时他更以古稀之年,瘦弱之躯,奔波于各教派冲突的地区,用说服教育以至绝食来制止教派冲突,消除教派仇恨。他决心奉献自己的生命,努力促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和平统一。甘地的这番苦心和种种努力却招来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中极右分子的仇恨。1948 年 1 月 30 日,甘地在德里去晚祷的路上被一名印度教大会党徒暗杀。终年 79 岁。

甘地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印度的民族独立事业,他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杰出领袖。他相信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并把他们吸引到民族独立运动的洪流之中。在他之前,印度还没有一位政治领袖像他那样与群众息息相通,紧密结合。他使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成为一场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和各教派广泛参加的群众运动。人们满怀牺牲精神和必胜信心去进行斗争,把监狱当作“朝圣的圣地”。他身体力行,纺纱织布,创办刊物,建设农场和书院,以唤醒同胞,实现自治。他修身苦行,粗茶淡饭,节衣缩食,与群众共甘苦。他在运动中屡次被捕,曾经多次绝食,以血肉之躯激发人民的反英斗志。他主张废除不可接触制。主张实现教派和睦,为此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把国大党改造成为能够领导民

族独立运动的群众性政党。他造就和培育了一代国大党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他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给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和国大党以深刻的影响。甘地对印度独立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印度人民热爱甘地,崇敬甘地,尊称他为“圣雄”和“国父”。我们中国人民尊敬甘地,还因为他对我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表示过同情和支持。

甘地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浩瀚的《甘地文集》100卷,汇集了他的政治、经济、哲学和宗教思想的智慧。它们是印度人民宝贵的思想财富。

1948年1月30日晚,尼赫鲁在惊悉甘地遇刺后,通过全印广播电台向印度人民发表了如下演说:“光在我们眼前消失了,四周是一片黑暗。……我们视同父亲一般的敬爱的领袖与我们永别了。……这道照亮过我们国家的光是不同寻常的光。许多年来,它照耀着我们的国家,在今后更多的岁月中,它将继续照耀着我们,即使一千年后,它还将照耀着我们,全世界也都将见到它。它将给无数的人们带来安慰。”的确,在甘地逝世以后的三十多年中,印度人民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他,世界人民也不曾忘记他。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也正是为了表达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1984年8月

奇花异卉迎春开

现在研究外国文学的刊物,同其他刊物一样,有如雨后春笋:国别文学的刊物,综合的文学刊物,当代文学的刊物,古代文学的刊物,无不具备。数目多,不一定就能说明水平高,但它起码可以告诉我们,全国人民在外国文学方面的需要比从前得到了更好的满足了。

在众多的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中,《世界纪实文学》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异军突起,它的出现给外国文学刊物的万花园又增添了一株奇花异卉。

我们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当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研究只是一种手段,而不能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借鉴外国,促进我们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发展。其次,翻译外国文学可以给中国读者提供更多的精神营养,使中国读者得到美的享受,为建设精神文明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过去大量地介绍史诗、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等等,都能起到这个作用。可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一般读者最喜欢读的往往是传记、回忆录、报告文学、日记、书信、特写、随笔、游记、轶事等等的作品。过去我们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介绍工作,但是同读者的需要比较起来,还有极大的距离。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现在,《世界纪实文学》的出版,可以说是弥补了这个缺陷。我相信,它会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的。

中国有一句老话:“万事开头难。”德国人也有类似的话:Aller Anfang ist schwer。这一种新型刊物的创办,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

制,也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这并不可怕,只要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锲而不舍,坚决走上前去,我相信,我们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这个新型刊物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它的威力也会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

我诚挚地祝贺我们这新生的刊物长命百岁。

1984 年 11 月 8 日

从历史上看中德文化关系

中德文化交流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从欧洲特别是德国文献来看,至迟到了18世纪,这种交流已经开始。在第一个阶段,中国文化影响德国文化比较多。德国对中国的兴趣从18世纪起至19世纪30年代,是一个逐渐升起的高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来了一个低潮。到了20世纪初叶,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兴趣又逐渐升高。差不多与此同时,第二个阶段开始。德国文化,特别是文学创作对中国逐渐产生影响。200多年来的中德文化交流史大体轮廓就是这样。

18世纪启蒙时期,孔子哲学在欧洲受到崇拜。德国大哲学家Leibniz非常钦佩孔子。他的门徒A.H.Franke和Christian Wolff完全同他抱一样的态度。1736年,法国人Du Halde出版了一本书:Description géographigue, chron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这本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书中有四篇《今古奇观》中的短篇小说和一本元曲《赵氏孤儿》,还有一些《诗经》中的诗。译文都不高明,影响却是极大。此外,在1719年,中国小说《好逑传》被介绍到欧洲,也意外地产生了极广泛的影响。影响范围包括德国在内。

从此以后,中国的文学作品逐渐通过各种渠道传入德国,有的通过拉丁文译本,有的通过法文译本,有的通过英文译本,有的直接译自中文。文体多种多样,小说、戏剧、抒情诗都有,还有一些哲学著作。

在小说方面,第一部传入德国的作品是上面讲的《好逑传》。ch. G. von Murr 于 1766 年译为德文:Haoh kjo'h Tschwen, d. i. die angenehme Geschichte des Haoh kjo'h。在以后的 200 年中陆续介绍到德国去的中国小说有:《三国志演义》、《东周列国志演义》、《水浒传》、《二度梅》(Erh – Tou – Mai on les Pruaiers Meneillex)、《正德游江南全传》(Streifereien des Kaisers Tscheng – Tih)、《封神演义》(Feng – Schen – Yën – I, die Metamorphosen der Götter)、《西游记》(Hsi – Yu – chi, A mission to Heaven)、《聊斋志异》(Seltsame Geschichten aus dem Liao Chai)、《平鬼传》、《金瓶梅》(Kin Pin Meh)、《红楼梦》(Hung Lou Mong, 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等等。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些小说的地位高低悬殊极大,它们传入德国不在一时一地,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在戏剧方面,首先传入欧洲的是元曲《赵氏孤儿》,因为 Du Halde 的那一本书里有这个剧本。1749 年 Du Halde 那本书译成了德文,《赵氏孤儿》从此传入德国。以后陆续传入德国的中国剧本有《灰阑记》。此书在 1832 年由 S. Julien 译为法文:Hoei – Lan – Ki on l'histoire du cercle。1876 年,Wallheim de Fonseca 改译为德文:Der Kreidekreis。1926 年,A. Forke 又重译:Hui – Lan – Ki。其他传入德国的中国戏剧有:《西厢记》(Das Westzimmer)、《琵琶记》(Die Laute)、《牡丹亭》(Mou – Dan – Ting)等等。同小说一样,中国戏剧传入德国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从 18 世纪起一直到 20 世纪,长达将近 200 年。在这漫长的时间内,有的德国作家曾企图改编中国戏剧在德国舞台上演出。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原因是,我们两个国家的戏剧毕竟太不相同了,无论是戏剧中的人生观,还是演出的技巧都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想要调合二者,那是十分困难的。只有个别人的尝试获得某一些成功。

在抒情诗方面,中国的古代的抒情诗同样传入了德国。最早

对中国抒情诗感兴趣的是歌德。其次是杰出的诗人 Friedrich Rückert。在 1833 年,他把《诗经》改作出版,他根据的是拉丁文译本。以后陆续传入德国的有:《离骚》、《九歌》、陶渊明、李白、杜甫等。1880 年 Viktor von Strauss 翻译的《诗经》:Schi - King, Das kanonische Buch der Chinesen, Heidelberg 1880,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抒情诗的翻译要比小说和戏剧困难得多,有人甚至主张,诗是无法翻译的。但是,200 年以来,德国始终有人尝试着把中国抒情诗移植到德国去。大家公认,抒情诗对德国文学的影响要比中国小说和戏剧大得多。

在哲学方面,上面已经谈到了孔子。由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在欧洲,其中当然包括德国,受到重视,是意料中事。代表孔子儒家思想的《四书》和《五经》几乎都有欧洲语言的译本,其中一部分有德文译本。孔子以外另一个在德国产生了影响的中国哲学家是老子。在德国,老子的译本数目最多。

我现在想集中谈一谈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顺便谈一下大诗人席勒。在中德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阶段中用力最勤、兴趣最广、贡献最大的是歌德。他可以说是德国第一个认识中国文学价值的人。他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接触中国文化,现在还无法确定。Du Halde 的那一本书于 1749 年泽为德文,歌德肯定是读过的。书中的《赵氏孤儿》这个剧本对歌德产生了影响。他创作 Elpenor 主要材料来源就是这个剧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这个剧本没有写完。1766 年出版的《好逑传》译本,他是读过的。这一本书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781 年 1 月 10 日,歌德日记中有:"啊,文王!"这样的字眼,这可能是 Du Halde 的书给他的启示。1796 年 1 月,歌德同席勒通信,讲到《好逑传》。1817 年 9 月 4 日,歌德读了英译本元曲《老生儿》(Sir J. F. Davis: Laou - Seng - Urh or An Heir in his old Age)后,10 月 9 日曾写信给 Knebel,评论这个剧本,歌德

集中研究中国文学或者说对中国文学发生兴趣是在1827年年初，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述：

1月31日　关于中国诗的性质
2月2日　研究中国诗
2月3日　《花笺记》
2月4日　晚上《中国的诗》
2月5日　《中国女诗人》
2月6日　抄写《中国女诗人》
2月11日　晚上对Dr. Eckermann读中国诗

《花笺记》，歌德读的是英文译本；此书于1836年由H. Kurz译为德文：Das Blumen blatt。1826年，Rémusat译《玉娇梨》为法文；1827年出版德译本：Ju Kiao Li oder Die beiden Vasen，歌德也读过。1827年，法人Davis的Contes Chinois出版，歌德读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27年1月31日歌德对Dr. Eckermann的谈话。根据Dr. Eckermann的记录谈话内容如下：

> 歌德说："（中国传奇）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好逑传》等等小说(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没有什么地位。但是歌德对这些书的评论意见则不能不说是异常深刻的,非常令人惊异的。他一眼就看出了中国文学和德国文学的不同之处。一直到今天他的见解对研究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人来说仍然有很大的启发。

现在再谈一谈席勒。他同歌德一样,对中国文学有极其浓厚的兴趣。1795年,他谈到《好逑传》。1796年,他同歌德通信,他谈到这部小说,表示不满意 Murr 的德译本,自己想改编它,只写了几页。1800年和1801年,他对 Unger 称赞《好逑传》。1803年和1806年,他又把改编《好逑传》列入自己的工作计划内,终于只是起了一个头。在戏剧方面,1801年,他改编 Turandot,他想点染上一点中国色彩。大家称之为"中国戏",实则与中国戏几乎毫无共同之处。

为什么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能在18、19世纪(前半)在德国产生这样一些影响呢?为什么影响的过程又有曲折呢?想要了解这一点,必须对欧洲思想史有所了解。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发展到高峰。这个运动没有浪漫的幻想,一切都立足于现实,一切都是脚踏实地。这一些确与中国思想有暗合之处。德国学者,特别是歌德之所以喜欢孔子儒家思想,也与此有关。他们认为,孔子儒家思想主要是宣传一种道德标准,维持风化,劝善惩恶。而且他们还发现,中国人和德国人有共同的人性,而歌德等所追求的正是这种普遍的人性,其中没有国界,没有鸿沟。歌德是首先提出"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人,其原因就在这里。狂飚运动浪漫主义兴起后,他们标榜的东西与歌德对 Dr. Eckermann 讲到的中国精神很少有共同之处;再加在政治上中国受到欧洲殖民主义的打击,在欧洲人眼中威信扫地,因而过去的那一点"中国热"也就冷下来了。

上面讲的是中德文化的关系第一阶段,主要是中国文化影响

德国。下面再谈第二阶段，主要是德国文化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把中国文化和文学介绍到德国去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只是规模已经很小，势头比较微弱了。

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德国文学传入中国。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小说月报》介绍了G. Hauptmann。创造社介绍了歌德、Storm的《茵梦湖》(Immensee)和H. Heine。郭沫若翻译了Faust。从那以后，在长达60年的漫长过程中，包括解放以后在内，大量的德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了汉文。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有下列一些德国作家：Goethe，Schiller，T. Fontane，T. Storm，P. Heyse，H. Hesse，H. Sudermann，Grimm兄弟，H. J. C. Grimmelshausen，H. Mann，Th. Mann，B. Kellermann，H. Heine，Lessing，Remarque，Anna Seghers，B. Brecht，S. Lenz，H. Böll，J. Puttkamer，I. Eichler，J. R. Becher，H. Marchwitza，G. Eich，M. von der Grün等等。在文艺理论方面介绍了：Lessing，H. Heine，K. Zetkin，Luxemburg，G. Ried，H. Meyer等等。这些介绍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中国人民了解德国人民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大大地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互相了解。除了翻译介绍以外，中国学者还撰写了大量论德国文化和文学的文章和德国文学史。他们组织了德国文学学会和德语教学研究会。许多中国大学里都有德国语言文学专业，有的成立了独立的德国语言文学系。

总之，在中德文化关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中国对德国文化(其中包括科学技术，我在本文中没有涉及)的兴趣日益增强。除了我上面讲的这些情况以外，两国还有不少学生到对方国家去留学，这当然会加强两国已有的文化关系。我自己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直至大战结束长达10年的时期中在德国留学和工作的。德国人民的友谊我毕生难忘。我相信，我们两国人民的长达200年的文化关系必将日益加强，我们的友谊也会不断发展。瞻

望前途,我充满了信心。

1985年2月13日

以文会友

——记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及蚁垤国际诗歌节

二月和三月，在新德里，正是春光明媚的大好时节，到处花开似锦，绿草如茵，惠风和畅，阳光明丽。今年，有两个大型的国际会议在这时候召开：一个是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一个是蚁垤国际诗歌节。我参加了这两个会，下面介绍一些情况。

先谈第一个会。

这个国际讨论会是由下面这些单位发起的：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德里大学现代欧洲语言系、大学拨款委员会、印度历史研究委员会、印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印度文学研究院等六个单位。主其事者是德里大学。这些机构绝大多数都是全国性的，有的有很大的权力，比如说，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会长是印度副总统，执行会长是纳札莱特(Nazareth)。

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有：中国、印度、苏联、伊朗、法国、匈牙利、西德、东德、捷克、加拿大、保加利亚、土耳其、意大利、波兰、南斯拉夫、斯里兰卡、尼日利亚、蒙古、叙利亚、古巴、葡萄牙、印度尼西亚等 22 个国家，共有代表 300 多人，其中有很多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和作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真可谓洋洋大观，空前盛会。

代表团中最大的当然是印度。其次就是苏联，共有 20 人之多，阵容异常整齐。其中有两个苏联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一个是 E.P.切利舍夫(Chelishev)，一个是朋加德—列文(G.M. Bongard - Levin)，都是著作等身的印度学家。由此可见苏联对于这次会议

的重视。反观我们自己,我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事前我们对于这次会议了解极少,严格地说,我们一个代表也没有派。我同刘国楠同志是应邀参加诗歌节的,并没有准备参加这个会,也没有哪一个单位委托我们参加。我在国内曾再三对印度驻华使馆的官员声明,我不参加第一个会,只参加第二个会。但是结果却是,由于种种时机的巧合,我们终于被动地参加了。对于这一件事,我并不后悔,而是庆幸。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不参加的话,必将产生一些不利的后果。我们的参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失,而且我们还学习了很多新东西,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开幕式是很隆重的。印度副总统亲临参加致词,外交使节也应邀参加。开幕式以后,讨论会按分会进行。分会共有 26 个。为了让大家了解整个讨论会的内容,有必要把分会的内容介绍一下:

一 印度和世界文学(史诗) 在这分会中,论文内容讲印度两大史诗与欧洲文学的关系。

二 印度和欧洲文学 印度对现代西方小说的影响,印度文艺理论对西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三 传播着的情节 民间故事的传播。

四 印度和亚洲文学(中国和日本) 古代中国文献中的印度,中国的变文,印度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五 印度和世界文学 《五卷书》与世界文学,《沙恭达罗》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六 印度和欧洲文学(俄国和苏联) 俄国革命前后印度文学的影响,高尔基与印度。

七 哲学交流 印度对日本早期佛教的影响,柏拉图和爱默生。

八 理论、概念、观点 rasa 论和它的经济的圆满实现。

九 印度和欧洲文学(俄国和苏联) 印度与托尔斯泰,苏联

对达罗毗荼文学的研究。

十　印度和欧洲文学(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拉丁美洲)　古巴文学中的印度,印度与意大利文学。

十一　印度和亚洲文学　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老挝、蒙古与印度文学的联系。

十二　汇流　迦梨陀娑作品中的妇女,业报学说。

十三　印度和欧洲文学(法国)　印度对18、19世纪法国文学的影响。

十四　印度和波斯文学　波斯古典文学中的印度形象。

十五　翻译中的文学　梵文与世界文学,现代印度文学译为欧洲和印度语言。

十六　泰戈尔和世界文学　泰戈尔与中国、匈牙利,泰戈尔与艾略特。

十七　印度和欧洲文学(法国)　印度和拉封丹寓言。

十八　印度和英语文学　叶芝、艾略特、伊克巴尔。

十九　印度和世界文学(阿拉伯、非洲)　阿拉伯古典文学中的印度。

二十　印度和欧洲文学(德国)　歌德和印度,《薄迦梵歌》与《浮士德》。

二一　印度和英语文学　《薄迦梵歌》和惠特曼的神秘主义。

二二　印度和欧洲文学(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南斯拉夫)　印度与这些国家的文学的关系。

二三　印度和欧洲文学(一般)　德国文学中的佛教影响。

二四　其他文学和传统对印度的影响　欧洲对南印度文学研究的贡献。

二五　翻译中的文学　莎士比亚《麦克白》的印地语译本。

二六　E.M.福斯特和印度

以上是二十六个分会宣读和讨论的论文的大体情况。每一个分会平均有论文七八篇,全会共有论文200多篇。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大会讨论的内容以及地区分布的情况。内容几乎都与比较文学有关。地区分布的情况是:俄苏占两个分会,法国占两个分会,英国一个,德国一个,波斯一个,东欧国家一个,而我们中国只占了半个。以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关系之源远流长,却只占了半个分会,其中原因何在?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我自己原来并没有准备参加这一个会,我到印度去的目的是参加第二个会。因此我没有准备论文。可是出我意料之外,我竟被指定为一个分会的主席,在我到印度以前,我的名字已经堂皇地印在日程表上。这个分会就是我上面介绍的第四个分会,内容是印度与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关系。论文宣读、讨论完以后,我原以为,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可没想到,听众中有人提出倡议,让我讲一讲,而且是任意(freely)讲。我当仁不让,讲了讲中印文化交流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印度、伊朗、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在沙糖制造方面互相学习的历史,这是我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事后听人说,群众是比较满意的。

为什么印度政府和学者、作家想起召开这样一个会呢?印度总统的祝词中透露了其中的消息。他说,在把各个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工作中文学占重要的地位,研究文学有利于保卫和平,促进相互了解。至于为什么以"世界文学"命名,我说不清楚。讨论会的主持人之一德里大学现代欧洲语言系系主任茅里亚(Maurya)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

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茅里亚既没有提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人名，也没有提《共产党宣言》这书名。不管怎样，他大概认为，“世界文学”这个词儿的出处就在这里。

据我所了解到的，“世界文学”这个词儿最早的出处不是《共产党宣言》，而是比这一书早21年的德国大诗人歌德的一次谈话。艾克曼博士的《歌德谈话录》中记载着：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读完中国小说《风月好逑传》以后对艾克曼发表意见，赞美中国小说严守道德和礼仪。他认为，《好逑传》绝对不是中国最好的小说，意思就是，中国还有更好的、更有代表性的小说。他接着说：“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朱光潜译本，第113页）可见歌德得到“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是中国文学启发了他。我们也不要忘记，歌德对印度文学也是非常欣赏的。他的杰作《浮士德》在结构方面就有意模仿印度戏剧。这一点，我们的印度主人似乎没有注意到。

总之，歌德是使用“世界文学”这个词儿的第一个人，而他发明这个词儿又是同中国和印度文学密切相联的。如果当年歌德没有接触到我们两国的文学，他也许根本想不到这个词儿。我认为，“世界文学”这一个十分简单的词儿包含着重大的意义。它已经冲破了欧洲人的自古代希腊和罗马以来的古老的文学传统，而把一向对他们陌生的东方文学，主要是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文学包罗进来。它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它给近一百多年以来蓬勃兴起的比较文学开辟了道路。

事实上，在这次国际讨论会各分会上宣读、讨论的论文中有不少是与比较文学有关的，比如《印度史诗与欧洲文学》、《希腊、罗马文学中的印度》、《〈神曲〉与〈薄迦梵歌〉》、《民间故事的流传》、《薄伽丘〈十日谈〉中一个故事的印度来源》、《〈五卷书〉与世界文学》、《印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印度与高尔基》、《印度与托尔斯泰》等

等,这样的论文还可以举出很多来,以上几篇只是几个例子。因此,如果我们说,这次国际讨论会是比较文学的讨论会,也决非夸大。

自己既然参加了这一次的讨论会,有所闻,有所见,当然会有所感,其中甚至还有一些感慨。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们对印度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印度文学的研究,太不重视了。印度是一个世界大国,人口之多仅次于中国。虽然还属于第三世界,国内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但是它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在最新科技的某些方面有显著的成就,又同我国是邻居,有几千年的友好关系。可是我们眼前对印度的研究,实在微不足道;在这方面的信息,实在少得可怜。同苏联一比,只能承认是相形见绌。我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会上,一位苏联的通讯院士告诉我说,他访问印度前后共有 26 次之多。一年有时候到印度二、三次。我们怎样呢? 像我这样一个研究印度语言、文学、年龄超过那位苏联院士将近 20 岁的人,也只在 25 年的长时间内到印度访问过四次。还有不知道多少研究印度问题的人根本一次也没有到过印度。这样,我们的研究成果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其次,我还有一个关于语言的感慨。在这次讨论会上,我碰到了很多国家的专家、学者,英文都讲得非常流利。还有不少人同时能讲印地语。我们中国怎样呢? 多少年来,参加过国际会议的国内学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的外语远远没有过关。在这一次国际讨论会上,就曾出现过由于语言障碍而产生的尴尬场面。在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下,我们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多。为了避免这种不愉快的场面,我热诚希望,我们的青年和中年学者,不管研究的是哪一门学科,都要用最大的努力来掌握外语,特别是英语,英语实际上已经成了"世界语"。是时候了,如果现在还不急起直追,将来的后果真不堪设想,有些人真要"老

大徒伤悲"了。

现在谈第二个会议:国际诗歌节。

我们应邀来印度参加的正是这个国际诗歌节。但是在国内时,不管是我,还是任何别的人,都对这个诗歌节毫无所知。填表时,我连发起单位这一栏都无法填写。真可以说是仓卒上阵。只在到了印度以后,才开始有点明白。

这个诗歌节的发起者有下面这些单位和个人: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印度国大党(英·甘地派)的总书记、诗人和小说家室利甘提·梵尔玛(Shrikant Verma)。看来真正主持会议的是梵尔玛。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的执行会长纳扎莱特只起协助作用。

参加诗歌节的国家有:中国、印度、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古巴、赞比亚、加纳、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牙买加、日本、肯尼亚、南朝鲜、马拉维共和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挪威、秘鲁、新加坡、苏联、土耳其、美国、乌拉圭、南斯拉夫等29个国家。其中南美和非洲代表人数相当多,这与一般的国际会议不同。印度本国各邦参加诗歌节的诗人有30名。在所有的诗人中,颇有一些是蜚声世界的。

诗歌节的开幕式,似乎比第一个讨论会还要隆重。印度副总统首先到会。隔了一会儿,印度总统又在十分严肃的气氛中来到。副总统走上前去迎接总统,然后大会正式开幕。许多国家的使节都应邀参加。摄影记者和职业摄影者更是蜂拥而至,争相拍照,寸步不让。整个会场里,气氛活跃而又隆重。大会上规定的讲话讲完以后,从加拿大、加纳、秘鲁、希腊和新西兰等国家来的几个诗人朗诵自己的诗篇。还唱了一首从《梨俱吠陀》第十篇129颂里选出来的诗。国际诗歌节的活动就算是正式开始了。

根据印度主人给大会拟定的日程表,诗歌的朗诵按诗歌的主题和次主题来进行。主题只有一个,叫作:诗歌:永恒的声音。诗

歌是发现着自己的人类灵魂。诗歌是永恒的、普遍的。它的传统要比书面记载早得多。蚁蛭国际诗歌节想把全世界各地来的诗人相互介绍,并把他们介绍给诗歌爱好者。次主题有五项:

一　人民群众的声音　在这个次主题的指导下,朗诵与口头文学传统相结合的诗歌。

二　寂寞的声音　异化、失掉同一性、个人心中积存的快乐与悲哀,都要求诗人要“鸣”。在这个次主题的指导下,朗诵的诗歌都带有个人的色彩。

三　抗议的声音　在这个次主题的指导下,朗诵的诗歌都带有抗议的色彩,反抗压迫,不管是政治的压迫、经济的压迫、社会的压迫、文化的压迫,统统要反抗;不管是个人的压迫,还是集体的压迫,统统要反抗;还反抗痛苦与灾难,反抗死亡和破坏的力量。

四　失望与希望的声音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是一个多难的世纪,面临着自我怀疑和焦虑。但是它又是个充满了希望的世纪。失望与希望是现代诗歌的两股交互代替的潮流。作为个人的诗人表达了个人的或集体的希望与失望。在这个次主题的指导下,朗诵的就是这样的诗篇。

五　其他的声音　诗歌是难以分类的。有的诗人不愿意归入这一类或那一类。所有这样的诗就在这个次主题的范围内朗诵。

诗歌朗诵的内容大体就是这个样子。

至于朗诵的地方,不是在美轮美奂的大厅里,而是在露天下,草地上。前一个会是学者的会,这一个会是诗人的会。诗人同学者是不一样的。诗人不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点名发言,鞠躬如也。他们冲出大厅,就在尼赫鲁总理故居的大草坪上,用白布搭了一座凉棚,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纵声朗诵,把诗人的兴会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诗人们认为这样还太拘束,还没有做到像泰戈尔那样与大自然合为一体;他们干脆走出凉棚,找了一块碧绿的草地,

在大树和棕榈树下,坐到地上,相向朗诵自己的诗篇。外国诗人先用自己的母语朗诵,然后译为英文。英文在这里,同在前一会上一样,成了所有参加者的媒介语言。此时,惠风和畅,阳光明丽,大小鸟类在上面枝头上歌唱,诗人们在下面草地上朗诵,上下和鸣,一片天籁,连根本不是诗人的我也飘飘然心头诗意盎然了。

在尼赫鲁故居的草坪上,应该说诗人们的兴会已经发挥得很像样子了。但是还没有发挥到极限。超过这一次草坪诵诗的是一次草坪夜宴。国际诗歌节主人之一的室利甘提·梵尔玛国会议员,在自己的花园里宴请各国与会的诗人。这座花园比起尼赫鲁故居的要小一点,但是实际上也够大了。中间是一片草坪,三面是参天的大树。电灯光从下面照上去,照到树顶的下面。树顶是暗黑的,上接更为暗黑的天空。下面则是灯火通明,人影如织。诗人们围坐在成排的小桌旁边,饮着各种名酒,吃着美味可口的菜肴,谈天说地,评古论今,当然也谈论诗歌。一个长胡子的老诗人忽然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瓶香槟酒,亲自打开,酒从瓶子里喷出来,高达数尺。他走到我跟前,给我斟了一杯,立刻有几个人围上来,其中有那个能讲德语的女诗人,大家一齐举杯,高呼:“为了诗歌!”并热烈祝贺老诗人的生日。一直痛饮到深夜,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那里。这一夜就成了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夜。

参加国际诗歌节的诗人们,肤色不同,国别不同,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政治信念也不同。但是,也有共同之处:大家都想保卫世界和平,促进相互了解。连语言也有一个共同的:英语。《诗经》上说:“嘤其鸣矣,求其发声。”大家到印度来是想发声的。从这一点上来看,这次诗歌节是开得非常成功的。正如这次节日的次主题第四项中所说,我们这个世纪是一个多难的世纪,有失望,也有希望。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充满了希望。但是,我决不否认失望的存在。只要全世界的诗人们,全世界的人民,同心协力,保

卫和平,摒除失望,增强希望,我坚决相信: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愿与天下仁人志士共勉之。

1985年3月26日写完

谈　老

偶读白香山诗，读到一首《咏老赠梦得》，觉得很有意思，先把诗抄在下面：

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眼涩夜先卧，头慵朝未梳。
有时扶杖出，尽日闭门居，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
情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惟是闲谈兴，相逢尚有余。

老，在人生中，是一件大事。佛家讲生、老、病、死，可见其地位之重要。但是对待老的态度，各个时代的人却是很不相同的。白香山是唐代人。他在这一首诗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我觉得还过得去。他是心平气和的，没有叹老嗟贫，没有见白发而心惊，睹颓颜而伤心。这在当时说已经是颇为难得的了。但是，其中也多少有一些消极的东西。比如说懒梳头，不看镜等等。诗中也表现了他的一些心理活动，比如说“情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这恐怕是古今之所同。我们今天常讲的代沟，不是“迹共少年疏”吗？

到了今天，人间已经换了几次，情况大大地变了。今天，古稀老人，触目皆是，谁也不觉得稀奇了。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认为，老是自然规律，老是人生阶段之一，能达到这个阶段，就是幸福的。大家都想再多活几年，再多给人民做点事情。老以后还有一个阶段，那一个阶段也肯定会来的，这也是自然规律，谁也不会像江淹说的那样：“莫不饮恨而吞声。”

至于说“迹共少年疏”,虽然是古今之所同,但是我认为不是不能挽救的。今天我们老人,还有年轻人,在我们思想中的封建的陈旧的东西恐怕是越来越少了吧,我们老人并不会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我们承认自己阅历多,经验富,但也承认精力衰,容易保守。年轻人阅历浅,经验少,但是他们精力充沛,最少保守思想。将来的天下毕竟是他们的。我们老年和青年,我相信只要双方都愿意,是能谈得来的。“迹共少年疏”,会变为“迹共少年密”(平仄有点不协)的。

1985年6月17日

我的处女作

哪一篇是我的处女作呢？这有点难说。究竟什么是处女作呢？也不容易说清楚。如果小学生的第一篇作文就是处女作的话，那我说不出。如果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处女作的话，我可以谈一谈。

我在高中里就开始学习着写东西。我的国文老师是胡也频、董秋芳(冬芬)、夏莱蒂诸先生。他们都是当时文坛上比较知名的作家，对我都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当时写过一些东西，包括普罗文艺理论在内，颇受到老师们的鼓励。从此就同笔墨结下了不解缘。在那以后五十多年中，我虽然走上了一条与文艺创作关系不大的道路；但是积习难除，至今还在舞笔弄墨；好像不如此，心里就不得安宁。当时的作品好像没有印出来过，所以不把它们算做处女作。

高中毕业后，到北京来上大学，念的是西洋文学系。但是只要心有所感，就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往往写一些可以算是散文一类的东西。第一篇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题目是《枸杞树》，里面记录的是一段真实的心灵活动。我十九岁离家到北京来考大学，这是我第一次走这样长的路，而且中学与大学之间好像有一条鸿沟，跨过这条沟，人生长途上就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这情况反映到我的心灵上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我有点惊异，有点担心，有点好奇，又有点迷惘。初到北京，什么东西都觉得新奇可爱；但是心灵中又没有余裕去爱这些东西。当时想考上一个好大学，比现

在要难得多,往往在几千人中只录取一二百名,竞争是异常激烈的,心里的斗争也同样激烈。因此,心里就像是开了油盐店,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但是美丽的希望也时时向我招手,好像在眼前不远的地方,就有一片玫瑰花园,姹紫嫣红,芳香四溢。

这种心情牢牢地控制住我,久久难忘,永远难忘。大学考取了,再也不必担心什么了,但是对这心情的忆念却依然存在,最后终于写成了这一篇短文:《枸杞树》。

这一篇所谓处女作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同我后来写的一些类似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仔细研究起来,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是有的,首先就表现在这篇短文的结构上。所谓结构,我的意思是指文章的行文布局,特别是起头与结尾更是文章的关键部位。文章一起头,必须立刻就把读者的注意力牢牢捉住,让他非读下去不可,大有欲罢不能之势。这种例子在中国文学史上是颇为不少的。我曾在什么笔记上读到过一段有关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写《相州画锦堂记》的记载。大意是说,欧阳修经过深思熟虑把文章写完,派人送走。但是,他忽然又想到,文章的起头不够满意,立刻又派人快马加鞭,追回差人,把文章的起头改为"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自己觉得满意,才又送走。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宋朝另一个大文学家苏轼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潮州韩文公庙碑》,起头两句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古文观止》编选者给这两句话写了一个夹注:"东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头,起行数十遭,忽得此两句,是从古来圣贤远远想入。"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我现在暂时不举了。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是以多么慎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文章的起头的。

至于结尾,中国文学史上有同样著名的例子。我在这里举一个大家所熟知的,这就是唐代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这一首诗的结尾两句话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让人感到韵味无穷。只要稍稍留意就可以发现,古代的诗人几乎没有哪一篇不在结尾上下工夫的,诗文总不能平平淡淡地结束,总要给人留下一点余味,含吮咀嚼,经久不息。

写到这里,话又回到我的处女作上。这一篇短文的起头与结尾都有明显的惨淡经营的痕迹,现在回忆起来,只是那个开头,就费了不少工夫,结果似乎还算满意,因为我一个同班同学看了说:“你那个起头很有意思。”什么叫“很有意思”呢?我不完全理解,起码他是表示同意吧。

我现在回忆起来,还有一件事情与这篇短文有关,应该在这里提一提。在写这篇短文之前,我曾翻译过一篇英国散文作家 L.P. Smith 的文章,名叫《蔷薇》,发表在 1931 年 4 月 24 日《华北日报·副刊》上。这篇文章的结构有一个特点。在第一段最后有这样一句话:“整个小城都在天空里熠耀着,闪动着,像一个巢似的星圈。”这是那个小城留给观者的一个鲜明生动的印象。到了整篇文章的结尾处,这一句话又出现了一次。我觉得这种写法很有意思,在写《枸杞树》的时候有意加以模仿。我常常有一个想法:写抒情散文(不是政论,不是杂文),可以尝试着像谱乐曲那样写,主要旋律可以多次出现,把散文写成像小夜曲,借以烘托气氛,加深印象,使内容与形式彼此促进。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幻想,我自己也尝试过几次。结果如何呢?我不清楚。好像并没有得到知音,颇有寂寞之感。事实上中国古代作家在形式方面标新立异者,颇不乏人,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一个有名的例子。现代作家,特别是散文作家,极少有人注重形式,我认为似乎可以改变一下。

“你不是在这里宣传‘八股’吗?”我隐约听到有人在斥责。如

果写文章讲究一点技巧就算是“八股”的话,这样的“八股”我一定要宣传。我生也晚,没有赶上作八股的年代。但是我从一些清代的笔记中了解到八股的一些情况。它的内容完全是腐朽昏庸的,必须彻底加以扬弃。至于形式,那些过分雕琢巧伪的东西也必须否定。那一点想把文章写得比较有点逻辑性、有点系统性,不蔓不枝,重点突出的用意,则是可以借鉴的。写文章,在艺术境界形成以后,在物化的过程中注意技巧,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必须加以提倡。在过去,八股中偶尔也会有好文章的。上面谈到的唐代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就是试帖诗,是八股一类,尽管遭到鲁迅先生的否定,但是你能不承认这是一首传诵古今的好诗吗?自然,自古以来,确有一些名篇,信笔写来,如行云流水,一点也没有追求技巧的痕迹。但是,我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写这样的文章需要很深的工力,很高的艺术修养。我们平常说的“返朴归真”,就是指的这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极难达到的,这与率尔命笔,草率从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决非我一个人的怪论,然而,不足为外人道也。

1985年7月4日

坐拥书城意未足

古今中外都有一些爱书如命的人。我愿意加入这一行列。

书能给人以知识,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希望。但也能给人带来麻烦,带来灾难。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里,我就以收藏封资修大洋古书籍的罪名挨过批斗。1976年地震的时候,也有人警告我,我坐拥书城,夜里万一有什么情况,书城将会封锁我的出路。

批斗对我已成过眼云烟,那种万一的情况也没有发生,我“死不改悔”,爱书如故,至今藏书已经发展到填满了几间房子。除自己购买以外,赠送的书籍越来越多。我究竟有多少书,自己也说不清楚。比较起来,大概是相当多的。搞抗震加固的一位工人师傅就曾多次对我说:这样多的书,他过去没有见过。学校领导对我额外加以照顾,我如今已经有了几间真正的书斋,那种卧室、书斋、会客室三位一体的情况,那种“初极狭,才通人”的“桃花源”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

有的年轻人看到我的书,瞪大了吃惊的眼睛问我:“这些书你都看过吗?”我坦白承认,我只看过极少极少的一点。“那么,你要这么多书干嘛呢?”这确实是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没有研究过藏书心理学,三言两语,我说不清楚。我相信,古今中外爱书如命者也不一定都能说清楚。即使说出原因来,恐怕也是五花八门的吧。

真正进行科学研究,我自己的书是远远不够的。也许我搞的这一行有点怪。我还没有发现全国任何图书馆能满足,哪怕是最

低限度地满足我的需要。有的题目有时候由于缺书,进行不下去,只好让它搁浅。我抽屉里面就积压着不少这样搁浅的稿子。我有时候对朋友们开玩笑说:“搞我们这一行,要想有一个满意的图书室简直比搞四化还要难。全国国民收入翻两番的时候,我们也未必真能翻身。”这决非耸人听闻之谈,事实正是这样。同我搞的这一行有类似困难的,全国还有不少。这都怪我们过去底子太薄,解放后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一时积重难返。我现在只有寄希望于未来,发呼吁于同行。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日积月累,将来总有一天会彻底改变目前这情况的。古人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让我们大家都来当种树人吧。

1985年7月8日晨

一点希望

——致《文字改革》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成立,我就参加了工作。三十年来,我做的工作不多,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参加简化汉字的工作,殊无成绩可言。

我觉得文字改革工作是牵涉中国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的千秋万代的巨大事业,我们这个工作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因此,自己能参加这个工作,我认为是十分光荣、值得骄傲的事情。我热诚期望工作能贯彻下去,取得彻底的成功。

我当然也有一些想法,特别是在汉字简化问题上。简化汉字成绩极大,这一点首先必须肯定。但是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主张越简越好、越多越好,把简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如果有的话,则很值得认真讨论一下。我觉得,我们对现已公布的简化汉字宣传不够有力,贯彻不够彻底。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大学教授、一个领导干部、一个作家、一个新闻记者——这些都是天天同文字打交道的人,能够完完全全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简化汉字表来进行写作。我自己很惭愧,我是三十年的文改会委员,又是经常舞笔弄墨的;但是我写的稿子中经常有一些不符合简化汉字表的写法。有时候,我也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旧习惯很顽强,我心里想:让编辑人员,甚至排字工人师傅,去替我规范化吧。我暂时偷懒一下吧。我这种心理,别人未必没有。许多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想在报纸上写文章呼吁,要求领导干部题字时注意简化标

准,但是文章好像没有写。我并不认为领导干部或者书法家题字、写字时一定非严格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简化表不可。写中国字是一种艺术,作为艺术品写几个繁体字也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是这个原则不能扩大化,普遍化。我们写文章还是应该严格遵照简化字表;如有疑问,则应随手翻阅,像我那样想让别人来代劳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然而,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大力进行宣传,大量发行简字表。听说简字表已经发了不少,但显然还不够。

这就是我的一点期望。

1985年7月14日

在德国——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

爱美大概也算是人的天性吧。宇宙间美的东西很多,花在其中占重要的地位。爱花的民族也很多,德国在其中占重要的地位。

四五十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我曾多次对德国人爱花之真切感到吃惊。家家户户都在养花。他们的花不像在中国那样,养在屋子里,他们是把花都栽种在临街窗户的外面。花朵都朝外开,在屋子里只能看到花的脊梁。我曾问过我的女房东:你这样养花是给别人看的吧! 她莞尔一笑说道:“正是这样!”

正是这样,也确实不错。走过任何一条街,抬头向上看,家家的窗子前都是花团锦簇,姹紫嫣红。许多窗子连接在一起,汇成了一个花的海洋,让我们看的人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每一家都是这样,在屋子里的时候,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走在街上的时候,自己又看别人的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觉得这一种境界是颇耐人寻味的。

今天我又到了德国,刚一下火车,迎接我们的主人问我:“你离开德国这样久,有什么变化没有?”我说:“变化是有的,但是美丽并没有改变。”我说“美丽”指的东西很多,其中也包含着美丽的花。我走在街上,抬头一看,又是家家户户的窗口上都堵满了鲜花。多么奇丽的景色! 多么奇特的民族! 我仿佛又回到四五十年前去,我做了一个花的梦,做了一个思乡的梦。

1985年8月27日

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

各位领导、朋友们、同志们：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和首届学术讨论会现在开幕了。首先让我代表学会筹备委员会和全体到会的代表向出席我们今天会议的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同志，深圳市委和市政府领导邹尔康、李定、李伟彦、张洪斌同志，深圳大学校领导罗征启、李天庆、方生、杨伊白等同志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对我们学会的支持。我还要代表同志们对不远万里而来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会长佛克玛(Fokkema)教授、法国巴黎大学谢弗莱尔(Yves Chevrel)教授、美国前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艾德礼教授(Aldridge)以及其他国外和香港地区的比较文学学者和专家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他们的到来，给我们的大会增加了无限的光彩。国内许多出版界和新闻界的同志们也来参加大会，我们也向他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现在，我简要地介绍一下本会筹备的经过。从1981年以来，比较文学学会已经成立的有上海、广西、辽宁、吉林，即将成立的有江苏等省市。大家知道，比较文学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我们中国，由于某些原因，开始得比较晚了一点。但是这一门学问，一经提倡，立刻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热情。青年学生更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国学者已经写出了大量的比较有水平的论文和专著，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中国比较文

学》这一本杂志已经出了两期，广西大学的英文刊物《文贝》(Cowrie)也已经出了两期，在书店里都算是热门畅销的书籍，经常想买而买不到。朋友们和同志们知道，这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现象。

我相信，大家都承认，在今天世界上，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在现在，任何一门学科都带有国际性、世界性。所有国家的同行们都应该而且必须通力协作，才能做出出色的成绩。比较文学更是带有国际性和世界性的学科，现在国际上已经有了国际比较文学协会，许多国家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会。今天，我们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又成立了，我相信，它会受到国际上同行们的热烈欢迎。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现在许多国家的比较文学学者都承认，讲比较文学而忽视东方文学，这一条路是行不通的。有的外国朋友，还有不少中国的学者都提出了形成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我个人还有许多朋友都认为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一定要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学习，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也希望，国外的同行们也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互相补充，互相鼓励，一定会取得成功的。提倡中国学派，绝对不是什么狭隘的爱国主义。学术是无国境的，特别是比较文学。只有把东方文学真正地归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我们这个学科才能发展、才能进步、才能有所突破、才能焕发出新的异样的光彩、才能开扩视野。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和同志们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让我们团结协作，加强联系，加强学术交流，共同迎接比较文学的新胜利吧！

1985年10月29日

翻　译

翻译(translation)是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这种语言活动,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进行,它影响到文化和语言的发展。与翻译有关的可变因素很多,例如文化背景不同,题材不同,语言难译易译不同,读者不同等等,很难把各种不同因素综合起来,都纳入一条通则。

在欧洲,翻译实践有长远的历史。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文明源于翻译,上至罗马帝国,下至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都要靠翻译来进行国际贸易。有人说,用古希伯来语写的《圣经》和用阿拉米语写的《福音》,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2000 年来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就不会产生,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自翻译《圣经》起,将近 2000 年来,欧洲的翻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圣经》的翻译是一件大事,它帮助许多国家的语言奠定了基础。在古代希腊、拉丁文学方面,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喜剧和抒情诗,忒奥克里托斯(约公元前 310—前 250)、卡图卢斯(约公元前 87—前 54)、普卢塔克(约公元 46—120 或 127)的作品等等也多次被译成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在保存古希腊文艺方面,阿拉伯译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于欧洲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如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安徒生、易卜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里哀等等的作品,也都多次被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在东方文学方面,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日本的能剧、中国的小说诗歌、印度的《故事海》、

《薄迦梵歌》、《沙恭达罗》等等都译成了欧洲语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五卷书》，它通过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反反复复地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实践产生理论，欧美许多国家的翻译理论是五花八门的。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翻译可能论，一派是翻译不可能论。其实，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可能是没有的，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也是没有的。世界上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的。欧洲许多著名的人物，比如马丁·路德、M.阿诺德、F.W.纽曼、J.B.波斯特加特、H.白洛克、Fr.R.诺克斯、V.那巴可夫等等，都对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据《开塞尔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的意见，这些理论中有些是刚愎自用的。

翻译一篇作品或者一段讲话，必然涉及两种语言：一种是原来那个作品或者讲话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 Ausgangssprache（源头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 Original 或 Source language；一种是译成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 Zielsprache（目的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 Target language。二者之间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距。因为，从严格的语言学原则上来讲，绝对的同义词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翻译者，不管水平多么高，也只能尽可能地接近源头语言，而不可能把原意和神韵完全传达过来。翻译者的任务就是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关于翻译工作，一般的看法是，逻辑的抽象的东西，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著作，翻译起来比较容易。但是也有含义转移的危险。重在故事情节的作品，比如浅薄平庸的小说之类，翻译起来也比较容易。重在说理或鼓动的作品，比如格言诗、论战文章、政治演说、有倾向性的剧本，以及讽刺文学等等，翻译起来也不十分困难。但是重在表达感情的高级文学作品，翻译起来就极为困难。在这里，翻译或多或少只能是再创作，只能做到尽可能地接近原作，原作的神韵、情调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仿制的。

特别是源头语言中那些靠声音来产生的效果,在目的语言中是完全无法重新创造的。

除了翻译可能与不可能的争论之外,还有直译与意译的争论。这种争论在欧洲也有很长的历史,但在中国尤其突出。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礼记》已有关于翻译的记载。《周礼》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译官之总称。《礼记·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专人,而“北方曰译”。后来,佛经译者在“译”字前加“翻”,成为“翻译”一词,一直流传到今天。

在中国,佛经的翻译自后汉至宋代,历一千二三百年,这样历久不衰的翻译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也以佛家为最有系统,最深刻。晋代道安(314—385)主张质,即直译。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汉文翻译佛经时,有五种情况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种不容易做到的情况。苻秦的鸠摩罗什(344—413)则主张除“得大意”外,还须考虑到“文体”。他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隋代彦琮(557—610)最推崇道安的理论,他主张直译,提出“八备”和“十条”。“八备”指翻译者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十条”指他对译文体例、格式的十种规定。到了唐代,玄奘(602—664)是中国翻译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质并重,但似以质为主。他没有留下专门阐述翻译理论的文章。《翻译名义集》中记载了他的“五种不翻”的学说,指出有五种词语只能译音。北宋赞宁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翻译佛经的“六例”,详细探讨了翻译中六个方面的问题。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

耳。”这个生动的比喻,说明翻译是一种艺术(如翻锦绮),它将(语言的)形式加以改变(左右不同),而内容不变(背面俱花)。

北宋(960—1127)初期还有翻译活动,以后逐渐衰微。它的重新兴起始于明代(1368—1644)永乐五年(1407)。那时由于对外交通的需要,创立了四夷馆,培训翻译人才。明代末期,西学东渐,翻译工作更活跃起来。但此时翻译的方向已完全改变,不再是印度的佛经,而是欧洲的天文、几何、医学等方面的典籍,中国翻译史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对翻译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说:“且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这是说,中西语言结构不同,文章脉络不同,西方有的术语为中国所无,口头解释一下还可以做到,笔译成文,人家就看不懂了。同时代的一位中国科学家李之藻(? —1631)在描写当时外国传教士的译书态度时说:“诸皆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此时的翻译往往用合作方式,同初期佛典翻译相似,即中国学者与外国人合作翻译,润文的责任则放在中国学者身上。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识之士痛感学习西方之必要,翻译活动又逐渐兴起,在中国翻译史上形成又一个新阶段。马建忠(1845—1900)强调译事之难。梁启超(1875—1929)鼓吹佛典翻译之高明。毕生从事西方社会科学翻译的严复(1853—1921)在几篇序文里申述了他在翻译中遵循的原则。在《天演论》序中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忠于原作,“达”是忠于读者,“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信、达、雅虽然只三个字,但体现了作品、读者、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严复那些译本当中,《天演论》接近意译,《原富》则近于直译。他说:“是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不过他对

本书“繁赘而无关宏旨”的地方,则又有所删除。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他说:“原书文理颇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译,必至难索解人,故不得不略为颠倒,此以中文译西书定法也。”可以看出,《天演论》是意在达旨的述译,《原富》是辞义无所颠倒的严译,《群己权界论》是不依文作译的宽译。但是不论译法如何,有一点是始终如一的:即避免按字直译,努力用新的词或词组以求词义的全部传递。例如 evolution 中文没有与之相应的词,于是采用“天演”一词;liberty 这个法制观念中国当时还没有,于是用“群己权界”这一词组。严复对于西文词义的翻译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开展。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翻译的重要性远迈前古。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第一个重视翻译并大力加以倡导的人是鲁迅。鲁迅主张直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1931 年 12 月 28 日他在给瞿秋白的信中谈到严复。他说:“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化。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认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

在主张直译方面,瞿秋白和鲁迅见解一致。他说:“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来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但是他同时指出:“当翻译的时候,如果只管‘装进异样的句法’等等,而不管是否活人嘴里能够说得出来,——那么,这些‘异样的句法’始终不能

‘据为己有’。”他认为,“新的言语应当是群众的言语——群众有可能了解和运用的言语。”现代许多翻译家基本上都是直译派。所谓“直译”是指:原文有的,不能删掉;原文没有的,不能增加。这与译文的流畅与否无关。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等书,文字就非常流畅,但仍然是直译。所谓“意译”是指对原文可以增删。古代的鸠摩罗什属于这一派。郭沫若一方面说:“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另一方面,他也主张:“我知道翻译工作绝不是轻松的事件,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的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绝不是无足重轻的因素。”茅盾更是简洁了当地指出:“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他又说:“‘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傅斯年、郑振铎、周作人、艾思奇等都主张直译。因此,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准则。

比较欧洲和中国翻译的历史,以及翻译的理论,可以看出,东西双方探讨的问题基本相同。双方都讨论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也讨论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但是双方也有不同之处。西方谈翻译理论,偏重于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以及可能的程度。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文学翻译难,科技翻译易。直译与意译问题,也偶尔涉及;但不是重点。在翻译的基础或背景方面,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欧洲,除了最早的希伯来语以外,基本上是同一语系的语言之间的互相翻译。因此才产生了某一些理论家主张的翻译三分法:一,翻译;二,变换;三,逐词对照本。这种三分法对中国是完全不适用的。中国决不可能有变换。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翻译史上都是不同语系语言之间的翻译,在同一语系语言间才能变换。中国偏重于直译与意译之争,所谓文与质者就是。这是由于从佛经的翻译到现代科学文学著作的翻译,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西双方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中国

讨论翻译的人没有对语言本质做细致的分析,而是侧重于综合,侧重于实际应用方面,因此谈翻译技巧多,而谈抽象理论少。在直译与意译的问题解决以后,如何解决具体作品和文句的译法问题将提到日程上来。

季羡林　许国璋合著

1986年2月22日

《大唐西域记校注》成书经过

丝绸之路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上，对东西文化科技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对这样一条路的记述，中国的旅行家、僧侣、商人和外交使节的著作在全世界都是最突出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的记载，这一条路至今还会笼罩在一团迷雾之中。

在中国所有的有关著述中，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又占据着首位。在过去，研究这一部书的大有人在。近代全世界研究印度历史和中亚历史的学者们都视此书为鸿宝。它被译成了许多种外国文字。光是日文的翻译和注释就有四五种之多。英文和其他欧洲文字也有不少的译本。至于研究本书的论文，那更是车载斗量，不胜枚举。外国学者，特别是印度学者，用最高的赞誉之词来歌颂这一本书。这些都是令人十分欢欣鼓舞的事情。

但是，美中也有不足。外国译文固然有些错误，连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也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考虑到这种情况，我国一些关心此事的学者心中都有一种愿望，这就是：大家通力协作，对这一本书加以校刊和注释。“心有灵犀一点通”，中华书局的领导同志恰在此时提出了校刊和注释此书的建议，于是一拍即合，立即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于是 1977 年，北京、广州、上海、四川等地的一些学者聚集北京，开了几次会，中华书局的领导亲自参加，达成了协议，分了一下工，就动手干了起来。我们分工的原则非常简单：各尽所能，按能分工。比如说，对新疆和中亚地区情况熟悉

的,就分工注第一和第十二卷;懂梵文的,就分工校阅汉译梵名;精通中国古典文献的,就负责注释序和跋;对历史有研究的,就分工校阅历史注释。依此类推,总之是要发挥每一个同志的专长。中华书局想方设法为这个小小的工作组提供食、宿和资料方面的方便。最后又排除了种种困难,用最精美的印刷和装帧,用最快的速度,将此书出版。假如没有中华书局的大力提倡和支持,这部书的出版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我们认为,中华书局为了保存和发扬我们古代的宝贵的文化,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应该受到全世界学者的赞扬。

但是,工作也决非一帆风顺。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把工作尽快完成。可是一接触实际才知道其中的甘苦,知道操之过急是不行的。我们一再推迟完成的期限。其中原因很多,我们抓得不紧是一个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最初对这件工作的艰巨性认识很不够,有点“轻敌”的味道。不应该轻而轻之,进展速度当然会受影响。因此,在此书出版前的四五年中,我们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既有顺利,也有挫折;既有快乐,也有苦恼。有时候,极简单的工作却隐藏着极其复杂的内容。比如说,一个人名,一个地名,旧有的译名不统一,但是,我们这本书却是必须统一的。可是稍一疏忽,立刻就出现不统一的情况。再比如,我们注释一件事情,要尽量利用最新资料,还要把旧有的注释都一一加以衡量,其间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矛盾。要想解决这些矛盾,就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细心分析,认真探索,然后才能作出结论,写入注释。这样的例子多得无法一一列举。

拿我自己来说,有时候碰到麻烦和困难,就有打退堂鼓的念头。但是,一想到玄奘当年西风瘦马、万里凿空,“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灿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细雨”那种九死一生的情况,其艰难程度实在超出我们的想象,自己便憬然振作

起来。其他同志可能也有同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个小小的工作集体动作是和谐的,工作是艰苦的,进展是顺利的。我们写任何一段注释,都是战战兢兢,再三推敲。我的意思并不是想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了。不,不,不是这样,古人说:校书如扫落叶,愈扫愈多。我们书中还有错误,有的是限于我们的学识,有的则是出于疏忽。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诚恳地希望海内外的读者不客气地指出,以便再版时改正。

现在,这部书出版后同读者见面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看到一些国内的书评,基本上都是肯定的:听到一些意见,也多是赞赏的。但没有看到国外的书评,只从外国学者来信中读到一些鼓励的词句。总之,我的印象是:这部书算是被读者接受了。这对于我们全体参加工作的同志是极大的鼓励和安慰。

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长期的计划:分四个步骤来对《大唐西域记》作出贡献:一,校刊;二,注释;三,今译;四,英译。这四个步骤互相配合,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现在,第一和第二合并进行了,所谓"校注"者就是。第三个步骤今译,我们也完成了。《大唐西域记今译》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参加者几乎是原班人马。还剩下第四个步骤英译。这个步骤意义重大,困难极多。外国许多研究印度历史的学者翘首以待,如大旱之望云霓。我们正在进行联系,将来可能采取中外学者合作的办法。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完成这个步骤,否则就是有始无终,功亏一篑。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在过去几年中,全体工作的同志,虽然也难免有一些干扰,但是,总起来看,都是愉快地工作的。我们都意识到这件工作的份量,我们做的工作是过去没有人系统地做过的。我们决不敢说,我们都能胜任愉快。拿我自己来说,就是边工作,边学习。虽然最后由我看了一遍,人们习惯称之为"把关"。实际上,这个关我个人是把不了的。我向其他同志学习,占

的比重更大。总之,我们这个小小的工作班子是团结协作的。我常常想,如果今天再让我组织一个班子,干同样的工作,我会要什么样的工作班子呢?我的答复是:原班人马。

在六七年的工作过程中,我们愈来愈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的陕西、甘肃、新疆等地是中国的宝地。除了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让人惊心动魄以外,丝绸之路横贯这几个地区,更像是灿烂发光的明珠。丝绸之路从中国开始,是我们全国人民的骄傲。我们这几个人能为宣传丝绸之路作出一点贡献,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希望,而且也相信,丝绸之路将会愈来愈多地吸引全世界的人们,他们将会愈来愈多地到这里来旅游观光,探讨学术问题,从而加深彼此的了解,增强相互的友谊,让过去曾为全世界文化交流作过重大贡献的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出青春之光,为在新形势下的世界文化交流作出新的更为巨大的贡献。

1986年4月13日

敦煌舞将走向世界

舞蹈在我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我常常想,我国的舞蹈有两个特点:一是善于汲取;一是敢于创新。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甘肃省艺术学校演出的敦煌舞是创新与学习互相结合或者融合的典范。

敦煌壁画上有无数的舞蹈场面。这可以说是中国舞蹈同西域舞蹈交融的产物。此外,石窟中一些佛像的雕塑也表现了一些独特的手势和身躯的其他形态。这些东西,在外行人眼中,只不过是绘画与雕塑而已,而在有心的内行人眼中却是学习与创新的灵感的来源。甘肃艺校搞舞蹈的同志是内行,又是有心人。他们根据从敦煌石窟中得来的灵感,多少年来,勤勤恳恳、锲而不舍,终于在创新方面开辟出一条阳关大道。在善于学习方面,他们也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我认为,他们的舞蹈具体地体现了中国舞蹈史上的两个特点。我祝愿而且相信,他们会受到观众们的欢迎。我还相信,敦煌舞决不会只局限于小圈圈内,它一定会走出国门,走向广阔的世界。

1986年4月

祝贺藏学研究中心成立

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也有巨大的学术意义。

谈到政治意义，国外颇有一些人对藏族的解放和藏、汉两族的团结心怀不满，总希望历史车轮向后倒退。但这只能是空想。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对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视，也标志着藏、汉两族学者的团结。这一件事实就可以昭告天下：我们重视藏学，重视西藏民族文化的普及与提高，这有助于纠正世界舆论界的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言论。

谈到学术意义，无论是从藏学本身来看，还是从西藏保存下来的贝叶梵经来看，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藏族文化典籍之丰富，在我们国内，除了汉族以外，恐怕是首屈一指的。其数量之大也是十分惊人的。但是过去我们对这方面研究还很不够，反而西欧一些国家和日本做的工作比我们要多得多。现在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藏学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人数一天比一天多，研究成果一天比一天丰富。反观我们自己，实在有点惭愧。藏学研究不清楚，今后再写什么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宗教史、中国思想史恐怕就很难下笔。“中国”不仅仅有一个汉族，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其中当然也包括藏族的文化遗产，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藏文典籍之外，还有大量的贝叶梵经，这是我们的国宝，全世界今天只有西藏还有这种经典。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学者向往这

些东西，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地保存这些宝贝，研究这些宝贝，过若干年以后，我们的研究成果逐渐问世的时候，必将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震动。我们目前的力量还不够。我们一定要努力培养藏族、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学者。

我常常想，在广义的汉学范围内，20 世纪敦煌学算是显学，吐鲁番学算是显学，到了 21 世纪，一门新的显学将要引起轰动，这就是藏学和贝叶梵经学。

我预祝中心的工作顺利开展，取得丰硕的成果。

1986 年 5 月 15 日

外语教学漫谈

我学了一辈子外语,也教了一辈子外语。但是如果让我总结什么外语教学的经验,这对我却实在是一个难题。

是我没有经验或教训吗?当然不是。我的感觉是:“提起此事,一言难尽。”

解放前后,我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的领导工作长达三十多年之久。在这一段很长的时间内,虽然我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每一次运动都要检查业务挂帅,智育第一,但是我用在行政方面的时间也确实不少。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开会。“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借用冯至同志的话)。我常常开玩笑说,现在这“学”,那“学”,多如过江之鲫。如果有人提倡创立一门“开会学”的话,我一定申请参加研究,如果让我写一本“《开会学导论》”之类的书,我一定会写得异常精彩,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将大大地扩大我们的科学研究的范围,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平,出版以后,一定会洛阳纸贵,给现在出版界缺纸的情况再增加一份压力。

我开会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研究外语教学法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现在全国从事外语教学的同志们一定都能够回忆起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我们没日没夜地为了外语教学法伤过多少脑筋呀!什么速成法,什么拉赫曼诺夫,什么词汇分析,什么复用式和领会式,什么病历卡,什么直接教学,什么听说领先,等等,等等,几乎是隔几年就换一套新花样,而且是举国皆然。一听说什么地方出了“先进”经验,就不远万里,跋山涉水,亲临学习。取经者接踵

于道路,传道者高踞于讲堂,大家都兴致勃勃,乐此不疲。

结果怎样呢?大家都可以回忆一下。要说是所有的教学法尝试都失败了,根本没有什么成绩可言,那不是事实。我们解放后的外语教学成绩远非解放前可比。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要说是成绩非常大,它能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成正比,那恐怕也不是事实。一直到现在我们也还说不出,究竟哪一种教学方法最合理想,最有效益。

最近若干年以来,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再谈什么外语教学法了,“文革”前那种钻研教学法的劲头再也见不到了。这是不是表示我们退步了呢?我说不出。这是不是表示我们现在的外语教学水平大大落后了呢?我看也不见得。我们现在的外语教学成绩不容抹煞。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你一不否定过去搞教学法成灾的做法,又不否定现在不太讲教学法的成绩,你这貌似辩证法,实际是在变戏法!”我先不回答这种质问,我先谈点别的事情。

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什么文章里讲了一个笑话。一个人在市场上叫卖治臭虫的用纸裹着的锦囊妙计,要的钱并不算少。有人买了一份,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层纸,一直打开了六七层纸。最后发现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字:勤捉。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你能说它没有道理吗?

外语教学我看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决不否定教学法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决不能让眼花缭乱、五花八门的教学法牵着鼻子走,而忘掉外语教学最根本的一条:真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尽可能早地接触外语的实际,让他们自己先努力寻找适合自己情况的学习方法,让他们去拼搏,让他们自己去吃点苦头。

我又想在这里谈一谈德国教外语的方法。我不谈理论,因为没有人教过我这方面的理论,我也不想去杜撰。我只谈实际情况。

我在德国开始学俄语,每周只上课两次,每次二学时,共四个学时。第一次上课,教员领着学生念了念字母。我觉得速度不算快,还比较舒服。第二堂课以后,老师就让学生自己按照教科书的顺序,背生词,学语法,做练习,教员以后就不再讲解了。每次上课就做教科书上的练习,其中也有会话的练习,学生念俄文,学生翻成德文,错了老师纠正。大概过了两个礼拜,老师就让念果戈里的小说《鼻子》。这对我无异是当头一棒,丈二和尚,我简直摸不着头脑。我抱着一本字典,对着原文查下去。几乎每一个字都只能查到前一半,后一半是语尾变化,我根本不知道,只能乱翻语法,努力找出语尾变化。一个小时的课,我要五六倍七八倍的时间来准备。真是苦不堪言。结果在一个学期内,学完了一本教科书,念完了《鼻子》。我觉得这种教学法真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曾对许多人谈过我的这一番经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批判,说我是宣传法西斯教学法,我真是啼笑皆非。这种教学法好像在德国很流行,但决非德国法西斯的发明创造。十九世纪一个什么人就说过:要学游泳,老师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们推下水去。如果淹不死,他就学会了。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比方,没有人会真这样去干的。我们要体会其中蕴含着的意义。学外语也是如此。这是否有点野蛮呢? 我看不能这样说。这办法确实有效。它确实能把学生的全部积极性和主动性毫无遗漏地调动起来。

学外语,同干任何事情一样,必须调动参加者的积极性,让他们尽快尽早地接触到工作的对象,工作的实际。我看这同捉臭虫要勤捉一样,既是老生常谈但又确有效用。过去几十年我们搞教学法,未可厚非,但对学生的积极性的调动则似乎重视不够。我也算是外语战线上的一个老兵。在折腾了几十年以后,到了垂暮之年,却只能拿出这样一点"经验"来,我自己也觉得脸红。我知道,

即使这一点刍荛之言,别人也还不见得都赞同,我自己却深信不疑。质诸上海外语界的同行们,不知以为如何。

1986年6月27日

我和外国语言

我学外国语言是从英文开始的。当时只有十岁,是高小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回忆起来,英文大概还不是正式课程,是在夜校中学习的。时间好像并不长,只记得晚上下课后,走过一片芍药栏,当然是在春天里,其他情节都记不清楚了。

当时最使我苦恼的是所谓“动词”,to be 和 to have 一点也没有动的意思呀,为什么竟然叫做动词呢?我问过老师,老师说不清楚,问其他的人,当然更没有人说得清楚了。一直到很晚很晚,我才知道,把英文 verb(拉丁文 verbum)译为“动词”是不够确切的,容易给初学西方语言的小学生造成误会。

我万万没有想到,学了一点英语,小学毕业后报考中学时竟然派上了用场。考试的其他课程和情况,现在完全记不清楚了。英文出的是汉译英,只有三句话:“我新得到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但是有几个字我不知识。”我大概是译出来了,只是“已经”这个字我还没有学过,当时颇伤脑筋,耿耿于怀者若干时日。我报考小学时,曾经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被破格编入高小一年级。比我年纪大的一个亲戚,因为不认识这个字,被编入初小三年级。一个字给我争取了一年。现在又因为译出了这几句话,被编入春季始业的一个班,占了半年的便宜。如果我也不认识那个“骡”字,或者我在小学没有学英文,则我从那以后的学历都将推迟一年半,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生中偶然出现的小事往往起很大的作用,难道不是非常清楚吗?不相信这一点是不行的。

在中学时,英文列入正式课程。在我两年半的初中阶段,英文课是怎样进行的,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课本是《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谈》、《莎氏乐府本事》(Tales form Shakespeare)、Washington Irving 的《拊掌录》(Sketch Book),好像还念过 Macaulay 的文章。老师的姓名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初中毕业后,因为是春季始业,又在原中学念了半年高中。在这半年中,英文教员是郑又桥先生。他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听口音,他是南方人。英文水平很高,发音很好,教学也很努力。只是他有吸鸦片的习惯,早晨起得很晚,往往上课铃声响了以后,还不见先生来临。班长不得不到他的住处去催请。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学生的英文作文,他不按原文来修改,而是在开头处画一个前括弧,在结尾处画一个后括弧,说明整篇文章作废,他自己重新写一篇文章。这样,学生得不到多少东西,而他自己则非常辛苦,改一本卷子,恐怕要费很多时间。别人觉得很怪,他却乐此不疲。对这样一位老师是不大容易忘掉的。过了 20 年以后,当我经过了高中、大学、教书、留学等等阶段,从欧洲回到济南时,我访问了我的母校,所有以前的老师都已离开了人世,只有郑又桥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临大明湖的高楼上。我见到他,我们俩彼此都非常激动,这实在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他住的地方,南望千佛山影,北望大明湖十里碧波,风景绝佳。可是这一位孤独的老人似乎并不能欣赏这绝妙的景色。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想他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们那一些十几岁的中学生也并不老实。来一个新教员,我们往往要试他一试,看他的本领如何。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少年心理吧。我们当然想不出什么高招来"测试"教员。有一年换了一位英文教员,我们都觉得他不怎么样。于是在字典里找了一个短语 by the by。其实这也不是多么稀见的短语,可我们当时从来没有读到过,觉得很深奥,就拿去问老师。老师没有回答出来,脸上颇

有愧色。我们一走,他大概是查了字典,下一次见到我们,说:"你们大概是从字典上查来的吧?"我们笑而不答。幸亏这一位老师颇为宽宏大量,以后他并没有对我们打击报复。

在这时候,我除了在学校里念英文外,还在每天晚上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习。校长叫冯鹏展,是广东人,说一口带广东腔的蓝青官话。他住的房子非常大,前面一进院子是学社占用。后面的大院子是他全家所居。前院有四五间教室,按年级分班。教我的老师除了冯老师以外,还有钮威如老师、陈鹤巢老师。钮老师满脸胡须,身体肥胖,用英文教我们历史。陈老师则是翩翩佳公子,衣饰华美。看来这几个老师英文水平都不差,教学也都努力。每到秋天,我能听到从后院传来的蟋蟀的鸣声。原来冯老师最喜欢养蟋蟀,山东人名之曰蛐蛐儿,嗜之若命,每每不惜重金,购买佳种。我自己当时也养蛐蛐,常常随同院里的大孩子到荒山野外蔓草丛中去捉蛐蛐,捉到了一只好的,则大喜若狂。我当然没有钱来买好的,只不过随便玩玩而已。冯老师却肯化大钱,据说斗蛐蛐有时也下很大的赌注,不是随便玩玩的。

在这里用的英文教科书已经不能全部回忆出来。只有一本我忆念难忘,这就是Nesfield的文法,我们称之为《纳氏文法》,当时我觉得非常艰深,因而对它非常崇拜。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英国人专门写了供殖民地人民学习英文之用的。不管怎样,这一本书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像这样内容丰富的语法,我以后还没有见过。

尚实英文学社,我上了多久,已经记不起来,大概总有几年之久。学习的成绩我也说不出来,大概还是非常有用的。到了我到北园白鹤庄去上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的时候,我在班上英文程度已经名列榜首。当时教英文的教员共有三位,一位姓刘,名字忘了,只记得他的绰号,一个非常不雅的绰号。另一位姓尤名桐。第三

位姓和名都忘了,这一位很不受学生欢迎。我们闹了一次小小的学潮:考试都交白卷,把他赶走了。我当时是班长,颇伤了一些脑筋。刘、尤两位老师却都受到了学生的尊敬,师生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

在北园高中,开始学了点德文。老师姓孙,名字忘记了。他长得宽额方脸,嘴上留着两撇像德皇威廉第二式的胡须,除了鼻子不够高以外,简直像是一个德国人。我们用的课本是山东济宁天主教堂编的书,实在很不像样子,他就用这个本子教我们。他是胶东口音,估计他在德国占领青岛时在一个德国什么洋行里干过活,学会了德文。但是他的德文实在不高明,特别是发音更为蹩脚。他把 gut 这个字念成"古吃"。有一次上堂时他满面怒容,说有人笑话他的发音。我心里想,那个人并没有错,然而孙老师却忿忿然,义形于色。他德文虽不高明却颇为风雅,他自己出钱印过一册十七字诗,比如有一首是嘲笑一只眼的人:

发配到云阳,
见舅如见娘,
两人齐下泪,
三行!

诸如此类,是中国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严格地说就是民间蹩脚文人的创作,足证我们孙老师的欣赏水平并不怎样高。总之,我们似乎只念了一学期德文,我的德文只学会了几个单词儿,并没有学好,也不可能学好。

到了 1928 年,日寇占领了济南,我失学一年。从 1929 年夏天起,我入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据说是当时山东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此时名义上是国民党统治,但是实权却多次变换,有时候,仍

然掌握在地方军阀手中。比起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来,多少有了一些新气象。《书经》、《诗经》不再念了,作文都用白话文,从前是写古文的。我在这里念了一年书,国文教员个个都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都是当时文坛上的名人。但英文教员却都记不清楚了。高中最后一年用的什么教本我也记不起来了。可能是《格里弗游记》之类。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来的是几次英文作文。我记得有一次作文题目是讲我们学校。我在作文中描绘了学校的大门外斜坡,大门内向上走的通道,以及后面图书馆所在的楼房。自己颇为得意,也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赞扬。我们的英文课一直用汉语进行,我们既不大能说,也不大能听。这是当时山东中学里一个普遍的缺点,同京、沪、津一些名牌中学比较起来,我们显然处于劣势。这大大地影响了考入名牌大学的命中率。

此时已经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从高中毕业了。我断断续续学习英语已经十年了,还学了一点德文。要问有什么经验没有呢?应该有一点,但并不多。曾有一度,我想把整部英文字典背过。以为这样一来,就再没有不认识的字了。我确实也下过工夫去背,但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有好多字实在太冷僻没有用处,于是采用另外一种办法:凡是在字典上查过的字都用红铅笔在字下画一横线,表示这个字查过了。但是过了不久,又查到这个字。说明自己忘记了。这个办法有一点用处,它可以给我敲一下警钟:查过的字怎么又查呢?可是有的字一连查过几遍还是记不住,说明警钟也不大理想。现在的中学生要比我们当时聪明得多,他们恐怕不会来背字典了。阿门!加上阿弥陀佛!

不管怎么样,高中毕业了。下一步是到北京投考大学。山东有一所山东大学,但是本省的学生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不大愿意报考本省的大学,一定要"进京赶考"。我们这一届高中有八十多个毕业生,几乎都到了北京。当年报考名牌大学,其困难程度要远

远超过今天。拿北大、清华来说，录取的学生恐怕不到报名的十分之一。据说有一个山东老乡报考北大、清华，考过四次，都名落孙山。我们考的那一年是第五次了，名次并不比孙山高。看榜后，神经顿时错乱，走到西山，昏迷漫游了四五天，才清醒过来，回到城里，从此回乡，再也不考大学了。

入学考试，英文是必须考的，以讲英语出名的清华，英文题出的并不难，只有一篇作文，题目忘记了。另外有一篇改错之类的东西。不以讲英语著名的北大出的题目却非常难，作文之处有一篇汉译英，题目是李后主的词：

别后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有的同学连中文原文都不十分了解，更何况译成英文！顺便说一句，北大的国文作文题也非常古怪，那一年的题目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这样一个题目也很够一个中学毕业生做的。但是北大古怪之处还不在这里。各门学科考完之后，忽然宣布要加试英文听写(dictation)，这对我们实在是当头一棒。我们在中学没有听过英文。我大概由于单词记得多了一点，只要能听懂几个单词儿，就有办法了。记得老师念的是一段寓言。其中有狐狸，有鸡，只有一个字 suffer，我临阵惊慌，听懂了，但没有写对。其余大概都对了。考完之后，山东同学面带惊慌之色，奔走相告，几乎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大家都知道，这一加试，录取的希望就十分渺茫了。

我很侥幸，北大、清华都录取了。当时处心积虑是想出国留洋。在这方面，清华比北大条件要好。我决定入清华西洋文学系。这一个系有一套详细的教学计划，课程有古希腊拉丁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艺评论、莎

士比亚、欧洲文学史等。教授有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波兰人、法国人、俄国人,但统统用英文讲授。我在前面已经谈到,我们中学没有听英文的练习。教大一英文的是美国小姐毕莲女士(Miss Bille)。头几堂课,我只听到她咽喉里咕噜咕噜地发出声音,"剪不断",理还乱,却一点也听不清单词。我在中学曾以英文自负,到了此时却落到这般地步,不啻当头一棒,悲观失望了好多天,幸而逐渐听出了个别的单词,仿佛能"剪断"了,大概不过用了几个礼拜,终于大体听懂了,算是度过了学英文的生平第一难关。

清华有一个古怪的规定:学英、德、法三种语言之一,从第一年X语,学到第四年X语者,谓之X语专门化(specialized in X)。实际上法语、德语完全不能同英语等量齐观。法语、德语都是从字母学起,教授都用英语讲授,而所谓第一年英语一开始就念Jane Austin的Pride and Prejudice。其余所有的课也都用英语讲授。所以这三个专门化是十分不平等的。

我选的是德语专门化,就是说,学了四年德语。从表面上来看,四年得了八个E(Excellent,最高分,清华分数是五级制),但实际上水平并不高。教第一年和第二年德语的是当时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杨丙辰(震文)教授。他在德国学习多年,德文大概是好的,曾翻译了一些德国古典名著,比如席勒的《强盗》等等。他对学生也从来不摆教授架子,平易近人,常请学生吃饭。但是作为一个教员,他却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教员。他教课从字母教起,教第一个字母a时,说:a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初听之下,也还新鲜。但b、c、d等等,都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学生就窃窃私议了:"我们不管它是否是丹田里的几口气。我们只想把音发得准确。"从此,"丹田里的一口气"就传为笑谈。

杨老师家庭生活也非常有趣。他是北京大学的系主任,工资相当高,推算起来,可能有现在教授的十几倍。不过在北洋军阀时

期,常常拖欠工资,国民党统治前期,稍微好一点,到了后期,什么法币、什么银元券、什么金元券一来,钞票几乎等于手纸,教授们的生活就够呛了。杨老师据说兼五个大学的教授,每月收入可达上千元银元。我在大学念书时,每月饭费只需六元,就可以吃得很好了。可见他的生活是相当优裕的。他在北大沙滩附近有一处大房子,服务人员有一群,太太年轻貌美,天天晚上看戏捧戏子,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一个非常离奇的结合。杨老师的人生观也很离奇,他信一些奇怪的东西,更推崇佛家的"四大皆空"。把他的人生哲学应用到教学上就是极端不负责任,游戏人间,逢场作戏而已。他打分数,也是极端不负责任。我们一交卷,他连看都不看,立刻把分数写在卷子上。有一次,一个姓陈的同学,因为脾气粘粘糊糊,交了卷,站着不走。杨老师说:"你嫌少吗?"立即把 S(superior,第二级)改为 E。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德语的。高中时期孙老师教的那一点德语早已交还了老师,杨老师又是这样来教,可见我的德语基础是很脆弱的。第二年仍然由他来教,前两年可以说是轻松愉快,但不踏实。

第三年是石坦安先生(Von den Steinen,德国人)教,他比较认真,要求比较严格,因此这年学了不少的东西。第四年换了艾克(G. Ecke,号锷风,德国人)。他又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先生。他工资很高,又独身一人,在城里租了一座王府居住。他自己住在银安殿上,仆从则住在前面一个大院子里。他搜集了不少的中国古代名画。他在德国学的是艺术史,因此对艺术很有兴趣,也懂行。他曾在厦门大学教过书,鲁迅的著作中曾提到过他。他用德文写过一部《中国的宝塔》,在国外学术界颇得好评。但是作为一个德语教员,则只能算是一个蹩脚的教员。他对教书心不在焉。他平常用英文讲授,有一次我们曾请求他用德语讲,他立刻哇啦哇啦讲一

通德语,其快如悬河泻水,最后用德语问我们,“Verstehen Sie etwas davon?”我们摇摇头,想说:“Wir verstehen nichts davon.”但说不出来,只好还说英语。他说道:“既然你们听不懂,我还是用英语讲吧!”我们虽不同意,然而如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课程就照旧进行下去了。

但是他对我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喜欢德国古典诗歌,最喜欢 Hölderlin 和 Plateno。我受了他的影响,也喜欢起 Hölderlin 来。我的学士论文:The Early Poems of Hölderlin,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写的,他是指导教授。当时我大概对 Hölderlin 不会了解得太多,太深。论文的内容我记不清楚了,恐怕是非常肤浅的。我当时的经济情况很困难,有一次写了几篇文章,拿了点稿费,特别向德国订购了 Hölderlin 的豪华本的全集,此书我珍藏至今,念了一些,但不甚了了。

除了英文和德文外,我还选了法文。教员是德国小姐 Mademoiselle Holland,中文名叫华兰德。当时她已发白如雪,大概很有一把子年纪了。因为是独身,性情有些反常,有点乖戾,要用医学术语来说,她恐怕患了迫害狂。在课堂上专以骂人为乐。如果学生的答卷非常完美,她挑不出毛病来借端骂人,她的火气就更大,简直要勃然大怒。最初选课的人很多,过了没有多久,就被她骂走了一多半。只剩下我们几个不怕骂的仍然留下,其中有华罗庚同志。有一次把我们骂得实在火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对她予以反击,结果大出意料,她屈服了,从此天下太平。她还特意邀请我们到她的住处(现在北大南门外的军机处)去吃了一顿饭。可见师徒间已经化干戈为玉帛,揖让进退,海宇澄清了。

我还旁听过俄文课。教员是一个白俄,名字好像是陈作福,个子极高,一个中国人站在他身后,从前面看什么都看不见。他既不会英文,也不会汉文,只好被迫用现在很时髦的“直接教学法”,然

而结果并不理想,我只听到讲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请您说!),其余则不甚了了。我旁听的兴趣越来越低,终于不再听了。大概只学了一些生词和若干句话,我第一次学习俄语的过程就此结束了。

我上面谈到,我虽然号称德文专门化,然而学习并不好。可是我偏偏得了四年高分。当我 1934 年毕业后,不得已而回到母校济南高中当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清华与德国学术交流处订立了交换研究生的合同,我报名应考,结果被录取了。我当年舍北大而趋清华的如意算盘终于真正实现了,我能到德国去留学了。对我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喜事。

可是我的德文水平不高,我看书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听、说则全无训练。到了德国,吃了德国面包,也无法立刻改变。我到德国学术交流处去报到的时候,一个女秘书含笑对我说:"Lange Reise!"(长途旅行呀!)我愣里愣怔,竟没有听懂。我留在柏林,天天到柏林大学外国语学院专为外国人开的德文班去学习了六周,到了深秋时分,我被分配到 Göttingen(哥廷根)大学去学习。我对于这个在世界上颇为著名的大学什么都不清楚。第一学期,我还没有能决定究竟学习哪一个学科。我随便选了一些课,因为交换研究生选课不用付钱,所以我尽量多选,我每天要听课六七小时。选的课我不一定都有兴趣,我也不能全部听懂。我的目的其实是通过选课听课提高自己的听的能力。我当时听德语的水平非常低,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情况我在上面已经谈过。解放后,我们的外语教育,不管还有多少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其水平和认真的态度是解放前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这一点现在的青年不一定都清楚。因此我在这里说上几句。

我还利用另一种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听说能力,这就是同我的女房东谈话。德国大学没有学生宿舍,学生住宿的问题学校根本不管,学生都住民房。我的女房东有一些文化水平,但不高。她喜

欢说话,唠唠叨叨,每天晚上到我屋里来收拾床铺,她都要说上一大套,把一天的经过都说一遍。别人大概都不爱听,我却是求之不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练习听力。我的女房东可以说是一位很好的德文教员,可惜我既不付报酬,她自己也不知道讨报酬,她成了我的义务教员。

到了第二学期,我偶然看到 Prof. Waldschmidt 开梵文课的告示。我大喜过望,立刻选了这一门课。我在清华大学时,曾经想学梵文,但没有老师教,只好作罢。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我怎能放过呢?学生只有三个:一个乡村里的牧师,一个历史系的学生。Waldschmidt 的教学方法是德国通常使用的。德国十九世纪一位语言学家主张,教学生外语,比如教学生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推下去,如果淹不死,他就学会游泳了。具体的办法是:尽快让学生自己阅读原文,语法由学生自己去钻,不在课堂上讲解。这种办法对学生要求很高。短短的两节课往往要准备上一天,其效果我认为是好的:学生的积极性完全调动起来了。他要同原文硬碰硬,不能依赖老师,他要自己解决语法问题。只有实在解不通时,教授才加以辅导。这个问题我在别的地方讲过,这里不再详细叙述了。

德国大学有一个奇特的规定:要想考哲学博士学位,必须选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对我来说,主系是梵文,这是已经定了的。副系一个是英文,这可以减轻我的负担。至于第三个系,则费了一番周折。有一个时期,我曾经想把阿拉伯语做为我的副系。我学习了大约三个学期的阿拉伯语。从第二学期开始就念《古兰经》。我很喜欢这一部经典,语言简炼典雅,不像佛经那样累赘重复,语法也并不难。但是在念过两个学期以后,我忽然又改变了想法,我想拿斯拉夫语言做为我的第二副系。按照德国大学的规定,拿斯拉夫语做副系,必须学习两种斯拉夫语言,只有一种不行。于

是我在俄文之外,又选了南斯拉夫语。

教俄文的老师是一个曾在俄国居住过的德国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语。他的教法同其他德国教员一样,是采用把学生推入游泳池的办法。俄文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德国的学期短,然而我们却在第一学期内,读完了一册俄文教科书,其中有单词、语法和简单的会话,又念完果戈里的小说《鼻子》。我最初念《鼻子》的时候,俄文语法还没有学多少,只好硬着头皮翻字典。往往是一个字的前一半字典上能查到,后一半则不知所云,因为后一半是表变位或变格变化的。而这些东西,我完全不清楚,往往一个上午只能查上两行,其痛苦可知。但是不知怎么一来,好像做梦一般,在一个学期内,我毕竟把《鼻子》全念完了。下学期念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的时候,我觉得轻松多了。

南斯拉夫语由主任教授 Prof. Braun 亲自讲授。他只让我看了一本简单的语法,立即进入阅读原文的阶段。有了学习俄文的经验,我拼命翻字典。南斯拉夫语同俄文很相近,只在发音方面有自己的特点,有升调和降调之别。在欧洲语言中,这是很特殊的。我之所以学南斯拉夫语,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我的兴趣并不大,可以说也没有学好。大概念了两个学期,就算结束了。

谈到梵文,这是我的主系,必须全力以赴。我上面已经说过,Waldschmidt 教授的教学方法也同样是德国式的。我们选用了 Stenzler 的教科书。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教科书。篇幅并不多,但是应有尽有。梵文语法以艰深复杂著称,有一些语法规则简直烦琐古怪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这些东西当然不是哪一个人硬制定出来的,而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利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都能解释得通。Stenzler 在薄薄的一本语法书中竟能把这些古怪的语法规则的主要组成部分收容进来,是一件十分不容易做好的工作。这一本书前一部分是语法,后一部分是练习。练习上面

都注明了相应的语法章节。做练习时,先要自己读那些语法,教授并不讲解,一上课就翻译那些练习。第二学期开始念《摩诃婆罗多》中的《那罗传》。听说,欧美许多大学都是用这种方式。到了高年级,梵文课就改称 Seminar,由教授选一部原著,学生课下准备,上堂就翻译。新疆出土的古代佛典残卷,也是在 Seminar 中读的。这种 Seminar 制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是训练学生做研究工作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比如,读古代佛典残卷时就学习了怎样来处理那些断简残篇,怎样整理,怎样阐释,连使用的符号都能学到。

至于巴利文,虽然是一门独立的课程,但教授根本不讲,连最基本的语法也不讲。他只选一部巴利文的佛经,比如《法句经》之类,一上堂就念原书,其余的语法问题,梵巴音变规律,词汇问题,都由学生自己去解决。

念到第三年上,我已经拿到了博士论文的题目,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正式爆发。我的教授被征从军。他的前任 Prof. E. Sieg 老教授又出来承担授课的任务。当时他已经有七八十岁了,但身体还很硬朗,人也非常可蔼可亲,简直像一个老祖父。他对上课似乎非常感兴趣。一上堂,他就告诉我,他平生研究三种东西:《梨俱吠陀》、古代梵文语法和吐火罗文,他都要教给我。他似乎认为我一定同意,连征求意见的口气都没有,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想在这里顺便谈一点感想。在那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里,把世间极其复杂的事物都简单化为一个公式: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学习过的人或者没有学习过的人,都成了资产阶级。至于那些国家的教授更不用说了。他们教什么东西,宣传什么东西,必定有政治目的,具体地讲,就是侵略和扩张。他们决不会怀有什么好意的。Sieg 教我这些东西也必然是为他们的政治服务的,为侵略和扩张服务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谁也否认不掉。但是不是他们的学者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为这个政策服务呢?我以

为不是这样。像 Sieg 这样的老人,不顾自己年老体衰,一定要把他的"绝招"教给一个异域的青年,究竟为了什么?我当时学习任务已经够重,我只想消化已学过的东西,并不想再学习多少新东西。然而,看了老人那样诚恳的态度,我屈服了。他教我什么,我就学什么。而且是全心全意地学。他是吐火罗文世界权威,经常接到外国学者求教的信。比如美国的 Lane 等等。我发现,他总是热诚地罄其所知去回答,没有想保留什么。和我同时学吐火罗文的就有一个比利时教授 W. Couvreur。根据我的观察,Sieg 先生认为学术是人类的公器,多撒一颗种子,这一门学科就多得一点好处。侵略扩张同他是不沾边的。他对我这个异邦的青年奖掖扶植不遗余力。我的博士论文和口试的分数比较高,他就到处为我张扬,有时甚至说一些夸大的话。在这一方面,他给了我极大的影响。今天我也成了老人,我总是想方设法,为年轻的学者鸣锣开道。我觉得,只要我能做到这一点,我就算是对得起 Sieg 先生了。

我跟 Sieg 先生学习的那几年,是我一生挨饿最厉害,躲避空袭最多,生活最艰苦的几年。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却是最甜蜜的几年。甜蜜在何处呢?就是能跟 Sieg 先生在一起。到了冬天,大雪载途,黄昏早至。下课以后,我每每扶 Sieg 先生踏雪长街,送他回家。此时山林皆白,雪光微明,十里长街,寂寞无人。心中又凄清,又温暖。此情此景,终生难忘。

1946 年我回国以后,当了外语教员。从表面上来看,我自己的外语学习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对于语言,包括外国语言和自己的母语在内,学习任务是永远也完成不了的。真正有识之士都会知道,对于一种语言的掌握,从来也不会达到绝对好的程度,水平都是相对的。据说莎士比亚作品里就有不少的语法错误,我们中国过去的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诗人、词客等等,又有哪一个没有病句呢?现代当代的著名文人又有

哪一个写的文章能经得起语法词汇方面的过细的推敲呢？因此，谁要是自吹自擂，说对语言文字的掌握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这个人不是一个疯子，就是一个骗子。我讲的全是实话，并不是危言耸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学习外语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在教学之余，我仍然阅读一些外文的书籍，翻译一些外国的文学作品，还经常碰到一些不懂的或者似懂而实不懂的地方，需要翻阅字典或向别人请教。今天还有一些人，自视甚高，毫无自知之明，强不知以为知，什么东西都敢翻译，什么问题都不在话下，结果胡译乱写，贻害无穷，而自己则沾沾自喜，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事！

“你学了一辈子外语，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呢？”我仿佛听到有人这样问。经验和教训，都是有的，而且还不少。

我自己常常想到，学习外语，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到了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程度，眼前就有一条界线，一个关口，一条鸿沟，一个龙门。至于是哪一个时期，这就因语言而异，因人而异。语言的难易不同，而且差别很大；个人的勤惰不同，差别也很大。这两个条件决定了这一个龙门的远近，有的三四年，有的五六年，一般人学习外语，走到这个龙门前面，并不难，只要泡上几年，总能走到。可是要跳过这龙门，就决非易事。跳不跳过有什么差别呢？差别有如天渊。跳不过，你对这种语言就算是没有登堂入室。只要你稍一放松，就会前功尽弃，把以前学的全忘掉。你勉强使用这种语言，这个工具你也掌握不了，必然会出许多笑话，贻笑大方。总之你这一条鲤鱼终归还是一条鲤鱼，说不定还会退化，你决变不成龙。跳过了龙门呢？则你已经不再是一条鲤鱼，而是一条龙。可是要跳过这个龙门又非常难，并不比鲤鱼跳龙门容易，必须付出极大的劳动，表现出极大的毅力，坚韧不拔，锲而不舍，才有跳过的希望。做任何事情都有类似的情况。书法、绘画、篆刻、围棋、象棋、打排球、踢足球、体操、跳水等等，无不如此。这一点必须认清。跳

过了龙门，你对你的这一行就有了把握，有了根底。专就外语来说，到了此时，就不大容易忘记，这一门外语会成为你得心应手的工具。当然，即使达到这个程度，仍然要继续努力，决不能掉以轻心。

学习外语，同学习一切东西一样，必须注重方法。我们过去尝试过许多教学外语的方法，都取得过一定的成绩。这一点必须承认。但是我们决不能迷信方法，认为方法万能。我认为，最可靠的不是方法，而是个人的勤学苦练，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个道理异常清楚。各行各业，莫不如此。过去有人讲笑话，说除臭虫最好的办法不是这药那药，而是“勤捉”。其中有朴素的真理。

我学习外国语言，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我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回顾这60多年的历史，心里真是感慨万端。我学了不少的外国语言，但是现在应用起来自己比较有把握的却不太多。我上面讲到跳龙门的问题。好多语言，我大概都没有跳过龙门。连那几种比较有把握的，跳到什么程度，自己心中也没有底。想要对今天学外语的年轻人讲几句经验之谈，想来想去，也只有勤学苦练一句，这真是未免太寒碜了。然而事实就是这个样子，这真叫做没有办法。学什么东西都要勤学苦练。这个真理平凡到同说每个人只要活着就必须吃饭一样。你不说，人家也会知道。然而它毕竟还是真理。你能说每个人必须吃饭不是真理吗？问题是如何贯彻这个真理。我只希望有志于掌握外语的年轻人说到做到。每个人到了一定的阶段，都能跳过龙门去。我们祖国今天的建设事业要求尽量多的外语人材，而且要求水平尽量高的。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达到这个神圣的目的。

1986年9月12日写完

赞“代沟”

现在常常听到有人使用“代沟”这个词儿。这个词儿看起来像一个外来语。然而它表达的内容却不限于外国,而是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当然也不能够例外。

青年人怎样议论“代沟”,我不清楚。老年人一谈起来,往往流露出十分不满意的神气,有时候甚至有类似“人心不古,世道浇漓”之类的慨叹。这种神气和慨叹我也有过。我现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年人了。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我同样也是有的。我们大概都感觉到,在青年人身上有一些东西,我们看着不顺眼;青年人嘴里讲一些话,我们听上去不大顺耳,特别是那一些新造的名词更是特别刺耳。他们的衣着、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言谈举动以及接物待人的礼节、他们欣赏的对象和趣味,总之,一切的一切,我们无不觉得不那么顺溜。脾气好一点的老头摇一摇头,叹一口气,脾气不太好的就难免发发牢骚,成为九斤老太的同党了。

如果说有一条沟的话,那么,我们就站在沟的这一边,那一边站的是年轻人。但是若干年以前,我们也曾在沟的那一边站过,站在这一边的是我们的父母、老师、长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是在一夜之间,我们忽然站到这边来了。原来站在这边的人,由于自然规律不可抗御,一个个地让出了位置,走向涅槃,空出来的位置由我们来递补。有如秋后的树木,落叶渐多,枝头渐空,全身都在秋风里,只有日渐凋零了。这一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好像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然而它确实是存在的。

站在沟这一边的老人,往往有一些杞忧。过去老人喜欢说一些世风日下之类的话,其尤甚者甚至缅怀什么羲皇盛世。现在这种人比较少了,但是类似这样的感慨还是有的。我在这一方面似乎更特别敏感。最近几年,我曾数次访问日本。年纪大一点的日本朋友对于中国文化能够理解,能够欣赏,他们感谢中国文化带给日本的好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中国古代的诗词和书画,他们熟悉。他们身上有一股“老”味,让我们觉得很亲切。然而据日本朋友说,现在的年轻人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中国古代的那一套,他们全不懂,全不买帐,他们喝咖啡,吃西餐,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同他们交往,他们身上有一股“新”味,这种“新”味使我觉得颇不舒服。我自己反复琢磨,中日交往垂二千年。到了近代,日本虽然进行了改革,成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强国,但是在过去还多少有点共同语言。好像在一夜之间,忽然从地里涌出了一代“新人类”,同过去几乎完全割断了纽带联系。同这一群新人打交道,我简直手足无所措。这样下去,我们两国不是越来越疏远吗?为什么几千年没有变,而今天忽然变了呢?我冥思苦想,不得其解。

在中国,我也有这种杞忧。过去,当我站在沟的那一边的时候,我虽然也感到同沟这一边的老年人有点隔阂,但并不认为十分严重;然而到了今天,世界变化空前加速,真正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我来到了沟的这一边,顿时觉得沟那一边的年轻人也颇有“新人类”的味道。他们所作所为,很多我都觉得有点难以理解。男女自由恋爱,在封建时期是不允许的;在解放前允许了,但也多半不敢明目张胆。如果男女恋人之间接一个吻,恐怕也要秘密举行。然而今天呢,青年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间,公然拥抱接吻,坦然,泰然,甚至还有比这更露骨的举动,我看了确实感到吃惊,又觉得难以理解。我原来自认为脑筋还没有僵化,同九斤老太划清了界限。曾几何时,我也竟成了她的“同路人”,岂不大可异哉!又

岂不大可哀哉!

不管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中国范围来看,代沟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根据我个人的感觉,好像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好像任何时候也没有今天这样明显。青年老年之间存在的好像已经不是沟,而是长江大河,其中波涛汹涌,难以逾越,我们两代人有点难以互相理解的势头了。为代沟而杞忧者自古就有,今天也决不乏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而且还可能是“积极分子”。

说了上面这一些话以后,倘若有人要问:“你对代沟抱什么态度呢?”答曰:“坚决拥护,竭诚赞美!”

试想一想:如果没有代沟,青年人和老年人完全一模一样,人类的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再往上回溯一下,如果在猴子中间没有代沟,所有的猴子都只能用四条腿在地上爬行,哪一只也决不允许站立起来,哪一只也决不允许使用工具劳动,某一类猴子如何能转变成人呢?从语言方面来讲,如果不允许青年们创造一些新词,我们的语言如何能进步呢?孔老头子说的话如果原封不动地保留到今天,这种情况你能想象吗?如果我们今天的报刊杂志孔老夫子这位圣人都完全能懂,这是可能的吗?人类社会在不停地变化,世界新知识日新月异,如果不允许创造新词儿,那么,语言就不能表达新概念、新事物,语言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这种情况是可取的吗?总之,代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它标志着变化,它标志着进步,它标志着社会演化,它标志着人类前进。不管你是否愿意,它总是要存在的,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还要存在。

因此,我赞美代沟,用满腔热忱来赞美代沟。

1987年4月29日上海华东师大

《东方世界》三周年诞辰贺辞

《东方世界》诞生三周年了,我祝它继续茁壮成长。

《东方世界》不是一个纯学术性刊物。我们从来也没有想把它办成一个纯学术性的刊物。原因很简单:出于读者的需要。纯学术性刊物,我们北京大学有,我们东语系也有,全国当然也有,而把知识性、趣味性与学术性相结合,供广大读者理解东方的刊物则还极少。《东方世界》的诞生正是为了雪中送炭。

我们羡慕“阳春白雪”,但是我们并不鄙薄“下里巴人”。“国内和者数千人”的“下里巴人”也许更能满足中国今天广大读者的需要。今天“东方,东方!”,叫得雷般地响。但是东方是什么样子呢?有谁能说得清楚?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理解”这个词儿。有人甚至喊出了:“理解万岁!”我觉得,这是一个涵义深刻的词儿。没有理解,我们的工作能顺利展开吗?我们无处不需要理解。在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需要理解。在我们国家、各兄弟民族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人与人之间都需要理解。在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也需要理解。在东方各国,我们基本上同属于第三世界,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我们更需要互相理解。

理解的途径,多种多样。办《东方世界》也是途径之一。

《东方世界》诞生三周年了,我祝它继续茁壮成长。

1987年10月13日

黎明之前

我于 1946 年深秋，在离开了祖国和北京 11 年之后，又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工作。深夜，阴法鲁同志等到车站上去接我们。坐在汽车上，看到落叶满街，秋风萧瑟，身上凉了起来，心里却是热的。

我被安排住在红楼上。这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驰名全国，驰名全世界。但在日寇占领时期，却成了日寇宪兵队的驻地。地下室就是刑讯杀人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地下室里有鬼叫声。我是唯物主义者，根本不信有什么鬼神。因此，虽然整个红楼空空荡荡，夜里真有点鬼气森森，但是我并不怕鬼，我怕的是人。

怕什么人呢？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住在红楼期间，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国民党反动派腐朽透顶，病入膏肓，众叛亲离，天怒人怨。犹如燕巢危幕，鱼陷涸池，岌岌不可终日。但是世上一切反动派的规律是垂死挣扎，国民党也不例外。他们对北大尤其恨之入骨。北大的民主广场号称小解放区，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拔之而后快。

在那段时间，学生正进行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经常在民主广场集合，然后到外面去游行示威 。国民党的北平市党部，军统特务，中统特务，宪兵第九团，恨得牙咬得直响，但是却束手无策。于是就从天桥雇用一批批的地痞流氓，手持棍棒，到红楼附近来捣乱，有时候抓住单身的学生，打他们一顿。有时候成群结队，到民主广场外面去堵截示威学生，我从我住的三楼上向下看，看到成群

的打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一条臭水沟边上,等待头子的命令。我看他们歪戴着帽子,敞胸露体,闹闹嚷嚷,列队集合,像一群乌合之众,成队地撤走。有人说,这是到什么地方去,国民党要发给每个人多少万金元券或银元券,再加上几个馒头。

国民党指挥的流氓有时候夜里也来捣乱。我们住在红楼的人就用椅子把楼道堵上,楼上算是我们的堡垒,红楼他们没有冲进来过,旁边的东斋宿舍,他们都冲进去了。乱砸了一通,然后撤走,大概又到国民党市党部领馒头去了。

1949年冬,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京。我们在孑民堂纪念北大建校51周年。城外炮声隆隆。我们几个人小声交谈,说:国民党给我们鸣礼炮哩!绝大多数教授的心情是愉快的,充满了期待的情绪。对共产党,我们几乎都不甚了解,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非常了解的。谁心里都有底,我们嘴里念着:“长夜漫漫何时旦?”,心里都知道,这一群反动家伙的末日快来临了。

在自然界,黎明前有一段黑暗。在人类社会中,反动力量要完蛋的时候,由于他们拼命捣乱,造成一段短暂的黑暗,但是黑暗一过,迎来的是霞光满东天,耀眼的朝阳就要照临大地了。

我们终于迎来了朝阳。

1987年10月27日

为考证辩诬

考证,也叫做考据。在清代,义理、词章、考据被认为是三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学科。有的学者专门从事一门学科的研究,有的学者也能从事两门学科的探讨,或者三门学科都兼容并包。据我所知道的,当时好像没有什么人对这种三分法说三道四,或者对其中一门加以挑剔。大家好像都认为,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到了本世纪20年代,情况却有了变化。胡适大力提倡考据工作,引起了纷纷的议论与责难。一直到解放后,每次对胡适进行所谓批判,都有人主张,胡适之所以提倡考据是为了引导青年钻入故纸堆中,脱离当前的斗争,从而防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天下翕然从之,从来没有什么人提出异议。我对于这种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事实,是谁也否认不掉的。但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就提倡考据,天下能有这种笨伯吗?有什么理由说,搞考据的人就一定反对共产主义呢?有什么理由说,搞考据的人就一定没有时间和兴致来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呢?事实也并不是这样。有一些老革命家曾长年从事考据工作。可见考据工作与共产主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还有一个与此类似的说法,我也深为怀疑。有不少人说,清代乾嘉时代考据之风大盛,与清代统治者大力倡导有关。而从事考据工作的学者们,也想通过这种工作来避免文字狱之类的灾难。我个人觉得,这种逻辑非常滑稽。如果统治者真想搞文字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难道考据就能成为躲开文字狱的避风港吗?

然而,以上两种说法却流行开来,而且占了垄断的地位,于是沸沸扬扬,波及全国,揭批判之大旗,震挞伐之天声,考据工作好像真成了革命之大敌。一些革命者,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一有机会,总要刺上几枪。一直到今天,流风未息,大有谈考据而色变之概了。

我个人觉得,对考据工作既用不着大捧特捧,也用不着大张挞伐。这种工作实际上是非常平常而又非做不可的。稍微搞点科学研究工作的人,特别是搞与古代典籍有关的研究工作的,都有一种经验:首先要积累资料,这种积累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也不外是这一层意思。但是,资料光多还不行,它还必须正确可靠,而不正确不可靠的资料却比比皆是。如果对资料不加鉴别,一视同仁,则从不正确不可靠的资料中得出来的结论绝对不会正确可靠,这一点连小孩子都会知道的。检验资料可靠不可靠的手段颇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考证。因此,考据工作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有不可。在提倡假、大、空的时代中是用不着考据的。反正是“以论带史”,或者“以论代史”。“论”已经有了,只需寻求证据加以肯定,加以阐释,工作就算是完成了。至于资料可不可靠,那是无关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论”。如果发现资料与“论”不相符合,那就丢车保帅,把资料丢弃,或者加以歪曲,只要帅能保得住,就猗欤盛哉,天下太平了。我从来不反对论,论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论必须真正反映客观规律,而这种真正反映客观规律的论只能从正确可靠的资料中才能抽绎出来,考据工作正是保证资料的正确与可靠所不能缺少的。

现在还有一种反对所谓烦琐考证的论调。我并不赞成搞烦琐考据。但是,我必须指出一点来:搞不搞烦琐考证,要视需要而定,不能笼统地加以否定,更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而口诛笔伐。搞过考据工作的恐怕都有一种经验:考据往往难免烦琐,大而化之搞考

据,是决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只要烦琐没有超过需要的范围,我看是应该允许的。

总之,我只是想说:对于考据工作和所谓烦琐考证,要平心静气地进行分析,既不必大声疾呼加以提倡,也不必义形于色横加指责。那种过分夸大考据工作作用的论调,如“发现一个字的古音,等于发现一个行星”等等,也为我所不取。

1987年11月18日

为胡适说几句话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过去,在极左思想的支配下,我们曾一度把他完全抹煞,把他说得一文不值,反动透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看问题比较实事求是了。因此对胡适的评价也有了一些改变。但是,最近我在一份报刊上一篇文章中读到,(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好像他是一个铁杆国民党员、蒋介石的崇拜者。根据我的了解,好像事情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因此禁不住要说几句话。

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事实,是谁也否认不掉的。但是,他是不是就是死心塌地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他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员。他对国民党并非一味地顺从。他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着独立性。对国民党也不例外。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知难行亦不易》,是针对孙中山先生的著名的学说"知难行易"的。我在这里不想讨论"知难行易"的哲学奥义,也不想涉及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主张的政治目的。我只想说,胡适敢于对国民党的"国父"的重要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蒋介石从来也没有听过"国父"的话,他打出孙中山先生的牌子,其目的只在于欺骗群众。但是,有谁胆敢碰这块牌子,那是断断不能容许的。于是,文章一出,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党棍一下子炸开了锅,认为

胡适简直是大不敬,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一群走狗一涌而上。但是,胡适却一笑置之,这一场风波不久也就平息下去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胡适等新月派的人物曾一度宣扬“好人政府”,他们大声疾呼,一时甚嚣尘上。这立刻又引起了一场喧闹。有人说,他们这种主张等于不说,难道还有什么人主张坏人政府吗?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而提倡好人政府,其中隐含着国民党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国民党之所以暴跳如雷,其原因就在这里。

这样的小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是,这两个也就够了。它充分说明,胡适有时候会同国民党闹一点小别扭的。个别“诛心”的君子义正辞严地昭告天下说,胡适这样做是为了向国民党讨价还价。我没有研究过“特种”心理学,对此不敢赞一辞,这里且不去说它。至于这种小别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也不在我研究的范围之内,也不去说它了。我个人觉得,这起码表明胡适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忠顺奴才。

但是,解放以后,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创造了一个新术语,叫做“小骂大帮忙”。胡适同国民党闹点小别扭就归入这个范畴。什么叫“小骂大帮忙”呢?理论家们说,胡适同国民党蒋介石闹点小别扭,对他们说点比较难听的话,这就叫做“小骂”。通过这样的“小骂”,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这种保护色是有欺骗性的,是用来迷惑人民的。到了关键时刻,他又出来为国民党讲话。于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话,天下翕然从之,国民党就“万寿无疆”了。这样的“理论”未免低估了中国老百姓的觉悟水平。难道我们的老百姓真正这样糊涂、这样低能吗?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垮台的历史,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把胡适说得似乎比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以及其他助纣为虐的忠实走狗还

要危险，还要可恶，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最近常常想到，解放以后，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了辩证法。对于这一件事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的。但是，正如西方一句俗语所说的那样：一切闪光的不都是金子。有人把辩证法弄成了诡辩术，老百姓称之为“变戏法”。辩证法稍一过头，就成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就成了真正的变戏法。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封建时代赃官比清官要好。清官能延长封建统治的寿命，而赃官则能促其衰亡。周兴、来俊臣一变而为座上宾，包拯、海瑞则成了阶下囚。当年我自己也曾大声疾呼宣扬这种荒谬绝伦的谬论，以为这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为了自己这种进步，这种“顿悟”，而心中沾沾自喜。一回想到这一点，我脸上就不禁发烧。我觉得，持“小骂大帮忙”论者的荒谬程度，与此不相上下。

上面讲的对胡适的看法，都比较抽象。我现在从回忆中举两个具体的例子。我于 1946 年回国后来北大工作，胡适是校长，我是系主任，在一起开会、见面讨论工作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俩都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什么委员，又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更增加了见面的机会。同时，印度尼赫鲁政府派来了一位访问教授师觉月博士和六七位印度留学生。胡适很关心这一批印度客人，经常要见见他们，到他们的住处去看望，还请他们吃饭。他把照顾印度朋友的任务交给了我。所有这一切都给了我更多的机会，来观察、了解胡适这样一个当时在学术界和政界都红得发紫的大人物。我写的一些文章也拿给他看，他总是连夜看完，提出评价。他这个人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这一点就是拿到今天来也是颇为难能可贵的。今天我们个别领导干部那种目中无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气势我们见到的还少吗？根据我几年的观察，胡适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物。要说他没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实。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一谈到

他有兴趣的学术问题,比如说《水经注》、《红楼梦》、神会和尚等等,他便眉飞色舞,忘掉了一切,颇有一些书呆子的味道,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有一度传言,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连我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也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骗局。可胡适似乎并不这样想,当时他在北平的时候不多,经常乘飞机来往于北平南京之间,仆仆风尘,极为劳累,他却似乎乐此不疲。我看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总印象。

我现在谈两个小例子。首先谈胡适对学生的态度。我到北大以后,正是解放战争激烈地展开、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的时候。北大学生一向是在政治上得风气之先的,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也是如此。北大的民主广场号称北京城内的"解放区"。学生经常从这里列队出发,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镇压,逮捕学生。从小骂大帮忙的理论来看,现在应当是胡适挺身出来给国民党帮忙的时候了,是他协助国民党反动派压制学生的时候了。但是,据我所知道的,胡适并没有这样干,而是张罗着保释学生,好像有一次他还亲自找李宗仁,想利用李的势力让学生获得自由。有的情景是我亲眼目睹的,有的是听到的。恐怕与事实不会相距过远。

还有一件小事,是我亲身经历的。大约在 1948 年的秋天,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北京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蒋介石集团的末日快要来临了。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走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

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地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国民党逃跑。但又不能说他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决不会如此镇定自若,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大骂一通,来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诚。我这种推理是不是实事求是呢?我认为是的。

总之,我认为胡适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在政治上,他有时候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度过的。他晚年决心回国定居,说明他还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因此,说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都不符合实际情况。

解放后,我们有过一段极左的历史。对胡适的批判不见得都正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拨乱反正,知人论世,真正的辩证法多了,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似是而非的伪辩证法少了。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不起的转变。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我为胡适说了上面这一些话,供同志们探讨时参考。

1987年11月25日

祝贺汉语拼音化方案发表三十周年

从长远来看,汉语拼音化对我国的四化建设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国家语委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原来有很多人不了解这一件工作的做法和意义,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疑虑。有的人甚至有抵触情绪。经过了长期的工作,了解的人日渐多了,热情支持的人也逐渐增多。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现象。我希望从事这一项工作的同志们锲而不舍,认真进行工作,期望取得更大的成就。

1988 年 1 月 16 日

赞《中亚学刊》

学术无国界,但在某一些方面却应该有适当的分工。如果同意这个意见的话,关于中亚研究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实际上,却不是这个样子。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中国对中亚的研究,不但没有居世界领先的地位,而且同一些先进国家比较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对于中亚研究,中国本来有很多有利的条件。从地理上来看,中国的新疆就包括在中亚范围之内。再往西南延申的所谓中亚,同中国接壤。从历史上来看,我国古代史籍中有大量的关于中亚的记载,仅在正史“二十四史”中就能够找到很多。中国古代的僧侣和外交家有很多关于中亚的旅行记。晋法显的《佛国记》、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等是其中最著名的,这些书已经成为研究中亚的瑰宝。一直到元、明、清,这个传统并未中断。可惜在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并未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料。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学者反而喧宾夺主,利用中国的史料,写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学术论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端正了思想路线,矫正了过去的僵硬死板的教条主义思想方式。在学术研究方面,也逐渐出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生动活泼的景象。仅就中亚研究而论,我们成立了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又创办了《中亚学刊》。虽然到现在仅仅出了两期,但是它表达了我们的研究方向,充分地体现出“厚重”二字的学风:材料充实,不尚空论,实事求是,力戒浮夸。现在国内学术

界少数学者中流行着一种决不能算是良好的学风:脱离具体资料,专尚所谓“理论”,满篇没有消化的新名词,让人怀疑作者自己是否都能了解。结果是曲“高”和寡,少有反应,一种“理论”之兴飘如疾风,转瞬即逝。庄子说:“蟪蛄不知春秋。”这种“理论”连蟪蛄都不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新理论形成之日,即寿终正寝之时,岂不大可哀哉!

从《中亚学刊》中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多数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一方面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的优良学风,利用了中国古籍中的资料;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和日本学者精通中亚古代和现代语言的作法,同时避免了他们使用中国史料的局限性,合二而一,才取得了这种可喜的结果。我相信,照这样发展下去,我们一定能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中亚研究的学派。

这是我的期望,也是我的信念。

祝《中亚学刊》健康成长。

1988年5月6日

赞通州大顺斋

——居京琐记

也许有人认为，吃喝小道，不登大雅之堂。但是，我却认为，吃喝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有无文化或文化高低的一种表现，实系大道，决非小道。中国烹调技术名扬四海，与中华民族的光辉的文化传统有密切联系。这一点恐怕是中外所公认的。

北京和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有名的食品和酒类。有的有上百年的历史，有的甚至几百年。这些东西受到全国人民的赞赏，在国外也为中华民族争得荣誉。其意义恐尚在乒乓球和围棋之上。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有很多名产，质量不是精益求精，而是江河日下。我个人认为，这与当前的社会风气有关，严格说来，甚至与某些人的民族素质有关。这决无助于为中华增光，而只能为祖国抹黑，可惜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也许有人怀疑我这是“无限上纲”。我不承认这一点。我相信，了解我的心情者必大有人在。

但是最近我偶然吃了几次通州大顺斋的点心。50年前我在北京念书时就曾吃过。我觉得这些点心制作精美，决不偷工减料，小小的几块点心具体生动地表现出大顺斋工人师傅的制作水平，甚至表现出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在当今并不能说是良好的社会风气中成为中流砥柱。这决不是一件小事情。我忍不住要为他们唱一唱赞歌。我们应当大力提倡这种精神，我也希望北京内外的其他名产向大顺斋看齐，不要砸自己名产的锅，而是让名产名副其实。这对当前的社会风气也将是一个针砭。

我最后在这里声明一句:我决非美食家。我平常吃东西比较马虎。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吃喝上,其风格决不算高。但是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我的舌头同别人的一样,不生病时,舌苔并不厚。所以倘是好东西,我也能尝出味道来。我为什么这样声明呢?我以杂家名家久矣,现在如果再戴上一顶美食家的帽子,岂不大可哀哉!

1988年5月12日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我想讲三点意见。第一是对大会的评价。

我听了许多先生的谈话,他们都认为这次会是成功的会。我认为这反映了客观实际。我们过去在开完会后习惯讲什么“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好像一个俗套。但今天我们要说会议是成功的,并非俗套,而有事实根据,这主要表现在:

一,认识了会议的重大意义。许多先生都持同样看法。在来参加会议之前,我并没有认识到会议的意义有多大,经过两天多的会议,认识到这个会的意义非常大。

二,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次小组会分两个组,每组的讨论都各抒己见,大家有什么意见都讲出来了,畅所欲言,大家没有什么保留。中央的政策就是要大家讲话,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这个良好的会风是成功的一个标志。

三,我们对陈寅恪先生的了解加深了。我从30年代就开始听陈先生的课,陈先生的著作几乎都拜读了。可我对陈先生的了解同三天之前比,不是量变,而是质变,对陈先生的了解加深了。

四,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我们有以文会友的优良传统,我们的文是陈先生的学术,以学术会朋友。许多先生的著作我都读过,名字听过,可未见过,而这次都见到了。参加这次会的是老中青学者,这次我们认识了,我相信以后我们还是朋友。

五,小组会的形式灵活。过去我们在国内开会,小组分得很死,指定名字把人员固定到一个小组,这次我们采取自愿的形式,

这样的形式好。

以上五点说明我们的会是成功的,不是一句空话。这个评价是我自己的评价,同时参考了许多先生的意见。

第二,对陈寅恪先生学术或者对其整个人的看法。

就我所听到的,几乎所有到会的人都认为陈先生是个大学者,一代大师,他融合中西,学贯古今,博大精深,爱国,才、学、识都具备等。其中一些学者也有些疑问。刚才黄约瑟先生谈到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但未讲下去,我是否理解错你的意思。陈先生在解放后对马列主义史学是什么态度,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文革前提出,我没有异议,陈先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现在我则不敢说。郭沫若先生,范文澜先生,翦伯赞先生这几位马列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分析判断,和陈先生对中国历史的分析判断,根本区别究竟何在?这很简单,过去可以说,有没有阶级观点,有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区别。阶级本身很复杂,我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意思。近来我有些偏见,对理论毫不感兴趣,因为碰钉子太多了。但我对一个理论信服,即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劳动价格与价值"的理论,我觉得分析得细致入微,很能说服人,讲历史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这能说服人。我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才是理论,我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我是否定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现在的理论太多了,如果搞一点考据有人则瞧不起你。陈先生从未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会上的报告中间,占一半的先生认为陈先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这就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这可能高了,但我说不出高在哪里。世界学术史上,不管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一个学者如果是实事求是的,有良心的,他就必然是唯物主义者。一个人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可能不是。他不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

者,但可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总讲陈先生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唯物主义。关于陈先生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建议,史学界的先生们,将前面所谈到的郭老、翦老、范老等几老对待一个简单问题的分析,和陈先生的分析研究一下,看看究竟差别在何处?是不是除了马列主义之词句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如果陈先生的方法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也应实事求是,那么对一问题的研究不会产生两种可能。我认为值得研究。

第三,我们今天从陈寅恪先生那里究竟能学习什么东西。

我们开这个会,有的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有的不远万里而来,说明我们开这个会意义重大。汪荣祖先生讲得好,我们现在只是开始,不是终结。我现在主要对青年学者讲几句话,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通过这个会,我们,特别是青年学者从这次会中应学到什么东西。中国有句老话,“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是一个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社会永远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任何人,都只能是环节中的一环。打一个比喻,跑接力赛,我们跑一阵,把棒递给你们,你们再跑下去。我听说有的青年人开玩笑说,要打倒老家伙。我现在说,你们不要打倒我们,否则等你们年龄大了,别人也要打倒你。我们手里都有接力棒,谁也不是开始,谁也不是终结。可是我们承认,年青人比我们好,否则人类就不能进步。我们走在前边,年青人在后边跟来。你们一定要超过我们,不超过我们,原地踏步走,踏两万年也不能进步。因此,我对年青同志讲,将来我们把棒交给你,你要跑了,将来你要交给你的学生,你应该比我们强。我们应该为你让路,创造机会,不能做绊脚石,老人容易保守,但年轻人要警惕骄傲,要互相学习,谁也不要打倒谁,老的学者要为年青人开路,作先锋,年轻人要认真学习老人的优点。

我谈一谈人超越问题。超越陈先生并不简单。整个社会是在

发展,是在前进,这是一般的情况。但是中间应该有一些例外,一般来讲,后人要超越前人,但是那些高峰、巨人在某些方面是超越不了的。主要原因是环境不允许再出那样的人。马克思讲希腊神话有永久的魅力,理由在此。陈先生是学术巨人,在他的范围之内无法超越,原因就是我们今后不可能再有他那样的条件。总的倾向是可以超越的,但又不可以超越。我同意汪先生的观点,又可以超越,又不可以超越。

我个人认为通过这次会,年轻人可以向陈先生学习的东西,可归纳为六句话:

一,不泥古人,不做古人的奴隶。陈先生不做古人的奴隶,我希望年轻人也不做古人的奴隶。

二,跟上时代。陈先生最大的特点是“预流”,“预流”就是跟上时代潮流,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新学问,王国维先生也是这样讲的。他讲有新材料有新学问,新材料是主要的,但我认为完全归于新材料上也不一定准确。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潮流,学者应赶上潮流,赶不上潮流,则要落伍。要预流,必须跟上时代。陈先生是跟上时代的,现在的时代潮流我说不清楚,主潮是什么东西,我谈不出。现在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名词多,内容少,新名词是必要的,问题是吸收外来东西,光吸收名词不行,重要的是吸收内容。现在的年轻人应踏踏实实,学术要讲道德,自己不懂的不要愚弄别人。现在有很多人写文章时,引别人的书不讲出处,这是不好的学风。

三,实事求是。它牵涉考证问题。我受了些影响,喜欢考证。陈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是考证。对考证如何看是一个问题,现在的年青人最讨厌考证。胡适先生非常注重考证。读书,首先要看懂,考证,有时是看懂的必要手段。研究任何问题,特别是历史,必须要走的第一步是要看懂文章,看不懂文章,任何现代的主义都没

有用,要看懂文章,非要考证。年青的同志对考证不要讲得太神,也不要全盘否定,这条路是不能逾越的,否则出笑话。

四,独辟蹊径。前人走的路你不要走,一定要开辟新道路。陈先生在他涉足的领域都有新见解,而且他写文章有一个大的特点,没有水分,开门见山谈问题,花言巧语他不讲。

五,关心时事。对陈先生很难得,他非常关心时事,当我们解放初一边倒时,陈先生写诗表示忧虑。当原子弹上天时,陈先生非常兴奋,他认为我们有力量摆脱外国人的控制。

六,热爱祖国。这一点很清楚,用不着多说。

以上几点都是陈先生身上具备的,也是我们应该向陈先生学习的。

1988 年 5 月 28 日

再谈考证

不久以前,我在本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为考证辩诬》,目的是想为清代考证之学说几句话,顺便发泄一点对当前理论界的不满。在文中我讲到,我不同意多少年来流行的说法,说清代考证之学之兴与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之狱有关。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有点教条主义的味道,是一种形而上学,与我们几十年来在理论方面的教条主义有关。

这引起了王武子先生不同的意见。他的文章已经发表在本刊1988年第8期上。王先生的文章对我有启发。但是他把考证之学与文字狱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的说法,并不全面,不准确,仍然不足以服我。因此我再申论一下。

我在上一篇文章里已经谈过,如果清代的文人学士只是想逃避文字之狱的话,他们不一定专门从事考证之学,其他离文字较远的学科都可以搞,甚至任何学科都不搞也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古有明训。考证之学决不能成为他们的避风港。有一点,我在那篇短文里没有点明:清代考证之学之兴是由中国学术历史的发展规律促成的,是由内因决定的,而不是文字狱等外因。

想证明这一点,用不着旁征博引,只需根据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稍加申述,就完全够了。我不敢说,梁的论点是百分之百地准确、完善;但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他首先讲到时代思潮,他说:“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的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他的意

思是说,考证之学是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上时代思潮之一。如果承认这个观点,则应该从宏观方面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囿于有清一代的文字狱等。

梁启超对于这个问题又进一步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在中国学术史上,"学派上之'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与'冥证',每迭为循环。大抵甲派至全盛时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动,而乙派与之代兴。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动亦然。……唐代佛学极昌之后,宋儒采之,以建设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至明而全盛。"全盛之后,流弊斯出。梁启超把这种流弊归结为两点:一曰遏抑创造,二曰奖励虚伪。清学起而矫之。他说:"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极简略地说,梁启超就是这样解释清学之兴的,而清学的代表就是考证之学。我觉得,这样从学术发展规律上来说明清代考证产生的原因,理由是充足的,是能够说服人的。

梁启超又把每一个思潮之流划分为四个时期:一、启蒙期;二、全盛期;三、蜕分期;四、衰落期。把这四个时期的分法应用到清代思潮上,他认为启蒙期的代表人物是顾炎武、胡渭、阎若璩;全盛期的代表人物是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至于蜕分期与衰落期与我现在要谈的问题无关,这里不谈了。在第一、二两期中,梁启超又把全盛期的代表人物名之为正统派。他说"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论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梁启超在这里讲的就是清代考据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内容。

我在上面只是非常简略地介绍了一下梁启超对于清代考证的论述。读者倘有兴趣,可以自己去读他的原著,我不再介绍了。总

之,我认为,梁启超的看法是可信的。因此,清代考证之学的兴起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因所决定,与文字狱之类的外因无关。这就是我的看法。

1988年6月9日

论书院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中国是唯一的有长达几千年的延续不断的教育传统的国家。这个传统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到了十九世纪末年，终于来了一个大转变：西方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传了进来，到现在也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这个新教育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虽经改造，基本上被保留下来。它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不能说完美无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重新对中国古今教育制度做一个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检查，显然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检查目前还只能非常简略。

一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制度[1]

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制度，从组织结构上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官，一私。远古时期，渺茫难窥，这里不谈。公元前三千纪末到二千纪中，夏代已有"庠"、"序"、"校"三种学校。到了公元前二千纪中叶至末叶的商代，又增加了"学"和"瞽宗"。"学"有大小之分。除了训练学生祭祀和打仗之外，还进行读、写、算的教学。西周集前代之大成，初步具有了学制系统。学制系统分国学与乡学两类。国学是中央官学，乡学是地方官学。国学分大学与小学两级。大学中有天子设立的五学和诸侯设立的泮宫。乡学中有塾、庠、序、校之分。这样一套制度对其后的中国教育有深远的影

响。我国古代一直沿用此制,稍加变化,改换一些名称。西周国学的教育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三德、六行、六艺、六仪,其中六艺是最基本的。所谓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从字面上也可以看出来,这里面文武兼备,知识与技能并举。这种教育制是密切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乡学以社会教化为务,内容有六艺、七教、八政以及乡三物等。总之,西周的教育已由殷商的宗教武士教育,转变为文武兼备的教育。

秦代实施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文教政策,是学校教育的一个倒退。

到了西汉,汉武帝正式制定了博士弟子员制度,兴办了太学。这在教育史上是一件大事。汉代官学分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两类,这里明显地受了西周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官学时兴时废。

到了唐代,在初唐的一百多年内,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成为世界上一个,也许是第一个强大的帝国。统治者对教育特别重视,官学达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为以后的官学制度奠定了基础。这时的官学仍然分为两级: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与前代不同之处在于组织更细致了,内容更丰富了。中央官学中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都专修儒经。这可以说是唐代教育的主干。此外还有专修律学、算学、书学的学校,医学校,卜筮学校,天文、历算、漏刻学校,兽医学校,校书学校等等。另外还有一些特殊学校。所有这些学校目的都是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在教学行政方面,唐承隋制,设立国子监,管理六学,以祭酒为教育最高长官。国子监的职能一直保留到清代学部成立。不过明清两代,国子监常与国学、太学混称。

宋代的官学对学生入学资格逐渐放宽,教育对象不断扩大,学校类型增加了,教学内容扩大了,增设了武学和画学。

元代对我国古代地方官学有特殊贡献,创设了诸路阴阳学,发展了天文、历算等科技教育。又创设了社学,以满足农业的需要。此外还创设蒙古国子学与回回国子学。

明承元制,仍设社学,但以教化为主。国子学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地方官学,除治经外,礼、乐、射、御、书、数还设科分教。

清代教育制度多承前代旧制。国子监生的对象范围比以前更宽。地方官学比较普遍。教学内容仍以儒家经典为主。另设觉罗学、旗学、土苗学等等。雍正、乾隆还设有俄罗斯学馆(堂),教汉满子弟习俄文。

我在上面简略地讲了我国古代的官学制,现在再讲一讲私学制。

古代私学包括家传与师授两种,起源极早。但是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则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发展给私学奠定了经济基础。又由于复杂的政治斗争,需要兴私学,养士人。此外,文化下移也推动了私学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私学在全国各地兴起,到了孔、墨两大显学崛起,私学发展如日中天。由此而形成的儒、墨两大学派互相攻伐,支配中国思想界达数百年之久。战国中起,百家争鸣,诸子私学蜂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时代之一,影响深远。

到了汉代,经师讲学之风特盛。东汉私学学生人数超过太学。汉代官学和私学各有偏重,官学以今文经为主,而私学则以古文经为主,东汉末出现了综合今古的趋势,郑玄为代表。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稍衰,但仍盛于官学。

隋唐之际,官学繁荣,私学也极发达。隋王通私人讲学,唐代开国名臣中有一些人就出王通之门。唐代有的学者身在官学,却又私人授徒。

宋代私人讲学极为发达。南宋书院大兴。书院原为私学性

质。但是,元明清书院渐有官学性质。到了后来,有的遭禁毁,有的沦为科举预备场所。

二 书院的滥觞与发展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但并非中国所专有。我认为,古代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师徒授受的所在地叫 akademe,也是一种类似中国古代书院的组织,只是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发达而已。书院以私人创造为主,有时也有官方创办的。其特点是,在个别著名学者领导下,积聚大量图书,聚众授徒,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从唐五代末到清末有一千年的历史,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要读中国教育史,要研究现在的教育制度,应着重研究书院制度。从这个研究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书院这个名称,始见于唐代。当时就有私人与官方两类。在最初,书院还仅仅有官方藏书、校书的地方;有的只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清代诗人袁子才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但是,唐代已有不少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传》中提到的有 11 所。这些也只是私人读书的地方。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起源于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庠,地址在江西庐山,为著名的白鹿书院的前身。陆游的《南唐书》中有关于庐山国学的记载。总起来看,聚众讲学的书院形成于五代末期。有人主张,中国的书院源于东汉的“精舍”或者“精庐”,实则二者并不完全相同。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但还没有充足的力量来兴办学校,于是私人书院应运而起。庐山国学或白鹿国庠,发展为白鹿洞书院。

接着有很多书院相继创建,有四大书院或六大书院之称。除白鹿洞书院外,还有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和茅山书院。

到了南宋,书院更为发达。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主要教育机构。南宋书院发达,始于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后来朱熹又修复和扩建了湖南岳麓书院。书院之所以发达,原因不外是理学发展而书院教学内容多为理学;官学衰落,科举腐败;许多著名学者由官学转向私人书院;印刷术的发展提供了出书快而多的条件,而书院又以藏书丰富为特点。有此数端,书院就大大地发展起来了。

元代也相当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奖励学校和书院的建设。不但文化兴盛的江南普遍创建或复兴了书院,连北方各地也相继设立了书院。但书院管理和讲学水平都很低。

到了明初,情况又有了改变。政府重点是办理官学,提倡科举,不重视书院,自洪武至成化100多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成化(1465—1487年)以后,书院才又得复兴。至嘉靖年间(1522—1566年)达到极盛。明代书院由衰到兴,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学大师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宣扬他们的理学,他们所到之处,创建书院。明代末年影响最大的是东林书院。在这个书院里,师生除教学活动外,还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这当然受到统治者的迫害,天启五年(1625年),太监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兴起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迫害东林党人的大案。

到了清初,统治者采取了对书院抑制的政策。一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才令各省会设书院,属官办性质。以后发展到了2000余所,数量大大超过前代;但多数由官方操纵,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因而也就没有活力。也有少数带有私人性质的书院,晚清许多著名的学者在其中讲学。

统观中国1000多年的书院制,可以看到,书院始终是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统治者既有调和,又有斗争。书院这种形式还影响了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

这样的书院制有些什么特点呢?毛礼锐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对中国书院的特点做了很好的归纳。我现在简要地叙述一下。他认为特点共有五个:

1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书院最初只是学术研究机关,后来逐渐成为教学机构。教学内容多与每一个时代的学术发展,密切联系。比如南宋理学流行,书院就多讲授理学。时代王守仁等讲一种新的理学"心学",于是书院也讲心学。到了清代,汉学与宋学对立,书院就重经学,讲考证。

2 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

在南宋,朱熹和陆九渊代表两个不同的学派。淳熙二年(1175年),两派在鹅湖寺进行公开辩论。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自己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去讲学,成为千古佳话。明代"讲会"之风更盛。王守仁和湛若水也代表两大学派,互相争辩。这种提倡自由争辩的讲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

3 在教学上实行门户开放

一个书院著名学者讲学,其他书院的师生均可自由来听,不受地域限制和其他任何限制。宋、明、清三代都是如此。

4 学习以个人钻研为主

书院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非常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宋、元、明、清一些大师提出了不少的读书原则。有的编制读书分年日程。有的把书院的课程分门别类,把每天的课程分成若干节。他们都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导师决不提倡学生死记硬背,而是强调学生读书要善于提出疑难,鼓励学生争辩,教学采用

问难论辩式。朱熹特别强调:"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吕祖谦更提出求学贵创造,要自己独立钻研,各辟门径,不能落古人窠臼。总的精神是要学生不断有发明创造。

5 师生关系融洽

中国教育素以尊师爱生为优良传统。这种精神在私人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书院属于私人教学的范畴,所以尊师爱生的传统容易得到体现,在官办学校中则十分困难。朱熹曾批评太学师生关系:"师生相见,漠然如行路之人"。他指出,其原因在于学校变成了"声利之场",教学缺乏"德行道艺之实"。他自己身体力行,循循善诱,对学生有深厚感情。但是,他对学生要求极严,却不采取压制的办法。他说:"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夫理义不足以悦 其心,而区区于法制之末以防之,其犹决湍之水注千仞之壑,而作翳萧苇以捍其冲流也,亦必不胜也。"(见《晦菴文集》,卷 74)这些话到了今天还很值得我们玩味。明代王守仁也注意培养师生感情。明末的东林书院,师生感情更是特别深厚。

上面我撮要叙述毛礼锐等的对书院特点的五点总结。在组织管理方面,书院也有特点,如管理机关比较精干,经费一般能独立自主等等。

三 新教育制度的兴起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加强,随着清代封建统治的日益腐朽,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中国有识之士就痛切感到,中国的政治经济等非改革不行,教育当然也在改革之列。魏源认为,理学"上不足致国用,外不足靖疆国,下不足苏民困",简直是一点用处都没

有。他主张向西方学习,改造中国的传统教育。魏源以后直至 19 世纪末叶,有不少人说八股文无用,主张翻译外国书籍,引进外国制度。洋务运动兴起以后,新教育也随之而兴,创建新型学校,设立同文馆,学习外国语文,开展工业技术教育,创办船政学堂、机器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水陆师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1898 年百日维新以后,设立京师大学堂,为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又逐渐废科举,废八股文。经过了许多波折,以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为模式的中国新教育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在中国教育史上开辟了新的一章。

四　书院在今天的意义

我在上面非常简略地叙述了中国几千年教育发展的历史,从奴隶社会,经过封建社会,一直讲到近代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影响的新教育制度。我着重讲了书院制度。到了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教育已经超越了封建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中国历史上的书院在今天还有意义吗？为什么最近几年来又出现了书院这个名称和组织呢？这是一种倒退呢,还是一种进步？这一些都是我们非思考不行的问题。

为了说明问题,我先举一个眼前的例子。1984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一些教师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没有接受政府一文资助,在不长的时期内就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书院团结了一些大学和社会科学院以及其他机构已退休或尚未退休的教授和研究员;同台湾学者加强了联系;同海外华裔和非华裔学者建立了经常的巩固的关系;开办了一系列的讲座;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建立了口述历史和为老学者录音录相的机构,等等。建立一个藏书丰富的专业图书馆的工作也正在进行。

全院的同仁们正在斗志昂扬地从事书院的建设和开拓。这样的成绩当然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以书院命名的机构接踵兴起,形成了一股“书院热”。这些书院的举起是否就是受了中国文化书院的影响,我不敢说,它们的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只想指出,有这样多的书院已经建立起来,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思考而已。

为了回答我在上面提出的有关书院的问题,我现在想结合古代中国书院的那些特点和当前中国文化书院的经验,谈一谈书院在今天的意义。我想从六个方面来谈:

1 书院可以成为当前教育制度的补充

我国今天的教育制度,从内容上来看,应该说是社会主义的。但是从组织上来看,基本上是西方那一套。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封建主义那种小批量培养人才的方式,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我们只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批量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须要有严格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学分计算、教学组织,一切都要标准化、计量化。资本主义国家大学里计算学分的办法,一方面能比较精确地确定学生的学习量,满了一定的学习量才能毕业;另一方面也用来确定教师的教学量,以便取得报酬。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金钱问题所决定的。我们之所以采用这种制度,当然不是为金钱问题所左右,而是为了适应大批量培养人才的需要。

仅仅采用这样的制度够不够呢?我认为是不够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办教育一向是官、私两条路,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两条腿走路吧,两者互相补充,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一条腿,只剩下官方一途,私人教育基本上不存在了。我个人认为,这无疑是一个损失。在过去执行这个政策,道理还能讲得通。今天在大家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国家又正在进行改革,

在教育方面是否也可改革一下呢?如果可以的话,提倡创办书院,鼓励私人办学,继承我国的优秀传统,实在是可以试一下的。

书院这种形式能适应今天的情况吗?我不妨先举一个例子。清华大学在建成大学以前是留美预备学校。到了20年代初,又创办了一个研究国学的机构,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这也是一种双轨制:一条轨道是西方式的新制度,有严格的教学计划,开设课程,计算学分,规定毕业年限,决定招生办法,都按计划进行。另一条轨道是什么计划也没有,招生和毕业都比较灵活。在一所学校内实行两套办法。如果想做比较研究,这实在是最好的样板。比较的结果怎样呢?正规制大学大批量地培养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干部,也出了一些著名的学者、教授。那个不怎么正规的国学研究部门,培养出来的人数要少得多,但几乎个个都成了教授,还不是一般的教授。这个结果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清华的国学研究部门无书院之名,而有书院之实。它不能算是私人创办的,其精神却与古代书院一脉相通。另外一个例子是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的国学研究所,也培养了一些人才。我在这里举的例子都属于国学范畴,其他学科我认为也是可以尝试的。这说明,私人办的书院在今天仍有其意义。古代书院那一些优良传统,比如说讲会制度,提倡自由争辩,门户开放,注意培养学生独立钻研的能力,师生关系融洽,等等,我们在书院中都应该继承和发扬。只希望我们教育当局找出一种承认书院学生资格的办法,不用费很大的力量,培养人才的数量就可以增加,质量也可以提高。何乐而不为呢?

2 书院可以协助解决老年教育问题

据说现在世界上有一个新名词,叫做“终生教育”。中国的成人教育有一部分同它类似,但似乎不包括老年教育,所以二者不完全相同。外国许多老人,在退休之后,到大学里报名入学,读硕士

或博士学位。中国还没听说有这种情况。但是,今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大大地提高,老人将会越来越多。有朝一日,老人教育也会成为问题的。我认为,书院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3 书院可以发挥老专家的作用

中国人平均寿命越来越高,老教授、老专家退休后活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这是件好事,但也带来了新问题。这些老教授、老专家退休后作用如何发挥呢?方法当然有多种多样,有的可以继续著书立说,有的可以当顾问,有的可以联合起来,搞一些社会福利事业。但是,没有适当的机构加以组织,他们的作用发挥有时会碰到困难,交流信息也会受到障碍。在今天社会上想单枪匹马搞出点名堂,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在这里想特别提一下博士生导师的问题。这些导师绝大部分都是有真才实学的,而且是经过了一定的选举和审批手续,才获得博士导师的资格的。他们到了年龄退休以后,有的为本校或本研究院返聘,继续指导博士生。但是也有一些,由于种种原因,拒绝返聘,不接受指导博士生的任务。现在全国博士生导师为数不多。老的退休了,新的上不来。许多大学都面临着这种青黄不接的局面。中年博士生导师,有的也有相当高的水平;可是在某一些方面,一时还难以达到老专家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让一些有能力的老教授老专家投闲置散,对国家是一个损失。这样下去,对我国博士生的培养工作是非常不利的。倘若有一些书院一类的机构,退休老教授乐意在里面工作,乐意指导研究生,岂非两全其美?中国文化书院就有这样的导师,可惜格于现行的制度,他们无法指导博士研究生。如果有关当局本着改革的精神,授权给某一些有条件的书院,让已经取得带博士生资格的老教授老专家在这里指导博士生,对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不是一个大贡献吗?我个人认为,将来培养博士或博士后的任务可以分一点给书院。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应该承认这样培养出来的博士的资格,并且一视同仁地发给证书。这样一来,国家出不了多少钱,既调动了退休老教授老专家的积极性,又培养了高级人才,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岂非一举数得吗?

4 书院可以团结海内外的学者

中国文化书院聘请了一些学有专长的导师,已经退休的和尚未退休的都有;海内外的学者都有,不限于华裔。同时也不时邀请海外学者来院做学术报告或参加座谈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学者中也有台湾学者。这在当前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不言而喻。这样的工作由政府机构出面来做,不如由民间机构。原因是,这样可以绕开台湾当局制造的一些困难。海峡两岸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祖国统一。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来大陆的台湾学者,同大陆的同行们,共同在学术上切磋琢磨,互相启发,不谈政治问题,而心心相印。

5 书院可以宣扬中国文化于海外

中国有极其悠久、极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对全世界文化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近代以来,我们开始向西方学习,这是完全必要的。到了今天,我们强调开放,其中包含着向外国学习,这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既然讲文化交流,就应该在"交"字上做文章。这并不等于要等价交换,出和入哪一方面多了一点或少了一点,这无关重要。但是,如果入超或出超严重,就值得考虑。以我的看法,现在我们是入超严重,出几乎等于没有。难道我们都要变成民族虚无主义者吗?现在世界上许多文化先进国家对我国的文化,特别是近现代的文化了解得非常少,有时候简直等于零。这不利于国际大团结,也不利于我们向外国学习。可惜这种情况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中国文化书院任务之一,就是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化,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后还将坚持不懈地继续做下去。我们

决不搞那一套什么都是世界第一,那是自欺欺人之谈。但也决不容许中外不管什么人士完全抹煞中国文化的精华。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6 书院可以保存历史资料

从中国文化书院的经验来看,书院可以在保存历史资料方面做不少的工作。中国文化书院目前正在进行的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有两项:一是记录口述历史;一是为老学者老专家录音录相。这都是有意义的工作,还带有点抢救的性质。这里的工作对象当然不是什么国家显要人物。但是难道只有国家显要才有被录音录相的资格吗?为这些人进行这样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完全拥护。为并非显要而在某一方面有点贡献的人,进行这样的工作,也自有其意义,这也是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所不可缺少的。

我在上面从六个方面谈了书院在今天的意义。当然不会限于这几个方面,我不过目前只想到这些而已。归纳起来,我们这样说,在中国流行了1000年的书院这种古老形式,在今天还有其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这个形式,加入新的内容,使它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88年6月24日写完

注释

〔1〕这几节的论述主要根据毛礼锐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1984年,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8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我宣布：一九八八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开幕。同学术讨论会同时举行的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我们要换届选举新的领导班子。

今天到会的有：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中顾委委员、学会顾问周林同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复三同志、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孙铁青同志。另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来的贵宾也出席了我们今天的会议。三是全国许多省市来的会员代表。四是列席的许多国内外的朋友。用一句中国现成的话说，就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胜友云集，济济一堂。首先，让我代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向各位不远千里甚至不远万里而来的朋友们、有关部门的领导、全国来的代表们表示衷心的欢迎和诚挚的谢意！

我们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是在五年前举行的，五年来，我们召开过几次学术讨论会，其中也有国际学术讨论会，如香港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参加了。我们的一些分会也召开过一些学术讨论会。在过去的五年中，无论是全世界，还是我们全中国，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专就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而论，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同行们之间来往比以前频繁了。通过国内外几次学术讨论会，大家有了越来越多的见面的机会。

二、信息交流加强了。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的社会，研究敦

煌吐鲁番学也不例外,国内的同行普遍感觉到,我们现在更耳聪目明了,这大大有利于研究工作的进行。

三、新材料整理日益增多。过去我们明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材料,但是却无法获得,现在这一方面的困难大大地减少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刊布一些新材料。

四、著作数量增加了,质量提高了。过去五年,国内外都出版了许多专著和论文。从这些专著和论文来看,内容更深刻了,范围更大了。宏观的概述,微观的探讨,百花齐放,各极其美。

五、在过去五年中,在敦煌吐鲁番学中,接触到许多过去没有接触的新问题,这从过去五年发表的论文、著作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六、同行之间的友谊增强了。今天,在座的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同行们,大家坐在一起,进行学术讨论,各抒己见。中国古话说:“君子以文会友”,我们现在就是以敦煌吐鲁番学之文来会友。

时至今日,越来越明显了,任何学问都是国际性的,敦煌吐鲁番学也不能例外。敦煌吐鲁番在中国,但是敦煌吐鲁番学却在全世界。各位学者来参加我们的会,既是雪中送炭,又是锦上添花。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通过这次学术讨论,上面提到的六项将会越来越提高,越来越发展,一定会加强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有助于增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的力量。我们这一门学问将会更加有成绩,我们的前景无限美好,这一点我们是深信不疑的。谢谢大家。

1988年8月15日

1988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代表：

我们学术讨论会一共开了六天，就要结束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内代表共有一百八十一人，其中正式代表一百二十人，列席代表六十一人，外国来宾二十八人，来自八个国家。大会共收到论文一百三十九篇，其中国内代表提交一百二十三篇，国外来宾提交十六篇。

在会议期间，各组本着畅所欲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组织了报告和讨论。不同的学术观点之间展开了争论。如语言文学组关于诗人王梵志有三派不同意见，艺术组对敦煌舞谱残卷的研究也有三种不同意见。有争论是好现象。据我观察，不同的观点碰到一起，大家一商讨，就会提高一步。历史组和其他组也都讨论得很热烈。少数民族历史语言和宗教组中有的同志提出要成立宗教分会，经过常务理事会讨论，同意他们成立。

大会期间，音乐分会的董锡玖、高金荣等同志还为我们组织了“丝绸之路”舞蹈晚会，一共演出了三场。在晚会上，戴爱莲等著名舞蹈家为我们作了精采的表演。日本的著名舞蹈家花柳千代、芙二三枝子等也给我们表演了日本现代舞——行列。这些精采的表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剧场气氛十分热烈。应该说，“丝绸之路”舞蹈晚会为我们这次会议增添了光彩。

另外，我们还组织代表和来宾们参观了被称为“北京的敦煌”的房山云居寺。我们的会议虽然安排得比较紧张，但因为有晚会，

有参观，所以，还不显得枯燥。

总之，我们这次会议是成功的，据代表和来宾们反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质量比八三年和八五年两次讨论会有所提高。会议期间，代表和来宾们很讲礼貌，团结得很好，所以，我们的会又是一个团结的大会。

在开幕式上，我讲过，“敦煌吐鲁番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世界”，这个提法得到教委领导和外国朋友的肯定。我的这个提法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世界上任何一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关起门来是干不好的。敦煌吐鲁番学也不能例外。在这次会议中，一些日本学者对中国的青年学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看到中国青年学者的成长感到十分高兴，这是十分可贵的。同样，我们中国学者看到日本青年学者的成长也十分高兴。这和爱国主义一点也不冲突，因为我们这门学科是国际性的。只有大家有这个雅量、胆识，这门学科才能发展。所以，我们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就是“敦煌吐鲁番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世界”。今后，我们也应用这个精神来指导我们学会的工作。

我们这次会议在组织安排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住在党校的同志一度在生活方面有安排不周的地方，对外宾也有照顾不周的地方等等。这些问题希望代表和来宾们能够原谅。

我们这次会议能够取得成功，首先要感谢国内外专家不辞辛劳来参加我们的会。要感谢国家教委对我们的领导和支持。特别要感谢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他们承担了繁重的会务工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会很难开成。还要感谢北京图书馆，提供了这样好的地方让我们开会。

最后，希望将来在别的地方再开这样的会，不管新朋友、旧朋友，我们希望以后再见面。希望大家散会后能够平安回国、平安回家，后会有期。

谢谢大家。

1988 年 8 月 21 日

编写东方语言教材的经验与教训

回顾30多年来编写东方语言教材的过程,我总的感觉是:教训多于经验。教训看起来似乎是消极的东西,但是只要敢于正视,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它也就能变成积极的经验。如果不敢正视,怕揭疮疤,则消极的东西会变为更消极。之所以产生了这样多消极的东西,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受了僵化的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影响,片面地理解政治标准第一这个口号。同时又见异思迁,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轻率地频繁变动。结果是,学校、系、教研室各级领导,以及全体教员,经常忙于编写教材;但是,到头来,没有留下多少能够使用的教材。

基础外语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掌握外语的基本能力,这应该说是最普通的常识。然而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混淆了外语课与政治课的界限,把外语课当成了政治课,片面地强调政治标准。教外语课要不要有政治标准,当然要有,这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这里有一个主次之分,先后之分。学外语,首先要掌握它的基本语法、基本词汇,要练好发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巧训练。政治标准在这里仅仅是次要的。如果喧宾夺主,把政治标准放在绝对统治的地位上,有时候就难免要牺牲外语技巧方面的训练。为了硬灌入政治内容,学一些汉语式的外语,结果是外语没有学好,政治内容也决起不到期望的那种作用,可以说是两败俱伤,这是我们惨痛的教训。

就拿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来说,在过去30多年内,我们

编写了不少的教材,想努力做到政治标准第一,可是这个政治标准实在很难掌握。其中有比较固定的东西,比如,拥护共产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克服个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频繁的政治运动,此伏彼起,从无宁日。每次运动一起,口号多少有所不同。我们的教材必须努力配合,编教材是一个细致的、科学性很强的工作,不能像用高压锅煮饭那样,要求立刻就熟。结果是我们的教员天天在忙着编教材,选教材,还是跟不上形势。有一度甚至打破中外教外语的常规,不让学生先学会字母,而是以"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句子开始。据说,这句话有神奇的力量,学生一念,忠心顿生,灵感立至,不费吹灰之力,外语即可学好,比道士的符箓威力大多了。可是事实怎样呢?事实是,我们忙忙碌碌,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教材随编随丢,完整地留下来的非常少。有时候还不得不临时抱佛脚,发油印教材,学生称之为"传单式的教材"。

下面分别谈几个具体问题。

一　选材问题

专就东语系来说,所修语言的国家几乎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作家,除了少数共产党员外,都是资产阶级分子。选他们的作品真是难上加难。他们的世界观当然是资产阶级的,而这样的世界观同我们的是根本对立的。即使是那里的共产党员,看法也不一定同我们长期流行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完全一致。可是又不能不选他们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语言地道,比我们自己写的要好。在这样的情况下,编选教材的人真是困难重重,山重水复,没有出路。我们还碰到一个现在看来是笑话的问题。我们不敢选活人的作品,不管他现在是多么进步,多么合我们的口味。因为一个

人的政治态度难免改变，他今天进步，你能保他明天进步吗？他明天一“反动”，或者仅仅说上几句对新中国批评的话，他就会立刻被打入另册。如果我们教科书中选了他的作品，这作品必须删除，决不能让它再留下“放毒”。印好的教材也不许再发。因此，我们就得到了一条经验：活人的作品一概不选。实际上，死人也并不能保险。在历史上盖棺也不能论定的人还少吗？可是，我们再也顾不了这样多，反正只要你还活着，你的作品我就是不选，想要进入中国教材，必须先去见上帝。

笑话还没有到此为止。忘记了是在哪一年，阿拉伯文专业的教师选了一篇一个阿拉伯国家著名作家写的描绘介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世界闻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文章，语言生动流畅，描绘色彩绚丽，的确是一片好文章。里面一点也没有涉及政治内容，学生读了，不但能学到地地道道的阿拉伯语，而且还能通过对自然风光的欣赏提高自己爱美的情趣。然而却出了问题。有人提出异议：把一个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风光描绘得这样美丽动人，不是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吗？于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我这个系主任也不能不出面干预，特别请人把此文译成汉文，供大家讨论，供领导参考。试问：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风光为什么就不许美呢？难道只有无产阶级国家的山山水水才能美吗？资本主义国家的美丽山水能把我们的青年学生拉回到资本主义去吗？这些问题都是不难回答的。可是在当年，也包括我自己在内，竟都严肃认真地讨论起来了。我们常说欧洲中世纪的神学讨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非常可笑。我们讨论这样的问题同欧洲中世纪又有多大差别呢？

二 谈一下教学计划问题

要不要有一个教学计划?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关键是要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是要一个比较稳定的计划呢,还是要一个随时变动的计划?教学计划的变动是难以避免的,但不能年年变动,或者一两年就变动一次。我们东语系(北大别的系恐怕也一样)的教学计划恰恰是变动非常频繁的。我领导东语系的行政工作前后将近30年。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时时都在制订教学计划中。我没有做系统的统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哪一个计划执行过一个全过程,四年或五年。计划屡次改变的原因,我现在也记不那么详细了。改变的动力都是从上面来的,学校不过是执行教育部的命令,而我们又执行学校的命令而已。每一次改变教学计划,都有一套大道理。我们首先要学习领会。等到我们能"掌握精神"了,然后再往下贯彻。于是系和教研室还有全体教员都忙得团团转。不知道要开多少会,花多大力量。最后一个新的教学计划制订好了。还没有实行多久,上面又来了新精神,我们又要从头开始团团转了。

教学计划的不稳定迫使教材也不能稳定。

三 关于教学方法问题

外国语言的教学方法,同别的学科的教学方法一样,包含着传统与革新两部分。随时都有可能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的教学方法却变动得太频繁了,变动的幅度也太大。

在"一边倒"时期,我们的外语教学,包括教学法在内,也是一边倒,我们迷信苏联。不管苏联的什么东西,我们都认为是"社会

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语教学法,我们自己在长时期内经过考验行之有效的教学法,一律贬之为资产阶级的。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只要苏联有什么新玩意儿,我们立刻就响应。最明显的例子是拉赫曼诺夫教学法。我们闻到一点气气儿,就立刻领会、学习、实践,全系搞得热火朝天。过了没有多久,又来了什么直接教学法,于是又领会、学习、实践。甚至派人走遍全国去学习、取经。过了没多久,又给分析词汇所代替。

总之,在教学方法方面,同教学计划一样,总是稳定不下来。当然教材也不会稳定。

四　谈一谈选材问题

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家都感到教材有稳定 的必要。于是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以周扬同志为首的大学文科教材编写组。我担任了外语一组的组长。在当时政治标准第一的口号下,选材非常困难。周扬同志把材料分为三类:有益的、无害的、有害的。有害的不选,不在话下,有益的当然要选,也不在话下。但是,什么叫“有益”呢?在当时教条主义支配下,自我束缚,把“有益”的范围搞得非常狭窄,可以选的东西非常少。至于无害的则是大量的,比如描绘自然风光的文章,描写亲子之情朋友之情的文章,描写所谓“身边琐事”的文章,等等。读了这些文章以后,确实无助于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但又确实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增添生活情趣。在今天看起来,这也是“有益的”。然而,在当时,因为这些文章缺少政治说教,所以,是不容许的。在十年浩劫期间,周扬同志被打成文艺黑线的头子,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反动的,他领导的大学文科教材编写组当然也是反动的。为此他受到了批判。我自己在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之外,又加上了一条:周扬的走卒。因此又多增加了

几次批判。一直到浩劫高潮已过,我仍是批判的靶子,陪“革命群众”到了延庆县的新华营,还被推上批斗台,听革命英雄们嚎叫。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总结过去编写外语教材的经验。但是,我写的几乎全是反面的教训,并非我有意这样做,而是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我想说谎话,也能总结出甲乙丙丁几条所谓经验,但那有什么用处呢?我在一开始就说过:教训可以变为经验。我就是本着这个精神进行总结的。我们常说付学费,这就算是付学费吧!根据上面提出的几点教训,我想对今后编写外语教材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一　外语教材一定要相对地稳定

不要再发传单式的教材,也不要每一个学校自搞一套,这样浪费精力和金钱。国家教委搞统编教材,各校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加以补充,教材印刷要精美。

二　以地道外语为标准

不要选中国式的外语,选材也不要太偏重文学作品。语言随时都在变化,教材一定要反映这种变化。外语教材不能有“老三篇”。

三　政治标准

当然要有,但不要作茧自缚。只要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就行。有益的和无害的都能选。外语教材不是政治教科书。

四　教学计划和教学法要相对稳定

千万不要再朝令夕改。教学法可以求新,可以探索,但不能见异思迁。传统的教学法要有条件地继承。

中国道家主张“无为而治”。绝对“无为”是“治”不了的。但是“为”得太多,也同样不能“治”。这就是我的体会。

1988年9月20日

他们把美学从太虚幻境拉到了地面上

我不是美学家,但是喜欢读美学的书。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内,我读的美学书确实不算少,古今中外都有。读的结果怎样呢?并不高明。我的脑筋成了跑马场,让许多中外美学家在那里驰骋。而我自己呢,则仿佛坐在下界听美学家们在太虚幻境里相互问难,驳斥对方。各自祭起法宝——术语,投向对方。可是谁也打不着谁。下风逖听,声音嘹亮;仔细听去,介于懂与不懂之间。

我无意责怪美学家们。美这玩意儿确实是存在的;不但看得见,听得出,而且似乎也摸得着。但是却说不出。因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真正的美,绝对的美,似乎只存在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或者宗教家们的天堂乐园里。

但是,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朱光潜先生,一个是宗白华先生。在他们那里,美确确实实是存在于大地上的。50多年前,我在清华读书时,曾听朱先生讲"文艺心理学",在整整一年内,听朱先生的课成了一大享受。他能把欧美学者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深奥难测的道理用最简单朴素的语言解释得一清二楚,而且常常引用中国诗词来说明问题,使我们感到,他讲的不是海外奇谈,不是天上神话,而是有血有肉的中国道理。

至于宗白华先生,我最初并不认识。中学时候读过他的《三叶集》,有一点印象而已。院系调整以后,他来到北大,从此就认识了。有时候在路上相逢,便海阔天空地聊上一通。在宗先生那里,美学不是干巴巴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人生。他常说:"学习美学

首先得爱好美,要对艺术有广泛的兴趣,要有多方面的爱好。”他不慕荣利,爱好一切美的东西。美学同他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总之,在古今中外众多的美学家中,只有朱、宗二位先生让我感到亲切,感到可以亲近,他们把美学从太虚幻境里拉到地上来,我对他们真是由衷地感谢。

前不久有人送给我他同王德胜合著的《朱光潜宗白华论》一书。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不知道。我读完以后,更加强了我上面说的那些想法。我觉得,这真是本好书。

1988年9月23日

祝贺《外国语》创刊十周年

我是《外国语》的忠实的读者。创刊10年以来,我几乎每一期都读过。我从里面学习了不少的东西,那是不在话下的。我个人感觉到,在中国的外语界,上外的《外国语》、北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和广外的《现代外语》,宛如三峰鼎峙,光彩辉映全国。现在,《外国语》10周岁了,我表示衷心的祝贺,祝它长寿。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这三个刊物都应该扩大篇幅,增加分量。

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谈外语教学总结经验的问题。解放后进行外语教学工作,已经40年了。同解放前对比一下,会产生什么结论呢?我们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一想到这一些,我头脑里就有矛盾。40年来,我们在教学计划、教材和教学法三个方面所做的努力,远非解放前所能比。但是成绩怎样呢?我们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语人材,这谁也否定不掉。但是,在解放前,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学生看英文原著,基本上是不成问题的。外语系的学生听外籍教师用英文授课,也可以说是不成问题的。然而现在怎样呢?每一个大学都建立了庞大的公共外语(主要是英语)教研室,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教学生英语。结果只能培养一些半生不熟的人材。这当然与中学教育有密切联系,不能光怪大学。

专就大学本身而论,我们外语界的同仁们都能回想起来,40年来,我们在教学计划、教材和教学法三个方面付出的劳动量之大,已经无法计算了。这三个方面几乎年年都在变。随时有新精神、新办法从天外飞来,旧的一套刚刚实行,新的一套又来敲我们

的大门。而且,据说什么事情都要搞群众运动,这是真理。在这三个方面,我们年年都在搞群众运动。新精神一来,校(院)、系、教研室三级立刻行动起来,学习、体会、讨论,再学习,再体会,再讨论。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把个新精神、新办法体会得天花乱坠,人人兴奋,个个争先。然而,一转瞬间,新的就为更新的所代替。我们又要重新学习、体会、讨论了。到了今天,我们有一些人已经垂垂老矣,然而,在教学计划、教材和教学法方面究竟留下了多少切实可行的东西呢? 这不很值得我们三思吗?

在祝寿之际,本来不应该说这些有点泄气的话,然而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我相信,只要认账,教训是可以成为经验的。

1988 年 9 月 24 日

祝　　词

——致全国非通用语种外语教学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

各位同志、各位代表：

中国非通用语种外语教学研究会在洛阳开会，我因为在北京有其他的会议，又要为赴香港做准备工作，不能来参加，请同志们原谅！

我们国内的外语教学，除了像英文、日文这样的流行语种外，都碰到各种各样不同而又基本相同的困难，非通用语种尤甚。我个人认为，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目前存在于我国教育中的种种不正常，有时甚至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我认为也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从我国长远的社会主义建设来看，这种现象有朝一日必须而且可能扭转。我只希望我们全体同志们正视这种现象，而又不要失掉信心，总有一天会否极泰来，苦尽甘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极其优秀的传统，在今天这样走华盖运的低潮中，我们的知识分子表现得更是特别突出。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声明，昭告天下，要把知识分子从老九提高到老大老幺，我们是有希望的。

祝大会圆满成功，同志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988年10月15日

祝贺《文史知识·齐文化专号》

近几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多次掀起了探讨文化问题的高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符合发展规律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就算是初级阶段吧，如果只抓科技，而不注意文化，发展下去必有偏颇。

在探讨文化问题的高潮中，又出现了专门探讨地区文化的热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样也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因为，对文化问题探讨得越细，必然导致探讨专门文化或地区文化。

专就山东一省的文化而论，过去笼统称之为齐鲁文化，实则齐文化和鲁文化并不完全是一码事。现在对这两个文化都有专家学者在探讨。齐文化的中心就在目前淄博市范围以内。无论是历史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证明此地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最近几年，淄博市经济飞跃发展，市的领导转而注意齐文化的探讨，我们不能不说这是高明之举，这是目光远大之举。对齐文化的探讨必将有助于以淄博市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这是可以断言的。

因此，我对"齐文化专号"的出版表示祝贺。

1988年12月14日

文学批评无用论

读最近一期的《文学评论》,里面有几篇关于"红学"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有的作者既反省,又批判。有的作者从困境中找出路。有的作者慨叹,"红学"出了危机。如此等等,煞是热闹。文章的论点都非常精彩,很有启发。但是,我却忽然想到了一个怪问题:这样的"红学"有用处吗?对红学家本身,对在大学里和研究所里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当然有用。但是对广大的《红楼梦》的读者呢?我看是没有用处。

《红楼梦》问世二百年以来,通过汉文原文和各种译文读过本书的人,无虑多少个亿。这样多的读者哪一个是先看批评家的文章,然后再让批评家牵着鼻子走,按图索骥地去读原作呢?我看是绝无仅有。一切文学作品,特别是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内容异常地丰富,涉及到的社会层面异常地多,简直像是一个宝山,一座迷宫。而读者群就更为复杂,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社会经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心理素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爱好——还可以这样"不同"下去,就此打住——,他们来读《红楼梦》,会各就自己的特点,欣赏《红楼梦》中的某一个方面,受到鼓舞,受到启发,引起了喜爱;也可能受到打击,引起了憎恶,总之是千差万别。对这些读者来说,"红学家"就好像是住在"太虚幻境"里的圣人、贤人,与自己无关。他们不管"红学家"究竟议论些什么,只是读下去,读下去。

因此我说,文学批评家无用。

不但对读者无用,对作者也无用。查一查各国文学史,我敢说,没有哪一个伟大作家是根据文学批评家的理论来进行创作的。

那么,文学批评家的研究不就是毫无意义了吗?也不是的。他们根据自己的文学欣赏的才能,根据不同的时代潮流,对文学作品提出自己的看法,互相争论,互相学习,互相启发,互相提高,这也是一种创作活动,对文学理论的建设会有很大的好处。只是不要幻想,自己的理论会对读者和作者有多大影响。这样一来,就可以各安其业,天下太平了。

上面这些话其实只有幼儿园的水平。可是还没有见有什么人这样坦率地说了出来。就让我当一个“始作俑者”吧!

1989年1月26日

祝贺《文献》华诞十周年

我是《文献》的忠实读者,对《文献》虽无偏心,但有偏爱。

这种偏爱不是没有理由的。五六十年以来,我浏览过的中外文杂志无虑数百种。最初我对什么杂志都是一视同仁,没有偏见。但是在浏览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一些看法。我最不喜欢,甚至最害怕是那些专门讲"理论"的杂志,它们巍然俨然,调门很高,令人读而生畏,不由得不跟它们走。然而过了不久,正当我们努力紧跟的时候,被跟随者自己的调门却变了,甚至是180度的大变——我惘然了。

反观有一些被"理论家们"视为"资料性"的杂志,却既无石破天惊的宏论,也少哗众取宠之心,本本分分,朴实无华。这些杂志真正吸引住了我。那些调门特高的杂志,往往"蟪蛄不知春秋",活不多久,而朴实无华者则永不褪色,几十年前出版的旧本到今天还有人努力搜寻。

我认为,《文献》就属于这一类杂志。现在它出刊10年了,我预祝而且相信,它将会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继续出下去,在中国和世界学坛上,放出光芒。

1989年3月9日

《历史研究》创刊三十五周年祝辞

《历史研究》创刊35周年了。第一任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编委到现在剩下的也没有几个人了。我有幸是其中之一,既感光荣,又多感慨。35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这个刊物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但总起来看,是经受住了考验的。谁都知道,这并不容易。

从最近几年的大学招生情况来看,历史科学越来越受到冷落。我们从事历史科学研究的人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但是原因何在呢? 又有不同的说法,是历史科学不重要吗? 当然不是。历史科学的用途何在,自古以来中外学者就争论不休,至今也还没有人人都承认的结论。对于历史的研究方法,意见也有分歧。在这方面,我自己走了一个中间道路:过去的传统方法,比如历史考据之学等等,我既不全盘接受,也不全盘否定。近若干年来,中外新兴起的研究方法,我对它的态度也是如此。这种态度不是迹近滑头吗? 恐为仁人志士所不取。但是我却觉得这是正确的态度。

为什么青年学生不愿意学习历史呢? 其中原因很多,出路恐怕是重要的一个。有的人认为历史无用,也是重要原因。我个人一向认为,历史是有用的。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历史知识能行吗? 我们研究古今中外历史,甚至各专门学科的历史,都能直接或间接地为这个伟大目的服务。比如自古以来常讲的鉴古知今,就非常有道理。历史循环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我记得马克思在什么地方讲过,历史上一些现象有时会重演。只是这一条不就很重要很有启发吗?

我个人觉得,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不能说已经很好很好了,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事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对古今中外的历史都研究得很不够。鲁迅先生从前提倡过写流氓史、娼妓史等等,我认为他的意见很有道理,可是这样的书我们已经都有了吗?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牵涉到的问题异常繁多,个个问题都需要有点历史的认识,工作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就会走弯路。比如人口问题,土地利用问题等等,都是历史上有过而今天仍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吗?没有,至少是做得很不够。我很希望,特别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能够扩大视野,开阔胸襟,放眼世界,面向未来,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对旧的研究课题要继续深入探讨,又要注意开发新的领域,新的课题,使我们的史学园地真正万紫千红,五彩缤纷。

至于对本刊的期望,也无非是老生常谈:百花齐放,兼容并包(反动的不在此列)是最正确的方针。我们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步,今后还应加强。

总之,我认为,历史科学是有光辉灿烂的前途的,我们的《历史研究》也是有光辉灿烂的前途的。我们从事这门科学研究的老、中、青年,都不要泄气,而是要鼓足干劲。这就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

1989年6月26日

《文史知识》百期祝词

我承认,我对《文史知识》有所偏爱。但是我的偏爱不是没有根据的。

很多年以来,我每月都收到大量的杂志。由于数目过多,我真正认真去阅读的,读得很仔细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文史知识》是其中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爱。

偏爱的根据何在呢?

我先谈一点印象。我对《文史知识》的印象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严肃、庄重、典雅、生动。我想,不用我解释,大家也会明白的。多少年来,社会上风浪叠起。然而我们的《文史知识》却始终保持住自己的严肃庄重的风格,不为外物所动,决不刊登追逐时髦的文章,也从来没有登过一篇满篇怪异术语令人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文章。我们的文章是谈学术的,有的还非常专门。然而我们的刊物上几乎没有刊登过烦琐、冗长、枯燥乏味的高头讲章,也没有见过以艰深饰浅陋的文章。比较深奥的学术问题,读来总是娓娓动听,意味盎然,亲切动人。这是难能可贵的。

从过去的一百期上可以看出来,我们的作者面相当广。这样广的作者,何以文风又如此地比较一致?我们也没有像从前的《语丝》、《新月》、《学衡》等等那样,是一个同人刊物。一个同人刊物,文风比较一致,是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文史知识派”,我们不能算是一个同人刊物。然而表现出来的却真像是一个同人刊物。作者几乎都是认真、严肃的,文章几乎都是典雅、

生动的。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现在办刊物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叫苦的:纸张贵,订数少,倘不“下流”,则无法招徕顾主。可是我们的《文史知识》据说读者群是比较稳定的。这表明,一方面,读者是有水平有眼光的;另一方面,我们的路子是对的。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只能欣赏“大美人”,或者只读“什么河渗案”。读者中确有认真严肃想求得文史方面的新知识的人。我认为,这又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评论文学艺术之类的东西时,常常用两句现成的话:阳春白雪,意思是曲高和寡;下里巴人,意思是合乎人民大众的口味,因而受到广泛的欢迎。我们的《文史知识》却是曲高而和不寡;能满足人民大众中一部分人的需要,又不过分浅显。可以说是融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于一体。这更是难能可贵的。

我在上面说的话几乎是一曲赞歌。我们不是常讲要一分为二吗？一分为二是真理,这里为什么没有了呢？我坦白承认,我再三推敲,对于这个一我实在分不出二来。限于我的水平,我目前只能做到这个程度,这要请读者原谅,我将继续推敲而且追索。

最后,我想提一个建议。我们讲的“文史”,我看主要是指中国文史。就算是中国文史吧,它现在已经不限于中国一国,而是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刊登一些世界其他国家讲中国文史的文章或者研究动态。这将有利于开阔我们的眼界(我们现在的眼界是非常不开阔的),增长我们的知识,加强对外部信息的了解,最终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1989年7月17日

关于中国弥勒信仰的几点感想

我正在为我译释的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写一篇相当长的导言。我考虑了一些有关弥勒信仰的问题,现在讲一点。

在中华民族中,汉族不能算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民族。我们信的宗教最大最古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土生土长的道教,一个是从外面传进来的佛教。除了道士和和尚尼姑以外,老百姓信这两种宗教都信得马马虎虎。佛教庙里有时有道教的神,反之亦然。而且佛道两种庙里有时竟会出现一个孔子、一个关圣帝君文武二圣人。在过去,有钱的阔人家里办大出丧,既请和尚念经,也请道士,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一团和气,处之泰然。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一次宗教战争。

然而在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方面，汉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却表现出了非凡的本领，其他民族望尘莫及。专就弥勒而论，他本是佛教中的未来佛，在佛教教义中有突出的地位。然而一到中国，人们把他塑在每一所佛教庙里。一进山门，首先看到的那一位肚皮肥大、胖胖的、面含微笑的佛爷就是弥勒佛。除了让人们觉得好玩以外，谁还会想到他是什么未来佛呢？其他佛爷像前香烟缭绕，热热闹闹；他的像前则往往是烟销火灭，冷冷清清。

可是，换一个场合，当皇亲国戚或达官贵人，甚至平民老百姓，想进行政治斗争的时候，却忽然想起了这一位佛爷，觉得他

这个未来佛的头衔颇可以加以利用了。

我先举一个最著名的例子。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唐代的武则天，以一妇女而贬子窃位，不得不想尽种种方法为自己洗刷，为自己涂脂抹粉。公元690年（载初元年，天授元年），沙门怀义与法朗等十人进《大云经》，陈符命，说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作阎浮提主。则天大喜，制颁天下，到处建立大云寺。武则天本人未必相信什么未来佛。有人说她是弥勒降生，从佛教教义上来看也是荒唐可笑的。然而对武则天来说，这却是天大的一根稻草，非牢牢抓住不可。到了695年（证圣元年，天册万岁元年），她又给自己加上了“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就是弥勒的意译。可见她真正俨然以弥勒佛自居了。

弥勒，皇帝能利用，民间也能利用。这样的记载从很早的时候就有。《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大业）六年（610年）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陈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同书载：“（大业）九年（613年）十二月丁亥，扶风人向海明举兵作乱，称皇帝，建元白乌。遣太仆卿杨义臣击破之。”这个向海明也自称是“弥勒出世”。仅在隋炀帝大业年间，这样自称弥勒佛作乱的事情就出现过两次。到了唐代，甚至唐代以后，这样的事情屡次发生。革命的农民也有假“弥勒降生”的名义聚众兴兵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

中国人民利用宗教信仰达到政治目的，对象决不止弥勒一个。利用佛教其他神灵者有之，利用道教者有之，利用摩尼教者有之。本文专谈弥勒，其他就不谈了。我认为，连太平天国也是利用耶稣教的，洪秀全并不是一个虔诚的耶稣教徒。

总之，汉人对宗教并不虔信，但是利用宗教却极广泛而精明。

这在汉族的民族性中是优是劣,由读者自己去评断吧。

1989年7月28日

困难虽在目前，希望却在将来

我现在越来越感到，回忆比较容易，展望却真难。我简直不知道，从何处展望起。说一些空话、废话，无补于事，于己于人都没有用处。

是不是就看不到任何可以展望的东西了呢？也不是的。我对人类美好前途的信念始终不变。困难虽在目前，希望却在将来。人类、包括我们国家在内，总会越来越好的。我反对那种愁眉苦脸的世纪末的哀鸣。

我的意思也决不是，只要把枕头垫得高高的，安然酣睡，馅儿饼就自己从天上掉进嘴里。我们非要努力不行，而且要十倍地努力。

屈原在《卜居》里高呼："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不敢说，我们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但是难道说一点这样的影子也没有吗？郭沫若说："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对于瓦釜加以不恤的打击，我以为这也是批评家所当取的态度"。我同意这个说法。

对政界、财界的情况，我若明若暗，不敢赞一辞。我现在近似一个井蛙，我往往只看到学界，学界也是有黄钟和瓦釜的。现在双方都在鸣，但还不一定是"雷鸣"。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是，拿出良心，尽上力量，让瓦釜少鸣，或者不鸣，让黄钟尽量地多鸣，大鸣而特鸣。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步，则"瓦釜毁弃，黄钟雷鸣"之日必将到来。我们要高呼"猗欤休哉"了。

1989年11月4日

新年展望

再过两年,我就要在古稀之后再上十岁了。在古代,这简直是了不起的高寿。然而在今天,在我身上,也不过是微露老态,尚未龙钟的水平而已。看来距离八宝山还有一段路。我还是要向前看的,而且决不会像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里说的那样——向前看只看到坟墓。

前几年,当我初有迟暮之感的时候,我喜欢说些豪言壮语,什么"人间重晚晴"之类的话常常出现在我的文章中。现在看来,未免有点可笑。人间决不重晚晴。勉强这样说只不过像是深夜旷野独行者的高声唱歌,壮壮胆子,自欺欺人而已。

因此,我现在向前看,不说空话,不在深夜中高声唱歌,只说几句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话,表达我对新的一年的,对九十年代的一点希望。

我有一个坏(好?)习惯,我喜欢同时进行多项工作。我觉得,这样做有很大的好处。干一件事,累了,立刻换一件。这样一来,脑筋就像是新磨的利刃一样锋利无比。用这样的新"磨"的脑筋来思考问题,时有梦笔生花之感,奇妙不可思议。

在新的一年里,在九十年代里,我仍然将一仍旧惯,多项工作齐头并进。

首先是想把进行了多年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工作做一个结束,将来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我正在为这个本子写一篇非常长的导论,我希望明年春天就能够写完。

第二件工作是给台湾一家出版社写一部《中国敦煌吐鲁番吐火罗文研究导论》,明年必须定稿出版。

第三件工作是继续《糖史》的研究。我对科技甚少通解。这一部书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来写的,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写成了一些文章。希望明年就能写完。

我还有一个习惯(好坏不知),喜欢在进行大工作的缝隙里,触景生情,灵机一动,写出一些较短的论文。这种“灵机”是我无法掌握的。有时简直像“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对于这种“灵机”,我做不出计划。我只虔诚希望,明年和九十年代这种“灵机”多光顾几次。

以上这些话好像是一个平庸而又美妙的梦。但愿这个梦能实现。

1989 年 12 月 8 日

后　　记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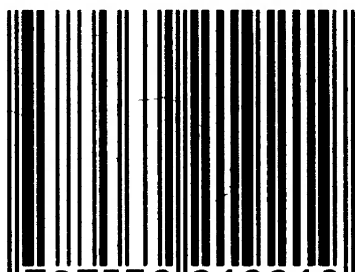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开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

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 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这与我写一些文章有关。因写“后记”,触发了我的感慨,所以就加了这样一条尾巴。

1995 年 3 月 18 日



ISBN 7－5392－1921－1/Z·13

定价：55.00元